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中东战争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 再 版 说 明

本书曾以《中东战争实录》作为《当代战争实录系列》之一印行。现改名为《中东战争》，作为《战后四大战争》之一再版。

1995年7月

## 中东战争

## 作者前言

中东战争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自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来，战火持续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就有五次之多，对中东地区及全世界的和平、安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东地区横跨欧亚非大陆，不仅地理位置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地下资源极为丰富。中东石油蕴藏量占全世界已探明储量的 65% 以上，石油日产量占全世界的 1/4 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一直是全世界瞩目的斗争热点地区。这里的矛盾错综复杂，不仅有列强与中东地区国家和人民的矛盾，而且在新老殖民主义之间，在阿拉伯国家之间，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中东是个名副其实的“火药库”，又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石油库”，一旦战火燃起，就会影响全世界。

笔者在本书中，根据多年搜集的大量材料，翔实地描述了中东国家和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所进行的斗争，记述了阿以矛盾的由来及其所进行的五次战争，记述了大国的角逐。对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及产油国家运用石油这一武器的斗争情况，在书中也作了比较充分的反映。同时笔者还根据有关国家近年来公布的鲜为人知的材料，对阿拉伯民族英雄、反帝旗手纳赛尔，对中东国家及美国、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元首，以及为中东和平进行穿梭斡旋的基辛格等人的活动和心态，作了真实的描述。

愿本书的出版对读者了解中东有所裨益。另外，伊拉克和伊朗的 8 年战争，性质与阿拉伯、以色列之间的五次中东战争有别，书中仅用淡墨提及，未作详细记述。1990—1991 年的海湾战争，也属另一性质的战争，另有专册详细撰述。特敬告读者。

解力夫

一九九三年十月于北京

## 第一章 中东战略地位

横跨地球三大洲，战略要冲扼咽喉；  
地下宝藏世无双，乌金滚滚似海流。

在世界东半球的中心，欧、亚、非三大洲的连接处，有一片辽阔而富饶的地带，这就是中东地区。它是欧洲的侧翼，欧、亚、非三洲的交通枢纽，境内有沟通印度洋与大西洋的苏伊士运河，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中东”这个名称，是在公元 16、17 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向东侵略扩张时使用起来的。他们以欧洲为中心，按距离远近，把东方各地分别称为“近东”、“中东”和“远东”，后来便成为对这些地理区域的习惯称谓。“近东”和“中东”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的划分，现在所说的中东一般是指亚、非、欧三大洲相连接的地区，主要是亚洲西部一带。它东起伊朗高原，西达埃及和地中海东岸，北至黑海和高加索，南临亚丁湾和阿拉伯海。除伊朗和埃及与大陆联成一块外，其余的部分都位于地中海、黑海、里海、阿拉伯海和红海之间，因此，中东又被称为“五海之地”。

从地理位置上看，中东处于东半球大陆的中心和欧洲侧翼，是亚、非、欧三大洲的汇合点和交通枢纽，由此向东可通往印度洋和南亚、东南亚各国，向西进入地中海，向西南可达非洲各国，向西北则与东、西欧各国相通。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不仅沟通了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联系，而且使西欧到印度洋之间的航程比绕道非洲好望角缩短了 8000 至 1 万公里。此外，土耳其的黑海海峡、塞浦路斯及其周围的水域、亚丁湾及其曼德海峡、波斯湾及其霍尔木兹海峡等等，又分别是沟通黑海、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海的交通要道和从中东到欧洲的重要石油通道。因此，这里一向被西方帝国主义称之为“生命线”，历来就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场所。

在中东 74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 1.5 亿多人民，分布着 17 个国家。它们是：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塞浦路斯、黎巴嫩、也门共和国、伊朗、沙特阿拉伯、约旦、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些国家的民族构成相当复杂，约有 20 多个民族，最主要的是信奉伊斯兰教和讲阿拉伯语的阿拉伯民族，约占中东全部人口的一半以上。在很多国家中，阿拉伯民族占绝大多数。土耳其是以土耳其族为主，伊朗以波斯族为主，塞浦路斯以希腊、土耳其族为主，并分别把土耳其语、波斯语和希腊语定为国语或官方语言。此外，还有库尔德人、土库曼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以及少量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非洲人和欧洲人等外来移民。

中东是世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每年前来这里朝拜的教徒高达 150 万人以上，中东有 80% 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余的则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和东正教，还有少数人信奉拜火教。耶路撒冷是中东地区的历史古城，这里有犹太教的神庙和伊斯兰教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基督教也把它奉为“圣地”。可见，宗教信仰在中东地区居民的精神生活中和政治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国家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写入宪法，甚至成为政治组织的基础。

中东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波斯湾及其周围广大地区蕴藏着石油资源，有“石油海洋”之称。据统计，其蕴藏量约占全世界的 2/3 以上。近几年来，

中东地区石油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2/5，出口量约占世界出口量的 2/3。

海湾地区素有西方世界“经济生命线”之称，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供应基地。截止 1991 年 1 月 1 日，海湾地区探明石油储量达 6569 亿桶，占世界探明石油储量 1 万多亿桶的 65%左右。从 1980 年到 1991 年，11 年间世界探明石油储量增长了 3506 亿桶，其中 87.6%是在海湾地区探明的。

迄今世界探明石油储量最多的 5 个国家全部集中在海湾地区。它们是：沙特阿拉伯，2575 亿桶；伊拉克，1000 亿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978 亿桶；科威特，945 亿桶；伊朗，930 亿桶。按 1990 年的开采速度，沙特阿拉伯可开采 100 年；伊拉克可开采约 150 年；阿联酋可开采约 126 年；科威特可开采约 173 年；伊朗可开采约 81 年。

1990 年，海湾地区的石油平均日产量达 1600 万桶，比 1989 年增长 2.7%，占世界石油平均日产量 6031.7 万桶的 26.5%。其中沙特的平均日产量达 621.5 万桶，增长 24.4%；阿联酋的平均日产量为 213 万桶，增长 12.9%；伊朗的平均日产量为 312 万桶，增长 11.4%，伊拉克和科威特因众所周知的战争原因，分别减产 28.1%和 32.2%。

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地区，在石油资源储量和产量方面，沙特阿拉伯居首位。这个国家位于阿拉伯半岛。东濒波斯湾，西临红海，同约旦、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阿曼、也门共和国等国接壤。海岸线长 2437 公里。地势西高东低。西部是希贾兹—阿西尔高原。其南端的希贾兹山脉，海拔 3000 米以上。中部为纳季德高原。东部为平原。红海沿岸地区是宽约 70 公里的红海低地。沙漠约占全国面积的一半。据地质学家说，沙特的条件是非常适于石油生成的：在古地中海的大地槽内，有长时期的连续沉积，其结果使得石油生成于若干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岩层内；古地中海是暖海，因而富于动物生命；进一步的事实是，尽管发生过广泛的褶皱运动，但由于下伏的结晶地台的存在，广阔的地壳强度被削弱了，多孔地层常常发生，形成了丰富的储油构造。早在 1988 年初，这个国家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即为 350 多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 1/4 以上。1990 年初又发现一个大油田，储油量至少有 300 亿桶。天然气储量为 71641 亿立方米，为世界之冠。

国际石油专家们认为，世界剩余石油生产能力的 65—70%存在于海湾地区。今后 5 到 10 年内，海湾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力可增长到日产 2500—2800 万桶。届时，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在世界石油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将上升到 35—40%。据美国政府预测，到本世纪末，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每天的石油出口量将由 1989 年的 1360 万桶上升到 1990 万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集团，也是海湾石油最大的供应对象。1989 年日需求量 3750 万桶，1990 年日需求量上升到 3770 万桶。随着石油需求量的不断上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从海湾地区的石油进口量大幅度增加。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从海湾地区进口的原油由 1985 年的每天 24.6 万桶激增到 1989 年每天的 176.9 万桶。其中从沙特进口的原油从 1985 年每天的 13.2 万桶上升到 1989 年的每天 111.9 万桶。

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它进口的石油绝大部分来自海湾。据《中东经济文摘》报道，1990 年上半年，日本每天从海湾进口的石油达 273 万桶，占其每天进口总量 380.25 万桶的 71.78%。从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进口的石油分别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了 58%、28%和 15%。据设在卢森堡的欧共体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89 年欧共体 12 个成员国从伊朗和沙

特进口的原油分别为 4990 万吨和 4920 万吨，分别占其原油总进口量的 12.5% 和 12.4%。同年欧共体从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进口的原油分别为 3030 万吨、1310 万吨和 780 万吨。

原来几乎由前苏联包下来的东欧国家的石油需求量，由于苏联解体及俄罗斯石油出口战略的调整，今后东欧国家石油需求量的相当一部分将不得不转向海湾地区进口。又据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杂志报道，1985 年亚大地区进口的石油，67% 来自海湾产油国，1990 年上升到 73%，1995 年将上升到 83%，2000 年将上升到 90%。

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从整个 90 年代或更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由于俄国和美国等一些老牌石油生产国的石油产量已越过了高峰期，出现了逐年递减的颓势，今后世界新增石油需求量将主要依赖于海湾地区。欧佩克秘书长苏布罗托预测，世界石油需求量将由 1989 年的每天 5180 万桶增长到 1995 年的每天 5600 万桶和本世纪末的每天 5800 万桶。国际能源机构首席经济顾问乔治·科瓦尔斯基说，到 2005 年，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石油产量每天将减少 400 万桶。世界石油需求量的增加和非欧佩克石油生产的下降，增强了世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从 1988 年到 2005 年，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量在世界石油总供应量中所占的份额将增加 10 个百分点，即由 24% 增至 34%。这样一来，更增加了中东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除石油外，中东地区的天然气资源也很丰富，已经探明的储量有 213000 亿立方米，其中储量最多的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这三个国家的储量是 178000 多亿立方米。其他矿物资源，如铬、铜、铁、磷酸盐、锰、锡、镍、锌、钨、铝、金、石墨、盐、石棉、云母等也较丰富。据估计，死海中氯化物储量在 420 亿吨以上，其中氯化镁 220 亿吨，氯化钠 120 亿吨，氯化钙 60 亿吨，氯化钾 20 亿吨，此外还有溴化镁 10 亿吨。中东地区可利用的水力资源达 1000 亿千瓦时。有草原 13780 多万公顷，森林地 3920 多万公顷。此外，波斯湾盛产多种鱼类及珍珠。

中东还是人类的摇篮，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文明。历史上有名的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流域和幼发拉底河流域，都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勤劳、勇敢的阿拉伯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很早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他们在医学、数学、天文学、建筑、文学艺术、工艺等各方面，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世界文明宝库增添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位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 6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早在公元前 3500 年，埃及人民就发明了文字，并有了文学创作。围绕着尼罗河的泛滥和控制尼罗河水的斗争，他们积累了天文知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计算出尼罗河水位变动的必要，产生出了埃及的天文学。”埃及人民还创造了古代的历法，把尼罗河水开始泛滥定为一年之始，他们还发展了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公元前 2000 多年就能求出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和圆的面积，确定圆周率为 3.16，并创造了十进位的演算方法。同时在水利工程技术、医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埃及的建筑艺术，著名的金字塔就是古代世界建筑的宏伟工程。早在公元前 2800 年，埃及就有了金字塔建筑。这种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在全埃及共有 70 多座，其中最有名的是矗立在开罗近郊的三座。第四王朝第二个国王胡夫的金字塔规模最大，高 146.5 米，相当于一座五六十层的摩天大楼，底面每边长 230 米，占地 56900 平方米。这座金字塔

是用 230 万块大小不等、平均每块重量为 2.5 吨的巨石砌成的。整个建筑细致精密，坚实牢固，将近 5000 年，一直屹立在尼罗河畔，蔚为壮观。这样巨大的建筑，生动地体现了古代埃及劳动人民的卓越智慧和创造才能。

古称波斯的伊朗，也是一个具有四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上古时期的波斯人居住在伊朗高原南部。公元前 550 年，伊朗较大部族阿黑门尼德族的居鲁士把各部族统一成为波斯帝国，建立了阿黑门尼德王朝。到大流士一代统治时期（公元前 522 至前 486 年），波斯帝国达到全盛时期，在文化、建筑、艺术和手工业方面已有高度发展。

当时，波斯人所用的文字是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在建筑艺术上，已能建造每根柱子高达 18 米至 20 米的百柱大殿，并在建筑物上饰以石雕、琉璃砖、壁画、木刻和象牙雕刻等。从公元 224 年开始，伊朗进入萨珊时代，文化更为发达。这时的手工业大都已经和农业分开，并有了高度的发展。艺术手工业的作品非常驰名。例如织造业，萨珊王朝的丝织品被视为特别珍贵的艺术品而远销国外。此外，染料、地毯、麻布、呢绒和丝绸等产品也畅销于地中海沿岸和亚洲各国。

到了公元 9 至 10 世纪，伊朗各族，特别是伊朗东部各民族的文化、科学以至医学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当时许多著名的东方史学家、哲学家、地理学家都是伊朗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阿维森纳和比伦尼。阿维森纳的哲学著作和医学著作都达到了中东地区中世纪科学的高峰。阿维森纳的名著《医典》，从 12 世纪到 16 世纪一直被西方医学界视为权威著作。比伦尼在当时则被称为中世纪时期东方和全世界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关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假说。他对天文的观察，尤其对经纬线的制定，更为准确。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中东人民对人类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

中东地区所处的重要战略位置及其富饶的自然资源，使它很早就成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凯觐的目标和激烈争夺的场所。早在 1798 年 7 月，法国拿破仑就率领远征军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登陆，强占开罗，企图以此作为与英国争夺的基地。1801 年，法军被迫撤出埃及之后，英国殖民者又乘虚而入，加紧经济渗透，使埃及成为英国的棉花主要供应地。19 世纪 20 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势力开始伸向波斯湾，把许多阿拉伯酋长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1839 年，英国殖民者占领了亚丁，并向附近扩张，强迫毗邻的 20 多个苏丹国和酋长国签订所谓“保护条约”，组成“亚丁保护地”。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在土耳其和伊朗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正如列宁所说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这时，中东各国便成为英、法、沙俄和后起的德国等西方列强拼命争夺的对象。1869 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为了控制苏伊士运河，确保通向印度和远东的重要通道，英国于 1878 年占领了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继而又在 1882 年凭借其坚船利炮，占领了埃及，并逐步排挤法国的势力，使埃及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列强对波斯湾及其沿岸各酋长国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英国野心勃勃，法国、沙皇俄国和德国也不甘示弱，都力图插足这个地区。争夺的结果是英国先后强迫阿曼、巴林、麦什哈特阿曼（即现在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各酋长国缔结了一系列保证英国享有垄断特权的协定，把波斯湾各酋长国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或保护



国，把波斯湾视为“英国的内湖”。

伊拉克、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仍然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逐渐崩溃和土耳其沦为半殖民地，英、法、俄等帝国主义千方百计要瓜分土耳其的“遗产”，使伊、叙、约、黎和巴勒斯坦也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东的另一个大国伊朗则沦为沙俄和英国的半殖民地。

在列强瓜分、抢夺中东殖民地的狂潮中，英国固然是野心勃勃，到处伸手，然而被列宁称为“世界宪兵”的沙皇俄国，其扩张野心也并不亚于英国。17世纪末，沙皇俄国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彼得一世早就盘算过在土耳其的废墟上放上自己的宝座。”为了达到南下夺取出海口，建立世界霸权的目的，沙皇曾多次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争夺亚速夫要塞，以便打通进入黑海的门户。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上台后，更加积极地推行瓜分土耳其帝国的政策。1768年，沙皇派出陆军，南下进攻土耳其，又调遣波罗的海舰队陈兵于地中海。土耳其屡战屡败，沙皇俄国打通了进入黑海的通道。

为了进一步开辟一条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通道，好几代沙皇都梦想夺取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1851至1853年，沙皇借口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的所谓监护权问题，对土耳其施加压力，几次提出对土最后通牒，要求土耳其签订条约，承认沙俄对土耳其属下的基督教徒有所谓保护权，企图干涉土耳其内政，进而达到霸占土耳其两个海峡的目的。

土耳其由于得到英法的支持，拒绝沙皇的无理要求。于是，1853年10月沙皇对土耳其发动进攻。英法为了各自的私利，打着维护土耳其独立的幌子，派舰队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对俄国宣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沙皇俄国失败，它向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扩张势力的企图受到沉重打击。沙皇俄国不甘心失败，伺机反扑。1877年4月，沙皇俄国利用巴尔干斯拉夫民族的反土起义，再次发动对土战争。俄军强渡多瑙河，直逼君士坦丁堡。1878年3月，土耳其被迫与沙俄签订《圣斯蒂法诺和约》。

这个和约影响了英法等西欧列强的既得利益，遭到这些国家的强烈反对，沙俄被迫退却。1878年6月召开柏林会议，修改《圣斯蒂法诺和约》。这是一次列强坐地分赃的会议。沙皇俄国虽未完全达到南下夺取海峡、进入地中海的目的，但它掠夺的土地最多，获得的权益也最多。俄土战争的结果，使土耳其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在列强之间，由于沙皇俄国的野心未能得逞，矛盾逐步加深，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火种。

沙皇南下的计划，除了瓜分土耳其外，还要占领伊朗，把伊朗作为它的投资场所、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而且把夺取伊朗作为插足波斯湾、控制印度洋、夺取英属殖民地印度、实现世界霸权的重要步骤。沙皇俄国最初入侵伊朗是在彼得大帝时代。1722年8月，彼得一世亲自指挥俄军进攻伊朗藩属塔尔克至沙姆哈尔领地，以后又占领了巴库，进逼伊朗国境。1723年伊朗被迫在彼得堡签订和约，把整个里海沿岸，德宾特、巴库、吉梁、马赞德兰、阿斯特拉巴德省等地割让给俄国。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俄、英、法西方列强加紧争夺伊朗，使伊朗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1800年末，沙皇保罗一世与法国拿破仑缔结了俄法两国取道伊朗联合进军印度的协定。1801年初，沙皇派225000名顿河哥萨克军队向伊朗进军，占领了格鲁吉亚。亚历山大一世继位后，继续派兵侵入伊朗，攻占高加索山

脉以南的许多地方。1813年10月，伊朗被迫签订了《古利斯坦条约》，使沙俄取得了高加索山脉以南属于伊朗的大片土地，并在伊朗获得种种特权。

1826年，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兵占据了伊朗塞凡湖边的哥克查地带，并无理要求伊朗放弃卡藩，作为俄国撤兵的交换条件。这遭到伊朗的拒绝。于是，沙俄再次发动对伊朗的战争。1828年2月，伊朗被迫签订了《土库曼彻条约》以及一项特殊通商条约。按照这个条约，沙俄又夺取了伊朗的两个省，伊朗付给沙俄200万英镑的赔款，禁止伊朗船只在里海岸边的领水内航行，俄国在伊朗各大城市设立领事馆并享有治外法权以及其他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等等。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土库曼彻条约》已将它（指伊朗）变成俄国的附属国。”马克思也指出：“俄国……在波斯获得的领土面积不亚于一个英国。”

《土库曼彻条约》的签订极大地加强了沙俄在伊朗的侵略势力，严重地妨碍了英国攫取伊朗的侵略行动。英国为了进行反击，一方面鼓动伊朗抵制沙俄的扩张，另一方面又用军事威胁等手段强迫伊朗于1841年同英国签订奴役性的《英伊条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英俄两国瓜分伊朗的局面。伊朗王位的继承要由沙俄决定，北方各省的统治者要从俄国政府所中意的人中任命；在南方，英国官吏则像统治者一样作威作福，发号施令。随后，新兴的德帝国主义也开始插足中东。从此，英、俄、德三国便加紧掠夺和分割伊朗，更进一步加深了伊朗的半殖民地化。

但是，中东各国人民是不甘心受侵略、被奴役的。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铁蹄踏上中东领土的那天起，阿拉伯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就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暴动、起义接连不断，中东人民痛击侵略者，用鲜血谱写了中东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壮丽篇章。

在近代史上，埃及人民反抗法、英殖民侵略的斗争占有重要地位。1798年7月，法军入侵埃及时，埃及人民英勇地抵抗了法国的入侵。10月，开罗爆发了有15000人参加的反法武装起义，近郊的农民和沙漠地区的游牧者也投入战斗，起义者击毙了法军司令，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1800年，开罗人民再次举行反法起义，并展开游击战，终于迫使法军于1801年撤出了埃及。1882年，当英国侵略军炮轰亚历山大港、武装侵略埃及的时候，埃及的爱国军官阿拉比等决心保卫祖国，领导埃及军民坚决抵抗英国侵略军。

英国武装占领埃及后，实行血腥的恐怖统治，恣意摧残埃及原有的民族工业，极力破坏埃及的民族文化，残酷镇压人民的反英斗争。但是，英国暴虐的殖民统治无法扑灭埃及人民要求自由、争取民族独立的熊熊烈火。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及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实行议会民主制。他们创办各种刊物，开展反英宣传。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丹沙微事件”成为埃及反英运动的新的导火线。

1906年6月，一群英国军官去丹沙微村猎捕鸽子。他们穷凶极恶地践踏庄稼，火烧农舍，枪杀农民。当地农民忍无可忍，用棍棒奋起自卫，赶走英国军官。一个军官逃跑中暑而死。英国殖民当局竟无理宣布该村农民有罪。埃及各地群众闻讯后义愤填膺，纷纷举行大会和示威，抗议英国殖民者的罪行。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英国被迫作了让步，赦免了被判刑的农民，撤销了统治埃及25年的“东方暴君”克罗默埃及总领事的职务。

波斯湾沿岸各酋长国的人民在反殖反帝的斗争中也占有光荣的一页。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侵占阿曼、巴林、伊拉克及伊朗沿岸时，遇到当

地人民的强烈反抗。阿曼的酋长领导人民进行反葡斗争，终于把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赶出境外。巴林人民也多次展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先后击毙和绞死两名葡萄牙派来的“总督”。1892至1894年，当英国强迫巴林酋长国签订丧失独立的协定时，巴林人民多次举行起义，并得到了卡塔尔人民的支持。1905年，巴林的爱国者在邻近酋长国的声援下，从开展不服从当局的运动发展到武装起义。1913年，阿曼山区部落在教长的领导下也举行起义；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迫使英国于1920年签订了《西卜条约》，承认了阿曼酋长国的内部独立。

在伊朗和土耳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瓜分，同样激起了两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891年，在伊朗发生了人民群众反对烟草租让权（即将伊朗烟草的收购、加工和出售权租让给英国公司）的运动，迫使国王于年底声明废除了烟草租让权。在土耳其，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反对封建统治者苏丹对俄国的投降，于1876年5月举行了伊斯坦布尔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学生、市民、手工业者和小官吏，他们在苏丹宫廷的周围示威游行，抗议苏丹的卖国政策。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一部分具有爱国热情的军官发动政变，废黜了苏丹。这以后，土耳其人民反侵略干涉和封建独裁统治的斗争仍此起彼伏，不断发生。

20世纪初，伊朗被英俄瓜分。伊朗国王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镇压和剥削人民，引起伊朗各阶层人民的不满，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1905年的革命。这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和僧侣的手中，但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广大农民、工人、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最初，他们的纲领是反对专制王权、召开国会和制定宪法；以后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又明确提出推翻国王、赶走外国侵略者的口号。这不仅沉重打击了伊朗的封建统治阶级，而且也沉重地打击了当时英俄帝国主义在伊朗的侵略势力。

英俄帝国主义从各自的反革命利害关系出发，互相勾结在一起。首先，他们经过讨价还价，于1907年8月达成了进一步瓜分伊朗的默契，继而则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共同镇压伊朗的革命运动。沙皇俄国派兵进入伊朗北部，英国派兵侵入伊朗南部。面对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伊朗人民毫无畏惧，提出“不独立，勿宁死”的战斗口号，再次掀起反抗帝国主义干涉的斗争高潮。但是，正当伊朗人民英勇奋战的时候，沙俄于1911年12月在伊朗首都策动政变，扶持亲俄政权，解散国会，实行反动的恐怖统治，扼杀了伊朗的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瓜分，从巴尔干延伸到波斯湾的奥斯曼帝国迅速土崩瓦解。土耳其本土也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榨下，土耳其广大人民处于饥寒交迫、贫困落后的境地，这时的土耳其，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各地农民起义和民族起义接连不断。1903年，在马其顿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农民坚持了3年的游击战争，为1908年革命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东人民又掀起了新的斗争热潮。首先燃起反帝烽火的是埃及。1919年至1921年，埃及人民进行了两次轰轰烈烈的群众反英斗争和武装起义。在伊拉克，继1918年发生反英斗争后，1920年又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反英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委任统治制度。英国花费了1亿英镑战费，葬送了数千名士兵，

才稳住阵脚。在波斯湾地区，人民的反帝斗争也是此伏彼起。1919年，英国强迫伊朗签订屈辱的《英伊条约》，激起了伊朗人民的反英怒潮。1920年到1921年，伊朗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波及全国。1919至1922年，成千上万的土耳其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狠狠地打击了英国和希腊的侵略军，粉碎了掠夺性的《色佛尔条约》，从而维护了土耳其的领土完整。与此同时，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斗争也风起云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东地区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战场之一，中东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作出了贡献。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中东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从此，中东的民族解放运动势如燎原烈火，不断高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战后初期，中东许多国家发生了反对英法占领军，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45年秋，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政府要求英法撤军，反抗英法占领军的武装斗争遍及全国。终于迫使英法占领军于1946年4月撤出叙利亚，叙利亚取得了独立；1946年8月、英法占领军又被迫撤出黎巴嫩，从而维护了黎巴嫩独立。约旦人民也于1946年3月获得独立。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则于1948年5月迫使英国取消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1951年，伊朗人民为了维护民族权益，展开了争取石油国有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势力。正是：

瓦解运动大发展，  
殖民锁链被砸断；  
人民当家做主人，  
中东局面大改观。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帝国主义一手制造出来的，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这是1920年协约国集团强加给土耳其的掠夺性条约。这个条约不仅使土耳其丧失了中东和北非的属地，而且连土耳其本身也遭到被肢解、被占领的危险。

## 第二章 巴勒斯坦问题

阿以矛盾由来久，大国争夺怪胎投；  
分治方案竟通过，几家欢乐几家愁。

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矛盾，是当代中东主要问题之一。大国的争夺，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为了分析说明中东战争爆发的原因，首先需要追溯一下犹太复国主义的由来。

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部，在地中海与死海、约旦河之间。北与黎巴嫩接壤，东与叙利亚、约旦为邻，西南与埃及的西奈半岛相连。南端的一角临红海的亚喀巴湾。地处亚、非、欧三洲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耶路撒冷是三大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地。犹太教徒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圣城，因为在历史上这个城市是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大卫王曾把耶路撒冷作为统一的以色列王国的首都。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第一座犹太人的圣殿。基督教徒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圣地，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伊斯兰教徒则认为，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在耶路撒冷“登宵”（遨游七重天，见过先知和天堂）。耶路撒冷是除了沙特阿拉伯境内的麦加和麦地那以外的穆斯林第三个圣地。

巴勒斯坦历史悠久，相传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就有一批从阿拉伯半岛迁来的半游牧部落的迦南人定居在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 2000 年，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国家，称为迦南国。其领土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加沙、约旦河西岸及约旦。迦南文化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后来，爱琴海沿岸的腓尼基人来到巴勒斯坦沿海地区建立了“腓尼西亚”国家。“巴勒斯坦”这个名称，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腓尼基人的土地”。

再其后，希伯来人从幼发拉底河沿岸迁来巴勒斯坦。希伯来人原是游牧民族，但是他们很快吸收了迦南文化，开始定居。希伯来人在巴勒斯坦不断与迦南人、腓尼基人以及当地部族作战，于公元前 1020 年在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和约旦河东部建立了第一个希伯来人的王国，随后把耶路撒冷定为首都。

公元前 923 年，这个王国分裂成两部分，在北部的称为以色列王国，在南部的称为犹太王国。犹太王国的人称为犹太人。后来所有的希伯来人都叫犹太人。公元前 722 年，亚述帝国征服了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其居民被亚述人同化。公元前 586 年，新巴比伦王国消灭了南部的犹太王国，国王及大批居民被掳到巴比伦。

从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 20 世纪初，巴勒斯坦一直处在周围大国的侵略、占领和争夺之中，先后被波斯、希腊、罗马、土耳其等外族轮番占领。公元前 538 年，波斯帝国征服了巴比伦，允许当年被巴比伦掳去的部分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并在耶路撒冷附近恢复一个附属小国，重新定居下来。这些人就成为现代犹太人的祖先。

公元前 143 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摆脱了希腊马其顿王的统治，建立了马卡比王朝，取得了 80 年的独立。公元前 64 年，罗马帝国入侵巴勒斯坦，先后 3 次镇压犹太人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屠杀犹太人 100 多万。最后一次荡平巴勒斯坦是在公元 132 年，犹太人除被杀者外，余者大部分被赶出巴

勒斯坦。从此，犹太人开始在世界各地流浪，主要去向是英、法、意、德等西欧国家。后来又大批流向俄国、东欧和北美国家。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发动了阿拉伯运动，确立了泛阿拉伯主义。公元637年，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人不断移入，和当地的土著居民同化，形成了现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1300多年来，他们世代在这里劳动生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

公元1099年，欧洲封建王朝的十字军以“收复圣地”为名，发动十字军东征，侵占了耶路撒冷，在一部分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了“神圣之家”的国家，即耶路撒冷国。公元1187年，欧洲十字军被当地各民族击败，耶路撒冷及大部分巴勒斯坦土地获得了解放。1517到1917年，即从16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巴勒斯坦被奥斯曼帝国占据了整整400年。但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的特征始终没有改变。长期以来，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为数极少，1880年不到两万人，1918年也只有56000人，仅占当地居民总数的8%。

中世纪末期，西欧各国商业迅速发展。散居在那里的犹太人有许多从事商业活动，同当地的资产阶级发生竞争。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为了转移人民斗争的目标，故意制造民族纠纷，各地开始出现排犹运动，西欧的犹太人被迫大批流亡东欧和美洲各国。19世纪初，东欧国家也开始排犹，特别在沙皇俄国，多次发生有组织的杀戮犹太人事件。列宁深刻地指出，地主资产阶级煽起反犹太主义，是“想把穷困的工人和农民的仇恨引导到犹太人身上”。

欧美犹太资产阶级受到排挤后，为了寻找出路，于19世纪末打起“犹太民族主义”的旗号。他们声称“犹太人受歧视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的祖国”，竭力在犹太人中间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发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号召散居各地的犹太人重建犹太国家。1896年，维也纳的犹太人、剧作家兼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发表了《犹太国》的小册子，提出成立犹太人自治的主张。

1897年，在赫茨尔主持下，欧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全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建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大会通过的纲领声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由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钱姆·魏兹曼还说“巴勒斯坦是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与此同时，却有一个没有国家的犹太族人民，因此，应当把珍珠镶到戒指上”。

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的另一个因素是，犹太人中的大资产阶级同欧美的垄断资产阶级逐渐融合，西方垄断资本的排犹活动同利用犹太资本力量争夺世界霸权的扶犹、支犹活动，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19世纪末，垄断资本帝国主义已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它们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空前尖锐。英帝国主义正加强与法俄帝国主义争夺中东霸权，同时要极力控制苏伊士运河，以保证通往印度等东方殖民地的航道。这时英国特别觊觎巴勒斯坦，想要控制它，一方面使自己的势力伸向中东腹地，另一方面用它作为苏伊士运河的屏障。

犹太复国主义要到巴勒斯坦去建立自己的国家，英帝国主义也要前去控制巴勒斯坦，英国的野心恰好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计划吻合，于是它们勾结起来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早的领导人赫茨尔一开始就明确表示，由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国家将充当欧洲防范亚洲的堡垒。英国则很快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指导中心。

1915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了打败德国，瓦解奥斯曼帝国，称霸中东，曾拉拢阿拉伯人，骗取他们的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写信给汉志的阿拉伯统治者沙里夫·侯赛因，表示英国准备“承认和支持阿拉伯人的独立”，“将土耳其人从阿拉伯国家驱逐出去”。但是1916年春，英国却背着阿拉伯人同法国签订瓜分中东的秘密协定。面临当时阿拉伯世界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国变换手法，玩弄“分而治之”的阴谋，竭力扶植和利用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制造宗教和民族矛盾，以达到它统治巴勒斯坦的目的。当时，英国有一部分人认为：“巴勒斯坦如果有一个大规模的犹太居留地，对英国重大利益正处于危机中的那个地区将起稳定作用，并将有助于整个中东的新生。”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贝尔福写信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犹太人大财阀华尔特·罗里柴尔德，宣布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信的全文如下：

我亲爱的华尔特·罗里柴尔德：

我荣幸地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将下述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志向表示同情的宣言转交给你，这个宣言业已送交内阁并为内阁所批准。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如果你能把这个宣言通知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我表示感谢。

外交部忠实的阿瑟·詹姆斯·贝尔福

1917年11月2日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并非都赞成依靠帝国主义、抢占阿拉伯土地、排挤巴勒斯坦当地人民的方针。以马丁·布贝尔为代表的一些人，曾主张犹太复国主义应该团结阿拉伯人，反对欧洲帝国主义。但是，这一派的主张在1931年犹太复国组织代表大会上被否决了。从此，犹太复国主义完全选择了依附帝国主义以实现其计划的道路。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是英国在巴勒斯坦最得意的时候。1918年英军赶走了土耳其人，占领了巴勒斯坦。国际联盟批准认可《贝尔福宣言》。1922年，国际联盟决定把巴勒斯坦作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英国统治期间，进一步在巴勒斯坦扶植犹太复国主义，大批犹太人从世界各国迁来巴勒斯坦定居，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从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前的5万人增加到1939年的44.5万人。英、犹默契，夺取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土地，把许多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在阿、犹两个民族之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强烈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不断进行抗英斗争，特别是1936年至1939年史称“阿拉伯起义”的巴勒斯坦斗争，迫使英国重新考虑它的政策，以确保中东不致落入英国的敌手德国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修订了“扶犹排阿”的巴勒斯坦政策，发表1939年5月17日白皮书，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和“购买”土地。犹太人坚决反对英国的1939年白皮书，英、犹之间从此发生龃龉，甚至摩擦。犹太人转而寻求美国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移民主席本·古

里安于 1942 年 5 月在纽约的毕尔莫旅馆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份对抗英国白皮书的《毕尔莫纲领》。这一纲领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脱离大英帝国的轨道，转而投向美国。

1943 年至 1945 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赞成在巴勒斯坦实行无限制移民和建立犹太国家的决议和宣言，1944 年 3 月 9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授权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斯提文·瓦伊斯和阿巴·西尔弗代表他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政府从未赞成过 1939 年的白皮书”。声明说：“总统表示愉快的是，巴勒斯坦的大门今日已给犹太的难民开放，同时一俟将来做出决议，凡寻求犹太民族之家的人均将得到完全公道的待遇。”

罗斯福在 1944 年的竞选活动中一再表示要协助巴勒斯坦犹太共和国的建立。1945 年 3 月，罗斯福结束中东之行后，还别有用心地对国务院官员说，一个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国家，“只有用军事力量才能建立和维持”。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在于排挤英国老殖民主义者，以便在中东地区进一步扩张自己的侵略势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杜鲁门接任美国总统几天后，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就写信向他介绍巴勒斯坦的情况。信中说：“在中东一直存在着紧张的局势，这主要是由于巴勒斯坦问题所引起的。在这个对美国极其重要的地区里，有我们的利益。我们认为，这整个问题是一个应以极其慎重的态度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去处理的问题。”1945 年 5 月，犹太复国主义者向英国送交请愿书，要求让 10 万犹太人迁移巴勒斯坦并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英国断然拒绝，而杜鲁门却马上表示支持。这样，英美之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矛盾就白热化起来。

在 1945 年波茨坦会议期间，7 月 24 日，杜鲁门向丘吉尔提出了下列备忘录，要求英国首相同他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备忘录说：

“在美国，人们对巴勒斯坦问题十分关心。1939 年 5 月英国白皮书所强加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的严厉限制，正继续引起最关心巴勒斯坦和犹太人问题的美国人的激烈抗议。他们强烈要求取消这些不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限制；他们受到纳粹的残酷迫害，他们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而巴勒斯坦又是他们许多人要求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我知道您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有着深切而同情的关怀。因此，我不揣冒昧地向您表示希望，英国政府立刻撤销白皮书中对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所下的限制也许是可能的……”

但是，在丘吉尔能够答复这个备忘录之前，克莱门特·艾德礼已继他出任英国首相。7 月 31 日，艾德礼在致杜鲁门的一个简短照会中，有意回避这一问题，并提出要美国协助英国承担对巴勒斯坦的军事和经济任务，以维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传统势力。杜鲁门意在一家独吞，当然不愿为英国火中取栗，没有同意英国的建议。

为了继续对英国施加压力，在从波茨坦回来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又重申了美国的立场。他说：“美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是要尽量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问题将来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同英国人和阿拉伯人一道求得解决，以便在和平的基础上，在那里建立一个国家，我并不想派 50 万美国军队到巴勒斯坦去强制维持和平。”

波茨坦会议后，8 月 31 日，杜鲁门写信给艾德礼说：“美国人民坚决相信，移民到巴勒斯坦去的大门不应关闭。”艾德礼复信说，罗斯福、杜鲁门



和丘吉尔都曾保证，在作出决定之前，要同阿拉伯人进行协商。艾德礼认为，任何其他途径都将使“整个中东燃起战火”，杜鲁门以后又多次致函艾德礼，要求给犹太人颁发 10 万张移民证，艾德礼一再予以拒绝。但是，英国这时要拒绝美国插手巴勒斯坦问题，已是力不从心了。

1945 年 10 月 19 日，英国建议成立英美两国联合调查委员会，调查犹太人的移民和解决巴勒斯坦的政治前途等问题。英国的意图是，一方面使美国在巴勒斯坦事务中“从幕后策划者的地位变为公开负责的合伙人”，另一方面将犹太人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分别处理，把巴勒斯坦仅仅作为犹太人移民的一个去处，坚持委员会的调查应该包括除巴勒斯坦之外的可能供欧洲犹太人居住的其他地区。美国则认为，巴勒斯坦应作为调查的重点。杜鲁门表示：“不希望美国成为任何拖延策略的伙伴。”

英美调查委员会于 11 月 13 日成立，在美国的坚持下，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赴巴勒斯坦进行调查。1946 年 4 月 30 日，委员会公布了调查报告，提议准许 10 万名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这自然符合美国的政治需要。英国原先要求美国推迟公布调查报告，美国置之不理。英国不甘示弱，以执行有一系列困难为理由，拒不同意 10 万名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

为了说服英国人按照这个报告采取行动，杜鲁门经和迪安·艾奇逊等人商议之后，给艾德礼写了如下一封信：

总统致艾德礼首相阁下：

我一直在考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应该采取的下一个步骤。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建议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举行协商，因为我们两国政府都对他们负有义务。我认为英美联合委员会的报告提供了这种协商的基础。我打算采取下列程序，我欢迎您对这些程序提出意见：

在最近的将来，由美国政府促使下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组织以及与美国政府保持关系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注意这个报告，并且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间内，如在两星期之内，提出对报告的意见。美国政府在接到这些意见之后将同英国政府进行商量，然后决定对整个报告的态度，并发表一项公开声明，说明两国政府准备在什么程度上接受这个报告作为巴勒斯坦政策的基础。

我想英国政府是愿意采取一致行动的，我很高兴知道这一假定是否正确。鉴于围绕着委员会所建议的允许 10 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这一问题的紧迫情况，我诚恳地希望能够尽快地提出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进行协商的倡议，并达成这一协议。

上面提到的有关组织和团体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紧急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犹太人会议，美国犹太教委员会，美国新复国者组织，犹太人管理局，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埃及、外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政府。

哈里·杜鲁门

1946 年 5 月 8 日

1946 年 6 月，英美又达成协议，同意双方派出联合专家代表团进一步协商。代表团在英国代表的坚持下，提出一个在英国高级专员负责的中央政府下成立犹太省、阿拉伯省、耶路撒冷区和内格夫区的“分省自治计划”，主要目的是继续维持英国的殖民统治。计划中的犹太省只占巴勒斯坦面积的 17%，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坚决反对；杜鲁门感到它比英美调查委员会原来的建议“后退了一步”，也表示“不能正式支持”。

1946 年 8 月，犹太建国协会执行机构在巴黎开会，会议认为在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比尔特摩尔计划当时不可能实现，于是制定了“在巴勒斯坦

适当地区建立有朝气的犹太国”的新计划。所谓“适当地区”是指加利利和特拉维夫到阿克的沿海平原，再加上整个内格夫沙漠，约占巴勒斯坦面积的65%。这个计划是犹太复国组织主席内厄姆·戈德曼会前在华盛顿与美国官员共同策划的。

戈德曼在会上提出：“如果我们不准备告诉总统（杜鲁门），我们同意在巴勒斯坦适当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那么，我们去华盛顿是没有意义的。”会后，戈德曼带着这个计划回到华盛顿，杜鲁门立即公开表示支持。当犹太建国协会执行机构代表魏兹曼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磋商此计划时，贝文不同意。他提出先安排3年、5年或10年的临时托管，然后再实行自治的建议。贝文的建议遭到了美国反对。

1946年9月10日，英国撇开美国，邀请阿犹双方代表在伦敦举行圆桌会议。出席会议的只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主要当事者巴勒斯坦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和犹太建国协会都拒绝参加。阿拉伯国家代表在会上提出，应在1948年底废除英国的委任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然后由英国与巴勒斯坦缔结同盟条约以确定两国的未来关系。英国企图通过同阿拉伯国家订立新条约来继续保持自己的殖民统治。

10月4日，杜鲁门发表关于巴勒斯坦局势的声明，公开支持犹太建国协会的新分治计划，表示随时准备帮助10万名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英国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贝文说，如果不是杜鲁门坚持要让10万名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破坏了他的计划的话，一切都会很顺利。贝文还对英国下院说，杜鲁门发表这一声明是为了竞选总统的需要，抢在（他的竞选对手）杜威的前面。杜鲁门对贝文的指责“感到气愤”，认为“这是作为英国政府的外交大臣对美国总统所作的非常不合外交礼节的（几乎不友好的）声明”。

1947年1月27日，伦敦会议再次召开，阿犹双方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在会上坚持己见，斗争激烈。贝文又乘机建议把英国的委任统治延长5年，逐步向成立单一的国家过渡。对于贝文的建议，阿犹双方都不接受，谈判遂告破裂。

在英美激烈争夺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的情况下，巴勒斯坦局势愈来愈紧张。美国积极支持并组织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大量移入巴勒斯坦，作为它侵略和扩张的支柱。与此同时，英国命令军警在巴勒斯坦西海岸实行戒严，对企图“非法”入境的犹太人予以逮捕。据统计，从1945年8月到1948年5月，共有56艘“非法”的移民船只载运69800多名犹太移民从欧洲驶向巴勒斯坦，其中有5万人被英国截获，拘留在集中营。尽管如此，驶向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有增无已。

英国看到巴勒斯坦问题无法解决，犹太复国主义者又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在巴勒斯坦肆无忌惮地开展恐怖活动，直接危及它的殖民统治，于是英国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947年2月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英国估计联合国讨论的结果，不是同意延长英国委任统治的期限，便是无法达成协议，交还英国处理，而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贝文的巴勒斯坦问题顾问哈罗德·贝利当时就说过，联合国要通过一个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需要2/3多数的赞同，苏联和美国不可能联合起来使这一决议获得通过。但这只是英国自己的如意算盘，结果却事与愿违，弄巧成拙。

4月28日到5月15日，联合国根据英国的要求，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巴勒斯坦问题。5月6日，大会通过给予阿犹双方发言的提案。5月8日，犹

太代表阿巴·西尔弗在会上抨击英国的政策。英国代表起来反对，美国代表则表示支持。苏联当时认为犹太人是巴勒斯坦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力量。5月14日联大特别会议结束前一天，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发言，支持犹太人的要求。他说，犹太人在战时“遭受到非常的不幸和苦难”，“西欧国家都不能够确保犹太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保护，并保护他们不受法西斯刽子手的暴力迫害。这说明了犹太人为什么有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愿望。不把这个事实予以考虑而拒绝犹太人有实现这个愿望的权利是不公正的。

不以这个权利给予犹太人民是没有理由的”。他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二元的、民主的和同样性质的阿拉伯—犹太国”；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施，就必须考虑“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的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葛罗米柯支持建立犹太国的讲话，使英国人惊慌失措，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感到喜出望外。有些评论指出：苏联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区成立犹太国，是为了“把当时西方最强国大不列颠排除出该地区”。最后，联大特别会议通过决议把“分治方案”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11月26日，联大第二届会议召开，就巴勒斯坦分治计划问题展开激烈辩论。美国、苏联一些国家的代表，坚持实行分治；而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则坚决反对分治，并“保留采取适当行动的权利”。26日下午，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大会上重申了赞成把巴勒斯坦分成阿拉伯国和犹太国的主张。他说：分治“符合两个民族的根本利益”，苏联之所以关心巴勒斯坦问题，“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国，和其他大国一样，对于维护和平负有特殊责任”。

11月27日，是感恩节，联大会议休会。犹太复国主义头目魏兹曼抓紧机会，向杜鲁门写效忠信，以消除美国对苏联支持犹太人后可能产生的误会，保证新建立的犹太国决不会落入苏联的手中。信中首先表示，他在这个紧急时刻，“是非常不安和痛苦的”。接着表白：“还有人害怕我们在巴勒斯坦的计划会在某种方式下被人利用作为共产主义思想侵入中东的通道。再没有比这更背离事实的话了。我们来自东欧的移民正是那些从共产主义国家出走的人，他们不愿意被共产主义所同化。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根本就不会出走。”

11月28日，会议复会。法国代表提议，为了给阿犹双方“进一步提供协商的机会”，推迟24小时表决。这帮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忙，他们乘机大肆活动，不停地拨电话，电报一个接一个飞往世界各地，寻求更多的支持者。很多犹太人半夜从床上被拉起来，向所在国政府施加影响。美国纽约州众议员、犹太人索尔·布卢姆就曾积极向菲律宾、海地、利比里亚的代表做“说服工作”，促使他们改变态度，支持分治方案。美国国务院也奉杜鲁门总统之命，为通过分治方案作出“外交努力”。国务院于是动用了全部力量，不择手段地拉票，特别对一些拉美国家施加压力。当时联合国有20多个拉美国家，它们的态度对表决结果举足轻重。

11月29日，美国预计已稳操胜券，就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迫不及待地开动联大表决机器。结果美苏等33票赞成，阿拉伯国家等13票反对，英国等10票弃权，分治方案通过。方案规定：巴勒斯坦在1948年结束英国委任统治后，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国面积1.1万多平方公里，包括北部的加利利、约旦河西地区和加沙地区；犹太国面积1.4万多平方公里；耶路撒冷及其郊区（计158平方公里）实行国际化，由联合国管理。

这个分治决议的实质，是分裂巴勒斯坦，加剧了阿犹矛盾的发展。当时，

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约有 120 多万，占总人口的 2/3 强，但“分治决议”拟议中的“阿拉伯国”的领土只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 43%，而且分割成互不相连的几个大小碎块，大部分是丘陵和贫瘠地区；而犹太人只有 60 万，不到总人口的 1/3，拟议中的“犹太国”的领土却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 57%，而且大部分是肥沃的沿海地带。

联大分治决议通过 10 天后，阿拉伯联盟会员国（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总理及外交部长在 1947 年 12 月 8 日至 17 日在开罗召开了一次会议；坚决反对分治决议。会议发布的一项声明说，阿拉伯人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而战，并且遵照真主的意旨，决战到最后胜利。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扩军备战，并奉行扩张政策。

阿犹矛盾急剧恶化。欲知形势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三章 剑拔弩张

巴勒斯坦失家园，犹太弹冠庆复国；  
阿犹分治弊端多，从此中东启战祸。

且说联大“阿犹分治”方案通过后，犹太复国主义者魏兹曼在纽约会见英国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他从琼斯谈话中了解到，“英国的观点是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自己通过不可避免的流血较量来决定”。英国“希望阿拉伯领导人能在事实上成功地取消联合国的决议”。贝文 1948 年 2 月 10 日在英国议会上也说：“我仍然不相信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已经失败，事情还没有了结。”

联大通过的分治方案虽然符合美国的意图，但是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因此感到满足。杜鲁门在分治决议通过后不久，便发出战争叫嚣说：“不用流血而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的希望是很渺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心领神会。1947 年 11 月 30 日清晨，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耶路撒冷和一些阿犹混居的村镇发动了武装袭击，挑起巴勒斯坦“非正式战争”。12 月，犹太统治集团的头目们在特拉维夫紧张地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1948 年 1 月上旬，果尔达·梅厄突然飞到美国活动，她走得如此匆忙，连行李也没有带。21 日，梅厄在犹太联大联盟福利基金理事会于芝加哥召开的大会讲台上大声叫嚷：

“朋友们，我们正在从事战争。巴勒斯坦没有一个犹太人不相信我们最后将获得胜利。这表现了国家的精神。但是光凭这种勇敢精神是不能对付步枪和机关枪的……

“我们的问题是时间，问题是我们能够立刻获得什么。而我所说的立刻，不是指下个月，不是指从现在起的两个月内。我指的是现在……

“我到这里来就是要使美国的犹太人知道，我们必须在十分短的时间，在两三个星期内，就得到 2500 万到 3000 万美元的现款。”

就在 1948 年的 3 月，梅厄回到巴勒斯坦，用筹集到的 5000 万美元为犹太地下武装组织在欧洲秘密购买武器。本—古里安后来夸奖她说：“将来某一天，当编写（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将会写上：是这位犹太妇女，她拿到了金钱，才使这个国家得以诞生。”此外，美国还把价值几千万美元的制造军火的机器以不到 100 万美元的低价，卖给犹太复国主义者。3 月 5 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又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第一个军火协定。

犹太复国主义者还积极为其地下武装搜罗打手，扩编部队。到战争爆发前夕，这支军队已拥有 3 万多人，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武器，随时准备向阿拉伯人民进攻，3 月底，犹太复国主义者派出 13000 人的部队向耶路撒冷西部的公路要地拉特伦发动进攻。他们不但占领联大分治决议划给犹太人的地区，还抢夺了划给阿拉伯人的地区，妄图一口把整个巴勒斯坦吞下去。4 月间，英军逐步从一些地方撤出，犹太复国者就下令他们的武装力量“填补英国人留下来的真空”。

犹太建国协会头目戴维·本—古里安早就嫌联大划给犹太人的地区“小得可怜”。4 月 6 日他向犹太军队官兵们说：“不仅要在划给犹太国的领土和巴勒斯坦境内发动攻击，而且要做到敌人在哪里就要打到哪里！”4 月 9 日，犹太复国组织另一头目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恐怖组织“伊尔贡”，血洗了耶路撒冷附近的德杰尔·亚辛村，全村 250 名阿拉伯男女老少无一幸免。

22日，犹太武装力量占领海法港，把当地7万名阿拉伯居民统统赶出家园。接着，他们又洗劫了加利利和沿海地区的一些阿拉伯城镇。在截至4月底为止的短短4个月内，有30多万阿拉伯人被逐出家园，漂泊他国异乡，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就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猖狂逞凶的时候，他们的头目们开始起草“独立宣言”。当讨论到有无必要在宣言中提到边界时，本—古里安野心毕露地说：“美国《独立宣言》没有提到领土边界线，我们也没有必要提及边界。国家宣布独立不需要规定边界。我们不要提及边界，因为我们不知道边界将来怎样……如果我们打败他们，占领西部加利利或通往耶路撒冷公路两边的土地，这些地区就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在为筹建犹太国的事情奔忙。5月13日，杜鲁门和魏兹曼就建立犹太国的具体事项密谋时，魏兹曼就恳求道：“我们深切地期望美国将立即承认新犹太国临时政府。我想全世界将认为，当今伟大的民主国家作为第一个欢迎世界大家庭中的新国家是特别适宜的。”5月14日中午，美国国务院接到杜鲁门关于承认犹太国的指示后，通知犹太建国协会驻华盛顿办事处说，一俟接到犹太国建立的通知书，美国将立即给予承认，并予以大力支持。

5月14日午夜，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宣布了以色列国的成立，并向全世界发布了《以色列国独立宣言》，其全文如下：

以色列国土是犹太人出生的地方。他们的精神、宗教和种族特征是在这里形成的。在这里他们取得了独立并创造了一种具有民族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文化。在这里他们写出了并给予世界以《圣经》。

自从被逐出以色列国土之后，散布在各国的犹太人对故国忠心耿耿，始终不渝地祈祷和希望重回祖国并恢复他们的民族的自由。

由于这种历史性的联系，犹太人为了重回祖国并重建他们的国家，若干世纪以来不停地奋斗着。在最近数十年来他们大批地返回故国。他们开垦了荒地，恢复了他们的语言，建设了城市乡村并且创立了一个具有自己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活泼有力的、不断增长的社会。他们寻求和平，但仍然准备保卫自己。他们给以色列一切居民带来进步的幸福，并希望获致国家的主权独立。

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为西奥多·赫茨尔的犹太国的理想所鼓舞，宣布了犹太人在自己的国土中重建自己的国家的权利。

这种权利为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宣言”所承认，并且为国际联盟的委托管理规定所重新肯定。这个规定对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历史关系以及他们重建他们的民族家园的权利给予了明确的国际承认。

最近在欧洲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惨遭屠杀，重新证明了必须重建犹太国以解决犹太人无家可归和失去独立的问题。这个犹太国对所有犹太人敞开大门，并且使犹太人在国际的大家庭中享有平等的地位。

在欧洲灾难性的大屠杀中残存的人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不顾困难、阻碍和危险前来以色列的努力从未中断；他们从未停止过争取尊严而自由的生活和在他们祖国诚实的劳动的权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曾全力地对爱好和平国家反对纳粹灾害的斗争作出贡献。他们战士的牺牲和他们在战争中的努力，使他们赢得同建立联合国的国家并列的权利。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决

议案。大会号召该国的居民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执行这个计划。联合国承认犹太人建立他们独立国家的权利是无懈可击的。

正如其他民族一样，在它的主权国家里独立生存乃是犹太人的自然权利。

因此，我们，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代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今日，在这个英国终止托管巴勒斯坦的日子，根据犹太人自然的与历史的权利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召开庄严的会议。

我们特此宣布巴勒斯坦犹太国的建立，并命名为麦迪纳以色列（以色列国）。

我们特此宣布从 1948 年 5 月 14 至 15 日午夜托管终止之时起，在依照宪法设立以适当办法选出的各种国家机构以前（宪法将不迟于 1948 年 10 月 1 日由制宪议会拟定），全国委员会代行临时国务会议的职责，而全国行政委员会则将成为以以色列为名的犹太人移居入境；将促进国家的发展以造福所有的居民；将以以色列的先知所抱负的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原则为基础；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种族或性别充分享受社会的和政治的平等；将保证宗教、信仰、教育和文化的自由；将保护所有宗教的圣地；并将忠实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

以色列国准备与联合国的机构和代表们合作履行 1947 年 11 月 29 日大会的决议，并将采取步骤在全巴勒斯坦实现经济联盟。

我们请求联合国协助犹太人建立他们的国家和接受以色列加入国际的大家庭。

在这样肆无忌惮的侵略正在进行中，我们仍号召以色列国的阿拉伯居民在有充分和平等的公民权和在各种临时的及永久的团体和组织中有相当的代表权的基础上，维护和平并且在国家的发展中贡献出他们的力量。

我们对一切邻邦和它们的人民伸出和平与善邻之手，并且请求他们与独立的犹太国为大家的共同的利益而合作。以色列国准备对整个中东的进步事业作出它的贡献。

我们号召全世界的犹太人在移入和发展的工作中团结到我们这边来，并且实现世代以来的梦想，在为以色列的复兴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和我们站在一起。

诚心信赖万能的上帝，在这个临时国务会议的会议中，在祖同的大地上，特拉维夫城，在安息日的前夕，我们举手在宣言书上宣誓。

在以色列国宣布成立 11 分钟后，美国就承认了。时间之快，动作之迅速，连以色列的头目们都感到惊讶。正是在这个时候，梅厄家里的电话铃声响了。后来她在回忆录中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当我跑去接电话的时候，我总是在担心现在我会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但是对方的声音听起来却是喜气洋溢。‘果尔达？你听到了吗？杜鲁门已经承认我们了！’我心里充满着喜悦和宽慰。这种承认的速度之快使我和其他每一个人都感到吃惊。”以色列驻联大代表埃班也不由得感激万分地说：“美国友谊的灿烂之光辉，驱散了以色列人的孤独情绪。”

对此，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在 5 月 14 日得到消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管理局正准备在当晚巴勒斯坦时间 12 点钟，也就是在英国的委任统治宣告结束的时候，宣布建立犹太国。我曾经时常同我的一些顾问谈起过，一旦实行分治，我们将采取怎样一种行动，而大家总是认为我们终归

应当承认任何由犹太人建立的能负责任的政府。当然，分治的局面并不是完全按照我所希望的那种和平方式演变的，但实际情况是，犹太人控制了犹太人居住的地区，他们准备自己来治理，并保卫这个地区。而另一方面，我也很清楚国务院的某些‘专家’是要阻挠我们承认犹太国的。”

“现在，犹太人准备成立以色列国了，尽管有人要阻挠，我还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宣告美国承认这个新国家。”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我命令我的一个幕僚，把我的这个决定告诉国务院，同时准备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在纽约的驻联合国的奥斯汀大使。大约30分钟以后，也就是在以色列宣布成立后刚刚11分钟，我的新闻秘书查利·罗斯便向记者们宣布了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临时政府的消息。”

新成立的以色列国立即开始建立自己的政府机构，1949年1月25日，它举行了第一次选举。美国随即在1949年1月31日正式承认了这个政府。为了表示对这个政府“最坚决的支持”，早在1948年11月29日，杜鲁门总统就给以色列总统魏兹曼博士写了一封“私人密函”。

这封信开始写道：“亲爱的总统先生：今天是通过分治决议的周年纪念日，这是回复您上次11月5日来信的最恰当的时候。当我读到您的信时，我深深为您与我最近所经历的事情所感动。关于我们的那种据说已经无望了的失败事业，我们两个都遭到所谓的现实主义的专家们的鄙弃。但是，我们两个还是继续追求我们确信其为正确的东西——事实也证明，我们两个都是正确的。我在11月3日早晨所感觉到的那种得意情绪，大概就是一年前的今天和5月14日以及随后一些场合中您自己所感觉到的那种情绪。”

“但是，顽强和机灵的敌人在被击溃以后，是用不着多久就会重新集结其力量的。您在以色列已经面临这种局势；而我呢，大概也快了。因此我很了解您要制止敌人破坏您那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的焦急心情。”杜鲁门在信中继续说，“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关于纳格夫问题的谈话，您上次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您就这个地区对以色列的重要性所作的估计，我对于任何企图夺走以色列的纳格夫的主张深表遗憾。我想全世界对于我所抱的态度都是很清楚的，特别是看到了民主党竞选纲领中的措词以后。但是也还是有人没有把这当一回事，认为这不过是竞选运动中的另一次诺言，而在选举以后就会忘掉。我相信这些人总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把我的这次重新当选看作是美国人民给我的一项委托，叫我执行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其中当然也包括解决以色列问题的主张。我准备照着这样做。”

“自从您写了那封信以后，我们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我们将坚决反对11月29日决议中所规定的疆界作任何的改变，这种改变为以色列国所不能接受。我相信联合国大会在这个基本立场上是会支持我们的。”杜鲁门强调指出，“我们已经表示愿意通过财政上和经济上的措施来帮助你们建设这个新国家。您知道，进出口银行正在积极考虑根据一定的计划给以色列大量的长期贷款。我也知道，您的政府目前正在草拟这种计划的具体项目，以便送交银行审核。就我个人看来，我甚至愿意把这种财政上和经济上的援助的范围更加扩大，使整个中东都能受益，这要看彼此是否能够有效的合作而定。”

杜鲁门最后说：“十分感谢您对我当选总统的热烈祝贺。我很高兴地获悉以色列的首次选举已定于1月25日举行。这就使我们有了一个确定的日期来正式承认您的政府。”



在美国的支持下，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恃无恐，1948年5月14日午夜，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宣布以色列国成立后，立即驱车前往犹太武装力量指挥部。他和军事参谋人员通宵达旦地策划向阿拉伯国家发动进攻的计划。黎明时分，本—古里安又赶到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说，呼吁美国继续给予大力援助和鼎力支持。

面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疯狂挑衅和侵略行径，阿拉伯联盟各国在国内人民的推动下，决定集体出兵巴勒斯坦，进行自卫反击。为了协调反帝反殖的行动，早在1945年3月22日，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外约旦以及也门的代表在开罗举行签字仪式，结成了阿拉伯联盟。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案。阿拉伯联盟反对这项决议，于1948年2月9日在开罗召开会议，就坚决阻止建立以色列国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4月16日，阿拉伯联盟再次在贝鲁特举行会议，决定英军撤退后把阿拉伯联盟的陆军派往巴勒斯坦。4月25日，阿卜杜拉国王和其他领导人在安曼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惜诉诸武力阻止联合国分治决议案的执行。同时还决定英国从巴勒斯坦撤退后，阿拉伯联盟统治巴勒斯坦。

但是，尽管阿拉伯联盟拥有优势的兵力和武器，而且在阻止建立以色列问题上表面上建立了合作体制，但在内部却因长期不和，为争夺领导权而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政治上的两大竞争对手是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和侯赛因王室。阿卜杜拉国王梦想建立由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外约旦和巴勒斯坦组成“大叙利亚”。阿拉伯舞台上的另一个人物是埃及的法鲁克国王。他虽被各方面看成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但却遭到伊拉克的反对。伊拉克一直自命不凡，认为只有自己才是阿拉伯世界的盟主。

阿拉伯联盟除外约旦、伊拉克和埃及的三足鼎立局面外，1936—1939年时考克吉与侯赛因的对立此时公开化了。侯赛因利用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案的机会，宣布对犹太人进行圣战，与此同时，企图接近阿卜杜拉国王。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黎巴嫩、埃及和伊拉克的领导人，为了对抗阿卜杜拉和侯赛因的联合，把昔日的英雄考克吉推到阿拉伯各国派出的志愿军的总指挥位置上。这支志愿军就是阿拉伯解放军。该军的司令部设于大马士革。当时已经集结了一支8000多人的部队，准备向以色列进行反击。

阿以双方都在加紧备战，剑拔弩张。正是：

犹太国家刚诞生，  
阿以双方动刀兵；  
战云密布军情急，  
剑拔弩张待令行。

欲知矛盾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四章 阿以开战

阿以开战积怨多，兵戎相见燃战火；  
转胜为败阿拉伯，有苦难言对谁说。

面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挑衅和对外扩张，阿拉伯联盟各国在国内人民的推动下，决定集体出兵巴勒斯坦，实施他们所谓自卫反击的“马斯塔计划”。第一次阿以战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巴勒斯坦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1948年5月15日凌晨，也就是在以色列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阿拉伯联盟5个成员国在关于组建联军司令部的计划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就分别出兵，对以色列军队展开了激战。当时埃及出兵两个旅，共计1万多人，其中包括装备有“谢尔曼”式坦克的装甲部队，5个步兵营，1个炮兵团，1个机枪连。另外，还有15架战斗机实施直接航空火力支援。其部署和目标是：以1个加强旅沿海岸公路推进，占领特拉维夫；另一个旅进攻内陆，占领耶路撒冷。叙利亚军队以两个机械化旅实施进攻，主攻方向直指加利利方向。外约旦出兵4500多人，伊拉克和黎巴嫩各出兵3000多人。他们分别从南、北、东三面向以军据点发动猛攻。

战争的头一个月，阿拉伯国家军队节节胜利。以军拼死顽抗，还是阻挡不住阿拉伯国家的胜利进军。埃及军队在西奈部队司令艾哈迈德·阿利·马瓦维将军的率领下，从阿里什分南、北两路进发。南路第四旅经过比尔谢巴、希布伦向耶路撒冷南郊攻击。北路第二旅由穆罕默德·纳吉布上校率领，沿海岸公路通过加沙向特拉维夫出击。由于以军在特拉维夫南面阿什杜德一地拼死顽抗，埃军改变目标，进攻南方的内格夫，控制了这一地区的所有重要公路，歼灭以军1000多人。

伊拉克部队一个旅和一个装甲团渡过约旦河后，相继占领纳布卢斯、杰宁和离地中海只有10英里的图勒卡姆。以色列面临被拦腰切断的危险。它趁伊军后勤供应困难，向杰宁城反扑，但没有成功。叙利亚部队在东北部陆续攻克了一些犹太居民点，在地加尼亚一地同以色列部队发生激烈的战斗。黎巴嫩部队在北线马尔基亚也与以军打响了。

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心想夺取耶路撒冷。战争打响后，阿拉伯军队就直捣这个城市。5月18日，约军占领耶路撒冷旧城阿拉伯人区，同时包围旧城的犹太人区。接着又派一支部队攻占了耶路撒冷通往海岸平原公路上的要地拉特伦，切断了以色列的增援。5月28日，耶路撒冷旧城犹太人区被迫投降；耶路撒冷新城区被围的以色列军也十分危急，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战局的发展，对阿拉伯国家非常有利，以色列四面楚歌，危在旦夕。以军头目惊呼：“以色列部队已处于危机的边缘”，如“不增加人员，不得到更多的装备的话，就没有再支持下去的希望了”。在这紧急关头，梅厄又匆忙飞到美国求援。她在那里受到美国犹太人的热烈欢迎。她对他们说：“掌声保不住以色列的生存。战争不能靠演讲，宣言或是泪水取胜。时间是关键，不然鼓掌将是空的。”“没有美国的帮助，我们就不能继续下去了。”梅厄终于带回了约达7500万美元的巨款，用来购买武器。

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为了组织有效的进攻，给阿拉伯军队以有力的打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给以色列联大代表埃班发出一份急电：“以色列急需几星期的喘息时间来重新组织和装备军队”，“以色列需要立即停火”。

美国完全了解以色列的困境，它操纵安理会安排了为期四周的停火。早在战争爆发后第三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就在安理会上颠倒是非，指责阿拉伯国家违反联合国宪章发动“侵略”，并提出停火的提案。他声嘶力竭地说，巴勒斯坦局势构成了“对于和平的威胁”，要求联合国对阿拉伯国家“采取制裁和武力行动来制止战争”。

作为老牌的殖民主义者，英国起初由于不甘心被美国挤出巴勒斯坦，想利用阿拉伯国家来反对美国，以维护它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战争爆发后，英国除供给埃及、叙利亚、外约旦武器和弹药外，还派 37 名英国军官到外约旦阿拉伯军团直接指挥战斗，其中包括担任军团司令的格拉布。因此，在安理会上英国代表卡多根反对美国提案，表示英国目前无意采取任何不利于阿拉伯人的步骤。英国的意见获得了安理会一部分成员国的支持，美国的提案因而未获通过。

英国人的态度激起了美国的反对。在杜鲁门政府的授意下，美国新闻界发动了“20 年来最严重的反英运动”。美国参议员布鲁斯特甚至主张，欧洲复兴计划给英国的财政援助“应重作考虑”，“以决定美国对那些在成功湖和中东明显强烈地反对美国政策的国家援助到什么程度”。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日趋衰落，它们在政治上。特别是在经济上有求于美国，同时考虑到阿拉伯国家在对以色列的战斗中已取得一定胜利，可以借此和美国分庭抗礼，便同意在不提对阿拉伯国家制裁的前提下实现停火。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还特地召见美国驻英大使，设法消除双方分歧。贝文特别解释说，给阿拉伯国家的武器是履行原订条约的义务，“英国在中东的政策是维护抵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保护对西方国家至关重要的石油资源”。

为了修补和美国的关系，5 月 27 日，英国在安理会上按着美国的旨意提出了实现四个星期停火的方案。英国代表并表示将立即采取措施使英国不再介入战争，其中包括：撤走阿拉伯军团内英国军官，停止供给阿拉伯军团的津贴，停止供应阿拉伯国家武器弹药。当时阿拉伯国家弹药奇缺，阿拉伯军团的弹药储备只够用一个星期。英国这些行动，无异于在阿拉伯国家的背后戳上一刀。阿拉伯军团司令、英国人格拉布事后也承认，英国的这种做法，“使约旦军队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

英国提出的巴勒斯坦停火决议案，在 5 月 29 日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阿拉伯联盟最初拒绝停火，但在英美强大的外交和政治压力下最后被迫同意。经伯纳多特斡旋，阿以双方在 6 月 11 日起实行停火，停火后，由于英国停止武器供应，阿拉伯国家只得向欧洲市场购买一些质量十分低劣的武器。像埃及买到的是 1912 年的毛瑟枪和一些过时的手榴弹，这些武器很容易走火和自爆。同时由于阿拉伯国家领导集团之间互相倾轧，争权夺势，”官兵的战斗情绪也日渐衰落下来。

和阿拉伯国家的情况相反，以色列却利用四个星期的停火机会进口大量武器，扩充实力。它从美国运来了轰炸机，从法国运来了坦克和大口径火炮，从捷克斯洛伐克运来了麦塞什密特式飞机和坦克。军队的数目也大大增加了。开战时完成训练的 6000 名士兵，经过 3 个星期的战斗，伤亡了 2500 人。到 6 月 6 日，总兵员只有 4 万人，其中战斗部队不过 2.3 万人。最重要的问题是确保兵员、武器、弹药和粮食的数量。为此，以色列政府下达了如下的命令：

- 征集 17 岁的男女接受两个月的训练；
- 招募 36 岁的男女服现役，动员 42 岁以下男子构筑工事；
- 35 岁以下已婚男子即使有两个以上抚养者也要服兵役。

另外，由于联大安全会的停火决议未对适合服兵役的移民加以限制，所以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半公开地进行了移民。

此外，为了加强部队的进攻和防御能力，以色列政府除了加强现有部队的正规训练外，还设立了 4 个军区，明确了各军区所分担的作战地域。第一军区（北部军区）负责加利利和萨马里三角地带的北部边境。第二军区负责萨马利亚三角地带的东部边境。第三军区负责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两地区和两城市间的公路。第四军区（南部军区）担任内格夫沙漠地区的防务。由于加紧扩“军备战，以军人数从战争开始时的 3 万人迅速增加到 6 万人。到 7 月 9 日，以色列国防军的陆、海、空三军基础已经形成。

在停火期间，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虽然也有所增长，但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很快地就发生了有利于以色列的变化。英国看到不可能利用阿拉伯国家阻挡美国抢夺巴勒斯坦，就另施诡计，煽动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吞并联大分治决议划给阿拉伯国的巴勒斯坦土地。这样既可以通过外约旦把这部分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又可以挑起外约旦同埃及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分而治之、继续维护自己殖民利益的目的。英国这一阴谋正合阿卜杜拉的心意。这个贪婪的国王早就觊觎巴勒斯坦，梦想建立一个“大约旦王国”。还在联大通过分治决议之前，阿卜杜拉和梅厄就进行过两次秘密会谈。

据西方及中东地区一些报刊日后透露，1947 年 11 月初，阿卜杜拉背着其他阿拉伯国家来到约旦河东岸纳哈拉伊姆水电站的一间房子里和梅厄会晤，和盘托出他的计划：他准备接受联合国分治巴勒斯坦的方案，并将接管按分治计划成立的阿拉伯国，把它并入外约旦，然后同犹太人的国家达成和平协议。他还表示，他将永远是犹太国家的朋友。

战争爆发前，双方又进行了接触。

1948 年 5 月 10 日，也就是在战争爆发前 5 天，梅厄身穿阿拉伯妇女的传统服装，披着面纱，在半夜里悄悄来到安曼阿卜杜拉的汽车司机家里，同阿卜杜拉进行了第二次密谈：

梅厄：你终究背弃了对我的诺言吗？

阿卜杜拉：在我作出诺言时，我认为我控制着自己的命运，而且能够按照我所认为正确的去做。但是，这以后我认识到情况变了……

梅厄：难道你不了解，我们是你们在这个地区的唯一盟友？其他人都是你的敌人？！

阿卜杜拉：是的：这我知道。但我有什么办法呢？事情不决定于我。

梅厄：你必须明白，如果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将投入战斗，并获得胜利。

阿卜杜拉：是的，这我知道。战斗是你们的责任。但你们为什么不等几年呢？放弃你们自由移民的要求。我将要接管整个国家，你们将在我的议会里有自己的代表。我一定很好地对待你们，这样就不会打仗了。

当然，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不愿意归顺阿卜杜拉的。因此，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早在战争发生数周前，英国就通过外交大臣贝文暗中告诉阿卜杜拉，如果一旦同犹太人发生战争，英国期待他占领划归给阿拉伯人的巴勒斯

坦的部分土地。因此阿卜杜拉在战争开始后念念不忘实现他的“大约旦王国”计划。停火后，阿卜杜拉在英国唆使下立即着手并吞巴勒斯坦的剩余土地。他首先争取了巴勒斯坦的名门望族，让他们出面提出巴勒斯坦阿拉伯区与外约旦合并的意见，任命了亲约旦的人为耶路撒冷总督。6月底，他出访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亲自向他们提出了合并的建议。

然而，埃及国王也像阿卜杜拉一样，心怀鬼胎，也有自己的打算。法鲁克国王出兵巴勒斯坦的部分动机是，想占领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土地，免得巴勒斯坦全部或大部分落入阿卜杜拉手中。埃及总理努克拉希曾公开向部队动员员说，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占领土地，达到政治上的要求”。在战争期间，法鲁克国王还下令没收了一船经苏伊士运河运给阿拉伯军团的英国军火。阿卜杜拉几经交涉也无济于事。

当阿卜杜拉提出合并巴勒斯坦的建议后，法鲁克根本置之不理，却支持一些巴勒斯坦人成立巴勒斯坦“行政管理理事会”，和外约旦唱对台戏。这样，阿拉伯国家的统治集团在停火期间卷入了内部纷争，对停火结束后的军事行动，没有认真进行准备，更没有进行什么有效的协调，从而上了帝国主义的当，在后来的战争中吃了大亏。

且说以色列军队，在停火期间不仅加紧购置重型武器，而且为：了有效地提高战斗力，还实现了国防军的真正统一。过去，“哈加纳”作为正规军，是以色列军队的核心；“伊尔贡·兹瓦伊·卢米”和“斯特恩帮”作为非正规军，独立于“哈加纳”之外从事战斗。6月28日，陆军举行了对国家的效忠宣誓，“伊尔贡·兹瓦伊·卢米”的大部分成员也宣了誓。整个以色列陆军实现了实质上的统一。由本一古里安担任总司令，总参谋长为雅科夫·多利准将，作战部长是30岁的伊加尔·雅丁，35岁的哈依姆·拉多金准将和27岁的英德凯·莱蒙中校分别就任空军司令和海军司令。军制采用英国式的。实施了军衔薪金制和惩戒令，以色列国防军由此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1948年7月9日，四周停火到期。以色列即组织了步兵、装甲兵、炮兵和空军首先在中部沿海平原发动进攻，占领了卢德和腊姆拉两城。接着又在北部夺得了下加利利的重镇拿撒勒。战斗持续了10天，以军共侵占了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次进攻名为“十天进攻”，自7月9日开始，至7月18日结束，是为期很短的一次进攻。主要战斗在戈兰和加利利展开。最高司令部在停火期间制定了4个进攻计划。第一个进攻计划旨在加强特拉维大的阵地，夺回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第二个计划是为了从北部的胡拉湖南侧地域击退叙军；第三个计划是为了击退拿撒勒地区和加利利北部的考克吉军队；第四个计划是为了夺占耶路撒冷旧城。与以色列相反，阿拉伯各国只追求各自国家的政策目标，没有一个总的作战计划。因此，在战争的第二阶段，一开始就出师不利。

在战争进行中，尽管阿拉伯国家下层官兵英勇奋战，但统治集团却腐败无能，指挥又不统一。名义上阿卜杜拉充任阿拉伯武装部队总司令，统率5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实际上多数国家不听他的指挥，各打各的。在以军大举进犯的时候，阿拉伯军团司令、英国军官格拉布借口军团后勤供应困难，需要缩短战线，不但没有组织部队抵抗，反而命令部队后撤。埃及、叙利亚

等国对阿拉伯军团此举甚为不满、阿卜杜拉本人也受到了谴责，在安曼，一大群阿拉伯示威者围住了阿卜杜拉的王宫，高呼要打败以色列，他们怒斥阿拉伯军团出卖了阿拉伯人民。

这次进攻，以色列虽有所得逞，但内部虚弱，急需补充兵力和物资，否则无法把战争支撑下去。于是，美国又操纵安理会，在 7 月 15 日通过了它提出的无限期停火提案。这次停火的特点是：首先，它是由美国提议的；其次，它是一种命令式的停火，而非双方协商的停火，不容许持异议，否则就给以严厉的经济制裁；另外，这次停火未规定期限，双方都认为它只不过是单纯的停止射击。以色列政府尽管受到军队的激烈反对，但它仍然同意了这次停火。阿拉伯一方尽管有伊拉克、叙利亚的反对（它们认为应当规定停火期限），但最终也同意了停火。

7 月 18 日下午 5 时 30 分（当地时间），停火生效。停火监督委员会主席帕纳多特手下有 300 名英、法、比利时军官和 10 名瑞典军官，还有 18 架飞机、4 艘船舶、一批机械化部队和无线电台。这些人员广泛地分布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境内。但是，9 月 17 日帕纳多特在耶路撒冷被以色列非正规军队“斯特恩帮”的分裂派成员暗杀了。他的后任是美国黑人拉尔夫·本奇博士。

第二次停火确实又给以色列带来了很大的好处。美国和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除给以色列大量军援外，还积极发动国内的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此外还派各种“志愿兵”前往以色列助战，其中有许多并不是犹太人，阿拉伯国家所对付的敌人是受到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总理兼武装部队司令本-古里安事后供认：“没有人知道第二次停火要延续多久，但这个阶段是被充分利用了，国防军得到了训练、扩建和装备。力量经常在加强。”“到 10 月初，现役军人达到 79889 人。海空军和炮兵有了很大发展，海军达到 2417 人，空军 4377 人，炮兵 3718 人。

在巴勒斯坦战争进行过程中，英国虽在安排停火方面同意了美国的意见，但在划分以色列国和阿拉伯国的边界问题上，一直与美国的打算大相径庭。英国想改变联大分治计划，把巴勒斯坦南部的大片地区内格夫划归阿拉伯国，然后再并入外约旦，从而保持自己对该地区的控制，使苏伊士运河区基地和英国在西亚的势力范围联成一片。而美国则力图扩大以色列的疆土，使自己在中东获得一个新的坚强的阵地。因此，英美双方围绕内格夫地区的归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新老殖民主义的角逐几乎表现在各个方面。英国开始时着重对联合国委派的调解员帕纳多特施加影响，企图通过他改变联大分治计划。帕纳多特赴任途经巴黎时，英国驻法国代办阿什利·克拉克就奉英国政府之命特地前往访问，向他表示，他的调解使命如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对联大分治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克拉克还明确提出，北纬 31 度以南的内格夫应划归外约旦，不能给犹太人；耶路撒冷也应划给外约旦。并表示阿拉伯人可用西部加利利对调。

在英国的促使之下，早在第一次停火期间，帕纳多特就建议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组成经济联盟；犹太国和阿拉伯国领土划分作如下调整：联合国决议

---

瑞典红十字会主席，在 1948 年 5 月 14 日联合国大会上被任命为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员，停火监督委员会主席。

中划给犹太人的内格夫改归阿拉伯人，划给阿拉伯人的西部加利利改归犹太人；那路撒冷不实行国际化，改属阿拉伯人，城内犹太人区实行自治；划给阿拉伯人的海法港改为自由港。以色列强烈反对伯纳多特计划，并声称这个计划代表了英国的利益，放弃内格夫，将使以色列的面积减少 1/3。英国的做法也遭到美国强烈反对，7 月，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纲要点特地写明：民主党政府不同意对以色列的边界作任何改变，除非这些改变为以色列所接受。

在美国的反对下，伯纳多特的建议不了了之。美国不仅在联合国大会上和英国进行辩论，而且还策动以色列向内格夫发动进攻，侵占土地，以便造成既成事实。对此，以色列总理本一古里安心领神会他说：“我对联合国没有丧失信心，但真正算数的是我们这里的行动……我们在南方的成功将影响联合国的意见。”

在美国的纵容和支持下，10 月 15 日，以色列悍然破坏第二次停火协议，向内格夫等地发动进攻。第二次进攻主要由两次作战组成：一次是对埃及的进攻，另一次是对北加利利的进攻。两次进攻都是在 10 月份进行的。为了集中使用兵力，以军在第二次进攻中编成了由 3—4 个旅组成的支队，地面部队同空军协同作战。

10 月 22 日以军夺占海岸地带的贝特·哈南和切断埃军的后方补给线后，埃军依靠海上运输坚持战斗，新组建的以色列海军同埃及海军进行了较量，击伤了埃及的 3 艘小型船只。贝特·哈南以北的埃军丧失了战斗意志，阿什杜德于 10 月 27 日被以军占领，阿隆上校指挥的这次进攻之所以能以与敌对等的兵力取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色列已掌握了制空权和“派尔马契”旅多以机械化部队实施包围作战，而埃军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们的防御战术呆板，纵深浅，缺少足够的反冲击部队，步兵实施反冲击时也无火力支援，通讯不畅影响了有效地对部队的指挥。

在 10 天进攻期间，考克吉的军队丧失了包括拿撒勒在内的南加利利，撤至北加利利山区。以军总参谋部决定击退考克吉军队。占领北加利利。和考克吉军队作过战的卡梅尔上校担任这一名为“希拉姆”行动的作战任务。这次作战行动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对南部方向实施牵制作战，与此同时，从培尔希哈和萨费德进攻萨萨。第二阶段，占领萨萨后进攻胡拉谷地。在这次作战中，以色列空军担负轰炸主要目标和支援地面作战的任务。这是以色列空军的首次集中使用。

10 月 28 日下午，空军首先实施航空人力准备。黄昏“希拉姆”地面作战开始。考克吉军队判断以军主攻方向指向南部，因而将部队移向北方。卡梅尔上校于 28 日黄昏对主攻正面发起进攻，31 日下午占领萨萨，尔后继续北进。阿军溃散，以军于 31 日下午 6 时占领胡拉谷地。同时，黎巴嫩边境正面的部队也占领了北自利塔尼河南至马利基亚的地区。

以军作战成功的重要原因是计划周密，神出鬼没，善于伪装。10 月 15 日，以色列向内格夫进军时，它首先派出车队佯装运送非军事物资给内格夫的犹太居民点，晚上 6 时借口埃及人攻击车队，在卡拉提亚交通路口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动。然后立即进攻法卢贾据点的埃及守卫旅，遭到埃军的有力反击，未能得逞。法卢贾西边的另一重要据点胡来卡特以及比尔谢巴，马杰达勒等地则被以军攻占。以军把这些地区内的 3 万多名阿拉伯居民统统赶了出去。

以色列攻占了胡来卡特之后，驻守在法卢贾的埃及旅 2500 人处于以军包围之中。受围的全体官兵顽强战斗，坚守 3 个月，拒绝以军多次招降，直到签订停战协定后方撤出。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当时是该旅的参谋军官，他领导部队多次发动了猛烈的反攻。有一次以军从两处突入埃军阵线，纳赛尔带领士兵激战 5 小时，击退了以军的进攻，解除了全军覆灭的危险，获得“法卢贾之虎”的称号。

1948 年 10 月 19 日，安理会又一次通过了停火提案，但以色列置之不理。

10 月 26 日，安理会应埃及要求，在巴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对内格夫的侵略。英国对美国支持以色列大举进攻的行动深感恼怒，它在会上提议，以色列应从内格夫撤出，不然的话，联合国应对以色列进行制裁。英国的提案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但是，安理会在美国一再坚持下，删掉有关制裁的内容，于 11 月 4 日通过一项一般性提案，提请争执双方“注意”撤回 10 月 15 日前的位置。这项提案对有美国作靠山的以色列根本不起任何约束作用。11 月 30 日，英国又拐弯抹角地提出阿以边界应在“互惠”的基础上重新划定的意见，再次遭到美国的拒绝。

12 月 2 日，安理会讨论以色列加入联合国的申请时，美国代表力主该届联大接纳以色列为会员国，并以美国建国时边界也未确定为例，说明不能因以色列边界未定而拒绝其申请，英国代表坚决反对美国的意见，提议对以色列的申请无限期地推迟讨论。结果以色列的申请没有获得通过。

12 月 3 日，英国在安理会上又提出把联大分治决议规定的阿拉伯国并入外约旦，美国声明不能予以支持，提案被否决，英国于是改变主张，设法将已为阿拉伯军团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土地划归外约旦，造成既成事实。

12 月 13 日，在英国的操纵下，外约旦议会通过了兼并约旦河西岸土地的决议。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却在“制订把埃及军队赶出内格夫的计划”。

12 月下旬，本一古里安同挂着联合国观察员牌子的美国将军威廉·赖利进行了一次谈话。谈到准备向内格夫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时，本一古里安问赖利：“你如处在我的境地，难道会不这样干吗？”赖利回答说：“当然，你没有挑选的余地。”

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有恃无恐，于 12 月底又出动 5 个旅，向驻守在内格夫的腊法和奥贾一带的埃及部队发动了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以军于 12 月 28 日攻占边界重镇奥贾后，以军前线头目阿隆即令部队越过边界侵入埃及领土西奈半岛。对此，英国十分恼怒，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它通过英国政府向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说它要按照 1936 年签订的英埃条约“保卫”埃及领土。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认为此举过火，为了照顾英国的面子，要以色列撤兵。本一古里安“应美国总统的要求，命令停止战斗，并命部队立即撤出西奈半岛”。

1949 年 1 月 3 日，以军撤出西奈后，即掉头进攻腊法城。埃及驻军顽强反击，守住了腊法城。但以军夺得了城南俯瞰铁路和公路的制高点，造成了加沙埃军被包围的局面。1 月 6 日，埃及政府被迫宣布同意与以色列进行停战谈判。以色列见胜局已定，于 1 月 7 日同意停火。1 月 12 日，埃以双方在希腊的罗得岛开始停战谈判。

美英两个新、老殖民主义者，在战争过程中又争夺又勾结，为了瓜分巴勒斯坦，几经周折，总算达成如下的交易：把巴勒斯坦分成两部分，英国承



认以色列属美国势力范围，美国承认约旦河西岸属英国势力范围。

1949年1月29日，英国宣布给予以色列事实上的承认。美国在英国承认以色列两天之后，宣布了对约旦法律上的承认。

但是，英美在内格夫问题上的矛盾并未完全解决，内格夫南端尚在英国支持的阿拉伯军团手中。3月7日，美国又支持以色列派军队夺取亚喀巴西面5英里的埃拉特要地，获得了通向红海的出口处，切断了阿拉伯国家在陆地上的联系。英国见势不妙，速派援军去亚喀巴。与以军对峙。以色列对此提出抗议，美国也提出强烈批评。双方关系一时非常紧张。

对此，英国在野党领袖丘吉尔在下院发言，要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歇手。丘吉尔说：“继续战争会与美国发生冲突，并可能引起外约旦领土的丧失。”英国政府权衡利弊，作了让步，向以色列作出保证，对其占领内格夫南端“不加干涉”。英国在和美国较量中采取守势，节节败退，正反映了大英帝国的衰败与没落。

就这样，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通过这次中东战争占有巴勒斯坦4/5的土地。计20700平方公里，比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的面积还多6700多平方公里。这些多侵占的土地几乎等于联合国划给阿拉伯国家而积的一半，战争中有96万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侵略者逐出家园，沦为难民，流落在附近阿拉伯国家。

巴勒斯坦战争后，以色列进一步投入了美国的怀抱，成为美帝在中东的重要据点。但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并不甘心被美国取代，为挽回颓势，1949年8月乘安理会取消对中东武器禁运的机会，向埃及、伊拉克和约旦恢复武器供应。法国抱着重返叙利亚的意图，也乘机向叙利亚提供武器。美国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主动提出举行美、英、法三方会谈，“协调”对中东的政策。3国外长于1950年5月在伦敦开会，发表3国宣言，声称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同样需要维持“一定水平的武装部队”，3国将采取行动反对任何国家改变现有的停战线。这实际上是划分了3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美国维护了既得阵地，使以色列霸占的阿拉伯领土合法化，同时对英法作了一定的让步。

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以胜利者自居，在美国的支持下，进一步推行扩张政策，不断侵犯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使中东局势愈趋紧张。正是：

以军得胜更发狂，  
肆无忌惮搞扩张；  
美英幕后插黑手，  
中东局势更紧张。

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为恢复和保卫自己的权利，开始了新的斗争。阿拉伯在第一次阿以战争中的失败，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从而激化了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埃及七月革命爆发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章 埃及七月革命

战争失败发人省，埃及爆发大革命；  
封建王朝被推翻，人民欢呼庆新生。

巴勒斯坦战争的失败，促进了中东地区各国人民的觉醒，激化了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1952年终于爆发了埃及的七月革命，它对中东地区局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埃及是中东的重要国家，也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它有着6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为了这个缘故，埃及人把他们自己的国家叫做“永恒的埃及”。但是，过去埃及和其他许多亚非国家一样，曾不断遭受外国的侵占和帝国主义的奴役，长期以来，埃及人民为了自己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曾展开了个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反殖民主义的高潮中，埃及终于完全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逐步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今天的埃及已不再是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殖民地，而是在国际事务中起着积极作用的独立国家。

埃及位于非洲的东北部，地跨亚非两洲。它东濒红海，北临地中海，西和利比亚的昔兰尼加毗邻，南和苏丹接壤。埃及的东北部是亚洲的西奈半岛，西奈半岛的东北和巴勒斯坦的内格夫相连，西奈半岛的东南为红海的阿喀巴湾，西南为苏伊士湾。苏伊士运河是沟通欧亚两洲间海上的枢纽。

埃及在地图上处于北纬22度至32度，东经24度至37度之间，形状差不多像个正方形，通常分为两部分：在开罗以北称为下埃及，开罗以南称为上埃及。全国面积约100.2万平方公里，约占非洲总面积的3%。埃及的领土绝大部分是沙漠，沙漠占去全部土地面积的96%，两千万以上的埃及人都集中在尼罗河流域，特别是尼罗河三角洲。尼罗河从南到北，纵贯埃及全境，尼罗河西面是一平坦的利比亚沙漠，尼罗河以东直到红海边上是一片多山多石的阿拉伯沙漠。

沙漠占去了埃及绝大部分土地，因此如何征服沙漠乃是埃及人民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埃及地近赤道，气候炎热。除地中海沿海一片狭长地带以外，全境干燥少雨，农业全赖尼罗河的河水灌溉。埃及的耕地差不多都集中在尼罗河两岸。尼罗河三角洲土地肥沃，人烟稠密，是埃及最富庶的区域。此外，还有几块绿洲，如西瓦绿洲、法拉弗拉绿洲。喀尔加绿洲等分布在境内其他各处。埃及耕地面积约有600多万菲丹，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5%左右。

埃及境内有两条闻名世界的河流，这就是尼罗河和苏伊士运河。尼罗河是世界第二条最长的河流，长6500公里，流域面积达280万平方公里。希腊的历史学家希洛多德斯曾说过：“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的确，埃及的富庶好像是尼罗河带来的。沿河一带是一片青翠的田地和果园；在田野和果园的后面，则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几乎所有埃及的农田都依靠尼罗河的河水灌溉，从这里可以看出，尼罗河对于埃及人民的经济生活是多么的重要。

地处埃及东部的苏伊士运河是沟通欧亚两洲海上交通的孔道。运河的北端为地中海的塞得港，南端为红海苏伊士湾的托菲克港。运河全长175公里，

---

菲丹为埃及的面积单位，一菲丹约合1.038英亩。

河床很深，排水量 45000 吨的轮船畅行无阻。河身的最狭处为 60 公尺，船只通过平均需 11 个小时。这条运河自 1869 年开通以来，即被帝国主义利用来作为掠夺和侵略东方各国的工具。

正由于埃及地处战略要冲，又具有悠久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和富饶的资源，因此近几个世纪就成了列强竞相掠夺的对象。欧洲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海外扩张殖民地。

1798 年，拿破仑率领海、陆军侵略埃及，企图把埃及变为法国殖民地，作为进一步侵略东方的根据地。法军在亚历山大登陆后，占领了埃及首都开罗。这是西方殖民国家侵略埃及的开端，从此以后，埃及一直成了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对象。

法国的侵略遭到了埃及人民的坚决抵抗。

1798 年 10 月，在法军占领开罗后不久，在埃及最古老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爆发了埃及人民第一次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在这次起义中，埃及人民击毙了法军司令迭布将军。这次人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可是革命运动却蔓延到全国各地，使法军疲于奔命，法国在埃及的行动引起西方其他殖民国家的反对，并遭到英国和土耳其的联合干涉。在内外压力之下，法国军队被迫在 1801 年从埃及撤出，埃及又恢复为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

虽说法军撤出了埃及，法国在埃及仍然拥有很大势力。1805 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经土耳其政府承认，为埃及取得了半独立国地位，在阿里统治的 44 年内，法国的势力深入到埃及的各个部门。阿里聘请了大批法国顾问，并按照拿破仑军队的组织形式建立了埃及的陆军。在经济方面，外国资本逐渐控制了埃及的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阿里把农民的大部分土地收归己有。埃及人民受到外国资本和国内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

在法国势力侵入埃及以后，英国殖民者也紧随其后。1867 年，苏伊士运河凿通，埃及在经济上和战略上的地位日益重要，英国对埃及的野心也就日益暴露。

1875 年，英国政府利用埃及政府的财政困难，收买了埃及政府在苏伊士运河公司所持有的 44% 的股票。1876 年，英法两国利用债权人的身份，进一步控制了埃及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海关、铁路和土地税收入都落入英法两国手中。埃及的财政管理完全被置于英法的双重控制之下。

1879 年，英法两国政府更强迫埃及政府接受英国人威尔逊为财政部长，另一法网人为公共工程部长。威尔逊为夺取埃及总督伊斯迈的土地，遭到伊斯迈的反对，英国人就于 1879 年 6 月强迫伊斯迈退位，另立他的儿子杜非克为埃及总督。

帝国主义对埃及的压迫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反抗。在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埃及人民组成了祖国党，它主要是由埃及的爱国军官组成的，它的首领是亚拉比。

1882 年 2 月，埃及祖国党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进行组阁，开始摆脱英法两国的控制。英法两国立即把舰队开到亚历山大港，进行威胁，要求祖国党政府辞职，并解除亚历山大沿岸要塞的武装。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激起了埃及人民的愤慨，埃及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要求取消外债，并把外国军舰驱逐出去。

1882 年 7 月 22 日，英帝国主义单独采取了武装侵略行动。当天：英国海军炮轰亚历山大城，第二天英国军队占领了亚历山大，屠杀了成千的居民。

8 月间，英国殖民军占据了苏伊士运河区。9 月 14 日，开罗被英国军队占领。埃及从此变成了英国事实上的殖民地。英国驻开罗的总领事克罗美尔成了埃及的实际统治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获得新的高涨。1918 年战争结束后，埃及人民展开了全国性的争取独立运动。签名支持这个运动的达 200 余万人。埃及人组织了一个以赛尔德·柴鲁尔为首的代表团，会见英国高级专员温盖特、要求英国给予独立，但被英国政府拒绝。在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过程中，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在 1919 年组成了华夫脱党、并推举柴鲁尔为领袖，英国政府不但不考虑埃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当要求，反而采取了专横的高压手段，逮捕了柴鲁尔等 4 个代表，把他们流放到地中海马耳他岛。英国政府的这种暴行，引起了埃及人民的无比愤怒，1919 年 3 月爆发了埃及历史上空前的反帝运动。

运动开始时，爱资哈尔大学学生首先举行罢课，各行各业的工人相继罢工，甚至律师也拒绝出庭。埃及的铁路运输全部停顿，开罗和各地的交通完全中断，群众的激昂情绪达到极点。英国军警对埃及人民实行了血腥的镇压，甚至手执国旗的埃及儿童也被枪杀。但是英军的暴行并不能阻挡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在埃及人民的压力下，英国当局不得不释放柴鲁尔和其他代表。

1922 年 2 月，英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埃及地位的片面宣言。在这一宣言中，英国表面上承认埃及为“独立主权”的国家，但另一方面，却宣布英国仍然保有关于“英帝国在埃及交通线”和“保卫埃及不受一切外国侵略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的权利。与此同时，英国还照会其他有关国家，声明英国取消对埃及的保护关系并没有变更埃及的国际地位，也没有改变埃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性质，英埃之间仍保持从前的“特殊关系”，英国“不容许第三国对这种特殊关系加以怀疑”。这样，埃及虽然在名义上被宣布为独立国家，但实际上仍然是英国占领的殖民地。

1936 年，英国借口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诱迫埃及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英埃同盟条约》。规定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驻扎陆、空军，用亚历山大港为军港，并可在战时调遣军队通过埃及领土。条约有效期为 20 年。英国占领者留驻在埃及的士兵在 8 万人以上，而且又擅自扩大占领区。埃及成为英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

在英军占领下，埃及受到英国残酷剥削，埃及变成英国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埃及变成专为英国生产棉花的国家。埃及的整个国民经济掌握在英帝国主义手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的民族企业在外国资本和商品排挤下纷纷倒闭，引起严重的工业危机和失业问题。农业经济受害更大。在社会经济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埃及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极为痛恨，反抗情绪日益强烈，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各阶层都卷入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战后初期，废除 1936 年英埃条约和驱逐英国占领军是埃及民族解放运动最迫切的任务。

1945 年 12 月，埃及政府在人民的强大的压力下，向英国提出修改 1936 年英埃条约的要求。由于英国拒绝谈判，埃及人民掀起了强大的抗议示威运动。

1946 年 2 月“工人、学生联合会”成立，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进行反英

斗争，并把2月21日定为“英国滚出埃及斗争日”。这一大，开罗全市举行了总罢工、总罢课，10万人举行游行示威。在开罗英军竟出动装甲车对示威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死伤达数百人，伊斯美广场（即今解放广场）染遍了埃及人民的鲜血。2月23—25日，示威运动扩大到全国，各地宣布总罢工、总罢课，对英国军队和反动政府的暴行表示强烈的抗议。

1951年春天和夏天，埃及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更加高涨起来。在英国炮轰亚历山大港69周年和1936年英埃协定签字15周年时，埃及的反帝运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在埃及人民反帝高潮中，埃及议会在1951年10月15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废除1936年的英埃条约和取消关于英埃共管苏丹的协定。埃及议会的这一决定是埃及人民的一次巨大胜利。然而，英帝国主义不愿自动撤出自己的军队，相反却用公开的侵略来回答埃及这一壮举。英国的增援部队被派赴运河地区。

1951年10月17日，英国的海、陆、空军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地区的主要城市和战略据点——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亚格鲁伯要塞，并开始进攻埃及的人民和警察。无数的和平村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英国侵略者的行动在埃及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埃及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为驱逐侵略者出境而战斗的全民运动。在苏伊士运河地区为英国军队工作的埃及工人举行罢工，并且离开了运河地带。码头工人也拒绝为英国船只卸货。在亚历山大、开罗、塞得港及其他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抗议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要求英军立即撤出埃及。全国展开了抵制英货的运动。成千上万的爱国者组织了游击队“解放军团”，封锁了苏伊士运河地区的英军，并在这一地区展开了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

投靠帝国主义的法鲁克王朝对埃及人民的爱国运动实行血腥镇压，但是镇压绝不能制止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相反地，埃及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斗争以后，越来越认识到帝国主义在埃及的主要支柱是以王室为首的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势力。因此，埃及人民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宫廷腐败政权的斗争结合起来。斗争的浪潮冲击着殖民主义的旧秩序，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1952年终于爆发了埃及的七月革命。

巴勒斯坦战争使埃及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内阁更迭频繁。但法鲁克国王依然高踞在他的王宫里，过着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生活。仅占埃及人口5%的权贵攫夺了国民收入的50%，宫廷派成了贪污腐化的代名词。

人民群众对封建王室和反动内阁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昏庸无能无比愤慨，开罗大街小巷充斥着一片指责声。1950年，政府被迫对战争期间购买军火的舞弊案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国王的一个亲信直接卷入该案，他接受军火商人100万英镑的贿赂，并把其中大部分转交国王。真相被揭露后，群情沸腾，纷纷痛斥王室的这种罪恶行径。

战争的溃败也使埃及人民进一步看透英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激起了对英帝国主义的极端愤恨。

70年来，英国大使馆曾是埃及的真正的权力中心，埃及的命运在那里被任意摆布，广大人民群众纷纷在使馆外面游行示威，抗议英国的奴役和压迫，抗议英国对人民群众运动的血腥镇压。

埃及的工人、农民、学生成立游击队和各種爱国团体，在苏伊士运河英

军占领区开展武装斗争。

1952年1月26日，开罗群众获悉英军在伊斯梅利亚开枪打死13名埃及人的暴行后，立即举行了50万人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群众出于义愤，放火烧了英国人开办的银行、商店和影院。大火持续了8小时之久，焚毁了700多座建筑物和大片市区，这就是有名的“开罗大火事件”。群众要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浪潮滚滚向前。封建国王不仅不支持群众的反英正义斗争，反而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人民群众愤恨已极，埃及变成了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人民群众的反英斗争，影响了埃及军队中的士兵和青年军官。士兵出身于工农，埃及青年军官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即富裕的农民和在职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上代表了中、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一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军官在麦加·阿卜杜勒·纳赛尔领导下，组织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地下组织——“自由军官组织”。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这个组织就已开始了秘密活动。

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后，他们的活动更为积极。

1948年5月，阿以战争爆发后，纳赛尔在自己家里召开了一次自由军官委员会会议，研究了对这次战争应抱的态度。他们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埃及尚未作好准备，不应参战。但是，当其他兄弟国家都在为保卫阿拉伯心脏地带而做出贡献时，埃及置身事外，也是不光彩的；参加作战，便于从军队中发展自己的组织。于是，纳赛尔就放弃考试，同其他几个青年军官一起参加了巴勒斯坦战争，任营参谋长，在战斗中，他显示出智勇双全的本领。战争初期，纳赛尔腹部受伤，被送回国内治疗。在开罗医院住了不久，他又重返前线。

1948年10月，纳赛尔和他所在的一个旅被敌军包围在法卢贾的一个孤立据点里。他指挥部队采取防御战和运动战等方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一次，以军从两处突入埃军阵地，纳赛尔率领士兵激战5小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解除了全军覆灭的危险，获得了“法卢贾之虎”的光荣称号。当时，他还到前沿阵地向以色列士兵喊话，揭露敌人的劝降阴谋，瓦解敌军。

1949年2月停战协定签订后，埃军顺利回国，受到埃及人民的热烈欢迎。在这次战争中，纳赛尔曾两次获得奖章，并被提升为少校军官。

巴勒斯坦战争，是纳赛尔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在被包围的据点里，有时同战友们促膝交谈，有时自己独坐遐想。他感到埃及被人送进了一场自己毫无准备的战争中，被贪婪、阴险和荒淫无耻的人们所玩弄。同时，他也发现，“帝国主义是在这整个地区强行设下杀人不见血的包围的最强大的势力”，因此，他渴望阿拉伯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他说：“既然地区是一个，大家的处境又相同，所遇到的问题和前途也相同，敌人又是一个（不管他怎样伪装），那末，我们为什么要分散我们的力量呢？”这说明纳赛尔的思想已越出了埃及的范围，他不仅在考虑埃及的前途。也在思考着阿拉伯世界的问题。这样，在他的民族主义思想里又增添了泛阿拉伯主义的新内容。他由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

在1942年英军逼宫时，纳赛尔的目的和抱负主要还只限于驱逐英国人这一点上；但1948年阿以战争之后，他又进而认为要赶走英国人，必须首先打倒它在埃及的社会支柱法鲁克王朝。纳赛尔后来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我们身在巴勒斯坦作战，我们的梦想却在埃及，我们的子弹向对方战壕里的敌人

打去，我们的心却索回在遥远的祖国周围，因为我们把祖国留在后方让豺狼去照着。”“我们在这里所遭遇着的一切，正是祖国的遭遇的缩影。”

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贵族利益的法鲁克国王，原打算通过巴勒斯坦战争来占领土地，达到他政治上的某种要求；但事与愿违，这次战争的结果，更加深了埃及的政治经济危机。人民群众对封建王室和反动内阁在战争中表现的昏庸无能，早已怨声载道，而 1950 年军人舞弊案的调查又证明此案与法鲁克国王有关，这就更加激怒了全国人民。末代王朝脚下的火山就要爆发了。

以华夫脱党为代表的旧的地主资产阶级党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内，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被证明是无能的。它们已经丧失了革命领导权，而工人、学生虽然在斗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但是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战斗组织。于是，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就在右翼丧失领导、左翼无力领导的情势下，被推到了斗争的前台，充当了 1952 年革命的“突击队”。

在纳赛尔领导下，“自由军官组织”于 1950 年进行了改组。“自由军官组织”在第二次大战后期就已经开始秘密活动，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军官，其中很多人后来都参加过巴勒斯坦战争。他们在火线上活动，在战壕和指挥所里集会讨论“如何恢复国家的尊严”。它的成员逐步增加，在军队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改组后的“自由军官组织”，建立了由纳赛尔和萨达特、阿密尔等 10 名委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纳赛尔任委员会主席，并初步商定了行动计划。那时成员已近 1000 人，其中骨干 100 多人。军人丑闻的揭露更坚定了“自由军官组织”行动的决心。他们重点在军队中开展工作。

1952 年初，“自由军官组织”已遍及各个兵种。

1952 年 1 月，“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计划要在 1955 年 11 月发动革命。但形势的发展，使纳赛尔和他的同伴们看到，统治者的地位比他们原来设想的更不稳定，起义的时机正在日益成熟。1952 年 1 月 6 日，开罗军官俱乐部的选举事件，是自由军官组织在军官团中考验自己力量的一次行动。办法是：提名在巴勒斯坦战争中有功的旅长纳吉布将军为俱乐部主任，以反对国王提名的候选人。结果是纳吉布以压倒多数当选。尽管这一结果立即遭到了国王的否定，但自由军官组织的目的已经达到。考验证明，他们在军队中的支持者比国王更多。于是，他们就决定把发动革命的时间由 1955 年 11 月提前到 1952 年 11 月，并拟定了他们所要达到的 6 点目的。即：消灭殖民主义，取消封建制度，根除垄断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建立社会正义，加强军队和建立稳定的民主生活。

但是，自由军官组织在制订革命计划的时候，又感到自己都是一些无名小辈，怕革命开始后，难以团结起各界人士，达不到预期革命目标。所以他们一致认为，需要一个众望所归的名义上的前台领袖，经过酝酿之后，他们决定清穆罕默德·纳吉布少将来充当这个名义领袖。纳吉布接受了这一建议。6 月份，他被介绍给由 9 人组成的革命领导小组，并被推举为自由军官执行委员会主席，而纳赛尔自己则退居为副主席兼参谋长。

---

华夫脱(wafd)党成立于 1919 年，它领导了 1919—1923 年的反英运动，迫使英国于 1922 年 2 月承认埃及独立。1923 年制定宪法，1924 年该党第一次组阁，1931 年后，许多封建大地主混入了领导集团，使它逐渐由一个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党变成大地主大资产的工具，变成了英帝国主义的走卒。

7月中旬，为采取行动所作的一切准备已经完成。

18日，纳赛尔的一位私人朋友透露说，国王决心再次改组内阁，国王的宠臣侯赛因·苏里·阿密尔少将将任国防部长。由于阿密尔了解一些自由军官的政治态度，所以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将是消灭自由军官组织。这样，就会使一切计划、准备工作付之东流。因此，纳赛尔得出结论：要么是我们，要么是下任国防大臣侯赛因·苏里·阿密尔。他在委员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如果我们失败了，至少那些步我们后尘的人 would 知道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7月22日清晨，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根据纳赛尔提议，会议决定在希拉利新内阁上台的前夕，即22日晚，在军营区（从阿巴斯大街尽头到新开罗一带）开始发难，并作了行动的最后安排。在讨论中对于先从哪里开刀，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多数委员主张发动一次循规蹈矩的武装政变，先去占领阿卜丁宫和主要政府机关。而纳赛尔则坚决主张要集中力量攻占陆军总司令部和广播电台。他说：“把军队拿到手，我们就拿到了国王用以威胁人民的大棒。”最后执委会一致同意了纳赛尔的意见。

这天，夜幕降临之后，纳赛尔上校进过晚餐，穿上军装，吻别了自己的妻子，并把仅有的30英镑都交给了兄弟，托他在自己万一发生意外时，照料自己的妻小。然后，纳赛尔走出家门，决心要去把皇帝拉下马，以改变埃及的历史进程。

天黑以后很久，革命的第一个目标——陆军总部，仍然灯火通明。这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但纳赛尔在巡视时；却是那样的镇静和自信。当他看到一位同伴的表情很激动时，就用英语说：“今天晚上没有感情激动的余地，我们必须对意外事故有所准备。”这时，各位委员都走上了指定的岗位。晚11点整，起事开始了。参加革命行动的部队在坦克、装甲车、机关枪、大炮的支援下，由自由军官们带领着分头迅速出发了。此外，专门派出一支部队部署在通往运河的路上，以防备英军的干涉。当那些应召前来参加会议、策划如何扑灭革命的将军们来到尘土飞扬的阿巴斯兵营外面的交叉路口时，立即被布置在那里的起义部队全部逮捕起来。

7月23日凌晨两点，占领军营区各兵种重要据点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接着，又迅速占领了广播电台、电话局、电报局、飞机场、火车站等要害部门。在3点钟时，纳赛尔打电话通知在家里的纳吉布将军，并派一辆装甲车在黎明时把他接到了革命委员会。在太阳从东方升起之前，革命委员会已全部控制了军队，控制了首都。7点整，萨达特在广播电台以纳吉布将军的名义向埃及人民宣告了新政权的诞生，开罗群众听到这一喜讯，兴奋极了，纷纷走出家门，拥向大街小巷，围绕着起义军的坦克跳呀，唱呀，充分表现了他们对这个“吉祥的运动”的满意心情。

当时，法鲁克国王住在亚府山大。如何处置他，在执行委员会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人主张以叛国罪处死他，有人反对。在争执不下时，纳赛尔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应尽快把国王送到国外去，以便安下心来清除一切污泥浊水，开始埃及的新生。他说：“让我们饶了法鲁克一条命，把他送出国外流放吧！”“历史会宣判他死刑的。”根据纳赛尔的指示，革命委员会在7月26日上午9点签发了给法鲁克的最后通牒，责令他在12点之前逊位给小福阿德亲王，并于下午6点前离开埃及。法鲁克在重兵包围王宫的形势下，



不得不含着眼泪按时在“退位诏书”上签了字。下午6点整，法鲁克乘“首都号”游艇离开亚历山大，驶往意大利定居。至此，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宣告成功。

1952年的“七月革命”，对埃及的社会发展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纳赛尔在回忆这场革命时说：“七·二三革命实现了埃及人民自从新时代开始就企求自己管理自己国家、掌握自己命运的那种愿望。”他还特别强调了法鲁克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君主制的灭亡和共和制的开始。

7月27日，纳赛尔主持召开了自由军官执行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建议把执行委员会改名为革命指导委员会，作为过渡性政府来指导下一阶段的革命和建设。大家接受了纳赛尔的建议，并一致推选他为自由军官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但是，他没有接受这一推举，而是坚持让纳吉布将军担任主席职务。

1953年3月，埃及政府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纳赛尔仍拥戴纳吉布任总统兼总理，而他自己则担任了副总理兼内政部长。他说：“我决不乞求人们的喝彩。我决不乞求名望。”然而，在埃及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巨浪中，这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军官，却一跃而成了埃及人民公认的领袖，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1953年6月18日，埃及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七月革命胜利的成果得到了巩固，埃及七月革命给了帝国主义一次沉重的打击。它以其光荣的业绩载入史册。它标志着中东国家人民反帝斗争跨入了一个新阶段，正是：

七月革命惊天地，  
人民奋起求解放；  
埃及古国变了样，  
帝国主义休逞狂！

欲知纳赛尔其人及其政府如何进行社会改革及其在国内外所奉行的政策，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六章 纳赛尔板斧

纳氏板斧力无穷，污泥浊水一扫清；  
打倒帝国除封建，人民拥戴纳英雄。

为了清洗法鲁克王朝的污泥浊水，七月革命后，纳赛尔和他的革命指导委员会，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推行着振兴埃及的一项项重大改革。新政府的政策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人们赞不绝口地说：“纳赛尔和人民心连心，他的每一板斧都砍在要处，都是为了重振国家和造福人民！”

纳赛尔是在暴风雨中诞生，在苦难中成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烟云还弥漫在欧、亚、非三洲的上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春雷震撼了沉睡的大地。埃及这块古老的土地，已经有了明显的震感。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开始土崩瓦解。在那世界风云变幻的伟大年代里，一批争取独立、寻求解放的民族主义英杰，在尼罗河赐予的土地上相继降生。其中的佼佼者。当属 1918 年 月 15 日诞生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纳赛尔出生于地中海之滨的亚历山大城。此城是公元前 232 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入侵埃及时兴建起来的一座古城。在纳赛尔出生时，亚历山大城已是埃及的第二大城和最大的海港，交通发达，繁荣兴旺。然而纳赛尔家居住的培科斯区，则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区。纳赛尔家住的是土路旁的一所破旧的泥砖房。他父亲是邮政局的一个办事员。收入微薄，生活艰难。

纳赛尔的父亲原是上埃及亚西乌特省贝尼莫尔村人，属于赛义迪氏族。这个氏族的人，一般都身材高大，面色黝黑，性情高傲易于激动。纳赛尔的母亲是亚历山大一位商人的女儿。她性情温柔，谦逊善良。长期以来，他们家一直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惯。纳赛尔当总统后，为了保持同农民的联系。曾要求政府出版物把他的出生地写为贝尼莫尔。

从幼年开始，纳赛尔就离开父母，过着颠沛的生活。在入小学之前，他被父亲送到了尼罗河三角洲的哈特蒂贝村。在这里，他开始上小学，在他 7 岁时，学校老师教他们要相信地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但又说所有的儿童都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天堂。第二年，纳赛尔被送往开罗上学，同他的一个叔叔住在一起，这个叔叔刚从英国监狱里释放出来。叔叔给他讲了许多英国人欺压埃及人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仇恨的种子。他发誓长大了要为苦难的埃及人复仇。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中学时代开始，纳赛尔就博览群书。从《古兰经》到历史人物传记，从法国的启蒙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无不进行探讨。他读过伏尔泰、卢梭、狄更斯等名家的著作，看过亚历山大大帝、凯撒、拿破仑、俾斯麦、甘地等人的传记。他对历史很感兴趣，对于德国的统一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近现代史，他都认真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他读过的有关革命的小说，对他后来的立身处世，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纳赛尔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去寻找可以使他脱离家庭的一种职业。他设法去投考警察，并通过了各种考试科目，但是由于他父亲的社会地位低下，未能被录取。一位具有将军头衔的考试委员会主任问他：“你父亲是做什么的？”纳赛尔回答说：“是邮局里一个办事员。”于是，这位主任就告诉他说：“孩子，这里你不适合……”这次碰壁，使年轻的纳赛尔对旧的等级制

度更加痛恨了。正是这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使纳赛尔很小就产生了强烈的反英情绪，并逐渐成为一个旧秩序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者。

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一书中写道：“在我童年的时候，每逢我看见一架飞机在天空出现，我就高声喊道：‘主啊，全能的主啊，让英国人遭劫吧！’”在他 16 岁那年，他以中学生联合会主席的身份领导了复兴中学的示威游行，要求英军撤出埃及，恢复 1923 年宪法，并提出了“要求完全独立”的口号。他还同学生代表们一起走访了一些“政治领袖”，要求他们“为了埃及而团结一致”。在这次游行中，因与军警发生冲突，有两个学生被枪杀，纳赛尔也因一颗子弹擦过前额而负伤，留下了一个终生的光荣痕迹。

在这次斗争之后，纳赛尔的思想日趋成熟，感到加强革命团结的必要。

1935 年 9 月 2 日，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现在的局势是危急的，埃及的处境尤其险恶，在此情况下更需要加强团结。只有团结斗争才能胜利，才能显示人民力量之伟大。”他指出，“埃及政府是建筑在腐败和询私之上的……谁敢向帝国主义者高喝一声‘止住’？大家必须团结起来与之斗争才能奏效。”他认为，在“埃及是不乏具有尊严的人的，他们不能听任自己像狗一样地死去”。他相信受屈辱的埃及人民能够重新站起来，像自由和独立的人们一样生活。

这封信表明，这个只有 17 岁的青年人已经意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是埃及进步的两大障碍。他认为，埃及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主、争取独立的政治革命。这就是他后来在《革命哲学》中说的：“从一个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暴君的统治下或者从违反人民愿望而驻扎在祖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手中，恢复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

总结过去的历次斗争，纳赛尔认识到，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必须通过暴力推翻国内外邪恶势力，才能建立新政权，在纳赛尔的思想里，驱逐英国占领军，实现政治独立，推翻封建王朝，实现政治民主的大方向已经确定。但是应该从何着手，应该通过什么道路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呢？这个问题，使年轻的纳赛尔困惑不解。他想从他学到的知识中寻找答案，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探明一条前进的道路。在这段时间里，纳赛尔重温了埃及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并着重研究了埃及 1919 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埃及的社会现实，最后，他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控制军队，我们就可以取胜。”

他相信，军队是能决定埃及命运的唯一力量，它可以使国家得到解放，人民获得自由。纳赛尔指出：“局势需要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的成员能够团结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力量应该来自人民内部，它的成员互相信任，而且应该掌握足够的物质力量，以保证敏捷而有决定性的行动。只有陆军符合上述的条件。”因此，纳赛尔积极设法投考开罗皇家军事学院。在 1936 年前，这个学院一直为王室贵族所把持。

1936 年条约签订后，埃及政府为了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着手扩充军队。这样，就为那些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子弟打开了军事学院的大门。所以，像纳赛尔、萨达特等出身寒微的一代爱国青年，都是在 1937 年 3 月被招入军事学院的。

1938 年 7 月，纳赛尔以少尉军阶毕业于军事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谢里夫山脚下的曼卡巴德军营。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军官，他们经常讨论埃及的社会政治情况，并制订了他们的《曼卡巴德宪章》。宪

章要求自由军官们必须为重建祖国而永远保持团结和友谊。

1939年纳赛尔为实地考察英埃共管的兄弟之邦苏丹，主动要求参加陆军第三营到苏丹驻防。在他离开曼卡巴德军营那年，萨达特组织了第一个秘密的军官组织，共有七八个人参加。

1942年12月，纳赛尔回到埃及。

1943年任皇家军事学院教官，1945年至1948年阿以战争爆发前，在开罗陆军参谋学院学习。为了实现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在加强自由军官的持久力、坚韧性和组织性的训练上，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使军官团能在实现埃及完全独立的斗争中起到“突击的先锋队”作用，他制定了一项基本原则，即每个小组的组成要始终绝对保密，小组之间也要彼此保密。纳赛尔还向自由军官们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不要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要在军官中制造舆论；不要单独或集体作任何没有理智的事，不要采取任何轻率的行动；要把军队始终掌握在有把握局势的人的手中等等。在他的积极组织 and 领导下，秘密小组日益增多，几乎遍及整个武装部队，成了七月革命的中坚力量。

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1952年7月23日埃及革命后，新政府于1952年12月宣布1923年宪法无效，并任命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草拟一部新宪法。

1953年2月10日，新政府公布了一部“临时宪法”，作为过渡时期的最高法。

1956年1月17日，政府公布了新宪法草案，并于6月23日举行全民投票。新宪法获得了全部投票的99%的赞成而被正式通过。

新宪法除序言外分六章，共196条。新宪法所体现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埃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这个原则在宪法序言中得到了表现。序言一开始就宣布：“我们埃及人民经过不断地反对外国暴力统治和反对国内剥削统治的斗争已经赢得了我们自由和生活的权利，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宪法第一章“埃及国家”一章中，埃及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阿拉伯国家这一基本原则又再度得到确定，这一章规定，埃及是一个民主共和国，伊斯兰教是埃及的国教，阿拉伯文是埃及的正式语文。

宪法第二章关于“埃及的社会基础”一章规定：社会团结是埃及的社会基础。国家保障埃及全体人民的自由、安全、安宁与平等。国民经济应当根据以社会正义的原则为基础、以增加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计划加以组织。宪法还规定：私营企业是自由的，但不得损害社会利益和人民的安全、自由与尊严。资本应用于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方面，私人财产应当受法律保护。法律应当规定土地所有权的最高限额，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国家应当鼓励合作和关怀各种合作机构。埃及人民有领取老年津贴以及在患病和丧失劳动能力时领取津贴的权利。国家将实行社会保险、社会安全和医疗制度，并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一切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公共财产不可侵犯，保护公共财产是每一个埃及公民的责任。

宪法第三章关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规定，埃及全体人民不分民族、出身、语言或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保障人身居住、言论、新闻、出版、通信、宗教信仰、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宪法也规定：埃及全体人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初等教育在国立学校中是免费的。埃及人民

有工作权，有享受医药治疗的权利。此外，宪法并规定人民有服兵役和纳税的义务和依法参加选举的权利。

1952年埃及革命成功后，以纳赛尔为首的“革命指导委员会”就提出了六大施政目标：第一，铲除帝国主义和他们的代理人卖国贼；第二，消灭封建主义；第三，铲除垄断以及资本对政府的控制；第四，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军；第五，建立社会正义；第六，建立健全民主生活。

根据这些目标，革命政府颁布了许多有利于工人农民的法令，并采取了一些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措施，其中包括制订“土地改革法”（1952年9月），设立负责制订全国发展计划和生产政策的“发展国民生产常设委员会”（10月2日），制订鼓励外资的法律（1953年4月2日），在沙漠地区建立一个面积约60万菲丹的“解放省”（4月13日），从英国手里接收苏伊士运河至开罗的输油管（1955年1月1日）。此外，政府并宣布和批准建立许多新工作的计划。埃及政府的这些措施正在逐渐改变着埃及的经济面貌。

过去埃及的经济是殖民地经济。帝国主义对埃及的长期压迫和剥削，造成了埃及的工业落后和农业的片面性。英帝国主义自1882年侵占埃及以后，就把埃及变成英国的农业原料供给地，特别是把它变成一个专生产棉花的国家。埃及30%以上的可耕地种植棉花，棉花的总产值占农业生产总产值的一半左右。生产的棉花80%左右供出口。为了保证为英国纺织工业提供廉价原料，英国的大公司垄断了埃及的棉花出口。同时，英国的工业制成品充斥了埃及的市场。埃及的单一原料作物经济，加上外国垄断资本对埃及的经济控制，造成了埃及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过去英帝国主义常常以操纵棉价或限制对埃及棉花的购买数量，来使埃及就范。

1952年革命前，埃及的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0%，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75%以上。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埃及的王室和宫廷就占全国可耕土地的1/4。占全国总人口6%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国耕地的65%以上。其余的94%的农民只占有全部耕地的35%，而这些农民当中又有200万户每户占有土地不到1菲丹。此外，外国人在埃及也占有大量的土地。

在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埃及的农民经常生活在饥饿线上，雇农每天的工资只有1先令左右。佃农的命运也是非常悲惨的。在某些情况下，缴纳的地租比地主自己经营时所获得的净产量还要多，因此，埃及人民的反帝斗争是和反封建斗争分不开的。

埃及政府为了解放生产力，消灭封建制度，1952年9月9日颁布了土地法，无偿地没收王室的土地，并规定每人拥有土地不得超过200菲丹，超过200菲丹的土地由政府发行年利3%为期30年的土地改革公债来征购。土地改革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减少了地租，并规定地租不得超过土地税的7倍；政府征购的土地以地租的10倍计价，再加上15%的手续费，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地价在30年内付清，收取年利3%。

征购土地须经下列4个步骤，即征购、过渡期间的管理、分配和对新土地所有者进行关于有效耕种土地的教育。

在第一步骤中，政府除规定土地所有权的最高限额为每人200菲丹外，还许可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分给其子女每人50菲丹，但这种分出的土地不得超过100菲丹。征购工作限5年内完成。截至1953年11月，已征购的土地约有19万菲丹，计划征购的有43万多菲丹。开垦的荒地、沙漠地和工业用的土地则免于征购。

第二步骤，根据土地改革法成立“土地改革高级委员会”，负责监督征购土地的管理，以保证分配土地以前农业生产的继续进行。在这期间，农民在没有分到土地以前向政府租用土地并缴纳地租。

第三步骤是分配土地。凡是成年人，他所拥有的耕地又在5菲丹以下者都有资格分配土地。但在原耕地从事耕作的雇农和自耕农有优先获得分配的权利。其次，农户家口众多的也有优先分配权。如果家口实在大多，得按情况分为几家（一个儿子可算一家）来领取分配的土地。法律规定每户可分到2至5菲丹的土地。

第四步骤是农民们组织合作社。由政府派专门人员到各个合作社协助指导增产事务，并对合作社的管理，种籽、肥料、农具、耕畜的供给，农产品的运销等方面尽量提供便利条件。

埃及土地改革法的实施，大大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产量一般提高20%到30%；但是却大大得罪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政客。他们勾结起来，策划用最卑鄙的手段杀害纳赛尔和颠覆新生政权。

1954年10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的曼奇亚广场发表演说时，一个暴徒突然向他连续开了6枪，可是，当子弹从他身旁穿过时，他毫无惧色，巍然屹立，勇敢地面向刺客。待枪声过后，他向着人们宣告：“我的同胞们，你们就呆在原处好了。我没有死，我还活着。即使我死了，你们每一个都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革命的旗帜是不会倒的。”这一勇敢的行动，使他在埃及人民中赢得了巨大声望。在1956年6月23日的选举中，他获得了全部选票的99.948%，当选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在纳赛尔的国内地位不断得到巩固的同时，由于他坚决拒绝参加美英帝国主义控制和策划的军事集团，坚持“积极中立”的不结盟政策，因此，他的国际威望也不断提高。

自从1952年七月革命以后，埃及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曾取得了几项重大胜利。首先是关于反对侵略性军事集团问题，新政权建立后，英、美、法帝国主义的代表就一个接一个地同新政府接触。要求埃及同他们缔结联盟和军事协定，对此，纳赛尔的答复是：我们可以同你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而不能同你们结成联盟，“我们决不能作尾巴或卫星国”。

1953年4月，英国要求埃及同它缔结一个25年的联盟，埃及拒绝了这一要求。

1953年5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抱着同样的目的来到开罗。但是，他一下飞机，就引起了埃及领导人对他的反感。杜勒斯在机场发表了一个声明，把纳吉布将军称做“自由世界一位杰出的领袖”。纳赛尔不客气地对杜勒斯说，“自由世界”这个词儿，对埃及来说，有不幸的含义。“因为英国人曾占领我们的国土来保证‘自由世界’交通安全。所以对我们来说，‘自由世界’意味着帝国主义和霸权统治。当你今天早晨使用这个词儿的时候，它产生了不良的效果。”为此，杜勒斯不得不叫来他的助手，再发表一篇迎合埃及人民思想感情的声明。

在会谈中，当埃及提出要美国供应军人时，杜勒斯只是敷衍地回答，将“予以同情地考虑”，而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兜售中东防御计划方面。纳赛尔未上圈套，表示让埃及同英国一起参与一个旨在反对某种军事力量的军事组织，是“天真的想法”。他说：“如果我去告诉我的人民说，因为换上一面旗帜，英国人在这里的地位就将由占领者一下子变为我们的伙伴，他们听

了一定要嘲笑我，”“我将失去他们对我的信任”，而其他人“将利用我和你们结盟的关系来证明我是一个走卒”。因此，纳赛尔断然地对杜勒斯说：“我们不准备讨论缔结条约或其他任何安全措施。”

为了加强对中东国家的控制，早在 1951 年 10 月，美国就纠合了英、法、土耳其 3 国向埃及其他中东国家建议成立一个“中东司令部”，企图以这个军事集团作为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同时加强对中东国家的奴役。但是埃及和中东人民看穿了 this 阴谋，由于他们的反对，这个计划遭到了失败。

于是，美国采取了新的策略，用诱迫中东国家签订双边条约的办法，来逐渐地把它拉进侵略性和奴役性的集团中去，1954 年 4 月，美国首先促使巴基斯坦同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土耳其签订军事同盟；1955 年 2 月，又诱使伊拉克同土耳其签订军事条约。4 月 5 日，英国参加了这个条约。9 月 23 日和 10 月 19 日，巴基斯坦和伊朗也先后加入了这个条约。这就是所谓“巴格达条约”。这个条约表面上是由英国出面拼凑起来的，实际上却是由美国在背后加以支持的。

为了打击帝国主义这一阴谋，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对抗措施。当土伊条约正在酝酿的时候，埃及在 1955 年 1 月召集了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签字国在开罗举行会议。与会国认为土伊条约将威胁阿拉伯联盟的结构，危害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它们警告伊拉克不要参加巴格达条约。1 月底，以埃及国家指导部长萨勒姆为首的一个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 4 国代表团，前往伊拉克进行劝阻，但伊拉克政府对于这种劝告竟置之不理。

当土伊条约于 2 月 24 日签字后，埃及再派萨勒姆前往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活动，建议订立一个不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新的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对于埃及的建议立即表示支持。

10 月间，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后参加了巴格达条约。埃及于是同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分别签订防御条约，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系，并且把双方的军事组织和指挥系统统一起来。很明显，埃及的这一系列外交措施，给予帝国主义者在中东的侵略政策以一个沉重的打击。

其次，是关于打破帝国主义军火垄断问题。过去，埃及的武器装备主要是英国制造的，埃及经常需要零件和弹药的补充，英国就利用这一情况对埃及进行讹诈和控制。

1952 年革命以后，埃及曾经要求美国供给军火，但是美国的答复却是附带着侵犯埃及独立和自由的条件。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这种讹诈，埃及终于在 1955 年 9 月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协定，用棉花来换取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

埃及这一举措，使美英等帝国主义大吃一惊，美国政府在得到这个消息几小时后，立即派遣助理国务卿艾伦飞注开罗活动，艾伦在同纳赛尔的谈话中竟威胁说：“共产党人什么时候运送，强有力的以色列陆军就准备什么时候开始进攻。”“以色列人有力量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占领开罗。”“以色列能够在埃及尚未更好地武装起来以前，寻求同埃及进行军事摊牌。”与此同时，以色列报纸也大嚷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反映英国官方言论的伦敦《泰晤士报》在 1955 年 10 月，以“西方给埃及的答复”为题发表社论，公然主张“应该加强（中东的）北层国家，削弱埃及的影响，并且维持以色列和它近邻之间的均势”。

然而，帝国主义的这些威胁并未能动摇埃及维护它的主权的坚定决心，

埃及的行动却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欢迎和效法，沙特阿拉伯内政大臣阿卜杜拉·费萨尔曾直率他说：“其他阿拉伯国家应当追随埃及所作的榜样。”

纳赛尔在对外政策方面坚决奉行和平独立政策，拒绝加入任何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受到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欢迎和支持。1955年，他参加在万隆举行亚非国家会议的消息，使美国大为震怒，杜勒斯一听到纳赛尔要赴会的消息，立即火冒三丈，认为这是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挑战。他设法加以阻挠，却是毫无结果。随后，英国又以供应军火为诱饵，企图使纳赛尔在万隆保持缄默。纳赛尔对此根本不买帐，在会上大声疾呼：“殖民主义一向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必须予以铲除。”强调“各国都有义务尊重别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且不干涉他国事务；各国都有权自由选择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显然是在同美英唱反调。

在这次会议上，他同周恩来总理交了朋友，奠定了中埃友好关系发展的基础。后任埃及总统的萨达特在谈到万隆会议时说，“至于万隆会议的地区影响，那就是大大提高了纳赛尔的声望，因为他能和像尼赫鲁和周恩来这样一些世界名人并肩地站在一起了，尽管当时纳赛尔无论在年龄上或经验方面都远不如他们两人，但他得到了他们两人的称赞，”

万隆会议前后，纳赛尔曾多次同南斯拉夫铁托总统和印度尼赫鲁总理进行互访和交谈。

1956年7月，纳赛尔在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岛同铁托、尼赫鲁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它标志着“不结盟”运动已经成为世界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这次会晤，既使华盛顿恼火，又使莫斯科猜疑。“不结盟”对杜勒斯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挖苦人的字眼。加上埃及购买苏联军火，又同中国建交，简直把杜勒斯气得发疯了。

对于帝国主义的威胁、恐吓，纳赛尔泰然处之。1956年他反驳说：“我们不需要以我们的理想和人格作为购买军火的代价。”他还说，埃及的独立政策，“是出自埃及，而不是来自伦敦或华盛顿或莫斯科的政策”。“我们准备同所有国家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决不能以我们的独立或尊严为代价。”杜勒斯等人的丑行，除了自讨苦吃外，它唯一的效用，就是帮助纳赛尔提高了国际声望。

为了维护埃及的主权，1956年7月，纳赛尔政府宣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使长期受帝国主义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归还给它的真正的主人。这一举措，不仅保卫了埃及的主权，而且也对帝国主义在中近东的侵略势力给以沉重的打击。

欲知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七章 运河风暴

运河运河苦难多，十万白骨筑天河；  
列强霸占施残暴，收归国有奏凯歌。

苏伊士运河，是沟通地中海—红海、直达两洋的一条国际航道。埃及为开挖运河，提供的财力物力难以数计，牺牲的民工达 10 万之多。但是，自 1869 年通航以来，它的所有权一直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纳赛尔政府在执政的第四年。宣布将运河收归国有。这一举动受到埃及乃至全世界主持正义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1956 年 7 月 26 日下午，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人们不顾盛夏炎热，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解放广场。傍晚，纳赛尔向广场上 25 万群众发表重要演说。他强烈谴责英、美、法帝国主义企图扼杀埃及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阴谋。当会上庄严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时，全场沸腾，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纳赛尔总统对他的同胞说：“为了开挖苏伊士运河，我们有 12 万儿女在强迫劳役中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为了建设苏伊士运河，我们曾经付出了 800 万英镑。今天苏伊士运河变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它使历任部长和历届内阁感到耻辱。”

“这条运河是一条埃及运河。运河公司是一个埃及的股份公司，英国用暴力攫取了我们的权利，我们 44% 的股份。从运河落成的时候起，一直到现在，英国一直从这些股份里收取利润。所有国家和股票持有者都得到他们的利润。”纳赛尔说，“苏伊士运河公司 1955 年的收入达到 3500 万埃镑，或 1 亿美元。在这笔款子里，由于挖掘运河而丧失了 12 万人的我们，只得到 100 万埃镑，或 300 万美元！根据土耳其皇帝的御赐合同，苏伊士运河公司还是为了埃及和埃及的利益而挖掘的呢！”

纳赛尔说：“你们知道美国和英国要在 5 年里向我们提供多少援助吗，7000 万美元。你们知道是谁每年拿到公司收入的 1 亿美元吗？当然是美国和英国了。”“苏伊士运河是为了埃及和埃及的利益而建立的。但是，它却成了一个剥削和榨取财富的源泉。”

“今天，在我们建立我们的尊严、自由和自豪的大厦之时，我们感到，除非根除统治、屈辱和恭顺，这个大厦就不是彻底健全的，苏伊士运河是一个令人感到屈辱的大厦。”纳赛尔告诉与会听众说，“公民们，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收归国有了。这项命令已经在政府公报上公布了。这件事已经成为事实了。”

纳赛尔强调指出：“我们不允许帝国主义或者剥削者来统治我们。我们不能让历史重演。我们已经着手建设一个强大的埃及。我们已经向着政治和经济独立前进。为了全体人民，我们已经朝着国有经济前进。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是为了消灭过去的陈迹——奴役、剥削和统治的陈迹。”

“在革命的第五个年头开始的时候，一如法鲁克在 1952 年 7 月 26 日被赶走一样，苏伊士运河公司在同一天收归国有。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了光荣，而且取得了真正的尊严”埃及的主权将只能属于埃及的儿女们。”纳赛尔最后说，“同胞们，现在在我们讲话的同时，你们的兄弟们正在接管运河的管

理和经营工作。这是埃及的运河公司，不是外国的运河公司。他们正在接管运河公司和它的设备来指挥运河的航运，这条运河是在埃及的领土上，它流过埃及的领土，它是埃及的一部分，并且属于埃及。我们现在这样做，来补偿过去，并且建立起新的自豪和尊严的大厦。”

纳赛尔讲到这里时，全场沸腾，会场上再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聚集在广场上的 25 万人欣喜若狂，载歌载舞直到深夜。

为什么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使埃及人民的心情如此激动呢，这还得回顾一下运河的苦难历史。运河地带原是连接亚非两大陆的地峡。

1859 年法国殖民者德勒塞普斯驱使埃及数十万民工开凿运河，花了整整 10 年的时间才告完工。埃及几乎负担了全部的开凿费用，有 12 万民工在强迫劳役中丧生。可是从 1924 年起，苏伊士运河公司 96% 的股票却掌握在英法殖民者手里。公司的总办事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都设在巴黎，由于英法的巧取豪夺，大量的利润流入伦敦和巴黎的银行。到 1949 年底，英国从运河公司攫取的利润，约为它购买股票金额的 16 倍。而作为运河主人的埃及，仅获得运河总收入的 3%。

苏伊士运河全长 175 公里。它沟通地中海与红海，成为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使欧亚两洲之间的航程，比绕道非洲好望角缩短了 6000 到 1.4 万公里。据统计，1955 年通过运河的船只共 14600 多艘，其中 3/4 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轮船，近 1/3 属于英国。帝国主义从中东掠夺的石油和其他原料约有一半以上通过运河输往西欧。1955 年英国进口石油 2800 万吨，其中有 2000 万吨就是经过运河运来的。

苏伊士运河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具有极大的价值。长期以来。它是帝国主义在中东争夺的一个重要目标。

1882 年，英国排挤了法国，派军队占领埃及，在运河区建立了它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

1936 年签订的英埃条约又肯定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驻军的权利。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人民近百年来蒙受剥削和压迫的历史见证，收回运河是埃及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愿望。

1952 年七月革命后，埃及人民反对英军占领运河的斗争日益高涨。1953 年 4 月，英国和埃及就英军撤离运河区问题进行谈判。经过反复斗争，1954 年 10 月，双方在开罗签订协定，英国被迫同意分批撤军，埃及也作了让步，同意一旦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遇到“攻击”时，英军可重返运河区。1956 年 6 月 12 日，在夕阳残照之下，最后一批英国军队降下他们兵营的米字旗，结束了英军对埃及 74 年的占领历史。

由于纳赛尔坚决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反对巴格达条约，同苏联达成武器协定等，使他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急剧恶化，1955 年 4 月，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到中东访问时，被呼喊纳赛尔名字的示威者投以石头。所发生的这一切，英国政府都认为是纳赛尔有意使他们丢脸，是纳赛尔在捉弄他们，劳埃德问纳赛尔：“总统先生，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从此往哪儿走？”纳赛尔反驳说：“我不是万能的，我也没有一按就能发生革命的电钮。”据 1956 年 5 月埃及驻美大使获得的情报说，英国在尽全力说服美国，要它相信纳赛尔的政策对西方及其伙伴的危害性。由于纳赛尔在这个月宣布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使得英国的说服工作产生了效果。

埃及于 1955 年同苏联签订军人协议之后，美英就企图以“经援”为手段

来拖住埃及靠近苏联的步子，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把俄罗斯熊排斥在尼罗河流域之外”。为此，他们曾于1955年12月表示，愿为阿斯旺高坝的第一期工程提供7000万美元的“赠款”，世界银行也答应给予2亿美元的贷款。现在美国又出尔反尔，以埃及人“不合作”为借口，在1955年7月19日宣布：“停止资助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甚至造谣说，“埃及经济已经破产”。纳赛尔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气愤。他说：“这不是撤销援助，这是对我们政权的进攻，这是唆使我们的人民去推翻这个政权。”因此，这位把报复看作是天经地义事情的贝尼莫尔人就决定，要以加倍的打击来回敬英美帝国主义。

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是经过慎重考虑和周密计划的。它事先没有通知苏联，以免遭到赫鲁晓夫的“劝阻”。7月24日，纳赛尔指定原陆军工程师尤尼斯负责接管运河，约定7月26日傍晚尤尼斯率领行动小组在伊斯梅利亚的运河公司管理处收听纳赛尔演说的广播，当演说一提到法国殖民者德勒塞普斯的名字时，立即采取行动，迅速接收运河公司。纳赛尔演说一结束，接管运河公司的工作也已顺利完成，在运河公司工作的全部外籍人员遵照命令各安其职，保证了运河的正常航行。

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是埃及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壮举。正如后来萨达特总统所指出的：“埃及这样一个小国，终于放声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提出了挑战，这不但是我们的革命历史，而且也是整个埃及历史的转折点。”敢于代表埃及人民向帝国主义大喝一声“住手！”的纳赛尔，立刻在埃及人民中变成了一个传奇般的英雄。他每到一处，都受到人们的欢呼。

埃及宣布运河国有化，像一声惊雷震动了西方，给帝国主义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在伦敦，艾登正在首相府举行宴会招待伊拉克国王费萨尔。当在座的人们得意洋洋地议论纳赛尔由于失去西方的“援助”快要垮台时，一个秘书悄悄地来到艾登身边，交给他一封关于运河国有化的急电。一向保持绅士风度、故作庄重的艾登看了电报，气急败坏地连声叫嚷：“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

宴会中断了。艾登顾不得外交礼仪，撇开客人，匆忙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当晚10点30分，法国大使和美国代办都应邀到首相府，在忧郁的气氛中举行会谈。第二天上午，英国内阁继续开会。艾登主张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但军方认为没有足够的兵力作后盾，而且一旦运河卡断，英国的石油储备只够3周的消耗，如果发动进攻，只够一周之用。艾登只得取消原来的打算，给埃及发出一份“抗议”照会很快被埃及退回。在艾登看来，运河是英帝国的“大动脉”，“对自由世界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他哀叹说，这是1940年以来，英国“所遇到的最危险局势”。

法国政府也惊慌失措，在7月27日上午和中午连续举行会议，惊呼埃及的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局势”。英法为了夺回对运河的控制权，冻结了埃及在英法的存款和运河公司的基金，要英法商船通过运河时拒不向埃及交纳通行费；同时调兵遣将，对埃及施加武力威胁。

英法虽然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但色厉内荏，力不从心，因此一心想拉美国共同对付埃及。27日，艾登致电艾森豪威尔，要美国与英法一起对埃及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并用军事力量作为最后手段，“使纳赛尔恢复理智”，同时提议3国立即举行外长会议。

针对英法等列强的威胁和叫嚣，1956年7月28日，纳赛尔总统发表了

驳斥英法反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演说，他说：“今天，埃及知道了主权的意义，也充分行使了它的主权。它将永远不允许任何国家或集团来剥夺这个主权。”“今天，埃及的人民愿保卫它的主权和独立，直到它的最后一滴血。”

“我们所料到的叫嚣在伦敦和巴黎发生了。”纳赛尔说，“这种叫嚣是毫无权利根据的，除了帝国主义的谎言、篡夺别人权利的习惯和对其他国家事务的干涉以外，是没有别的根据的。英国曾经向埃及提出抗议，我不知道是根据什么。苏伊士运河（公司）是一个埃及公司，在埃及主权的管辖之下。当我们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时候，我们是将一个埃及的公司收归国有，实现一个纯粹属于埃及主权的行动。英国有什么权利来干涉我们的内政？”

“苏伊士运河公司是一个埃及的公司，在1856年受埃及政府的委托来进行它的工作。今天，我们撤回这个委托以便我们自己来办理这个工作；这种撤回是行使我们的权利之一。”纳赛尔继续说，“我们已经决定要对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予以补偿，尽管事实上它们曾经掠夺过我们，例如，英国就曾无代价地从我们手里窃夺了44%的股票，然而，我们仍将按照这些股票的价格偿还它。我们并没有以相同的办法对待他们，无代价地夺回他们从我们这里夺去的股票。相反地，我们告诉那些股票持有者，我们愿意忘掉过去，付给他们补偿费。……干吗还要这样高声叫嚣？”

针对英法叫嚷埃及的接管要影响运河的航行，纳赛尔驳斥说：“苏伊士运河的航行在过去的48小时，从实行国有化起到现在为止，一直是正常的，航行是有秩序而畅通的。……但是，我要强硬警告那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它们的诡计、煽动和干涉将会使运河航行中断。我要英国和法国负任何中断运河航行的责任，同时我宣布埃及将保护苏伊士运河航行的自由。”

“运河在谁的保护下？运河是在我们的保护之下，在它的主人保护之下。”纳赛尔最后强调说，“运河是埃及的一部分，流过埃及的领土，并且我们是维护航行自由的人。今天我们要保护它，一个月以前我们也保护它，过去多少年来我们也一直如此，因为运河是埃及的一部分，它流过埃及的领土。”

“我们将继续遵循着实现埃及及尊严和光荣的大道，为它建立一个民族经济和真正的自由。愿和平和你们同在！”

纳赛尔的演讲有力地揭露了“运河航运将要中断”的谎言，即使这样，美国政府得知埃及收回运河后也感到吃惊。它一方面表示要就这个事件的“深远影响”同英法举行“紧急的磋商”；另一方面又讨好埃及说：“作为一种既定政策，美国政府不能反对国有化的原则，”美国拥有运河公司的股票虽少，可是它在中东有大量的石油投资。美国固然担心“国有化的政治口号”会影响它的石油利益和动摇它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但更重要的是，运河公司国有化后。英法陷入困境，为美国提供了混水摸鱼、取代英法、称霸中东的机会。因此，美国的策略是使运河问题悬而不决，既反对立即使用武力，又要保持一定的紧张局势，以便自己从中渔利。

而当时英国首相艾登的态度，却有些“急不可待”，他认为运河是一宗国际财产，而且自1888年条约签订以来就被确定为“国际财产”了。近年来，由于中东油田的发展，以及由于西欧大部分石油供应都依靠中东，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就大大地增加了。1995年，共有14666艘船通过运河。其中的3/4

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这里面又有将近 1/3 属于英国。内阁会议决定，英国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权益必须加以保护，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同时必须为这...目的做好必要的准备。如果不能保持运河“国际化”，“就必然会连续丧失”英国“在中东的权益和财产”，即使女王政府不得不单独采取行动，英国也不能避免使用武力来保护英国的地位。

7月27日，艾登把内阁会议这一决定，打电报通知了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时，也通过英联邦国家驻伦敦的高级专员，通知了他们的总理。

艾登在致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说：

“今天上午我同我的阁僚以及三军参谋长讨论了当前的整个局势。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决不能让纳赛尔蔑视国际协定，用这种方式夺取运河的控制权。如果我们目前在这一问题上采取坚定的立场，我们就会得到所有海运国家的支持。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深信，英美两国在中东的势力最后将遭到破坏。

“当前受威胁的是西欧的石油供应，其中的大部分都通过运河.....如果运河遭到封锁，我们就不得不要您帮助我们，减低你们在地中海东岸输油管终点所提取的石油量，同时也可能要求你们在一段时期内由你方供应补充的石油。

“然而，威胁更大的倒是未来的长久的局面。运河是一宗国际财产和设备，它对自由世界具有存亡攸关的意义。海运国家决不能允许埃及没收运河，听任它无视运河以及运河使用国的权益，夺取运河的收入而用在国内的用途上。

“我们决不应该让自己牵连在这样的法律遁词中：埃及政府有权把一个在技术上属于埃及的公司收归国有；同时也不应牵连在这样的经济争论中：他们有能力拿出他们曾经提到过的补偿费。我认定，我们应该在更广泛的国际基础上同纳赛尔进行交涉。

“我们认为，单凭经济压力，不大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推测，埃及已不应该再从你们那里得到任何援助，一个月以前，此间埃及的英镑存款中已没有大笔到期应付的款项。我们应该在开始时就向埃及施加最大限度的政治压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我们自己的行动以外，我们应该吁请各有关国家给予支持。我的同僚和我都深信，作为最后一着，我们必须准备用武力来使纳赛尔恢复理智。因此，今天上午我已指示三军参谋长拟定一项军事计划。

“然而，第一个步骤必须是美、英、法三国交换意见，使我们的政策趋于一致，同时共同商讨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对埃及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

纳赛尔把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对英法是一致命打击。艾登对此急如星火，据这位首相估计，联合王国的石油储存量可以维持6个星期，而西欧其他国家的储存量则比较少。燃料对英国的经济来说，是一项主要的动力来源，而现在它的不断供应却要“仰赖纳赛尔的鼻息了”。当时中东的油田一年大约可以生产14500万吨石油。在1955年，将近有7000万吨石油通过埃及当时的盟国——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境内的输油管运抵地中海东岸各国的港口。

英国每年进口的石油，有一半以上都通过该运河。“埃及人任何时候都可能阻止石油通过运河。”艾登说，“他们也可能唆使他们的盟国切断油管。我们不得不衡量一下，从波斯湾兜一个大圈子绕过好望角运输石油意味着什么。”

艾登急切得到美国的答复，7月28日，美国派了副国务卿帮办墨菲去伦敦参加外长会议，打算说服英法放弃使用武力。艾森豪威尔还亲自和艾登通了电话，强调依靠武力解决运河问题是“站不住脚的”，主张通过联合国“取得满意的解决办法”。

艾登初步了解到美国的意图后，向墨菲提出，希望美国在英法与埃及的斗争中至少能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在必要时提供核保护伞，“看好俄国这只熊”；第二，在英法石油来源被卡断后，希望美国供应石油。至于联合国，英国并不把它放在眼里。

7月3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来到伦敦，杜勒斯带来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封信。美国总统强调谈判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排除使用武力，他承认运河对“自由世界”的重大价值，也承认为了保护国际权利，最终可能有必要使用武力。但是，艾森豪威尔认为必须在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和平解决的办法之后，再使用武力。

杜勒斯在8月1日同其他外长们举行第一次会谈时，概括了他的看法：  
——把运河交给任何单一国家去支配而不受任何国际控制这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应该引用1888年君士坦丁堡条约作为讨论的基础以免和巴拿马运河牵扯在一起；

——武力是最后不得已采取的办法，但是，如果别的办法令部失败的话，美国也并不排除使用武力；

——我们应该动员世界舆论来支持国际管理运河；

——我们应该设法使要召开的会议至少有2/3的多数接受3国意见。

杜勒斯在8月1日举行的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上继续恶狠狠地说：“必须找出一个办法，叫纳赛尔吐出他在企图吞下去的东西……我们必须认真努力使世界舆论支持国际管理运河……造成一种对纳赛尔极不利的世界舆论，使他陷于孤立，这应当是可以办到的。那时，如果不得已而采取军事行动，就会比猝然采取军事行动更容易成功，并且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反响。”

杜勒斯除了参加3国会议以外，还在唐宁街同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进行了多次会谈。对此，艾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杜勒斯）的发言使我们感到鼓舞，他一再表示同意我们的看法：夺取一条重要的国际性航道是不可容忍的，特别是企图独霸运河的国家是埃及，就更不可容忍。一定要让纳赛尔——借用杜勒斯先生对我说的话——‘吐出来’。这些话很干脆，一直在我耳边震荡了好几个月。”

英、法、美外长几经磋商之后，于8月2日发表联合公报，鼓吹运河是“国际水道”，“始终具有国际性质”，否认埃及将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权利，建议24个国家（包括英、法、美、苏）在伦敦开会，妄图通过国际会议把运河公司重新置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在英国政府和新闻媒介的煽动之下，英国殖民主义者疯狂叫嚷：“一定不能纳赛尔白白地夺走他的赃物，而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在下院辩论的前一天，即8月1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好战社论。

社论说：“明天下议院议员们在讨论苏伊士问题时，有一件事情他们是肯定的，而且必须以此作为他们的指导思想。如果让纳赛尔的阴谋得逞，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中东的一切利益都将完蛋。现代世界曾多次受不法行动之害，如希特勒的进军莱茵河地区，或斯大林分子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自

由，这些行动都是在维护国内主权的名义下进行的，实际上，它们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纳赛尔夺取运河的行动，同样是另一个历史转折点。对他的掠夺是否‘合法’进行诡辩将使吹毛求疵的人高兴，使胆小怕事的人快慰，但却完全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社论继续说：“第一点是十分简单的。不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苏伊士运河的自由通航是西方的根本利益所在，只有当运河掌握在友好和可靠的人的手中，自由才能得到保证。纳赛尔的掠夺行为及其为此而发表的演说，最后证明了他是既不友好又不可靠。第二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中东的巨大炼油厂和油田是英国和西欧的工业和安全的主要基础之一。谁认为纳赛尔的胜利不会鼓励其他极端主义分子对油田——以及对战略基地提出反对，谁就是自欺欺人。第三点则更为明白易懂。只要协定可以肆意撕毁，世界就不可能有稳定和信任。”

针对西方列强的好战言论和狂妄的叫嚣，1956年8月12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在接见国内外记者时，又重申了埃及政府的严正立场。其问答如下：

问：尽管西方国家有反对你们政府的行动，你认为与西方国家达成协议的门始终是开着的吗？

答：我们准备忘记过去，通过谈判的途径来解决所有的纠纷。

问：你是否打算把其他埃及公司和阿拉伯石油公司收归国有？

答：我从来没有想到把另一个埃及公司收归国有。至于阿拉伯石油公司，这与我无关。埃及坚决遵守不干涉他国事务的原则。英国报纸指责我们是罢免约旦格拉布·帕夏的主谋，指责我们在英国属地像巴林和亚丁各处酝酿骚动。这些都是记者们想象出来的。

问：你是否打算提出所有国际运河一律自由航行的问题？

答：只有苏伊士运河与我有关。

问：你是否接受由联合国来保证苏伊士运河的自由航行？

答：最重要的还是由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自己来保证自由航行。

问：在埃及遭受侵略时，你是否将诉诸安全理事会？

答：这些发动战争的人，连他们自己也不晓得纠纷的结局是什么。再说，这场纠纷还可产生更广泛得多的后果。

问：苏伊士运河区域是否真的已经处于戒严状态？旧公司的职员被迫为新机构工作是否属实？

答：运河区域并没有处于戒严状态。至于旧公司的职员，他们可以自由离职，但须按照规章预先通知我们。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希望访问运河区域，并看看我刚才所说的话是否属实，都可以从埃及政府得到一切便利。

问：你是否准备接受由一个联合国委员会来监督苏伊士运河的管理？

答：我在本次记者招待会开始时所作的声明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再重述一遍，埃及政府准备缔结协定。

问：你认为运河公司的收益足够实现你的工业计划和其他计划吗？

答：是的。我们绝对无意增加通行税。同时，我们还打算把运河加深，让更大的油船也能够通过。

问：你说，你的政府保证自由航行，但是如果另外一个政府代替了你的政府，那时候情形又怎样呢？

答：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反对自由航行的国际保证，但是我反对集体的帝国主义，反对它们对埃及内政的干涉和侵略。

在对待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美国由于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它的态度是

难以捉摸的。美国国务卿在伦敦 3 国会议上，对纳赛尔又是恫吓又是谩骂；但是会议一结束，杜勒斯回到华盛顿，就在电视讲话中声称，如果伦敦会议失败，美国并“没有承担任何种类的义务”。8 月 8 日，艾森豪威尔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希望“和平”解决运河问题。美国还通过驻苏大使悄悄地通知苏联：“美国好不容易才制止了英法的军事行动；在美国看来，设立一个国际机构以保证对运河作出自由而不加限制的安排，是最符合美苏两国利益的。”

英法对美国玩弄两面手法感到“痛苦而惊讶”，认为美国这样做，“削弱了对埃及进行的‘神经战’的最要紧阶段的西方阵线”。并再次叫嚷要采取武力行动。正是：

张牙舞爪气势汹，  
色厉内荏不中用；  
埃及决心捍独立，  
何惧暴雨和狂风！

有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斗争愈演愈烈，欲知英、法、美等国下一步的图谋和行动，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八章 图穷匕首见

阴谋诡计难实现，英法图穷匕首见；  
花样翻新无济事，调兵遣将起战端。

由英国所策划的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的 22 国代表会议，1956 年 8 月 16 日在伦敦举行。会议开幕那一天，埃及全国举行总罢工，表示抗议，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约旦首都安曼等城市，也都举行支持埃及的盛大示威，反对英法帝国主义的图谋。

在伦敦会议上，杜勒斯提出了“4 点计划”，中心内容是把运河交给一个“和联合国保持联系”的“国际委员会”管理。杜勒斯计划充分暴露了美国企图通过联合国攫取运河的阴谋。由于一些与会国的反对或表示保留意见，这个计划没有通过。会上有些亚洲国家，希望强调埃及对于运河的主权，同时又赞成“以财政报酬来公平地换取运河通航的国际管理”。后来这些意见被包括在宣言草案中。

宣言指明了国际管理的原则，承认了埃及的主权，保证埃及将从人们使用运河得到公平的报酬，并建议商谈一个新条约。新条约应该规定把运河的管理权交给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除埃及外的其他国家，应以参加这条约的各国所商定的方式选出，选举时应应对运河使用量、贸易方式和地理分配有适当照顾；委员会组成的原则是：保证官没有偏袒或不利任何运河使用国的政治动机，完全以达到尽可能最好的管理效果为其执行任务的目的。”

但是，埃及政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早就有言在先，不承认伦敦会议对苏伊士运河所作出的任何决议。1956 年 8 月 12 日，埃及政府在一项声明中指出：“7 月 26 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并且按照这种情况颁布了一项特别法律。根据这项法律，运河股东可以按照在收归国有前一天的巴黎股票市场价格得到赔偿。同一天，完全独立的、有单独预算的一个管理运河的专门机构接管了对运河的管理。这个新的管理机构拥有一切必要权力，不受政府法律和条例的限制。”

“8 月 3 日，外交部收到了英国驻开罗大使馆送来的英国政府的一件照会，照会中有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政府就埃及把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发表的声明全文。除了这项声明以外，埃及政府收到了请它参加 1956 年 8 月 16 日在伦敦举行的会议的邀请。”埃及政府声明指出，“埃及政府不能同意西方 3 国外长关于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声明的内容，因为这项声明企图运用一切可能办法加给苏伊士运河公司一种它并不具有的地位，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制造有助于干预被认为是埃及主权事务的一些问题的理由。”

“埃及政府遗憾地注意到，3 国外交部长的声明歪曲了事实，再次企图给运河以国际性质。”声明说，“很明显，发表联合声明的 3 国政府坚持硬说苏伊士运河公司是一个国际机构，并且埃及政府不能改变它的性质。这就漠视了认为苏伊士运河公司是一个由埃及法律管辖的埃及公司的一切条约和协定，并且漠视了这个事实：当苏伊士运河公司协定期满的时候，埃及政府将接管运河。”

“埃及政府在宣布决定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时候，曾经重申它要保证这条运河的航行自由的决心。国有化一点都不影响通过这条水道的航行自由。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有 766 只船通过运河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清楚

的证明。”声明指出，“关于邀请参加会议的这件事情，埃及十分惊奇地注意到：英国竟没有同直接有关的埃及商量，就发出邀请举行会议讨论构成埃及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苏伊士运河的问题。英国政府把参加这个会议的国家仅仅限于 24 个，尽管事实是在 1955 年内使用这条运河的不下 45 个国家。”

“因此，埃及政府不能认为这个拟议中的会议，是一个有资格作出决定的国际会议。”声明最后强调说，“此外，这个会议也没有任何权利讨论在埃及管辖范围之内，或者有关在它的领上的任何部分之上的主权的问题。因此，埃及不能接受出席这种会议的邀请。”

会议于 8 月 16 日在伦敦兰开斯特大厦举行。但有两个使用国缺席：希腊和埃及。前者由于它在塞浦路斯和埃及的特殊利益而下愿牵连在内。纳赛尔本来打算出席会议。他的慧星式座机已做好飞行准备，他带的一批人的护照也已办理就绪。尽管英国报纸在猛烈攻击他，他还是做好了这一切准备。尼赫鲁和铁托都劝他去，而他自己也把会议看作争取必要时间、巩固他的接管工作的另一种手段。后来，在他预定飞往伦敦的前几天，他接到伦敦大使馆发来的急件，报告说艾登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对他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说：“敌人只是纳赛尔上校。我们跟埃及人民毫无芥蒂。”然后艾登还举起一张黑纸说：“这就是纳赛尔的黑纪录！”

纳赛尔读了这份急件后说：“这家伙在演戏。他从首相变成了一个演员。”这一报告，连同艾登的健康、脾气和行动不可捉摸等消息加在一起考虑，纳赛尔总统决定不去伦敦。他派阿里·萨布里代替，令他住在大使馆，只充当一名观察员。

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确把艾登搞得吃睡不安，心神不宁。他们本来就是一对冤家，如今又变成了誓不两立的仇敌。埃及《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曾经说过，这两个人无论从哪一点都截然不同。家世、教养、外貌、服饰、经历、前途和抱负，无一不是相互冲突的。

在把运河收归国有之前，纳赛尔和艾登只是在宴会席上有过一面之缘。这次宴会不是一次社交聚会，而是一场对抗，一场两种敌对生活方式之间，两位终极的代表人物之间的对抗。这既是一场个人之间，又是一场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酒宴于 1955 年 2 月 26 日设在英国驻开罗的大使馆。当时在丘吉尔手下做外交大臣兼副首相的艾登，在前往曼谷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的途中，访问了开罗。纳赛尔厌恶到那幢房子里去。有 70 年之久，这所房子曾是埃及的真正权力中心。它是殖民统治的标志。埃及的命运向来是在那里被摆布的，纳赛尔跨进那个大门，就感到埃及所受的殖民奴役的屈辱。

许多埃及人都和纳赛尔深有同感。每当回忆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者身穿白服、骑着高头大马在开罗街头耀武扬威的情景，他们就旧恨难消。斋月开始的典礼要在一个基督教徒大使的主持下在英国大使馆里举行，如此奇耻大辱，令人没齿难忘。海卡尔说，英国人在埃及消磨的岁月这么长久，而对真正的埃及人民部吭所知。这是颇不寻常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有好几十万英国人在埃及过境，他们只结识了两个阶级。长官们结识了上层阶级，小兵们结识的是娼妓，还得受开罗街头的扒手和给妓院揽客的家伙们的作弄。他们跟真正埃及人打交道的唯一机会是在发生反英示威的时候。

在官方关系中，这种隔阂更严重，这也是导致苏伊士事件的原因之一。有人说英国政府做出了两个严重的错误判断。它喜欢跟沙漠的部落打交道而不喜欢跟城市的知识界和中产阶级打交道，它喜欢跟王宫贵族打交道而不喜

欢跟人民打交道。这些殖民统治者整天都陶醉于阿拉伯式的养尊处优，把那些埃及的统治家族视为心腹，那些家族又都像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一样，一心以为“天上唯上帝，人间唯英国”。

纳赛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艾登共进晚餐的。一个是为了要在他的国家里清除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而献身的革命家，一个是要竭力维护他的帝国的日见衰颓的霸权的保守党人。他们所在的这所房屋对两人都具有十足的象征意义。这天，纳赛尔穿的是他的上校军服。艾登是风度翩翩的一套夜礼服。纳赛尔按照他的习惯让妻子留在家里。艾登则由他的身穿裙夜礼服、苗条人时的妻子克拉丽莎陪伴。

席间，艾登口操阿拉伯语寒暄，接着又侃侃谈论《古兰经》和阿拉伯诗歌文学，这使纳赛尔不禁大吃一惊。他告诉纳赛尔，他一度有意从事阿拉伯语义的研究，毕生献身于阿拉伯事务，不过后来又觉得还是政界生涯更饶兴味。这位英国贵族，历数了他在开罗的往事，还说了1936年的英埃条约，那一次埃及的当权者被送往伦敦，在兰开斯特大厦签字。这是一个时限较长的条约，然而比起英国人跟波斯湾酋长们签订的那些条约来，这个文本是要高明些了，那些条约被认为直至“乌鸦长白毛而人世不再充斥尘土”之时都是有效的。那几位埃及的当权者曾经合影留念，戴着土耳其帽子照的相。艾登当时以外交大臣的身份在条约上签字。他告诉纳赛尔说，他家里保存有一张他们的照片，跟当时为纪念这一盛事而发行的一套邮票藏在一起。

这是一番自我炫耀的令人作呕的表演。艾登自以为他是西方外交界的巨星，对一切问题都胸有成竹，听他讲话的则是一个碌碌无名、前途未卜的上校。躬逢其会的人士有人觉得艾登是在故意卖弄，力图博得他的年轻妻子的欢心。

在另一方面，纳赛尔则是想谈谈公事的。他告诉艾登，他感到非常愉快，英埃已经签订了协议，规定英国要撤离运河区，他还希望这一步骤将使英埃关系的历史揭开新的一章。他指出，他已经为这个协议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许还得为它献出他的生命。无论如何，他说，他要遵守协议，为的是希望历史的新篇章有个升端。他还说，只有一件事情可能会对新的关系有影响，那就是埃及对于英国努力促成巴格达条约一举有疑虑。艾登问他为什么反对巴格达条约。纳赛尔说，他不能参加任何跟强国签订的防御条约。艾登对此厌烦。他要求纳赛尔说明，就算他不愿参加这项条约，干么要攻击那些赞成这个条约的人们，例如伊拉克的努里·赛义德和哈希米特皇族。纳赛尔矢口否认他攻击了他们本人，但是他认为巴格达条约的主张正在导致阿拉伯世界分裂，并把埃及孤立起来。伊拉克是会参加的，然后是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随后还可能有海湾诸国。只剩下一个埃及孤零零地面对以色列的危险，阿拉伯统一的整个设想也就有不测之虞。

这场交锋继续展开。艾登说只要埃及政府愿意，埃及大可不必参加巴格达条约，但是他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埃及居然要把它的想法强加给其余的阿拉伯国家。纳赛尔回答说：“我们并不是把我们的想法强加给它们。我们只不过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得到的支持来自如下的事实：我们的观点与群众的见解相符合。”艾登接着表明他认为纳赛尔的解释还成问题，他声称英国所处的地位更能了解阿拉伯人民真正的心情，以及他还知道“人民要求反共自卫”。

这场交锋不欢而散。事后纳赛尔说，艾登的行为颇像“一个在和流氓打

交道的王子”。但最后王子为了这些流氓而失掉了王位。

1955年4月6日艾登出任大不列颠首相时，纳赛尔曾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艾登的任命对埃英关系的影响。这一委员会由几个大使和其他方面的专家组成，以马哈茂德·法齐任主席。委员会认为，艾登企图在中东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因为这是一个他能留名史册的地区。所有其他地区都已有人染指了。丘吉尔已为英国和美国安排了特殊关系，并且已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把欧洲的防卫组织好了，剩下的只有中东了。因此，估计英国对于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必须与美苏进行角逐，对此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

如今，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使艾登恼羞成怒，他拼命纠集各种力量企图制服埃及。英美两国各怀鬼胎，貌合神离。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在伦敦会议上，杜勒斯要求成立一个国际机构来经营运河。这根本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很得艾登等人的赏识。于是一个五人委员会就此成立起来，并向纳赛尔总统说明这一建议。大家要求杜勒斯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但他拒绝了，而代之以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负责。委员会由伊朗（代表亚洲国家）、埃塞俄比亚（代表非洲国家）、瑞典（代表欧洲国家）3国的外长和代表美国的副国务卿帮办洛伊·汉德逊组成。

孟席斯一行于9月2日抵达开罗，住在俯瞰尼罗河的塞米腊米斯旅馆。第二天，他们两次会见了纳赛尔，向他说明了伦敦会议的情况和他们的使命。他们告诉他，此行是为了向他解释18国宣言，他们强调指出运河对海运国的重要性，并且表示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协议。

9月5日纳赛尔总统举行宴会招待使团，地点在曼尼尔宫，那儿在革命前是国王法鲁克叔父的王宫。四周古木参天，蔚为奇观。在进餐时，“善于外交”的孟席斯谈到这些树木，喜欢得入迷，说它们真美啊。他使尽了巴结人的功夫，来讨总统的欢喜。

孟席斯问纳赛尔：“你碰到过丘吉尔没有？”纳赛尔回答，“没有，但是我很钦佩他。”

“你听他讲过话没有？”孟席斯问。纳赛尔再次回答：“没有。”

“你可知道，”孟席斯说，“我是以丘吉尔的最好模仿者出名的。”

整个一餐饭的时间孟席斯一直在纳赛尔耳边说悄悄话，人们都以为他们在谈论有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重要大事，实际上孟席斯在学丘吉尔讲话。他也模仿萧帕纳和扬·史末资将军。他不谈正事，但是他竭力想博得纳赛尔的欢心。而纳赛尔觉得这个人既让人讨厌又让人喜欢。

第二天，9月6日，星期四，他们举行第三轮会谈。孟席斯坚持成立国际管理机构来经营运河的观点。纳赛尔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这样将成为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集体的殖民主义。孟席斯问，怎么会有这种事。

纳赛尔解释说，如果他在运河国有化以后，引进一个国际管理机构来，而这一机构又需要保护，那末这种保护只能来自外部。这样埃及就要再次被外国军队所占领。

孟席斯不同意这一论点，坚持国际管延将能解决一切问题。纳赛尔的回答是：“你认为国际管理会结束纠纷，们是我认为国际管理将是纠纷的开始。”

孟席斯将身子伸过桌面，竖起浓眉，咆哮道：“总统先生，你川国际管理的拒绝将是纠纷的开始。”

纳赛尔立即把他面前桌子上的档案夹子合上，说道：“你在威胁我。很

好用厚就没有我的事了。也不必再讨论了。全都结束啦！”

孟席斯满脸通红，埃塞俄比亚外长设法打圆场。他说孟席斯先生措辞不当，但他并没有威胁的意思。他作为他的国家，一个非洲国家的发言人来说，他这次并不是为了威胁而来的，也不是为了把埃及不喜欢的解决办法强加给埃及。瑞典外长也竭力让气氛缓和下来，洛伊·汉德逊也劝说，孟席斯讲的话并没有威胁的意思。狼狈的孟席斯自己也道歉说：“很抱歉，我没有向你进行威胁的意思。”

但是，纳赛尔总统不肯平下气来。他怒气冲冲地说：“对我说我拒绝成立一个国际管理机构将是真正纠纷的开始，这就是一个威胁。我不会在威胁之下进行谈判。”

孟席斯的代表团就此告终。这是一次令人沮丧的失败。5国委员会在9月9日结束了他们的工作，接着他们就各自回国了。孟席斯取道伦敦和华盛顿飞回澳大利亚。当他回到墨尔本时，他给艾登首相写了下面这封私人信件：

“你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所进行的工作，其困难大概不下于人类所曾作过的任何工作。对于我们没有能在开罗替你解决这个问题，我很觉歉疚。我们的报告，特别是我们给纳赛尔的备忘录对我们所使用的论点和我们所听到的言词勾出一个概貌。在这件事情上，有几个方面是什么委员会也不便正式提出的。我愿意把它们写下来供你私人参考。

“埃及不但是一个独裁国家，并且它具备一个警察国家的一切特征。偷听电话、安装扩音器、建立一个庞大的保安警察机构——所有这些都被人看作是不足为奇的事。

“有人告诉我说，纳赛尔是一个有巨大个人魅力的人，也许会把我迷惑得用信那些和我自己思想格格个人的东西。情况并不如此。在某些方面，他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家伙，但是他个但远远没有魅力，反而有些笨拙，还有一些令人发火的习气。譬如当他在对你说话的时候，两只眼睛望着天花板，当他想不出什么别的事可做时，就忽然制造出一个昙花一现的笑脸。我要说，他是一个有相当大的。但是不成熟的才智的人。对于许多他正在处理的事情，他缺少训练或经验。所以做得很笨拙。他有时也要使用那种大喊大叫的言词，但是如果他发现人们很幽默地对边些话提出质问时，他很快就终止谈这些话。他的逻辑是走不远的，这就是说，他会提出一个完全正确的大前提，有时候也会提出一个正确的小的提，可是他的结论是使人惊讶的。关于这一点，我要给你举一个非常有力的例子，我想你知道它也许有点用处。这个例子是我和他的许多辩论中的一段，我将用辽宁逐句地追述的形式把它写出来：

纳赛尔：在你们的建议中，说你们是“对苏伊士运河的严重局面而感到忧虑”。我同意有这种局面。然而是谁造成它的呢？我们没有造成它，因为我们所做的只是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而这是一件我们完全有合法权利来做的事。所以我们的那种行动不可能产生这种严重局面。造成这种严重局面的是大不列颠和法国在后来所进行的威胁。

孟席斯：但是你没有看出世界上的紧张空气正是在你收归国有的那一瞬间开始的吗？使我从美国赶到联合王国的就是这个声明。使杜勒斯从美国去伦敦的就是这个声明。使22国的代表齐集伦敦的就是这个声明，你正在忽视的是：你实际所做的事情是背弃：我用这个字眼，是因为你愿意听坦率话）一个还有12年有效期的租让合同。

纳赛尔：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的权力之内的事。任何人怎么可以埋怨呢？

孟席斯：我不承认这件事是在你们的权力之内。老实说，我认为它不是。如果你的态度是仅仅

因为背弃一个对你们有约束力的合同是在你们的权力之内，你们就可以这样做，但是这样就会一举毁坏了全世界对于存在订约中所作的保证的信心。难道这一点你没有看到吗？

纳赛尔：我不明白这一点。这个租让合同反正要在 12 年内满期的，可是如果你说的话对，那时也会引起同样的吵闹的。

孟席斯：完全不会。如果你们不干预这种租让合同，我毫无疑问地相信那个公司本身不久就会开始同你们磋商关于运河的一种未来组织。但是那种磋商就会在一种并非是危机的气氛中进行，很可能不必对像“主权”这一类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辩而达到明智和公平的结论。

纳赛尔：但是这就无视了一个事实：我们有权利做我们所做的事，而如果我们有权利做某种事，我们就不能了解人们怎么对它表示异议。

“这段对话可以说明在他的头脑里的那种逻辑是多么混乱。这恰似一个人说，因为联合王国的议会有权力通过任何它认为应该通过的法律，任何人就不应该有自由来埋怨它听通过的法律、对这法律表示愤懑和企图改变它……”

从以上这段冗长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孟席斯先生对于纳赛尔行使主权把运河收归国有，是如何恨之入骨！对他的大英联邦帝国是如何尽力效忠！这从反面也说明了纳赛尔不为帝国主义和它的奴才们的欺诈、威胁所动。正如埃及人们所说的：“纳赛尔是一条硬汉子，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纳赛尔的坚定立场使英法殖民者恼羞成怒。于是他们继续加强在地中海的军事部署，并对运河公司的非埃籍工作人员，特别是领航员采取威胁利诱的办法，煽动 493 名外籍职员（其中领航员 114 人）于 9 月 14 日离职。接着又有意开来大批船只要求通过运河，妄图造成航运瘫痪的严重局面。埃及领航员夜以继日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保证了航运畅通，使英法的阴谋再次破产。

就在这个时候，杜勒斯又提出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的计划。计划规定，运河使用国政府自己组织起来，“以便尽可能有效地享受”通航权。协会总部将设在罗马，由一个选出来的小组管理。英法对这项计划虽不够满意，为了拉拢美国反对埃及，也就勉强接受。可是 9 月 13 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除表示希望其他国家和美、英、法一起参加协会外，还说美国“不准备靠枪炮通过运河”，并说他也没有得到英国“要靠枪炮通过运河”的印象。艾登认为：“这些话无异是公开通知纳赛尔，他可以放心大胆拒绝这个计划。”对美国这种拆台的做法，艾登极为恼火。他后来写道：“这种对盟国的玩世不恭作风，破坏了真正的伙伴关系。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一个选择：是分道扬镳，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发生一种主仆关系。”

9 月 19 日，美、英、法召集 18 国代表再次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的问题。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混乱和分裂。9 月 21 日，会议在没有取得协议的情况下草草结束。直到 10 月 1 日，协会才在伦敦成立，但它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政治僵尸而已。

9 月 23 日，英法在国内外重重压力下，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法，抢先把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想借此在政治上变被动为主动，在军事上掩盖它们的侵略准备。

英法事先和美国磋商时，美国表示它不参加英法向安理会提出的提案，同时要英法不必要求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10 月 2 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还打着“反殖民主义”的招牌反对英法。这位国务卿说：“人们不能期

望美国同殖民国家或者和一心想尽快尽可能完全地获得独立的国家百分之百地一致。我承认 3 国在处理苏伊士的争执的态度方面是有不同的，这也许是出自基本的概念不同。因为我们虽然联合在一起，并且我希望在涉及北大西洋公约的体系方面我们将永远站在一起，但是在任何以某种形式或方式涉及到所谓殖民主义问题的地方，美国却是担任着一个多少有点独立的角色。” 壮勒斯的声明使英国感到“愤慨和惊慌”，这时英法只好硬着头皮与美国“分道扬镳”了。

安理会于 10 月 5 日正式进行讨论。由于各方分歧很大。在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安排下，英法和埃及 3 方于 10 月 9 日秘密会谈，结果产生了六项原则：

- 运河航道必须保持畅通，对任何方面都开放，不得歧视。
- 埃及的主权必须得到尊重。
- 任何一国的政治问题不得干扰运河的运行。
- 运河通行费及其他费用应由埃及和使用国家协商决定。
- 费用收入中应提出相当比例的一部分作开发运河之用。
- 遇有争执，应通过仲裁解决。

英法被迫承认埃及对运河的主权，埃及也同意照顾使用国的利益。但是在 10 月 13 日晚间举行的安理会上，英法又提出了一个提案，提案的第一部分是 6 项原则，第二部分塞进了它们的私货，即无理要求埃及接受“国际管理”的制度和承认“使用国协会”的特权。安理会否决了提案的第二部分，英法的阴谋又一次遭到破产。艾登在回顾英法自埃及实行运河国有化以来的失败情况时，哀叹说：“在这个令人厌倦的过程中，每经一个阶段，我们都眼看到我们的地位被削弱一步。”

艾登指责美国“企图拖延时间，随时遇见困难随时应付过去，临时制定政策，一个政策失败后就再制定一个政策。这些政策之中，没有一个是和有利于共同事业的长远目标有联系的”。艾登认为，美国的这种做法使得英国“除了使用武力或默认纳赛尔胜利以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安理会后，哈马舍尔德建议埃及和英法 3 方再次举行会谈。埃及表示愿意同英法讨论解决运河问题的办法。而英法表面上表示同意，但暗中却加紧勾结以色列积极准备侵略战争。

以色列对埃及禁止它的船只通过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一直十分怀恨，它对运河国有化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也深感恐惧。从 1956 年 9 月份以来，它不断进攻约旦，并加紧准备向加沙地区和埃及扩张，因此，它和英法的侵略阴谋一拍即合。埃、英、法三方谈判的预定日期为 10 月 29 日，后来竟成了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的日子。

战争在迫近。英法和以色列蓄意对埃及的侵略战争爆发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九章 狼狈为奸

激流滚滚风云急，狼狈为奸英法以；

联合入侵不足惧，众志成城齐御敌。

1956年10月的苏伊士运河，激流滚滚，风紧云急。英法的经济制裁，政治讹诈和武力威胁都不能使埃及屈服，它们终于乞灵于战争冒险，甚至不惜和以色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以此来挽救它们行将失败的命运。

埃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一开始，英国三军参谋长即奉命拟订一项计划，准备在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占领运河。但作为老牌殖民帝国的英法，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已日趋衰败没落。英国当时能够抽调到中东的总兵力不过5万，其中一半是后备役军人，战斗力很差。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已投入了它的大部分兵力，在军事上还不如英国。为了侵略埃及，这两个所谓欧洲的“一等强国”，足足准备了3个多月，还要利用以色列打头阵。这充分暴露了它们十分虚弱的反动本质。

许多情况表明，在策划和准备这次侵略战争中，英国是主犯，法国是同犯，以色列则是“自愿的打手”和急先锋。以色列早在1955年10月就制订了一个侵占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南端沙姆沙伊赫的方案。它同法国互相勾结。运河国有化后，法国秘密交给以色列30架以上的“神秘式”喷气战斗机，以色列的空军驾驶员和地勤人员秘密去法国受训。法国教官也穿着便服来以色列传授军事技术。大批法国制造的坦克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储备的武器零件陆续运到以色列。9月上旬和中旬，以军参谋长摩西·达扬和国防部总监西蒙·佩雷斯先后赴法密谋进攻埃及的问题。

武装入侵的准备在紧张地进行。10月13日，法以双方商定了联合侵埃的军事行动计划。10月14日，英法在艾登的乡村别墅举行了一次极其秘密的会议。会上法国代理外长阿尔贝·加齐埃和莫里斯·夏尔将军，向艾登提出了法以的侵略计划。艾登感到以色列进攻埃及可以为英法的军事干涉找到一个“大赐的借口”，但又顾虑以色列是阿拉伯国家的死敌，英国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订有同盟条约，英法一旦公开和以色列站在一起，处境十分尴尬。

10月16日，艾登为此和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飞往巴黎，同法国总理摩勒和外长比诺密谈。英国要求法国劝以色列不要攻打约旦，以免英国为难；如果要打的话，从英国的观点看，最好是针对埃及，有关这次英法巴黎密谈，艾登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们在会谈中讨论了中东的局势、它的危险和我们能做什么。约旦，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勾结已经日益紧密。有报告说将成立一个在埃及人指挥下的联合司令部，事实上，这个司令部不久就成立了。开罗电台日益猛烈地对以色列叫嚣，扬言要毁灭它。除非以色列准备坐在那里等待它的敌人在方便的时候来窒息并最终毁灭它，否则显然不久它就不得不采取某种对抗的行动的，至少也得制止埃及敢死队的袭击。如果这种对抗行动的目标是约旦——据说有些敢死队的袭击是在埃及人的领导下从约旦发动的——那么，我们的地位的确将不堪设想。我们负有保卫约旦的条约义务。约旦人没有有效的空军，我们的战斗机中队是他们唯一的保护。已经差一点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那是一架以色列飞机在某次进行反袭击时第一次遭到截击。约旦人向我们求援，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幸亏在现场采取了明智和迅速的交换



警讯，才避免了大错。

“但是危险还是存在的。如果以色列人对约旦发动攻击，以色列人就要使用他们的法国“神秘式”飞机，因为根据“3同宣言”的3个伙伴——美国、法国和我们——所两定的决议，对以色列曾提供了若干架这种飞机。皇家空军将为约旦进行战斗，而美国则在球场边线上。这简直是太容易实现的船梦了：约旦向纳赛尔和我们求援，纳赛尔向俄国求援，而法国和以色列则列队于另一边。

“早在1月时，我们的大使就曾警告约己，说埃及的干涉对于它是十分危险的。埃及正在阴谋把约旦卷入和以色列的纠纷之中。如果以色列要对包围它的敌人之一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它的对象不是约旦就是埃及，叙利亚是不够重要的，在1948—1949年间的战斗中，那唯一有力量的阿拉伯军队——阿拉伯军团——是约旦提供的。

“虽然埃及收到了大量的苏联装备，阿拉伯军团大概仍然是以色列各邻国所能派进疆场的最精悍的军队。以色列人也许会认为，不触动这一军团就对埃及采取行动是鲁莽的做法，但在另一方面，埃及是对以色列的威胁的政治发源地和主使中心。那每天高喊出仇恨和煽动仇杀的声音的，是开罗电台。那想出埃及敢死队这种恐怖工具的是纳赛尔。结果，以色列想出的答案是把它的最好的军队部署在防备约旦的前线，而使用它那经验较差的军队侵入西奈。事实证明，以色列人对于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作了精彩的答复。

“我的同事们和我深知以色列对约旦采取行动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必须全力避免这种事。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并不密切或者亲近，关于供应武器问题我们之间经常发生争论，所以在巴黎的这次会谈中，我们要求法国总理和外长尽力对以色列说明，它如果进攻约旦必将遭到我们的抗拒。法国的总理和外长慨然应允。我们所关心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条约义务，而且还有在约旦发生的事件对伊拉克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履行我们的义务，就会是我们在中东的地位的终结；不得不履行它，又会极严重地损害西方的团结。比这个情况更使人左右为难的局面大概没有了。如果以色列去打埃及而不打约旦，那么就不会出现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因此，要打的话，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最好是针对埃及。”

就这样，经过这次密谈，初步达成了英、法、以联合侵略埃及的协议。由于这个阴谋见不得人，艾登不敢把这件事告诉英国下院和保守党的同事；提交内阁讨论时，连记录也不敢保留。

从10月22日起，在巴黎附近塞夫勒的一幢别墅里，英、法、以三方的头目又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主张尽快发动进攻，他认为当时匈牙利事件“缚住了苏联的双手”，美国正忙于大选，也无暇顾及。因此机会难得。10月24日，英、法、以一致确定要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在协议上签字的有代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代表法国的比诺和奉命代表英国签字的英国当时外交部中东司司长帕特里克·迪安。

他们计划先由以色列对西奈半岛发动攻击，吸引埃及主力东援；接着由英法从塞浦路斯，马耳他、亚丁和航空母舰上出动飞机轰炸埃及，摧毁埃及有组织的防御力量；然后英法军队向塞得港发动进攻，切断西奈埃军的退路；最后，由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英法占领运河区，全歼埃军，迫使纳赛尔下台。10月25日，以色列按照预定的侵略计划，秘密而迅速地进行军事动员。

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埃及军民严阵以待。运河公司国有化一开

始，埃及就决定在运河区实行军事管制，并征召预备役军人入伍。埃及常备军约 10 万人，主要是陆军。埃军虽有一些苏式装备，但因为当时有许多飞行员和坦克手还在苏联受训，多数装备不能用于实战。如 200 辆苏制坦克，只有 50 辆可供作战；100 架米格式战斗机，只有 30 架可飞行；50 架伊柳辛式轰炸机，只有 12 架可用。在这种情况下，埃及计划一旦英法向运河区发动进攻，立即撤出西奈，集中力量保卫运河和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如运河被占领，则坚守开罗；开罗失陷，则沿尼罗河组织防线，节节抗击，坚持战斗到底。

8 月 9 日，纳赛尔下令成立埃及民族解放军。它由国民警卫队和年龄在 18 岁至 50 岁的志愿人员组成。埃及人民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纷纷报名参军。到 8 月 4 日，在短短的几天里，就有 8 万名青年参加了民族解放军。10 月 24 日，埃及和叙利亚、约旦成立了联合司令部。与此同时，埃及在运河一线部署了大量军队。

以色列在 10 月 29 日晚出动 45000 名侵略军，分 4 路侵入西奈半岛。中线一路，空降 1 个营于米特拉山口，空降旅的其余部队随后策应，矛头直指苏伊士城。稍北一路以主力向阿布奥格拉进攻，矛头直指伊斯梅利亚。最北一部沿地中海海岸袭击加沙地带腊法和阿里什。南线一路由孔蒂拉向半岛南端沙姆沙伊赫进攻。以军总参谋长达扬在其备忘录中写道：“要不是由于英法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是否会发动那场战争还是疑问。如果发动战争，则其性质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也将完全不同。”

然而，联合入侵终于发动了。从总体上说，纳赛尔对这场战争是有准备的，但战争爆发如此之快，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为“6 项原则”双方刚签字不久，英法两国就勾结以色列大举入侵了。当天早晨 4 点钟，埃及驻伦敦大使萨米·阿布勒—费图赫被召到外交部，他那位驻巴黎的同行卡迈勒·阿卜杜勒·纳比被召到法国外交部，他们在那里收到了英法两国政府给埃及和以色列的所谓“联合最后通牒”。

这个最后通牒要求以色列和埃及双方应立即停火，并从运河两岸各撤 10 英里。它更进一步要求埃及“接受英法两国军队的‘暂时占领’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的重要阵地”。考虑同意执行这些要求的时间限制是 12 小时。“如果超过时间限制，”最后通牒申言，“一方政府或双方政府尚未履行上述要求，联合王国和法国的军队将用一切必要的军事力量进行干涉，以确保上述要求得到执行。”

纳赛尔仍觉得难以相信英法两国会伙同以色列对埃及发动联合入侵。然而这个最后通牒里满是伪善和两面三刀手法的臭气。在那一阶段，以色列只有一营配备轻武器的伞兵在运河 40 英里以外的地方，因此，在运河两岸各撤 10 英里的要求，其理由何在？

“这完全是谎言，”纳赛尔说，“他们怎么会说谎呢？难道艾登是个会说谎的人吗？”他简直不敢相信艾登会说谎骗人，因为在中东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英国绅士向来是不会说谎的，这确实使他很吃惊，虽然他不喜欢艾登，不相信艾登，同时他也知道艾登要搞垮他，但是他仍然认为艾登不会说假话。

在战争爆发之前，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即一个法国人来到埃及驻巴黎大使馆，向埃方提供了有关英、法、以勾结的情报，使馆给了这个人 1000 英镑，但是过了几天，他又来了。这次他讨价 5000 英镑，理由是他可以提供有关以色列会议和联合作战计划更多的情报。当时谁也不相信他的话。根据

开罗的命令，把他当骗子撵走了。

纳赛尔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他自己相信，自称很了解中东的艾登竟会与以色列勾结在一起，竟会对一个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从而危及英国所有的朋友在阿拉伯世界的安全和英国本身在那里的地位。纳赛尔对艾登的意图完全估计错了，但对其结果却估计得十分正确。

对于英法的“最后通牒”，那天晚上，内阁会议决定埃及应该采取的行动。总统认为，如向最后通牒屈服，埃及就要大难临头。因此，最后通牒遭到拒绝。然而以色列接受了它——这是按照事先的策划行事的。

埃及的行动方针既已决定，总统遂着手组织国家的防御工作。10月30日，纳赛尔下令全国总动员，随后乘车前往设在阿巴赛兵营的陆军指挥部，在那里他和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尔总司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阿密尔已开始将他的装甲部队开往西奈去对付以色列的威胁。他要继续执行这一军事行动，以便从运河外面击退以色列的军队。但纳赛尔坚决主张将坦克部队调回守卫运河，抵抗英法军队。他力争说：“如果他们在塞得港登陆，所有装甲部队就将被切断在沙漠里，我宁愿撤出西奈，把装甲部队调回来，在国内保卫运河。”这两个人，一对老朋友，为这个问题几乎争论了一整夜，从西奈撤退坦克一事就被耽搁了。

在最后通牒发出的第二天，一场煽动民愤、反对纳赛尔的宣传战开始了。设在塞浦路斯的广播电台改名为“英国之音”，它所安排的节目就是煽动埃及人民推翻他们的总统。节目的主题是宣传“纳赛尔是敌人”，“英国爱埃及人，但是纳赛尔是个坏人”。

这种广播内容，说明这些宣传家对埃及事务和埃及人的思想，元知到惊人的地步。仅举一例来说，他们提出了一份在新政府中可为英国所接受的8个埃及人的名单，其中有两个人——哈菲兹·拉马丹和阿里·扎基·奥拉比——都早已去世了。他们的广播宣传，反而更提高了纳赛尔的名望。

第二天，10月31日，纳赛尔总统与最高司令部之间又发生了一场争论。军人们从军事观点出发，确定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阵地是与英法侵略军开展坦克战最理想的地区，因此他们着手将坦克部队从苏伊士运河调往三角洲防线。但是，纳赛尔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认为英法侵略的整个目的，就是占领苏伊士运河地区。侵略者想要的不是开罗，而是运河。所以埃及必须把它的全部兵力集中在运河地区。否则，放弃了运河，那就中了侵略者的圈套，让他们占了便宜。因此，他已派往三角洲的部队调转头来去增援塞得港和伊斯梅利亚。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埃军英勇地抵抗了以军的猖狂进犯，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埃及空军在两天之内，击落以色列飞机18架，自己损失3架。在阿布奥格拉，埃军以两个营的兵力抵抗以军的三个旅，坚守阵地。在西奈东北部的鲁瓦法水坝上，埃军一个步兵连浴血奋战，连续打退了以色列装甲部队的多次进攻。在沙姆沙伊赫的1营埃军同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激战数日。加沙守军一直坚持战斗到11月2日。埃及海军也英勇出击。驱逐舰“易卜拉欣·阿瓦尔号”炮轰海法港，在返航途中与以色列海空军激战，遭重创后自行炸沉。在西奈战役中，埃军共毙以军189人，打伤700人，生俘20人。正当埃及计划向以色列侵略军发动大规模的反击时，英法调动大批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公然开始了赤裸裸的武装侵犯。

10月31日，英法正式宣布成立两国对埃作战的联军司令部。由英国驻

中东地面部队总司令凯特来陆军上将任司令，法国的已尔若海军中将任副司令。但是直到当天下午4点半，通牌规定的时限早已过去，英国的空军仍然没有出动。原来英法怕飞机白天易被埃及炮火击中，加上美国正在开罗撤退侨民，英法顾虑误伤美侨，影响同美国的关系，便延迟攻击时间，这时以色列在米特拉山口的395名伞兵四面被围，眼看有被歼灭的危险。本—古甲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想命令这支空降部队突围撤回，但为达杨所劝阻。直到下午5点50分，英法才出动飞机轰炸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等城市和机场，在这次空袭中，埃军空军受到严重损失。

在这严重考验的时刻，埃及的投降派跳了出来。在空袭开始后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埃及原革命指导委员会委员、政府成员萨拉赫·萨勒姆无耻地对纳赛尔说：“你已尽了你的一切所能，你已拿出你最大的能耐来为国效劳。但是你失败了。你还可以为国效劳那么一次……你去向他（英国大使）自行投降吧！因为他们要的只是你。”纳赛尔怒斥道：“我宁愿在战斗中牺牲，而不会去投降！”

他转身问别人是否赞同萨勒姆的意见。没有一个人赞同。艾登相信，先发最后通牒，继之以轰炸，就足以把纳赛尔搞垮。可是艾登错了。没有反对纳赛尔的示威游行，只有支持他的。纳赛尔的地位很稳固。然而纳赛尔意识到埃及军队不能与强大的英法军事力量对抗到底，所以他用很多的时间在准备打一场人民游击战争。他计划将游击队司令部设在三角洲的坦塔，并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小型武器贮藏所。一些秘密电台也已建立起来。那天晚上，纳赛尔通宵研究了第二阶段的战斗问题。

且说英法入侵后，埃及宣布全国处于战争状态，断绝了同英法的外交关系，查封了英法在埃及的银行，接管了英法在埃及的石油企业。同时，纳赛尔指挥军队立即从西奈撤退，转入运河区，以便集中兵力抗击英法侵略军，粉碎敌军两面夹击的阴谋。当时埃军在西奈半岛有45000人，占埃及军队总数一半左右，埃军在后有敌兵追击、上有飞机轰炸的情况下，且战且退，牺牲了约1000人，损失了几十辆坦克和军用车辆。以色列侵略军在加沙地区和西奈半岛烧杀抢掠，抓走了7000名平民。但是，埃军主力终于顺利地撤出了西奈半岛。

为了保卫运河区，已派往尼罗河三角洲的埃及部队也奉命调转头来增援。有6艘满载水泥和废铁的船只，准备自沉，以封锁运河，这时英国飞机前来轰炸，船只被炸沉后，堵塞了运河，使英法兵舰无法通过。

埃及利用美国同英法的矛盾，集中力量打击英法侵略者。它要叙利亚下去炸毁美国公司的油管；并故意把美国的两艘驱逐舰拖在亚历山大港内，使英军不敢对该港轰炸和袭击。美国大使向纳赛尔保证，美国将尽力在联合国内通过外交行动使战争得以制止。埃及军民同仇敌忾，在战斗中沉着坚定。在开罗，尽管敌机袭击频繁，这个城市的300万居民仍表现了惊人的镇静和顽强。他们积极准备投入战斗，如苏布拉区100万居民中，有50万人学习使用武器。许多工人学生奔赴前线，留下来的在敌机轰炸下坚持生产，并参加救护工作。

在人民群众抗击侵略、保卫祖国热情的影响下，纳赛尔指派革命指导委员会委员、内政部长毛希丁统一指挥游击活动；革命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侯赛因负责领导运河区的游击队。根据纳赛尔的命令，40万支来福枪分发给了民兵。在运河区原来英军的仓库中缴获价值3亿英镑的军火，也用来

武装埃及人民。

在英、法、以联合入侵的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纳赛尔除了上前线外，始终在他开罗的革命指导委员会办公室里领导全国抗战。14年之后，纳赛尔的送葬行列就是从这座建筑物的院子里出发的，以纪念他在那里度过的拼死苦战的日子。当时他睡在一个简朴的小屋子里，隔壁就是他那个同样简陋的办公室。在那些日子里，他每天平均睡两三个小时。他睡觉之前总是说：“如果登陆开始就叫醒我，否则，就让我睡觉。”

“不过，在我们准备迎击入侵期间的一天晚上，”埃及著名新闻工作者、开罗《金字塔报》总编辑海卡尔说，“我到革命指导委员会总部访问他时，发现他在阳台上回来踱步，闷闷不乐。他一直在倾听一首已经抓住了公众心灵的歌曲。人人都在唱这首歌。这是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菲兹唱的曲子，他后来成为埃及最有名的歌手之一。歌词叠句是：‘我们已将埃及交托给你。’纳赛尔对我说：‘我一直扪心自问，我的行为有没有辜负这一重托？’”

“那首歌使纳赛尔深为感动。”海卡尔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第二天，他决定去前线。我们竭力劝阻他，告诉他那个地区正在遭到扫射和轰炸，他的汽车可能被发现。但是，他不听从我们；相反，他听从那首歌，而在11月5日出发到前线去了。他到达因恰斯时，那儿正遭到猛烈扫射，同时听到消息说，敌人在塞得港和富阿德港空降登陆。”

纳赛尔从沙漠里掉转头去为苏伊士运河和埃及打军事仗和政治仗时，他才倾向于把这次空降登陆同英国与以色列勾结联系在一起——作为艾登背信弃义的又一例证。事过之后，纳赛尔总统谈起此事时说：“如果艾登用英国海军企图侵略埃及，我想埃及人事后会置之脑后，不咎既往。纵然他伙同法国一起来，我们也会说它大约是出于需要一个盟国。但是他把以色列人搞进反对阿拉伯人的冒险行为，这是非常愚蠢的。我们过去一贯憎恨英国的政策，但是从此我们开始鄙视英国的政策了。”

有人说，苏伊士事件，很大程度上是阿拉伯民族主义革命家纳赛尔和垂死的帝国主义发展到顶点的化身艾登之间相互斗争的故事，他们之间的相互憎恨，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基于两种不同的国家、两种不同的力量之间利益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这种憎恨，是他们各自几百年的历史背景所酿成的。英国70年的占领，时这个由两个方面交织起来的憎恨加了一把火。纳赛尔和艾登之间仅有一次会见，使问题更趋白热化，现在终于爆发了。而使事情复杂化的，还有另外两种因素：一个是约翰·福斯特·什勒斯，一个是克拉丽莎·艾登。

美国在那个时期政策很混乱。美国人用许许多多不同的调子发言。国务卿是一种调子，他的弟弟、中央情报局头子艾伦又是完全不同的调子。国务院是一个调子，白宫则是压低了调子。但是，在这场中东角逐中，这个新的对手的力量是不容置疑的。纳赛尔说艾登是“色厉内荏”，而杜勒斯则是“口蜜腹剑”。

危机期间，埃及考虑的因素之一，就是杜勒斯谈到艾登时那种蔑视的口吻。杜勒斯对一位阿拉伯政治家说：“安东尼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他被纳赛尔搞得不知所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杜勒斯的长期目标与艾登有何不同。杜勒斯也要纳赛尔下台，但是他的兄弟要他相信，可以从内部策划政变来达到这一目的，而不必从外部发动进攻。这一办法既不会激怒阿拉伯人，也不致触犯苏联人。

艾登的老婆克拉丽莎坚决主张搞掉纳赛尔。新闻媒介曾报道说，她对保守党内有人攻击她丈夫是“稻草人”大为恼火。她梦想艾登会像她叔叔温斯顿·丘吉尔那样，证明自己是个大丈夫。美国记者阿瑟夫·艾尔索普访问纳赛尔时，对纳赛尔说，他访问克拉丽莎的那天，她拿起一份载有一张纳赛尔肖像的报纸气愤地说：“怎么能让这个埃及人向安东尼挑战并放过他呢？”这位记者的印象是，艾登只要能讨好他的老婆，他就不惜去砍下纳赛尔的脑袋。

但是，与纳赛尔和艾登之间的深仇大恨相比，杜勒斯和克拉丽莎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纳赛尔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他所维护的不是个人的威信，而是国家的尊严，民族的荣誉。他坚信，正义的力量一定会胜利！正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欲知埃及人民在英、法、以强敌面前，英勇奋斗、同仇敌忾的情况，全世界进步力量对埃及维护国家主权正义事业的支持，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章 同仇敌忾

硝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军民千百万；  
同仇敌忾保国家，塞得港人创新篇。

英国和法国伙同以色列非法人侵埃及，激起了埃及人民的无比愤慨。埃及军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同仇敌忾，奋起抵抗。

英法人侵后，纳赛尔发表讲话，宣布全国处于战争状态，断绝了同英法的外交关系，查封了英法在埃及的银行，接管了英法在埃及的石油企业。埃及 3000 多万人民奋起抗战，在开罗，尽管敌机袭击频繁，但这个城市的 300 万居民仍表现了惊人的镇静和顽强，他们和军队并肩战斗。

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11 月 1 日，星期四，阿拉伯世界各地的支援开始到来。约旦国王打电话告诉纳赛尔总统说，他准备向以色列发动攻击。但是纳赛尔请求他不要出兵，说约旦正面临着比以色列袭击远为严重的情况，约旦军队必须按兵不动，以免遭受损失。

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也曾打电话给纳赛尔总统，提出他将推迟预定的莫斯科之行。但纳赛尔敦促他去，并说如果形势有所发展，他会打电话到莫斯科通知他。库阿特利后来告诉纳赛尔说，正当他准备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元帅进行会谈之际，他得悉英法轰炸开罗的消息，当时他感到非常不安，就丢开了议事日程。他问那些俄国人：“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反问库阿特利，他认为他们应该怎么办？他回答说：“你们必须进行干涉。”

就在此时，叙利亚的民族主义军官们，在阿卜杜勒·哈密德·萨拉杰的领导下，炸毁了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这一行动对西方国家的石油供应和英国货币危机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在英法军队发动进攻以前，已作好安排：叙利亚人一收到纳赛尔的秘密信号，就炸毁伊拉克石油公司和泛阿拉伯油管公司的输油管，切断对欧洲的石油供应。英法侵略行动开始后，萨拉杰征求埃及对炸毁输油管的许可，纳赛尔表示同意，并发出了秘密信号。但是信号发出后，总统才想到此事涉及两条油管，其中之一的泛阿拉伯油管公司的油管是美国人的。由于美国为了与老殖民者争夺中东，曾出面“强烈支持埃及，反对英法”。他不想触怒美国人，因而不得不发出一份急电，叫萨拉杰只炸毁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油管。切断油管，封锁运河，以及拒绝石油供应，都是纳赛尔预定计划的一部分，就是用造成欧洲经济危机的办法来反击侵略者。

轰炸在继续，敌人援兵源源开来，战争规模在扩大。埃及装甲部队在英勇的后卫战掩护下，从西奈撤退时遭到扫射和轰炸。纳赛尔估计短期内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他命令 6 艘用来阻塞运河的船只，满载水泥、啤酒瓶和废铁，停泊在大苦湖里，准备英法入侵一开始就沉入运河。英国人得知后，进行了猛烈的轰炸。不过，只有一艘船被炸沉，而且它巧妙地将运河堵塞了。其他几条船都是凿沉的，组成了一道非常有效的障碍。这样什么船也不能通过苏伊士运河了。

在保卫运河的过程中，塞得港军民曾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塞得港是埃及的第二大港，扼苏伊士运河的北口，一面临海，三面为湖泊和沼泽包围，只

有向南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向运河中部的开阔地带，在军事上难以防守。纳赛尔曾计划放弃塞得港，在伊斯梅利亚地区打一个大仗，以消灭英法侵略军的有生力量。后来他在全民高昂士气的鼓舞下，决定坚守塞得港。

英法在进攻塞得港前发生意见分歧。法国主张立即出动伞兵部队占领运河区，如果在短期内得不到海军支援，可以依赖以色列在运河东岸的军事支持；英国则要继续玩弄欺骗手段，反对在军事上和以色列作明显的配合，坚持要依靠远离塞得港 1400 多公里的马耳他基地的海军支援。双方几经争执，才决定先对塞得港实行空袭，然后集中兵力三面围攻塞得港。

从 11 月 1 日起，英法空军连续对塞得港狂轰滥炸。5 日上午 7 时半，英法向塞得港空投了一批伞兵，计英国 600 名，法国 5000 名。埃及前线指挥部通过设在各个重要地点的扩音器，迅速确切地告诉居民敌人降落的地点，群众立即集合起来，前往围歼，许多伞兵还没有着陆就被子弹纷纷击中，下午英法又空投了第二批伞兵，一部分法国伞兵降在运河东岸的富阿德港，也遭到埃及军民的英勇歼击。

11 月 6 日晨，英法从马耳他海运 22000 名海军陆战队在塞得港附近登陆。登陆作战除了使用海军炮火外，还动用了 15 架飞机，并且发射了火箭。当天，一支英国的坦克部队打着埃及的国旗冲进塞得港。许多塞得港居民以为是自己的军队胜利归来，涌上街头欢迎。嗜血成性的侵略军竟向手无寸铁的居民开枪扫射，使大批群众惨死在血泊之中。

英雄的塞得港军民在敌人的疯狂进攻和屠杀面前，英勇不屈，坚持抵抗。居民与守军一起，同窜入市区的敌人进行肉搏和巷战。年轻人组成狙击小组，连十三四岁的孩子也拿起武器参加战斗。英国以为几天的猛烈轰炸已使埃及瘫痪，塞得港之战可以轻易取胜。侵略军司令凯特来计划在 11 月 8 日占领伊斯梅利亚，12 日占领苏伊士，从而结束占领运河的整个战役。但是，英法侵略者出动了 8 万名海陆空军，却在塞得港碰得头破血流。直到 11 月 6 日停火时，他们还没有完全占领塞得港，先头部队也只窜到塞得港以南 27 公里处的卡卜。英法的侵略计划完全破产。

当时领导塞得港抗战的是卡迈勒·里法特。他是自由军官运动成员之一，曾担任情报官。原奉阿密尔元帅之命调往西奈抵抗以色列军队的第四装甲师。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为了保卫运河，阻止英法的进攻，他已根据纳赛尔的命令，迅速撤了回来。这个师在转移途中受到英国皇家空军的攻击，但是他们的装甲车隐蔽什沙基地区的掩蔽阵地里，没有受到损失。可是，由于塞得港本身无法守卫，埃军决定只用民兵留守，同敌人开展游击战争。

里法特炸毁了淡水运河。领导由工人、农民、士兵组成的游击队同敌人进行周旋。他们在敌人士兵团层层包围下，神出鬼没·英勇奋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他们就是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也坚贞不屈，誓死不向敌人投降。为了支援这支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部队，一个名叫季南·沙瓦比的贵族夫人，带着人们的重托，带领一个完全由妇女组成的红新月会，携带 5 万英镑的支援费，由伊斯梅利亚前往塞得港。她把钱放在手提包里。到达封锁线时，一个英国军官和一个法国军官拦住了她。他们搜查了小队的所有用品和药物。接着他们要搜查她本人，于是沙瓦比夫人，这位长得漂亮而已说得一口地道英语和法语的妇人，轻蔑地朝着那个英国军官说：“你自称是位英国军官吗？”然后，她向那位好向妇女献殷勤的法国军官说：“你真要搜查一个女人的手提包吗？那末拿去吧！”他没有接受：“不，太太，你可以通过了。”



这样，她就带着 5 万英镑走过了封锁线，把钱送到里法特抗战士兵的手里。另外，埃及人民还通过曼扎拉湖，通过敌人层层封锁，把武器送到战士们手里。

就这样，埃及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塞得港，在激烈的战斗中，有 1000 多居民牺牲，2 万多人受伤，12000 多幢住宅毁于战火，大片闹市区被夷为平地，纳赛尔说，塞得港“保卫了整个祖国”，“正是塞得港人民的牺牲和勇敢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失败”。

为了进一步鼓舞埃及军民的斗志，坚定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1956 年 11 月 9 日，纳赛尔总统又在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发表演说，重申埃及决心要维护它的主权、独立、领土和尊严。他说：“埃及决不接受任何侵犯它的主权或危害它的尊严的条件。”

纳赛尔在这篇由开罗电台广播的演说中重申，埃及的自由和独立必须得到保证，而后中东才会有和平。他说：“我们绝不投降。我们将为我们的尊严、光荣和祖国而战斗。”

纳赛尔说，这是一个反对背信弃义和强暴专制的斗争，也是一场政治斗争。他指出，他所说的政治斗争，就是维护埃及的政治权利的意思。他说，至于军事斗争，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为这种斗争做好了准备。我们已经宣布，只要在我们的领土上还有一名外国兵，苏伊士运河就不会开始通航。

纳赛尔总统说：“我的同胞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态度。”“我们希望和平，我们要为和平而斗争。我们今天的感情是：团结、力量、工作、决心、斗争和圣战。”

纳赛尔总统在回顾埃及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战争经过时说，埃及卒军在英法空车袭击埃及机场以前，完全控制着在西奈半岛进行的抵抗以色列的战役。他说，在西奈战事的头 3 天期间，埃及泛机击落 18 架以色列飞机，只牺牲了 3 位埃及飞行员。在 10 月 31 日。在沙漠上空进行空战期间，埃及飞行员报告说，他们看见天空中有许多法国造的“神秘式”喷气战斗机，而原来以色列并没有如此多的这种飞机。纳赛尔说：“我们断定，法国决心暗中派它的空军帮助以色列，可是我们的空军仍然完全控制着战局。”驻西奈沙漠的埃及部队在占优势的空军支持下，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以色列侵略者，埃及军队的主力正在向前推进，去给以色列的进犯者一个致命的打击。

纳赛尔总统说，可是接着在 10 月 31 日，大背叛和破坏道义的行为发生了。英国的轰炸机轰炸了开罗机场，而在“联军司令部”的名义下，英国和法国攻击了埃及空军。

纳赛尔说，埃及第一次经历的轰炸只会使人民更加坚定地维护他们的自由和独立。他说，英国人以为这次战斗很简单。塞浦路斯岛上的专家认为，这次战斗只需要 24 小时。但是，塞得港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塞得港贡献出了自己来拯救整个埃及。

纳赛尔说，在塞得港表现的慷慨牺牲精神和埃及人的英勇抵抗，意味着英法对埃及的侵略什么目标也没有实现。他指出，英国人说他们摧毁了埃及的空军的说法只是空想。埃及的空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是有意识地不采取行动。英国人所说的击毁的地面上的飞机都是木头做的假飞机。

“当英法空军派遣大批飞机来空袭的时候，我们面对着两个可能性：我们的空军是上去迎击呢，还是把领空让给敌人？我们认为必须挫败他们的目的。尽管我们的驾驶员提出抗议，他们还是奉命不起飞。如果我们去迎击英

国人和法国人，我们将会损失我们的驾驶员。我们就把假飞机放在飞机场，用这种办法来保存我们的空军。”纳赛尔指出，艾登的打算落空了：“埃及的空军仍然存在，并且正在等待着在战斗中轮到它来执行任务的时候。”

纳赛尔最后强调指出，英法政府的行为“就像真正的战争罪犯一样，对埃及人民发动了谋杀性的战争”。“也就因此，这些罪犯们在国际舞台上是完全孤立的，所有人民的声音都谴责背信的侵略。”他说，全世界每一个地方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支持我们。埃及保卫了它的主权。“今天，我们的感情是：我们要战斗，我们要用战斗来保卫我们的祖国。”

在埃及人民奋起反抗侵略的战斗日子里，全世界人民掀起了反对英法侵略、支持埃及正义斗争的热潮。阿拉伯各国人民给埃及人民的斗争以有力的支持。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继埃及之后与英法断交，约旦同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这3个阿拉伯国家都宣布总动员，表示愿将全部力量交由埃及支配。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切断了英国资本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油管。英军在利比亚的油库被炸毁。沙特阿拉伯决定暂停向英法供应石油。巴林群岛举行总罢工。苏丹向埃及派了志愿军。突尼斯、摩洛哥政府也公开表示反对英法的侵略。伊拉克政府在人民的推动下，宣布与法国断交。并提出准备给埃及军事援助。一些阿拉伯国家不准英国使用它们的军事基地。苏伊士运河战争“使英国失去了阿拉伯世界”。

亚非拉各国人民纷纷举行示威，支持埃及人民收回运河和反抗侵略的正义斗争：

1956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严正指出：“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9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接受埃及大使递交国书的答词中再次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并且相信在这一斗争中埃及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10月2日，毛泽东号召：“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继续对埃及的正义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

为了表示中国对埃及人民斗争的声援和坚决支持，1956年9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会议上作了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报告，指出：“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行动，中国人民都不能置若罔闻。”英法入侵埃及后，中国政府于11月1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神圣斗争。

11月3日，中国政府向英法提出强烈抗议，警告英法政府必须立即停止进攻，撤出侵埃的一切武装力量。声明说：“英法政府策动以色列进攻埃及，又利用这种进攻为借口，自己发动了对埃及的武装进攻。这是历史上一次最蛮横、最可耻的侵略行为。认为这种武装侵略是为了保证苏伊士运河的航行自由，是荒谬绝伦的。正是英法和在它们指使之下的以色列的武装侵略破坏了运河的一切航行，并且堵塞了通过和平协商以保证运河航行自由的道路。”

“英法政府武装侵略埃及是对于联合国宪章的粗暴破坏，是对于亚非各国人民的公然挑战，是对于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愤怒和抗议。”声明说，“中国政府认为有责任向英法政府提出严重的抗议和警告。英法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一切武装进攻，必须立即撤出它们侵入埃及的一切武装力量，在它们的指

使下侵入埃及的以色列武装力量必须立即撤回到停战线后面，像证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问题必须经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如果英法政府竟敢藐视世界人民的正义谴责和合理要求，坚持对埃及进行侵略战争，那末，他们就必然会面对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11月7日，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揭穿美国纵容英法侵略和企图控制埃及的阴谋。中国政府还决定赠送埃及2000万瑞士法郎和大批物资。全国城乡数亿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成立了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

在埃及人民反对英法和以色列侵略的斗争中，亚洲各国人民也伸出热情的手，给予声援和支持。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现称斯里兰卡）、缅甸、阿富汗等国政府纷纷表示反对英、法、以侵略埃及。雅加达人民举行了105万人参加的大示威，高呼“英法帝国主义滚出亚洲和非洲”的口号。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的码头工人对英法船只进行了抵制。塞浦路斯人民加紧袭击英军的活动，使英法侵埃的基地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参加巴格达条约的4个穆斯林国家也召开会议，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要求英法撤军，并且不让英国参加巴格达条约。

在11月1日联合国大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有10个亚非拉国家的代表发言，一致谴责英法以侵略。11月3日，19个亚非国家提出一项提案，要求立即停火，制止把军队、军火运进这个地区，以色列军撤回到停战线后。这个提案以59票对5票通过，大杀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使英、法、以在政治上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

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也在会上浑水摸鱼。艾登对此甚为不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联合国大会上带头采取反对以色列、法国和英国的行动的，不是苏俄，也不是任何阿拉伯国家，而是美国政府。它的国务卿说，他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提出了提案。这个提案丝毫没有考虑以色列或者法国和英国采取行动前的事件，也没有建议联合国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来改善那个地区早就存在的危险情况。……这个提案使和平受到了约束。提案是针对战斗本身而又针对英法干涉的，它宣称现在中东参加敌对行动的各方应该同意立即停火埃案要求所有会员国不要把军事物资运到这个地区，并且要求在决议得到遵守以前，联合国大会继续进行紧急会议。杜勒斯先生承认，仅仅设法恢复以色列攻击前的现状的提案，既不充分也不全面。他希望联合国设法导致改善他所说的‘这个悲剧’的情况。他没有说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英法的侵略也遭到欧美人民包括英法两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1月1日，英国工人罢工，学生游行。

11月4日，伦敦5万市民在特拉法加广场集会，反对政府侵埃。有1万多群众高喊着“艾登必须滚蛋”的口号，涌向唐宁街10号首相府，同警察发生了据说是“20年来最大最猛烈的一次冲突”。法国的反战运动也风起云涌，吓得摩勒惊慌失措，要求议会授予他应付紧急局势的权力。

侵略战争使英法的财政经济状况空前恶化。沉重的军费负担使英法财政赤字激增，外汇储备锐减。由于运河封闭，油管被截断，中东石油来源有断绝的危险。英法国内许多企业纷纷倒闭，失业增加，物价上涨，劳动人民处境更加困难，阶级矛盾加剧。英国工党经济问题主要发言人威尔逊，11月12日在下院抱怨说，靠最近节约卫生费用和取消对牛奶、面包的最后一笔补助

金省下来的 500 万英镑，“全都葬送在塞得港的火焰里了”。

作为执政党政府首脑，艾登对经济形势的恶化，十分不安。他说：“我们面临着—个比布尔加宁元帅的威胁更不可轻视的威胁。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形成了挤兑英镑的现象，其速度之快，有使我们的整个经济地位遭到大祸的危险。两个月以前，内阁讨论了在苏伊士采取行动的财政后果。军事预防措施的费用大约 1200 万英镑。从 9 月中旬以后，为了使我们打算采取的军事行动保持准备状态，我们每月花费了大约 200 万英镑。据估计，军事行动本身的费用约为 1 亿英镑，相当于防御计划年度开支的 1/16。财政部肯定认为能够担负这些开支而不会有过分的紧张。然而，如果无限期地堵塞运河和切断输油管，我们的收支平衡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由于主要是美国市场上或者美国帐目上对英镑的投机，立即形成了危机的情况。”艾登说，“11 月初压力大大加强了。我们的储备在 9 月份减少了 5700 万美元，10 月份减少了 8400 万美元，而 11 月份减少了 27900 万美元。

27900 万美元这个数字约为我们的全部黄金储备的 15%。这是阴暗不祥之兆。在今后几天内，可能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美国竭力利用英法的经济困难，压它们在中东停火撤军，以便取而代之，并乘机加强对英法经济的控制。美国财政部长乔治·汉弗来拒绝批准英国从国际货币基金提取大量美元的要求。汉弗来对英国财政大臣麦克米伦说，只有在英国答应立即停火时，才会给予财政援助。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不满地指出：“美国的政策是被石油利益集团控制着的，它的目的是要由美国来代替英国在中东的全部势力和经济利益。”法国《回声报》也无可奈何地哀叹道：“对埃及的军事干涉使我们的经济独立受到了挫折。今后我们将像战后时期—样紧紧地依赖美国，它将用石油和美元来控制我们。”

内外交困的局面促使英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侵埃战争后，英国下院保守党和工党间的争吵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10 月 31 日，工党对政府提出弹劾。工党领导人盖茨克尔说，政府的侵埃决定是“非常愚笨的行动，我们将要为这个行动的不幸后果遗憾多年”。

11 月 1 日，当英国国防大臣赫德向下院宣布英机轰炸埃及时，工党议员大叫“可耻”！要保守党政府辞职。两党议员互相辱骂，下院—片混乱，以致议长不得不宣布休会半个小时。这是 1923 年以来所未有的。工党议员葛来菲斯说：“这个星期对我国说来是—个黑暗的悲惨的星期。”“政府由于使我国投入了不义的和罪恶的战争，已经严重地违背了我国千百万人的意见”，这个行动“可能已经给了英联邦以致命的打击，无可补救地损害了同英国的友邦的联盟”。英国上院也有 30 名议员谴责政府对埃及使用武力。

英法伙同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和抨击，致使英国保守党内部发生分化。

11 月 3 日，艾登的亲密僚属，首要的“青年保守党人”、外交国务大臣和英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安东尼·纳丁因不同意政府对埃政策而辞职。艾登的公共关系顾问克拉克、财政部经济次官波伊尔也因反对政府政策相继辞职。许多人退出了艾登政府和保守党，这是保守党经受的—次严重危机。法国摩勒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经常受到来自议会和社会党内部的抨击。很多人指责进攻埃及是“灾难性的政策”。以色列在国内外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它在 11 月 5 日占领沙姆沙伊赫后，便宣布停火。

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11月6日下午1时，艾登打电话给巴黎的摩勒说：“我们必须停火。”摩勒含着眼泪恳求艾登再坚持几个小时，使部队能到达苏伊士城。摩勒说：“我们已接近于成功。我们不要使远征归于无效。”艾登在电话中回答道：“我是进退两难啊！我不能坚持了。我正在被所有的人抛弃。我的忠实的同事纳丁已辞去国务大臣的职务。我不再能依靠保守党内的举党一致。坎特伯雷大主教、教会牧师、石油商，每一个都在反对我！英联邦面临分裂的威胁……我不能做王室的掘墓人。我要求你理解，真正地理解，刚才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我，我不能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再于下去。”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法国总理摩勒最后只好接受艾登的意见，同意停火，因为法国也不能在没有英国的情况下再于下去。

11月6日下午5时，英法终于被迫宣布在当日午夜停火。据艾登说，这次作战中，登陆的总人数为22000人，其中英国人有13500人。英国阵亡16人，负伤96人；法国阵亡10人，负伤33人。

12月3日，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被迫在下院宣布英国从埃及撤军。他打肿脸充胖子，说什么英法侵埃“制止了一场局部性的战争”，“使得全世界避免了灾难”，结果引起哄堂大笑。许多议员要求政府立即辞职。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比万挖苦说：“我们很同情外交大臣，他不得不发出进军的号角声来掩饰他的退却。”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劳埃德宣布撤军后，一些号称“苏伊士集团”的死硬的右翼议员在议会里发言时，由于“幻想破灭的痛苦”，“面色发白、全身发抖”。

在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作为大英帝国政府的首脑，艾登经常被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事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那个时期的日日夜夜，事态发展的步伐以及政府主要官员的紧张，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任何时候。诚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曾进行过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辩论，有时候辩论的结果还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但是这样的辩论并不太经常。而现在这样的辩论却是连续进行的。在那个决定性的时期，辩论差不多每天都在进行，并且在整个会议期间一直在进行。这种情况总是使得下院在开会期间很难处理、常常是不可能处理甚至最迫切的工作。下院会议至少是从下午2点30分开到晚上10点，有时候还要更晚一些。除此以外还有时间的差别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没有任何横越大西洋的电话联系。首先这种电话联系不安全，德国人可以偷听，确实也偷听了。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在我们的时间午夜之后，联合国和华盛顿用电报和电话进行的联系最活跃。有事情总是可以找到我，外交大臣也是如此。我的出色的侍从人员们尽了最大的力量来避免麻烦我，并且安排人轮流值班，但是经常打扰夜间休息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艾登说，“在这些日子里，不再存在私人生活。……午饭不一定什么时候吃，常常要到深夜才吃晚饭。”

英法政府在联合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联合国要它们立即指定一个撤退军队的日期。艾登抱怨说，美国政府在这方面不仅没帮忙，反而起了带头作用。他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美国“财政部长汉弗来先生打电话给巴特勒先生，说明美国在英国发表关于撤军的明确声明之前，不会给予英国帮助或者支持。在后来的一份电报中，他说，美国政府这样说的意思是要我们宣布早日撤军。”

11月23日，为了躲避矛盾，艾登宣布自己“疲劳过度”，到牙买加去

“休养”。1957年1月，艾登终于被迫辞职。这个出身于贵族世家，受到帝国元老青睐，号称阿拉伯问题专家和一度显赫于英国政坛的人物，30年来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个人政治资本，在6大的战争中几乎都输光了，从此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伴随着艾登的隐退和辞职，大英帝国在埃及的丧钟敲响了。在1956年12月22日，垂头丧气的英法侵略军在暮色苍茫中全部从埃及的领土上撤走了。英雄的塞得港和塞得港居民，在经历了40天的黑暗日子之后，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英法侵略军从埃及全部撤出和塞得港的光复，是埃及人民英勇反抗侵略、保卫民族独立和主权的伟大胜利，是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伟大胜利。

英法侵略者在进攻埃及的战争中，没有捞到任何东西，不得不被迫从埃及领土上全部撤退。这证明它们的武装侵略政策已彻底破产，证明殖民主义者企图用过去的炮舰政策来镇压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英法侵略者在进攻埃及的战争中，出动了16万陆军，100多艘军舰，2000多架飞机。它们原想一举消灭埃及的军队占领运河，推翻埃及政府，恢复它们在埃及、中东和北非的殖民统治。但是，埃及人民的英勇战斗，给了他们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它们的武装侵略计划。埃及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在埃及争取独立和维护主权的斗争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 第十一章 大国的角逐

大国角逐不堪言，各怀鬼胎暗打算；  
冠冕堂皇非本意，相互争夺搞欺骗。

在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后，美国竭力利用战争的机会，取代英法，并妄图通过“联合国部队”打入埃及。后来苏联也积极插手。这样，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就面临着“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形势。

英法两个老殖民主义国家伙同以色列在酝酿侵埃计划的过程中，为了避免美国从中作梗，不仅不与美国磋商，而且采取封锁消息的做法。美国自以为是西方的盟主，对英法背着它勾结由它扶植起来的以色列，企图通过武力来恢复对埃及的殖民统治，感到十分恼火。从战争一开始，它就用各种手段拆英法的台，以便达到独霸中东的目的。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他的弟弟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因此消息也十分灵通，他原来估计英法人侵埃及将在美国大选之后。以色列实行总动员后，美国发现法国和以色列之间来往的外交电讯大量增加，感到形势将迅速变化，于是匆忙下令从中东有关国家撤退侨民，在以色列发动进攻的前夕，美国两次向以色列发出“紧急呼吁”，要以色列不要为英法打头阵。但以色列为了夺取埃及西奈半岛，甘愿为英法人中取栗，在侵埃战争中充当了急先锋。

1956年10月30日，埃及政府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侵略。声明说：“以色列已经在埃及境内采取了军事行动，从而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停战协定。以色列方面的这种行动是一种侵犯埃及、侵犯它的领土的完整以及安全的敌对行动。因此，埃及政府保留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采取一切措施的权利，包括自卫权。”

“尽管以色列当局宣布说不会进行任何侵略，说动员它的部队是一种目的在于保护它的边境的措施，虽然以色列总理和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在前一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保证不发动任何侵略，以色列还是采取了上述行动。事实已经证明，所有这些声明显然都是明明白白的谎言，这也就证明它的目的——现在它的目的已经变得很明显——是要在他们存心对埃及发动背信弃义的进攻的时候，迷惑世界公众的舆论。”声明进一步指出，“昨天采取的这些军事行动，只是过去几年来以色列对埃及和阿拉伯边境的一系列进攻的一部分，这些进攻的目的是要制造经常的紧张状态和威胁中东的和平，尽管国际组织对以色列进行了几次谴责，它还是这样做。”

在埃及政府发表这一声明的前两天，10月28日晚，美国驻英大使奥尔德里奇奉命宴请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探询英国态度。席间，奥尔德里奇问劳埃德，以色列动员的意义何在。劳埃德表示英国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接着他转移话题说：“英国政府曾警告以色列不要进攻约旦。”奥尔德里奇追问：“以色列是否准备进攻埃及？”劳埃德仍然守口如瓶，回答说：“我一点也不知道。”

10月29日，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的当晚，杜勒斯已觉察到这可能是英、法、以的合谋，认为事态“十分严重”。艾森豪威尔召见英国驻美代办库尔森，对他说：“中东形势的发展牵涉到美英的声誉”，美国要履行“支持被侵略者的诺言”，并表示对法国勾结以色列的行动“不能理解”。美国

正在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

第二天，1956年10月30日，埃及外长致函联大安全理事会，要求讨论英法伙同以色列对埃及的侵略行动。信中首先陈诉了英法对埃及政府的最后通牒。在格林威治时间下午4时30分，英国政府交给埃及驻伦敦大使一份照会，其中有一份给埃及政府的最后通牒，要求：埃及停止海陆空军的一切战争行动；把一切埃及军事部队撤到离苏伊士运河10英里的地方；同意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占领埃及领土上的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的关键性地点。最后通牒要求在10月31日开罗时间上午6时30分以前给予答复，如果没有按时给予答复，联合王国和法国政府将以它们认为必要的兵力进行干涉，以保证上述要求得到依从。联合王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以进攻的以色列军队和防御的埃及军队目前在埃及领土内进行的战斗作为它们争取行动的借口。

埃及外长的信严正指出：“无论这种借口还是任何其他借口，都丝毫不能为英法两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辩解。英法两国政府的这种武力威胁和在今后几小时内英国和法国武装部队将会严重侵犯埃及的权利和违背联合国宪章、占领埃及领土的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迫使埃及政府要求立即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以考虑英国和法国的这种侵略行为。”

就在埃及外长致函联大这一天，美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抢在苏联之前提出提案，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并要求埃以双方立即停火；以色列军队撤退到1949年停战线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在该地区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进行威胁；以色列不接受本提案时，不给他任何援助。这个提案的用意是讨好阿拉伯国家，威胁英法不要违背美国的意愿发动进攻。

英法代表要求对美国的提案暂缓表决。美国代表洛奇力促迅速进行表决。他说：“安理会就像面对阑尾炎患者的医生，阑尾已经溃烂，需要干净利索的手术。”结果英法第一次使用了它们的否决权。美国总统助理亚当斯说，这是美国 and 两个“最老的和最亲密的盟国”之间发生了“公开和痛苦的分裂”。

美国驻伦敦大使奥尔德里奇，在10月30日上午，再次约见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奥尔德里奇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已清楚，以色列正在攻打埃及，你们打算做些什么？”劳埃德支吾其辞说，他还得跟法国总理和外长讨论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要奥尔德里奇回使馆听候消息，并约定了再次会晤的时间。不久，劳埃德的秘书打电话给奥尔德里奇说，劳埃德要去下院，原先约定的会晤不能实现，改由常务外交副大臣柯克帕特里克在下午见面。下午4点45分，柯克帕特里克交给奥尔德里奇两份已递交埃以双方的最后通牒的抄件。奥尔德里奇恼羞成怒地叫道：“简直有点荒唐！”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得悉英法发出通牒的抄件后，大发雷霆，斥责英法“戏弄”他和“暗算美国”。他立即召见英法驻美使节，表示美国反对英法把军队开进运河区。同一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向艾登首相和摩勒总理发出“警告”。他在给艾登的一封电报中声称，英法可能参与一场“全面的阿拉伯战争”。并说，如以色列的进攻引起埃及要求苏联帮助，“中东真的就要在战火之中”。他要求美英双方迅速地开诚布公商谈，以免在“任何真正的危机中”不能协调行动。

鉴于上述情况，英国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了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促请他给予“全面支持”的电文。那一天，艾登拍了两份电报给华盛顿。在第一封电报中他说：



“我们从来没有隐瞒我们的信念，正义给了我们保卫我们的切身利益不受纳赛尔的阴谋侵害的权利。但是，我们曾和您一同召集伦敦会议，派遣无结果的孟席斯代表团，并且设法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使用国俱乐部）。如您所知，俄国人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是他们自己和埃及的胜利。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寻求继续谈判的基础。

“由于埃及坚持继续战争状态，反抗安全理事会，由于它宣布打算纠集阿拉伯国家来毁灭以色列，因此这次它受到的攻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埃及宣布成立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合司令部就是暴露埃及意图的最新实例。

“我们已经认真地考虑了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经不起运河被封闭，或者丧失每天都要通过运河的航运。我们对于这些船只中的人有责任。我们觉得应该立即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制止敌对行动。我们已经同意您的意见，把这件事提交安全理事会，目前正在发出指示。但是经验证明，安争理事会的进程可能既不迅速，也难于有效。”

在艾登同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进行了会谈并把他们共同协议的照会交给埃及大使和以色列代办以后，艾登首相发出了第二份电报。这份电报通知美国总统他们对交战双方提出的要求，电报接着说：

“我的第一本能冲动是要求您自己和您的国家参加这个宣言。但是我了解您在宪法上所处的困难境地和其他困难的境地。我认为交战双方有接受要求的可能。无论如何，如果您有可能至少用一般的措词支持我们所做的事情，就会对这种可能结果大有裨益。我们深知，除非通过贵、我两国的最密切的合作，中东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我们两国政府在过去两三年内曾经本着世界上最好的愿望尝试各种各样的公开和私下的谈判，但这些谈判都失败了。看来这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任何力量都不能防止这座火山在某个地方爆发，但是，当火山喷出的尘土平息后，就很可能有机会让我们共同做一件真正建设性的工作，从而加强在反共战线上这一最薄弱的环节。”

英法空袭埃及后，10月31日，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讲话。他首先宣称美国在中东的基本政策是“支持新国家以色列，同时加强我们跟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两方面的联系”，并且指责英法侵埃“丝毫没有同美国商量过”。他说，美国认为英法“采取这些行动是错误的”，美国“将不会卷入目前的敌对行动中去”，美国政府所致力目的是“结束冲突”。他表示赞成把这一事件提交联合国大会，因为在那里“没有否决权”。

11月1日下午和晚上，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亚非拉国家反侵略的呼声很高。艾森豪威尔急忙指定杜勒斯向大会提出一个表面上适应这些国家愿望，实际上便于美国排挤英法的提案。这个提案要求：

第一，各方立即停火，停止将军队和武器运入该地区；第二，缔结停战协定的各国立即将军队撤回停战线后；第三，联合国各会员国不将军事物资运往敌对地区；第四，一俟停火生效，即采取步骤使苏伊士运河重行开启并恢复安全的航行自由；第五，联合国秘书长观察本决议遵行情况，并就此事迅速向安理会和联大提出报告。以便它们采取自己认为符合宪章的适当的进一步行动；第六，在决议得到遵行以前，联合国大会继续进行紧急会议。

11月2日，大会以64票对5票通过了上述提案。

艾登对此伤心他说道：“在联合国大会中带头采取反对以色列、法国和

英国的行动的，不是苏俄，也不是任何阿拉伯国家，而是美国政府。”“如果当初美国愿意起加拿大这样稳重主动的作用，历史的发展必然会不同，但是后来的情况并不是那样。联合国大会有意进行惩罚。他们要惩罚的是以色列和‘殖民’国家。”

然而，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对会议的结果却表示非常“满意”。他说：“在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显示不受英法对亚洲和非洲的政策影响，我们认为那种政策反映了殖民的传统。这种独立宣言在世界各地发生了使人振奋的效果。”

但是，英法无视大会的决议，坚持侵略。艾登说：“女王陛下政府时干它们所要作的回答是很肯定的。在战斗继续进行时，我们不准停止我们的行动。如果联合国建立一支国际部队，我们愿意在某种条件下把责任移交给他们。”在那一天的白天，他同比诺部长协商了照会的措词，当天晚上得到了内阁的批准。

11月3日艾登向下院宣布了他们的答复：

英法两国政府仔细考虑了联合国大会在11月2日通过的决议。它们仍旧认为，警察行动迫切需要坚持到底，以制止现在正威胁着苏伊士运河的敌对行动，防止战端重开，并为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获致根本的解决办法铺平道路，因为这一战争正威胁着这样多的国家的合法利益。一俟下列条件得到实现，英法两国政府将欣然同意停止军事行动：

——埃及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双方都同意一支联合国部队负责维持和平。

——联合国决定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达成和平解决的协议以前、以及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一致商定满意的安排以前，组织和保持这样一支部队。上述两项协议应由联合国加以保证。

——在联合国部队组成以前这一期间，作战双方同意立即让数量有限的英法部队驻扎在作战双方之间。

就在英国政府电复联合国的同一天。11月3日，埃及政府要求立即召开联大会议，采取行动，制止侵略。在这次大会上，美国暴露出它的新殖民主义面目。它提出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两个提案，要求联合国大会成立两个委员会，分别解决关于重开与管理苏伊士运河和关于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企图打乱会议主题，转移斗争目标。联合国大会排除了美国的干扰，通过了亚非国家提出的关于限定英法在12小时内停火的决议。大会还通过了加拿大提出的组织一支所谓保证和监督停火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提案。加拿大代表皮尔逊两天前在联大发言中就提到要组织联合国部队来维持“和平”。当时杜勒斯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和艾森豪威尔“完全同意”加拿大的声明，并说，如果加拿大代表能遵循这条路线，提出一项具体建议，美国将“确实十分高兴”。提案提出后，美国代表洛奇表示支持，说他“非常喜欢这个提案”。

联合国决定建立国际紧急部队后，美国力迫英法早日停火、撤军。它想通过国际部队控制运河，同时腾出手来对付苏联向中东的渗透。由于英法仍然拒不执行限期停火的决定，美国便以中断石油供应。个准使用美援武器，甚至动用第六舰队，对英法进行威胁。11月6日晨，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艾登说：“如果你想保持英美团结与和平的话，我要求你立即下令停火，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对于美英之间的矛盾，1957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一个人，叫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了；

另外一个人，叫艾登，出一支兵去打；接着，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又说：“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毛泽东这一英明论断深刻地揭露了美英帝国主义之间激烈争夺中东的本质。

且说英法被迫宣布停火后，11月7日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43分，艾登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建议他和摩勒当晚乘飞机赴美同艾森豪威尔会谈。艾森豪威尔同意他们来美会晤，并要国务院安排接待。但国务院认为访问时机还没有成熟，现在接待，将使人误解为美国赞成英国在中东的立场。艾森豪威尔接受了国务院的意见。

当天上午10点，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艾登，希望会谈时不要就联合国关于撤军的决议进行辩论。艾登回答说，他们访问的目的是为了就整个中东局势以及英美对这种局势所能共同采取的行动进行广泛的讨论。艾森豪威尔说，他对这一点很高兴，因为如果英法政府首脑去辩论联合国决议，然后又不同意，局面就会很尴尬。

艾登向他保证：“这不是我的目的”。

后来，艾森豪威尔又给艾登打电话说，今后几天他要忙于同国会领袖进行磋商，抽不出空来。因此他得出结论，艾登和摩勒的访问应该推迟，但是他并不排除在稍后日期进行访问的可能性。

艾登吃了闭门羹，心里根本不是滋味。那天晚上，他又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份电报。电报说：“我确实希望我们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会晤。如果我们每一方打算对于长远解决中东的悬而未决问题所采取的态度首先达成共同的谅解，那么我对于我们必须作出的短期决定和行动一定会感到有信心得多。我早就觉得，我们在那里的麻烦事情中至少有一些是由于我们两个国家，从大战结束以来在中东政策上缺乏明确的谅解。我怀疑，除非我们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我们是否能够使得该地区稳定下来。”

在提到苏联的意图以及瑞士总统提出的举行另一次日内瓦会议的邀请以后，艾登最后说：“在像这样的问题上，很难依靠通信来得出深思熟虑的结论。如果我们能够很快见面并且讨论这些问题，我会高兴得多。正是考虑到这些严重的问题，我才在今天早晨建议我立刻到华盛顿去的。我仍然希望我们可能在今后几天内一俟您的急务结束，就举行会议。”

对此，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同意早日举行会议，但是他认为应该首先执行联合国的决议。这意味着英法军队应该毫不拖延地撤出埃及。艾森豪威尔这时认为，只有做到这一点，会议才会有有利的条件。因此断然地要求英国和法国人放弃他们所赢得的一切保证，然后再同美国协调对于中东的任何共同政策。

后来英国外交大臣和澳大利亚外长去华盛顿，艾森豪威尔也不予以接见。艾登牢骚满腹地说，美国差不多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对英国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停火以后比停火以前更加严厉”，“这时候支配美国政府的唯一思想就是折磨他们的盟国”。法国外长比诺也说，美国的态度是令人“最感失望的”。

正当新老殖民主义者为了争夺中东这块肥肉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苏联也打着“反侵略战争”的旗号，向埃及和阿拉伯国家渗透扩张，同美国展开了争夺。战争开始时，苏联因看不准风向而采取犹豫观望态度，当它见到有机可乘，便积极插手，后来受到美国威胁，又缩了回去。英法轰炸埃及时，

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正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朱可夫等人会谈。库阿特利认为苏联必须进行干涉。苏联领导人说，他们不可能进行军事干涉，只能通过联合国采取政治手段。

库阿特利把苏联的态度告诉纳赛尔，说明：苏联不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基于这一点，苏联不能进行军事干涉，甚至不能派遣志愿军；苏联所提供的援助最多不过是运送一些装备和派遣一些技术人员。事实上，最后一点也没有做到。纳赛尔从库阿特利的电报中知道苏联的态度，大为震惊。当时战争正处于紧急关头，他生怕影响士气，把电报放进保险箱里，只是对他的同事们说，苏联建议给埃及更多的飞机和技术人员，但他没有接受，因为这个建议不切合实际。

后来，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看到埃及顶住了英法的侵略，全世界人民一致反对英法，美国与英法公开唱对台戏，便又准备在中东进行投机。连艾登也认为：“在最初四天，苏联人在联合国和无线电广播中都极为沉默和有节制。他们在安全理事会的第一次干涉比美国的干涉要温和一些……只是在美国显然在联合国中带头反对我们以后几天，苏联的宣传才加紧了。”

1956年11月5日，正当英法就要停火之际，苏联突然由政府首脑布尔加宁出面，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建议苏美“紧密合作”，共同出兵埃及。信中说“两个拥有包括原子弹和氢弹在内的各种现代武器的大国”，如果两国“坚决表示保证和平和反对侵略的决心，那么侵略将会结束，再也不会再有战争”。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信的一开头，就对美国总统说：“在这个对普遍和平非常危急的紧要关头，我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向您讲几句话。英国、法国和听从外力支配的以色列的武装部队无端地侵入埃及，造成死亡和破坏，至今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全世界都看到，对埃及和阿拉伯人民的侵略战争正在扩大，而他们的全部罪过只不过是他们在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

“埃及的局势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最坚决的行动。如果不采取这样的行动，联合国就会在全人类面前失掉威信，就会垮台。”布尔加宁说，“苏联和美国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而且是两个拥有包括原子弹和氢弹在内的各种现代武器的大国。我们特别有责任去制止战争和恢复中近东区域的和平和安宁。”

“总统先生，当此至高的道义原则和联合国的基础和宗旨经受考验的最危险的时刻，为了制止侵略和继续流血，苏联政府向美国政府建议紧密合作。”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继续说，“美国在地中海地区驻扎有强大海军。苏联也拥有强大海军和空军。根据联合国的决议立即联合地调用美苏的这些军队，将是制止对埃及人民，对阿拉伯东方各国的侵略的可靠保障。”

布尔加宁进一步指出：“除了英法以外，其他许多国家也关心立即恢复和平，恢复被战争中中断了的苏伊士运河的正常通航。这次强盗性战争的目的是在东方恢复被人民推翻了的殖民主义秩序。假如这次战争不加以制止，它包含很大的危险，并且可能发展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苏联和美国支持侵略的受害者，那末其他联合国会员国将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这样就能大大提高联合国的威信，恢复并且巩固和平。”

同一天，11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写信给艾登、摩勒和本一古里安，警告他们必须停止对埃及的武装侵略。信中说：“英法和以色列对埃及的侵略战争有可能扩及到其他国家，发展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

政府已经向联合国和美国总统建议，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一起使用海、空军来制止埃及战争，制止侵略行动。苏联政府决心使用武力来歼灭侵略者和恢复东方和平。希望艾登和摩勒及英法政府在这紧要关头，能表现出应有的理智，清醒地估计当前形势，并且从中作出适当的结论。”

对于苏联政府的建议，艾森豪威尔给了一个“强硬和愤慨的答复”，声称苏联建议美苏“联合行动”是“不可恩议的”，并警告说：“任何新的军队进入中东，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将不得不采取有效的反措施。”美国驻法大使还向摩勒保证，美国要在中东抵抗任何新来的部队。

11月6日是美国总统选举日。上午8点37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送给艾森豪威尔的情报说，苏联已经告诉埃及，他们将在中东“有所作为”。艾森豪威尔一方面叫艾伦·杜勒斯命令高空侦察机，在以色列和叙利亚的上空监视苏联飞行员是否已在叙利亚着陆；另一方面在白宫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经过匆促的讨论，艾森豪威尔决定，美国渐次进入战备状态，武装部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处于警戒状态，增加临战状态的船只和飞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欧部队总司令、美国将军格仑瑟公开威胁说：“假如苏联使用导弹威胁西欧，我们将马上回敬，苏联将被毁灭。这就像白天过后是黑夜一样的肯定。”

11月16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小赫伯特·胡佛在联合国大会上针对苏联的威胁表示，向中东地区“引进外界力量”，“事实上是威胁进入这个地区的联合国部队。联合国有责任采取适当的行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宣布，美国将完全支持这个行动。”还恫吓说，“假使苏联直接攻击英法，我们当然要卷入一场大战。”

在美国的威胁恐吓下，苏联立即退却。赫鲁晓夫对埃及驻苏大使说，由于“地理上的障碍。苏联不可能“给埃及送去任何物质上的援助”。事实证明，苏联所谓派遣“志愿人员”，纯是虚张声势。英法政府认为，苏联的做法“主要是一种外交策略，是做给阿拉伯人看的”。赫鲁晓夫明明知道美国不会接受他的“建议”，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而已。

赫鲁晓夫两面三刀，在搞政治投机的同时，又想在经济上捞一把。它利用英法的经济困难，增加对它们的石油输出，捞取外汇，破坏阿拉伯国家的反侵略斗争。11月中旬，法国工商部长发言人说，苏联已经答应把运送给法国的石油从每月两万吨增加到10万吨。这就彻底撕下了它的所谓“阿拉伯国家朋友”的假面具。

英法宣布停火撤军后，美国一方面进一步排挤英法，另一方面则把苏联作为它争霸中东的对手。美国坚决反对英法和苏联参加联合国紧急部队，以便由它一手操纵这支部队插足埃及。11月6日，艾森豪威尔同艾登通电话时，希望艾登能够不附加任何条件遵守联合国决议，认为这是“排除俄国制造麻烦的高明办法”，还说联合国正在准备组织一支监督部队。

11月上旬，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决定在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以外的国家招募部队。这支部队组成后，从11月15日起分批进入埃及，到12月中旬，总数达到3700人。

埃及政府为了力促英、法、以撤军，同意联合国部队入境，但规定联合国部队的参加国、进驻人数、驻扎地点和期限，都必须事先经过埃及同意，埃及有权随时要联合国部队撤走，以防止美国利用联合国部队占领埃及。在埃及和全世界人民坚持斗争下，1956年12月22日，英法侵略军全部滚出了

埃及。联合国部队也按规定于 12 月 24 日开始撤出塞得港，不久又撤出了运河区。

埃及人民以坚决的斗争、英雄的气概，粉碎了大国对埃及的角逐，但是美苏两霸并不死心，它们仍在千方百计地企求控制埃及和中东。欲知这方面情况的演变和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二章 杜勒斯的图谋

埃及人民志气高，坚持独立不弯腰；

美国威胁无济事，黄粱美梦破产了！

由于埃及在中东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早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在打它的主意了。他的首要猎取目标是纳赛尔。对于这位被称为雄狮的民主革命领袖，首先是制服，此计不成就是颠覆。从此，一桩桩的阴谋活动就开始了。

在运河战争开战之前，纳赛尔和杜勒斯仅在美国驻开罗大使馆的宴会上见过一面，时间是1953年5月11日。这是一次朴素的宴会，只有汤、法式板鱼、羊排和冰淇淋。为了尊重穆斯林习惯，席间没有备酒。然而，这次会晤却是满有讲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开罗来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斡旋和平。第二是想促进他用军事和政治结盟的手段以包围苏联的计划。这是他在中东各种行动的主要动机。

他们两人，对这次会晤可能导致的结果，各自抱着截然不同的希望。杜勒斯开始向纳赛尔灌迷魂汤，并对纳赛尔讲了一系列有关国际政治以及各大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讨价还价的事情。纳赛尔发现杜勒斯对共产主义的仇恨是“顽固而独特的”，但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意想不到的幽默感的人”。

那天早晨杜勒斯飞抵开罗机场时，曾发表一个声明，说他对于能到埃及这个具有伟大文明的国家来感到非常高兴，并称埃及名誉领袖纳吉布将军是“战后自由世界一位杰出的领袖”。可是纳赛尔不久就在这句活上扭住杜勒斯。纳赛尔说：“我不喜欢你今天发表的声明。”杜勒斯感到十分惊讶，坚持声明是为了表示友好才这样说的。于是纳赛尔解释说，“自由世界”这个词儿对埃及说来有不幸的含义，“因为英国人曾占领我们的国土，保证‘自由世界’交通的安全。所以对我们来说，‘自由世界’意味着帝国主义与霸权统治。当你今天早晨使用那个词儿的时候，它产生了不良的效果”。杜勒斯立刻领会了纳赛尔的意思，并发表了另一篇措辞更适合埃及人思想感情的声明。

在杜勒斯访问开罗的时刻，正是美国日益渗入中东的时刻。开始，这个地区的许多人对这种卷入抱有希望。那时候，美国的整个形象具有“迷人的魅力”。英法都是没落的，惹人痛恨的殖民帝国。苏联地处5000英里之外，而且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义在某些地方是不相容的。但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更富有了，更强大了，在老牌帝国主义者没落景象衬托之下，更显得“光芒四射”。在美国人方面，他们真正关注的是中东的石油，他们千方百计地取代英法老牌殖民主义者，并阻止苏联在这个地区插足。

那时，美国在埃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据埃及新闻部长海卡尔介绍说，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象征是：爆发革命的当夜，双方的领导人，纳赛尔和法鲁克国王，都曾派使者求见美国大使杰斐逊·卡弗里。当时英军显然可能从苏伊士运河区出兵干涉，以此来帮助旧王朝。为此，纳赛尔在军事上采取了预防性措施，以一个旅的兵力封锁通向苏伊士的道路。为了对付英军可能发动的袭击，他布置了一条临时防线，并配备了更多的后备兵员。战备还必须要有政治上的努力配合。纳赛尔希望让世界各国知道，这次革命纯属埃及的内政，它只关系到埃及本身，而不会影响到侨居埃及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因

此，在爆发革命的当天凌晨 3 时，他决定通知美国大使，说明这次革命的目的，并警告英国人不得进行任何干涉。事实上，英国人对这次革命事先并无所闻。等到他们知道后，即使想干涉，为时也太晚了。那天中午时分，年轻的军官们已经赢得埃及人民的支持，英国的任何军事行动也元济于事了。

这时候，法鲁克国王惊恐万状，也送了一封信给美国驻开罗大使馆。信里说明国王认为局势危急，并询问在亚历山大附近是否有一艘美国驱逐舰，在必要时可以载他脱险。美国大使卡弗里把国王的请求转达给华盛顿。后来，在国王的生命不再受到威胁时，卡弗里将华盛顿的答复通知革命当局。他告诉年轻的军官们，华盛顿声称在附近海面并无驱逐舰，但指示大使尽一切可能保证国王的人身安全。那是革命爆发的第二天。于是，国王被勒令离开国境。国王却还继续要求美国人的保护。他打电话给大使，要求在出国之前和他呆在一起。这样，这个美国人经革命当局的允许，便来到了皇宫，陪着法鲁克收拾行装，并护送他到船上。

在这以后发生的许多相关联的事件，充分显示了美国在那一时期里的地位和影响。美国的外交代表是送别王朝余孽的最后一个人，也是和新政权取得接触的第一个人。美国立即开始利用这种关系。他们增加了大使馆的外交人员，而且他们对新生的埃及表示了种种好意。声称“新世界的财富与力量，将用来帮助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

正是在这种气氛之中，纳赛尔采取了以后带动许多其他事件俏步骤：他要求美国人支援军火。美国人第一个反应是惊奇，而当他们指出两国之间早就订有提供军火的合同时，埃及人也感到惊奇。美国人于是出示这份密约，原来这是和法鲁克政府在 1952 年 2 月开罗大火事件之后签订的。根据这个密约，美国同意提供埃及价值 500 万美元的武器。购货清单主要是一批装甲车、机枪和其他一些适用于镇压人民的武器。而纳赛尔现在需要的却是坦克、飞机、大炮和舰艇以保卫国境。

他告诉美国人，这次革命的许多原因之一，就是埃及军队软弱无能。它的陆军在 1948 年巴勒斯坦战役中打了败仗，当时用的是以惊人高昂的代价从欧洲买来的劣质军火。由于使用这些军火而牺牲的埃及人竟多于被它们打死的敌人。他强调：这次革命是由陆军的官兵们首先发难的，尽管这是一场人民的革命，但领导者是陆军。军官们在 1948 年军火丑闻的历史背景的影响下，决心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这支陆军必须不但在心理上而且在物质上都是强大的，这样才能保卫埃及。

纳赛尔还告诉美国大使，如果美国真能向埃及出售武器，这种行动“将提高美国的威望”。他所订购的武器，主要的项目是装备一个装甲师所需的坦克、运输工具、大炮、反坦克炮以及 3 个中队的喷气式战斗机。他还亲口保证，这些武器将仅用于自卫。

为了洽谈这笔“军火生意”，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威廉·福斯特在 1952 年 11 月 5 日来到开罗。纳赛尔应邀赴宴，并和他在美国大使馆讨论武器问题。福斯特讲话滔滔不绝。他一边研究“购货单”，一边记下了可以出售的项目，并讨论了付款方式：分期付款，部分以埃及棉花抵帐。他说，如果美埃关系顺利发展，那末，美国可以考虑放弃部分帐款。晚间，在宴会结束前，福斯特建议埃及派一个代表团赴美访问各军事基地，和负责提供武器的人谈谈，并安排交货事宜。看来一切进行得很好。代表团很快组成了，并于 1952 年 11 月出国，作了一次“大家都寄予厚望的远征”。



但是问题发生了。在法鲁克王朝时代，美国和英、法、土耳其等国一起曾建议埃及签订一项防御条约——中东条约组织（Middle East Treaty Organization），按字头简称“METO”。但这个建议当时没再取得什么进展，后来旧事重提，又重新定名为中东防御组织（Middle East Defence Organization），简称“MEDO”。尽管条约没有签成，但条约组织国的基地包围苏联的这一设想，对美国人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在埃及购买武器的代表团于美国逗留期间，缔结一个伊斯兰军事条约的设想再次被提出来了。

提出这个设想的人是乔治·奥姆斯特德陆军少将。他是对外军援计划的负责人。他告诉埃及代表团，这一项伊斯兰条约的潜力是巨大的。它将包括三个首都：最现代化的伊斯兰国家首都安卡拉，人口最多的伊斯兰国家的首都卡拉奇和最有威望的伊斯兰首都开罗。他接下去说，这样一个条约不但可以保卫中东，还可能对苏联和中国的穆斯林产生极大的影响。然后，他又谈到怎样在那些国家里建立一支“第五纵队”。这句话使代表团的每个成员都大为震惊。其所以吃惊，是因为这件事和他们的目的是完全无关的。

为了加深埃及军事代表团对拟建的伊斯兰军事条约的印象。这位负责军援的奥姆斯特德将军，拉开了办公室墙上一幅大地图的幕帘，地图上插满了大头针和小旗子。他手执指示棒，开始说明这些标志代表的是什么。接着他指着上面只有很少几个大头针的地区说：“先生们，我们应该在这里插上些针和旗，这是一个真空地带。”他所指的就是拟议中的伊斯兰条约所包括的地带。这确实是一幕最惊人的表演。他想让他的地图插满小旗子和大头针。

海卡尔新闻部长进一步介绍说，不管怎样，埃及军事代表团的工作看来一切都很顺利。阿里·萨布里团长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讨论了埃及需要的东西。随即组成了讨论技术细节的小组委员会。纳赛尔对代表团这次使命的完成满怀信心。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已经到了圣诞节，可是还看不见有什么具体的结果，也没有运来任何武器。以纳赛尔为首的革命指导委员会开始感到幻想落空了。

就在这个时候，杜勒斯出场了。他带来了献身于遏制共产主义事业的传教士的狂热。他认为中东局势关系重大，所以在接管国务院后仅4个月就来到了开罗。就在那时，他和纳赛尔在宴会上会面了。饭后，他们又谈了两个钟头。纳赛尔马上提出了武器的问题，杜勒斯接着对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什么迟迟运送埃及所需军火这个问题第一次作了解释。

他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和新上任的总统通过电话，力劝总统不要把武器卖给埃及人，因为总统一上任就提供的这些武器，可能会用于屠杀在大战期间曾在艾森豪威尔指挥下作过战的英国士兵。杜勒斯说，这个请求深深地打动了艾克。因此，艾森豪威尔决定把这件事搁置下来。但总统没有断然拒绝出售武器，只是把这份请求购买武器的清单放在“待办”的卷宗里。

杜勒斯继续讲道，对埃及的要求，他将予以同情的考虑。而同时他将试图协助解决存在于英国与埃及之间的纠纷。这时他又转到最感兴趣的话题：反共条约。他谈到集体安全条约的公要性，尤其是中东防御组织“MEDO”。他强调指出，埃及参加这个组织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两人就这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如下的紧张而又发人深思的对话：

纳赛尔：为什么埃及必须加入这个条约组织？这个防御条约是针对谁的？

杜勒斯：针对苏联。

纳赛尔：为什么？苏联远在千里之外？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和苏联人发生过什么纠纷。他们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他们没有占领过我们的领土。他们在这里从来不曾有过基地，而英国人呆在这里则已达 70 年之久。

杜勒斯：不错。但根据条约规定，留在这个基地的英国人将隶属于条约组织。他们只能悬挂条约组织的旗帜而不能挂英国国旗。

纳赛尔：这真是个天真的想法。如果我去告诉我的人民说，因为换上一面旗帜，英国人在这里的地位就将由占领者一下子改变为我们的伙伴，他们听了一定要嘲笑我。

我将失去他们对我的信任，而隐藏在地下的其他人物将出现并赢得人民的信任。如果我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不去领导我的人民，那末共产党人将去领导他们。他们将利用我和你们的结盟关系来证明我是一个走卒。

我怎能去告诉我的人民，我对呆在离我这儿只有 60 英里路的苏伊士运河边的持枪杀人犯视而不见，而去为数千英里以外的一个持刀人而操心？我的人民将会对我说，“急事先

干”。人民必须首先享有独立自主，然后才能认真考虑如何保卫他们的独立自主。除非是完全出于自愿，否则我们不准备讨论缔结条约或其他任何安全措施。……我认为你把这场足球赛搞得太复杂了。殖民主义已被淘汰，现在互相对抗的两队是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如果你坚持要插一手，你肯定要把别人的球输掉。

……

辩论经过两个多小时，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杜勒斯认为他的联络系统必定出了毛病，他对纳赛尔太不了解了。很可能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决定要撤换美国驻埃及大使杰斐逊·卡弗里了。当然向埃及提供武装的问题也就告吹了。

杜勒斯返回华盛顿后，时局平静了一个时期。这是一个外交活动频繁的时期。他决定最好暂时不插手阿拉伯国家的事务而集中精力于“北层联盟”国家——土耳其、伊拉克和巴基斯坦。1955 年 1 月，杜勒斯派国务院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亨利·拜罗德去接替卡弗里。拜罗德，军人出身，在中国呆过。开始他搞得不错，给纳赛尔以良好的印象，可是后来事事不顺手。他在出使埃及期间，无论在个人生活或政治方面，都不很愉快。

1954 年 7 月，埃及和英国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英国将在 20 个月内撤出苏伊士运河区，从而结束 72 年之久的占领，最后离开埃及。这项协议以及美国对埃及革命“继续表示好感”这个事实，使以色列人感到不高兴。他们希望英军留在埃及，因为英国人在那里既分散了埃及人的注意力，又在苏伊士运河沿岸起着缓冲作用。而且以色列人也不愿看到美国和埃及友好下去。为此，表面上是在沙漠隐居的本一古里安，在以色列国防部一伙高级军官的帮助下，策划了一个恐怖活动。恐怖分子企图炸毁英国和美国在埃及的一些设施，从而使英国和美国相信埃及是不可靠的，纳赛尔是不能控制他的国家的。以色列人派了一名陆军情报官潜入埃及，随后他组织了一伙年轻的埃及犹太人来干这个肮脏的勾当。然而，这个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阴谋家们遭到逮捕。两个被绞死，以色列特务在狱中自杀。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升罗和在在中东各地同样忙碌起来。一天，纳赛尔和革命指导委员会正在讨论为外交部和情报部门修建一座环球通讯用的无线电发射塔。有人告诉纳赛尔，已购置了一些设备。当纳赛尔声称这笔开支尚未列入预算时，人家便告诉他，这些钱来自一笔特殊的美国基金。这时人们又告诉他，中央情报局给了当时还担任着总理的纳吉布将军 300 万

美元。这笔钱由一个美国特工人员亲自送来。这笔交易是在那个美国人的住宅里成交的。一个埃及军官随即将手提包送至纳吉布将军的办公室，在那里，它被放进了纳吉布的保险箱。

纳赛尔听了勃然大怒。他马上驱车前往内阁会议，质问当时是总理的纳吉布，要求他把事情讲清楚。纳吉布坚持说，这笔钱与中央情报局无关，而是来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他资助一些政府首脑，以便他们在国家预算之外有能力保护自己和他的国家，反对共产主义。纳赛尔要求把这笔钱锁在情报局的保险箱内，他还命令：没有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批准，任何人不能动用。

发射塔终于建成。原来的设计是一座朴素的、实用的发射塔，顶上是无线电天线，电缆通过塔心由上而下。后来纳赛尔决定修建一座极其豪华的发射塔，作为中央情报局的“纪念物”。他用这笔美国人的钱建造了一座钢骨格子塔，塔顶上有一个旋转式的饭店。纳赛尔所以要建这家饭店和采用荒唐的结构，是为了羞辱美国的情报机构，这笔钱的真相的暴露，大大加深了纳赛尔对美国的怀疑。他命令对美国在埃及的一切活动作一次全面的检查。这样，反过来，又使美国人对纳赛尔的意图怀疑起来。从埃及的观点来看，它好像在和两个美国打交道，一个是国务卿约翰·福斯特·仗勒斯的美国，另一个是他的弟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美国。

1955年2月，中东形势又趋紧张。以色列人对加沙地区一个埃及部队的阵地发动了一次袭击，击毙了埃及士兵37人。这次袭击是根据本一古里安就任国防部长重新掌权刚一星期后发出的命令进行的。它定下了本一古里安所奉行的发动大规模“惩罚性袭击”的政策模式。当时，正是阿拉伯世界内部发生争吵的时候。伊拉克已参加了巴格达条约，而纳赛尔却激烈反对这个条约。在这以前，在开罗开过一次阿拉伯各国首相会议，这次会议在一片吵闹声中不欢而散。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加沙发动袭击时，纳赛尔受到很大的压力。他得不到别的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又受到巴格达条约的威胁。中央情报局的阴谋使他不安。他必需获得武器，不管武器来自何方。面对本一古里安的威胁，他必须把他的部队武装起来。

就在加沙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两三天，美国驻埃及大使亨利·拜罗德到达开罗履新。在初次会见时，纳赛尔告诉大使，埃及急需大炮、坦克和喷气飞机。他请拜罗德将这个信息火速转达国务卿杜勒斯。但是，当时杜勒斯对纳赛尔很不满意，因为纳赛尔宣布打算到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去参加不结盟会议，杜勒斯几经劝阻没有成功。杜勒斯把这看作是对他的“反共十字军的背叛”，因此拒绝向埃及提供军火。

无奈之下，纳赛尔又通过关系向苏联购买军火。这时正值日内瓦最高级会议开会期间，俄国人觉得，他们公开出售武器，可能被看作是对日内瓦精神的蓄意破坏。因此在8月份之后，谈判地点移到布拉格，由捷克人出面谈判。清单全部准备好了，价格也定了下来。可是，在全部就绪之前，纳赛尔给美国人最后一个机会，来提供他所需要的武器。但是又遭美国的拒绝，杜勒斯认为纳赛尔是在“虚张声势”。

为了故意刺激美国，纳赛尔在参观一个小型摄影展览会时，公开宣布：“埃及已经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一项军火协定。其实，这是一项同苏联的协定，只不过是同捷克人来执行罢了。”宣布此事是在1955年9月27日。协定已经签署了一周时间，但尚无军火运到。

埃及驻华盛顿大使艾哈迈德·侯赛因博士那时正在开罗度假，他听到这

一消息后，未经事先约定就在第二天上午9时急忙去见纳赛尔。他问纳赛尔他在报上看到的这一消息是否属实，纳赛尔回答说：“确凿无疑。”侯赛因博士当下感到很紧张。美国人在不久之前刚刚组织了一次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左翼政府的政变，所以侯赛因一个劲反复不停地说：“危地马拉，总统先生，危地马拉！”

纳赛尔愤愤地回答说：“让危地马拉见鬼去吧！”然而，果然不出侯赛因大使所料。同天上午，杜勒斯的特使克米特·罗斯福到达开罗，带来消息说：杜勒斯发怒了。他对美国驻开罗大使拜罗德说，杜勒斯简直像头激怒了的公牛，决心要阻止这桩军人买卖。罗斯福特使说，杜勒斯要纳赛尔取消这笔交易，如若不然，美国将采取4项措施，即：第一，停止一切援助；第二，停止一切贸易；第三，断绝外交关系；第四，封锁埃及，阻止任何载运军火的船只抵达埃及。杜勒斯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势在必行，因为这项军火协定使得共产党国家跳过了“北层联盟”，破坏了他所设计的公约同盟。

罗斯福特使听从拜罗德大使的劝告，准备当晚和纳赛尔见面时委婉从事。双方会谈了两天，但找不到解决办法，纳赛尔寸步不让。第三天罗斯福接到国务院的通知说，杜勒斯正派另一名使节助理国务卿乔治·艾伦来埃及，他将随身携带一封重要信件。但是艾伦到达之前发生了一件使拜罗德的生涯变得艰辛多难的事情。拜罗德早已感觉到他的使命完不成，杜勒斯已经对他丧失信心。他原是作为一个被授予特殊权力的特殊使节，被派到一个特殊地点工作，并期望他取得特殊成果的。但要他取得这些特殊成果却是不可能的。埃及已经成为断送了那么多外交官前程的墓地。

在罗斯福特使同纳赛尔举行会谈期间，那个唯恐再出一个危地马拉的侯赛因大使，为了搀进一点“友谊气氛”，在金字塔附近吉萨他岳父家里安排了一次宴会。出席的人有罗斯福，为解决约旦水源问题而来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别代表埃里克·约翰斯顿，还有拜罗德。纳赛尔由陆军元帅阿密尔以及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空军中校巴格达迪偕同前来。纳赛尔要了杯桔子汁，拜罗德喝着威士忌。

纳赛尔刚喝了一口，拜罗德大使就开口发言。在座的人立即感到大事不妙。拜罗德情绪激动，声音发颤，说道：“纳赛尔先生，我手下的一个人今天在苏伊士运河差点给揍死。”

纳赛尔说：“他到苏伊士去干什么？”

拜罗德回答说，挨打的芬奇先生是劳工参赞，与劳工运动保持接触是他份内的事。他是到苏伊士去了解石油工业情况的。

纳赛尔早知详情，于是便说，不幸得很，他的行动却使人认为他是个间谍。

美国大使予以否认：“他不是间谍，但他挨揍了。”接着又辛辣地添了一句：“很遗憾，我还以为我们是在一个文明国家里！”

纳赛尔被激怒了。他掐灭了香烟，转身向阿密尔和巴格达迪望了一眼，说：“我们走吧。”然后便大步离席而去。这次原来为了增进友谊而设的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待杜勒斯的新特使艾伦来到开罗后，双方又进行了长时间的会商，但毫无结果。艾伦告诉纳赛尔说，杜勒斯很恼怒。纳赛尔说：“他很恼怒，但是我的人民却受到威胁。”艾伦说，如果纳赛尔取消同共产党的军火交易，美国将赞同考虑供应军火的问题。可是纳赛尔回答说：“已经为时过晚。”这

样，艾伦未获成功，离开埃及回国。他走后 1 小时，杜勒斯给他拍来一封电报，执意要他务必递交书面信件。但是，这，也为时已晚。

杜勒斯对拜罗德感到愤怒，对约翰斯顿（他根本没有得到许可参加谈判）感到愤怒，对罗斯福感到愤怒，对艾伦感到愤怒。他开始相信纳赛尔对他手下的人一定有什么奇特的魔力。后来，约翰斯顿和罗斯福就可能因此而引起的一些问题联名向他呈交了一份报告，他这时才稍微平静下来，并且接受了这个事实：对于这笔军火交易他已无能为力，不然，他只能使事情对美国更加不利。

此计不成，又生一计。当由捷克启运的苏联第一批军火运抵亚历山大港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诱使船上一名水手叛逃。船长报告一名水手失踪后，埃及当局在美国驻亚历山大港的领事馆追查他的踪迹。当他们发现这一线索时，已经来不及了，叛逃者已经装在一一只标有“外交文件”字样的大口袋里，装上一架美国飞机飞往美国了。

后来，为了报复埃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杜勒斯要求法国根据英、法、美为保持中东军火平衡而签订的 3 国协定，向以色列人提供更多更好的“神秘式”战斗机。纳赛尔则要求俄国人提供米格—17 战斗机以代替曾是第一笔军火交易核心的米格—15。没有正式签订另一协定，因为这已包括在第一次协定之中了。当杜勒斯知道这件事以后，这位国务卿又气得发疯了。

在这整个期间，纳赛尔一直在为实现建造阿斯旺高坝这一梦想而努力。埃及曾为筹措必需经费与世界银行接洽，但是世界银行无力单独承担这样一项浩大工程，它必须向其主要股东求援。这也就是为何美英两国与此项工程发生牵制的原委。

1955 年 11 月，埃及财政部长阿卜杜勒·摩奈姆·凯舒尼博士去伦敦和华盛顿就高坝工程一事同英美两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举行会谈。当他在华盛顿见到杜勒斯时，杜勒斯要他带信给纳赛尔说，苏联以军火援助埃及，那是意味着死亡；美国援助埃及建造高坝，则意味着生命。他说，他希望纳赛尔对此有所考虑，并深思一下这两种援助性质上的差异，而后再决定究竟谁是埃及的真正朋友。

但是，纳赛尔意识到，美国人鉴于工程规模之大和费用之多，便认为他们因此能够牢牢控制埃及，他们认为单单工程的长期性就能够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或者抵销苏联在埃及不断增长的影响，或者使纳赛尔政权倾覆。当时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处的秘密电台，正对埃及大肆进行反纳赛尔的宣传。纳赛尔毫不怀疑，西方确实希望由一个更易就范的人物来取代他。

据估计，高坝需要耗资 10 亿美元，其中 4 亿必须是外汇。世界银行表示，倘若英国人和美国人愿意承担其中一半，他们则愿承担另外一半。埃及所需的就是从美英两国得到这笔两亿美元的贷款。既非奉送，也非无偿援助，仅仅是一笔贷款而已。然后，美国人和英国人私下进行商议之后，于 1955 年 12 月宣布，他们愿意赠送给埃及 7000 万美元以敷第一年工程之需。

纳赛尔总统的回答是，他不能仅以只够一年之用的款项去从事一项需要 10 年才能完成的工程。这意味着，只要一年之后他们的政策一旦有所变化，给他留下的就将只有一堆乱石残砖，除此而外将一事无成。但是，杜勒斯坚持说他无法从国会取得一项长期承诺，外援预算一年一度，必须每年投票通过。再说，高坝的建筑需经三届国会的时间，而每届国会都无权制约下一届国会。因此，纳赛尔总统完全反对这一行动计划。

美国的宗旨已经越来越明朗了，为了换取对高坝的援助，埃及必须约束它同苏联的关系，其借口是，军人交易会使得埃及背上不胜负荷的经济重担。另外，埃及如果要致力于建造高坝，它就必须同以色列人缔结“和平协定”。

纳赛尔经常说：“在古代，我们为死人建造金字塔；现在，我们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为活着的人们建造新的金字塔。”建设规模宏大的高坝，这意味着对沙漠进行一次为民造福的大举进攻，一种迫使沙漠让出土地的壮举，将有 150 万英亩的土地被开垦成良田，它相当于埃及 4000 年来所开垦的土地总和的 1/4。这是一幅宏伟的美景，对于一个历史上以耕作为生的民族，这意味着新的土地。这也是一个渴望着工业化的国家的美景。这意味着将能发出神话般巨大的电力：每年 100 亿千瓦时。埃及那时的发电量将占整个非洲大陆发电量的 50%。甚至单单是高坝的规模就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挑战。人们说高坝的规模将相当于大金字塔的 17 倍。

为了造福于人民，纳赛尔决心把长期以来一直是外国统治的象征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他准备把运河的收益用来建造高坝。

埃及新闻部长海卡尔说：“阿斯旺高坝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所进行的一场政治斗争的象征和背景。是它，导致了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引起了苏伊士战争。”经过埃及人民的艰苦努力，高坝奇迹般地矗立起来了。目前它正为埃及人民造福，在困难面前，纳赛尔和他的人民始终没有向美国低头。杜勒斯的图谋又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英法老牌殖民主义遭到沉重打击，中东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为了填补所谓这一“真空”，美国提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欲知这一主义产生的背景及其实质，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三章 艾森豪威尔主义

民族运动新发展，中东局面大改观；  
美国惊呼不得了，填补“真空”莫等闲。

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埃及人民的胜利而结束。这是埃及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斗争的光辉胜利，是阿拉伯民族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帝反殖斗争的伟大胜利。它宣告了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彻底破产，说明了觉醒和动员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英法政府为进行这次侵埃战争，总共动员了 16 万兵力（不包括以色列的 20 万军队），出动了 100 多艘军舰和 2000 多架飞机，花费了 3 亿美元的军费，结果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场斗争震撼了帝国主义在中东的统治基础，促进了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

战争结束后，1956 年 11 月 20 日，埃及政府发表声明，要求联合国调查英法暴行。声明说，英法在 11 月 5 日进攻塞得港以前就不断地进行空袭，使这个有 15 万人口的城市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声明援引英法军方数字说，在进攻那一天，对塞得港出动飞机 500 架次。声明并且指出，侵略军千方百计地迫使埃及人民同他们合作，塞得港居民拒绝同他们合作，于是就引起了他们对塞得港居民采取野蛮措施。

声明指出，在塞得港，英法军队实行了宵禁，并且开枪射击妇女和儿童，强迫人民在武装的威胁下工作。在拉法、埃尔阿里希和加沙，以色列军对居民采取报复行动，大批的阿拉伯难民在加沙被他们杀害，一次就杀害 50 多人。“埃及政府得到表明英法在塞得港的所作所为的照片和影片，并且把这些照片和影片交给联合国组织，使各国代表团知道这种违反人权的暴行。”

声明说：“我们要求联合国和它的适当的委员会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的合作下成立一个委员会，以便调查对埃及和加沙进行的野蛮侵略所造成的影响。”声明强调说：埃及要求“惩罚侵略者，侵略者必须对他们所进行的侵略负责”。

继这一声明之后，埃及即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清除英法的残余殖民势力。

1957 年 1 月 2 日，埃及政府废除了 1954 年签订的“英埃条约”，粉碎了英国殖民主义者重返运河的迷梦。同年 1 月 15 日，埃及颁布命令，规定所有外国在埃及的银行、保险公司、贸易公司必须归埃及人所有。4 月 10 日苏伊士运河恢复通航后，英法被迫要它们航行运河的船只向埃及运河管理当局交纳通行费。纳赛尔在为运河公司国有化一周年举行的大会上说：“今天苏伊士运河属于埃及了，而过去埃及是属于苏伊士运河的。”

英法不仅在埃及，而且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殖民统治迅速崩溃。约旦民族主义政党在 1956 年 10 月的议会选举中获胜。

11 月 27 日，约旦宣布废除“英约同盟条约”，撤销英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同年 11 月，叙利亚政府接管了国内英法开办的学校。

1958 年 7 月 14 日，伊拉克人民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成立了伊拉克共和国。1959 年 3 月，伊拉克正式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同年 9 月，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开罗宣布成立。

到此，英国在中东只剩下波斯湾沿岸一些小块的殖民地，昔日威风扫地

以尽。法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殖民地也大都独立。它虽还在镇压阿尔及利亚的武装斗争，但筋疲力尽，败局已定。英法在中东的殖民统治作为一个时代已基本结束。它们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当时美国报刊嘲笑英国说：“由于入侵埃及，英国自讨苦吃！”

“英国不能单独行事，苏伊士的大败就表明了这一点。”英国的石油老板也哀叹说，“英国在中东的势力已经完蛋了！不管愿意或是不愿意，美国必须填补英法在中东的空隙。”英国的《金融时报》以无比凄凉的情调写道：“50年以前，在全世界哪有人敢于向英国挑战！使我们装饰门面的努力，现在已经破产了。像一个传统的古老家庭一样，首先是典当土地，其次是家人作鸟兽散，最后是房屋倒塌。现在的英国，正站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美国、苏联都乘英法在中东大势已去之机，向中东大力扩张。

1957年元旦下午，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会见国会两党领袖，寻求对美国在中东新政策的支持。艾森豪威尔说：“目前中东出现了真空，美国一定要在苏联之前填补这个真空。”又说，如果“苏联在那里发动攻击”，美国“除立即行动制止外，别无其他选择”。

1957年1月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国会两院特别联席会议上，提出了美国对中东政策的特别咨文。这个咨文在向国会提出以前，据说已修改过12遍，但基本内容仍同早已透露出来的一样，主要包括两点：一是授权总统在中东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并且为了“保护”中东国家的“独立”，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二是授权总统对中东国家给予经济“援助”，在今后两年内每年在这个地区额外“自由支配”2亿美元。美国宣传机关一直大吹大擂，把这个所谓“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计划叫做“艾森豪威尔主义”。

艾森豪威尔在咨文中，口口声声叫嚷，美国有责任确保世界自由秩序。他说，中东这个地区经常发生骚乱。由于各国边界上拉锯式的打来打去而产生的一贯的互不信任、互相疑惧，使中东地区的许多地方发生了极不稳定的情况。就在最近，还发生敌对行动，曾一度在这一地区有很大影响的一些西欧国家也牵连在这些行动里。

10月间，以色列所发动的较大规模的进攻也加深了这个国家同它的阿拉伯邻国之间所存在的根本的分歧。

“俄国的统治者长期以来就打算主宰中东地区。沙皇当时如此，现在布尔什维克也是这样。理由是不难找到的。他们并不影响俄国的安全，因为没有人打算以中东为基地来侵略俄国。”艾森豪威尔说，“俄国对中东感兴趣的原因是为了强权政治。如果考虑到它把世界共产化的公开目标，那么就不难理解它控制中东的希望了。”

“这个地区曾一向是东半球各大陆的枢纽。苏伊士运河使西欧各国能够进行贸易，而这种贸易，如果这些国家要保侍经济平衡发展和繁荣的话，是极端重要的。中东是欧亚洲和非洲之间的门户。”咨文继续指出，“中东约占占有目前已经探明的世界石油蕴藏量大约2/3，它通常供应欧、亚、非洲的许多国家的石油需要。欧洲国家特别依靠这种供应，这种依靠的情况关系到运输和生产。自从苏伊士运河和一些油管封闭以来，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出来。如果必要，可以找出其他的运输道路，的确还能找到其他的动力来源。但是不能够认为，这是可以很快实现的前景。”



“这些事情着重说明了中东的巨大重要性，如果这个地区的国家竟然丧失了独立，如果它们受到敌视自由的外国力量的统治，这对这个地区和对许多其他经济生活将近被扼杀的自由国家来说，都将是一个悲剧。西欧将遭到危险，就如同没有马歇尔计划和没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样。亚、非洲的自由国家也将处于严重的危险境地。中东国家将失去它们经济所依靠的市场。所有这一切将对我们自己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前景产生最不利的影响，如果不是祸国殃民的影响的话。”咨文又说，“然后还有一些超物质的因素。中东是三种伟大的宗教——穆斯林教、基督教和希伯来教的发源地。麦加和那路撒冷不仅是地图上的地名而已。它们象征着这样一些宗教，这些宗教教育大家：精神是优于物质的，个人有着任何专横的政府所不能合法地剥夺的尊严和权利。如果中东这些圣地居然受到赞扬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统治的话，这是不能容忍的。”

艾森豪威尔在咨文中列举了中东地位的重要性后，接着建议国会授权总统在中东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为了“保护”中东国家的“独立”，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并且对中东国家给予经济“援助”。在今后国会为这个地区提供的其他共同安全计划以外，在1958和1959年财政年度中，总统每年得以在这个地区自由支配2亿美元。这个咨文，就是被美国政府所说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它是美国在中东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纲领，也是美国进一步排挤英法、抵制前苏联，妄图独霸中东的野心勃勃的计划。

其实“艾森豪威尔主义”绝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不过是美国侵略主义的翻版而已。艾森豪威尔早在他的连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就说：“新兴力量和新兴国家在全世界崛起进行斗争。从北非的沙漠到南太平洋的岛屿4/3的人类进入了一场争取新的自由——摆脱极度贫困的历史性斗争。”尤其是苏伊士事件使艾森豪威尔惨痛地认识到，第三世界对美国的重要性。他告诉美国同仁说：“没有人能独立生存，如果第三世界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它就要变成共产党。如果其他国家不繁荣，美国的繁荣甚至也不能维持下去。”他要求民主党和共和党必须正视现实，采取适应当前斗争的新的对外政策。艾森豪威尔最关心的是，如果第三世界“赤化”，西方将得不到原料，美国的经济也将受到严重的削弱和影响。

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这一举动，在西方世界引起了震惊。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这是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挑战，是对摇摇欲坠的殖民主义体系的又一次打击。资产阶级报刊议论说，谁能担保其他国家不会仿效埃及，谁能担保整个殖民主义体系的环节不会发生“连锁反应”？而这种反应按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华尔特·李普曼的说法，将使“整个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撰文说：埃及的例子“会推动其他有可能抓住现今世界贸易的孔道的小国，也采取这样的行动。例如，叙利亚和约旦就可能研究中断经过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到地中海的石油管输油的权利。西班牙就可能要求封闭直布罗陀海峡的权利，而巴拿马就可能考虑为什么它不能封闭巴拿马运河。这会带来数不清的灾祸”。

由此可见，孤注一掷的不仅是处于英法两国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的前途问题，而且也是中东一切帝国主义势力的前途问题。《纽约时报》在1956年10月露骨地写道：“英国失去什么，我们也就失去什么。英国并不仅仅是

我们主要的盟国。它和我们分享着中东丰富无比的石油财富的主要部分。”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 1956 年 8 月 7 日写道：“苏伊士仍旧是西方在中东的威力和影响的标志。”英法两国的报刊也这样写着。法国《世界报》指出：苏伊士运河……这是个标志。一旦这个标志倒塌，那么堤坝就要溃决……国有化将一个跟着一个接踵而至。所有的石油公司都将遭到破产……这就是对西方威望的最后一击。”

就在西方报刊厚颜无耻地把运河称为“西方的标志”的同时，埃及纳赛尔总统在 8 月 12 日广播说：“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帝国主义，标志着外国的势力，而埃及正是为反对这一点而斗争的。”

在西方列强对埃及所采取的这种恐吓和威胁的政策中，美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1956 年 8 月 16 日至 23 日，美国国务卿在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伦敦会议上，提出的所谓“杜勒斯计划”。其实质在于禁止埃及管理运河并把运河永远交给某种国际机构管理。“杜勒斯计划”遭到埃及的反对。纳赛尔说：“对苏伊士运河的国际管制，这是一种新式帝国主义，集体的帝国主义。”

当“杜勒斯计划”显然已经遭到彻底失败时，在华盛顿又制定了一个挑衅方案，即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来接收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一切权利。同时，美国声明它要参加这个“协会”。这同美国政客们所谓美国只是与苏伊士问题“无利害关系的调停人”这种令人作呕的言论，有着惊人的矛盾。

成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的方案，与臭名远扬的“杜勒斯计划”一样，又制造了一个同埃及冲突的借口。杜勒斯所建议的对埃及的经济制裁，规定了对苏伊士运河实行抵制。这种抵制打算用两种办法实现：第一，减少从中东供应西欧国家的石油，而相应地增加从美洲大陆上美国领土供应石油；第二，减少通过苏伊士运河输送的石油到最低限度，而利用绕过非洲的迂回路线。无须特别解释就可以明白，这些措施只对美国有利，对其余的一切西方国家却带来巨大损失。西欧国家的收支已不平衡，它们的黄金和美元的储备已消耗殆尽，又从哪里去取得美元呢？正如美国报纸《每日新闻》所供认的：华盛顿背着它的同盟者并靠损害它们的利益来准备“把中东大部分经济事务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

由此可见，美国一切关于所谓“和平”解决苏伊士问题的建议，其实质就是用威胁手段迫使埃及放弃自己的主权，取消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以便在对运河实行“国际管制”的幌子下达到美国独占的目的。但是，埃及政府不畏强暴，坚决拒绝了西方列强关于由外国建立对运河管制的一切要求和最后通牒。埃及政府强调指出，诸如此类的管制都是损害埃及的主权，剥夺它的独立的。纳赛尔总统在揭露美国“国际管制”计划的实质时说：“难道在独立和不独立之间能够折中解决吗？”埃及《人民报》写道：“埃及坚持它的立场，因为真理在它这方面，而威胁和恐吓的策略必遭破产。”

为了维护美国垄断阶级的利益，1957 年 3 月 9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国会所通过的对中东的政治纲领，它的具体内容就是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的咨文里，企图把它说成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一个新的、“被迫”采取的步骤，是为了“保证”和平和自由免受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而由美国政府承担起来的沉重“负担”。

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纲领规定：第一，“同中东一般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

或国家集团进行经济合作和援助”，以发展他们的经济；第二，“对这个地区希望获得军事援助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执行军事援助的计划”；第三，在近东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以“保护”这个地区的国家免受“国际共产主义的侵略”。为了这个目的，美国拨出两亿美元由总统支配。艾森豪威尔宣称，美国“对于任何其他国家人民并不谋求建立政治或经济的统治，而只是关心中东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只是对他们提供援助”。

美国渗透中东的历史事实证明，美国对于这个远隔几万公里的地区兴趣的增加决不是偶然的，决不是关心中东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安全”。这个兴趣的增加不仅由于本地区的巨大的地下资源，也出于帝国主义的战略考虑。中近东的石油资源确实巨大。这里拥有资本主义世界所已发现的石油蕴藏量的70%。而问题不仅止此。中东石油对于帝国主义重大的意义还有其他方面。

首先，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花费在中东石油开采上的代价是特别低廉的。这是因为这里的油井生产率很高。每口油井平均每天可产石油4000桶（每桶约合135公斤），而在委内瑞拉为230桶，在美国仅为11桶。此外，由于对当地工人加强剥削的结果，石油垄断组织在劳动力上花费的代价非常低廉。当地石油工人通常每昼夜工作10—12小时，而所得工资则是美国石油工人的1/7。如果石油垄断组织每年从每个美国工人身上剥削4000—5000美元，那末，例如，在科威特的油田上，它们每年可以从每个工人身上剥削40000美元，几乎多了九倍。

这就是中东石油开采成本低廉的原因。当时，每桶石油开采成本在0.75美元和2.4美元之间，而每桶售价则平均在15美元左右。由此可见，石油垄断组织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中东能取得那样高额利润，它们在中东开采石油，每桶的利润竟是成本的400%。

美国垄断资本，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不仅关心石油的有利开采条件，而且也关心有利的销售条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中东的石油是如此之多，问题不仅在于对它的开采，同样也在于运输和销售。”向西欧国家销售石油可获得最大的利润。那里的统计资料证明，西欧国家自中东进口的石油占其需要量的85%。例如，法国自中东进口的石油在1955年占其需要量的94%。正如美国垄断组织的机关刊物《华尔街与商业研究》杂志所供认的，“中东石油对于欧洲是绝对必要的”。

当“艾森豪威尔主义”刚出宠的时候，美国垄断组织在近东拥有的石油资源总值计2750亿美元。美国垄断组织从其投资中攫取的巨额利润，比之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的石油公司的利润要高出好多倍。石油垄断组织获得的利润，在美国为10%，在南美为25%，而在中东则为75%。正因为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东地区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50年代，中东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这对艾森豪威尔的对外政策方针不能不产生影响。美国在这里的政策，首先是由美国石油垄断集团的利益和该地区对世界的重要政治军事意义所决定。巨大的石油蕴藏量、苏伊士运河、这个区域直接靠近苏联和东欧的地理位置，所有这些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美国的注视。

早在艾森豪威尔还在担任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时，就着手和积极探讨对中东的政策问题。1951年4月29日，摩萨台政府在伊朗执政，并做出石油开采工业和石油加工工业实行国有化的重要决定。这是整个战后时期对

帝国主义大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的第一次沉重打击。美国曾公开试图利用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来“填补”由于英国丧失在该国的阵地而出现的“真空”。但是，美国控制取代英国控制的前景并不符合伊朗人的意愿。美国统治集团占领英国在伊朗丧失的阵地的愿望，未能取得成功。美国担心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便与英国人联合起来，共同投入了反摩萨台政府的斗争。

丘吉尔认为，伊朗事件具有国际性质，因为它开创了一个损害帝国主义大国在第三世界“合法”经济权利的不合西方世界心意的先例。不到北约司令部办公室去要求保护自己的“权利”，还能到哪儿去？1951年7月5日，丘吉尔要求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向美国发报，请求支持英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在英美策划共同制裁伊朗国有化运动的过程中，艾森豪威尔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这是他在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岗位上最初的行动之一。

但是，摩萨台政府并没有停止不前，毅然采取了像同英国断绝经济和外交关系这样的果断措施。这一行动之后，伊朗不得向美国请求经济援助。美国方面则给予了坚决的回绝。艾森豪威尔对本国的立场做了如下的解释：“我拒绝为了使摩萨台摆脱贫困而把更多的金钱投入一个混乱的国家，因为他处境麻烦的根源在于他拒绝与英国商订一项协议。”

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伊朗国内右翼势力，于1953年8月得手，推翻了摩萨台政府。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这个行动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具有亲西方倾向的伊朗新政府立即从美国得到了价值45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艾森豪威尔写道：“在这次危机中，美国为支持国王做了一切能做的事……在国王凯旋归国时，我向他发了电报。”

伊朗争取石油国有化的斗争，虽然遇到了挫折，但这一斗争却在中东引起了巨大反响。该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力量不断壮大。正如事态的不断发展所表明的，1952年埃及革命的胜利意义尤为重大。这一切都迫使美国采取紧急措施，联合帝国主义大国和当地右翼政权的力量来共同对付进步力量。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积极倡议和策划下，1952年2月，产生了被称之为巴格达条约的新的军事集团，参加该集团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美国与巴格达条约的有效范围相距甚远，为避免声誉受损，没有公开参加这个目的在于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集团。艾森豪威尔当局的算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来更能随心所欲地行动。美国参加这个集团还可能妨碍它今后实现另一个打算：占据在民族解放运动压力下英法在这些地方丢失的地盘。

伊朗和埃及事件，仅仅是中东民族革命进程积极发展的开端。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极深刻的社会政治变化，发展下去会根本改变这个广阔地区的整个面貌。特别是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事件，更引起西方的严重震惊。当时在中东，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已经开了头。以上这些情况，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的总背景。

美国统治集团竭力想利用英法两国地位的削弱而在中东出现“力量真空”的借口，来为自己的侵略政策辩护。按着这种理论，如果在世界某一部分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而被迫撤退，那就会形成一个空白地带，即一种“真空”；为了保持西方世界的势力，美国就应当来填补这个“真空”。每当需要为美国的侵略意图寻找论据时就提出这种理论，这是美国殖民主义的明显反映，正因为如此，中东各国人民才把美国的

“真空理论”看作是对自己的最大侮辱，是对他们内政粗暴的干涉。

美国统治集团对“保持独立”这个规定所硬加的含意，杜勒斯在国会讨论“艾森豪威尔主义”时曾加以说明：“我们这个规定是指同共产主义作斗争。”这样，提供美援就是以政治条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军事条件来决定的。美国政府就是用这些手法再次来完成石油垄断组织的任务的。这些垄断组织，正如1956年1月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给艾森豪威尔的秘密信件中所强调的，要求给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能有助于“将来我们可能会面临的任何军事任务的完成”。美国企图以此迫使阿拉伯国家放弃和平共处的政策，放弃他们所坚持的符合“万隆精神”的积极中立的立场。由此可见，实施“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最初的企图证明，这是一个圈套，美国以侈谈“援助”为掩护，引诱阿拉伯各国人民落入这个圈套。

因此，“艾森豪威尔主义”一出笼就像瘟疫一样，遭到中东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1957年1月10日，叙利亚政府发表声明说：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授给他在中东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的权力是严重的。声明指出，对叙利亚的安全和独立并不存在什么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

声明说，叙利亚不同意这样的论据：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使得它们有权干预这个地区的事务以保障这些利益。它说，这个论点显然违反了主权原则，而尊重这个原则正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这篇声明还说，中东地区并不存在任何“势力真空”，因为中东各国已经获得了它们的自由和独立。叙利亚政府深信，保持中东的和平和安全纯粹是这个地区人民的责任。

1957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发表讲话，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纳赛尔说：“我们的政策是保卫我们的独立和自由，和不承认任何势力范围。我们也相信，任何地区的保卫应由这个地区本身来担当。这是一个反对联盟的政策。”

“艾森豪威尔主义附有政治条件，那些接受这个主义的国家只好把自己束缚在华盛顿的政策下。但是我们的政策应该完全由埃及自己来定。我们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因为它附有政治条件。”纳赛尔愤懑地指出，“一个仇恨的战争和神经战跟着来了。美国开始采取一个凶恶的政策来实现它的目的。一个从内部袭击的政策！”

1957年3月7日，美国国会通过了艾森豪威尔特别咨文。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总统特使理查兹相继到中东及邻近地区活动，诱使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等国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还在中东进行露骨的颠覆和侵略活动。

1957年4月，美国支持约旦王室发动政变，推翻了以纳布西为首的约旦民族主义政府。接着又在叙利亚搞颠覆活动，并怂恿土耳其对叙利亚施加军事压力。同年6月，美国正式宣布参加巴格达条约军事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正如《印度快报》所评论的：“巴格达条约现在已投向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怀抱。”面对这种严酷的事实，连伦敦的一些报纸也酸溜溜他说。艾森豪威尔主义就是要使“美国从英国手里把西方在中东的领导势力接收过来”。

1958年7月，美国派遣军队入侵黎巴嫩，决定用武力实现艾森豪威尔主义。与此同时，英国军队也乘机在约旦着陆。中东形势又趋紧张。最后在中东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下，美英侵略军才被迫撤出黎巴嫩和约旦。通过斗争实践，中东人民进一步认识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本质。欲知艾森豪

威尔主义出笼后，中东地区的风云变幻，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四章 风云变幻

风云变幻何其多，分化组合逐逝波；  
打破控制求解放，万众欢腾奏凯歌。

在连接亚非两大洲的地方，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1958年2月1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以及两国代表团在开罗签署一项宣言，宣布成立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接着，埃及和叙利亚两国议会分别通过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临时宪法。2月21日两国举行了公民投票，绝大多数选民拥护埃及和叙利亚联合，并且选举纳赛尔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这是埃及和叙利亚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这也是当时民族独立运动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埃及、叙利亚都曾经遭受殖民主义的统治。在取得独立以后，两国又同样面临着西方殖民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威胁。因此，多年以来，埃及和叙利亚都坚持执行了和平独立政策，并且为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种共同的愿望和共同的斗争，使埃及和叙利亚两国日益感到加强团结的必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正是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诞生的。

过去几年来，埃及和叙利亚为了加强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团结合作，已经采取了许多步骤。1955年，两国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两国建立了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联合调度两国部队。1957年，两国又缔结了经济联盟协定、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事实证明，埃及和叙利亚两国的团结合作，是完全符合两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的共同利益的。当埃及受到英法和以色列的军事侵略的时候，叙利亚人民立即切断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油管，有力地配合了埃及人民保卫民族独立的斗争。当美国和土耳其陈兵叙利亚边境，准备对叙利亚发动侵略的时候，埃及也毅然派出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到叙利亚，共同保卫了叙利亚的安全。在当时的情况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建立有利于加强埃及和叙利亚两国人民的团结力量，从而有利于反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美国的恼怒，美国迫不及待地要扼杀它。

1958年7月26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地区《金字塔报》公布了美国策划破坏、孤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侵略中东人民阴谋的一封秘密电报。这封电报是1958年4月18日美国国务院发给美国驻中东所有外交代表的。

电报重申：“美国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策的基本目标维持不变。国务院再次强调，埃及势力范围的扩张是同美国国会联合会议关于中东的决议相违背的，是加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是鼓励在中东和非洲的反西方、特别是反美的倾向的，是破坏自由世界战略网中重要一环巴格达条约的，是损害以色列的地位的，而以色列的利益是美国绝对不能忽视的。”

电报指出：“中东百油通过苏伊士运河和通过所有通向地中海的油管输向欧洲的运输的实际控制权现在集中在开罗，这个事实严重地危及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在能够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施加压力。如果纳赛尔总统将来投靠苏联集团，那么这种可能性就能够成为他手中的一个可怕的武器。”

电报说：“在目前情况下，继续采取以前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方针只会激怒阿拉伯各国而把它们推入苏联的怀抱。因此在执行我国政策的方法上必须作某些改变。问题是使我国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关系有一些‘缓和’。当然这绝不是说要对我国政策从根本上进行重新估计；这是出于必要而作的一种策略上的暂时改变。因此，目前正在考虑解冻埃及在美国的款项，放宽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贸易的限制，以及一些其他措施。”

为了颠覆新生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美国密电要求：“必须继续不懈地努力使叙利亚和埃及建立联邦的思想扫地，以便离间这两个国家，因为我们在该地区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分裂叙利亚和埃及。必须不懈地巩固具有西方理想的内部力量和可以在适当时机干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内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国外力量。必须记住，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瓦解不仅将结束纳赛尔埃及的命运，而且也将使我们较容易地击退阿拉伯民族主义，不管它在中东可能采取什么形式或式样。”

“如果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脱离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而孤立，我们的努力显然将较容易获得成功。因此，美国驻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和宣传人员的任务就是散布这样一种总的信念：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构成对目前阿拉伯各国政府的直接威胁。在君主国家，必须有力地阐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增强可能造成当政王朝的倒台；在共和国内，必须用一切方法强调被开罗军政府并吞的恐惧。最后，伊拉克—约旦联邦将继续获得美国的支持来反对叙利亚—埃及联邦。”密电最后说，“目前这份通告对美国驻中东的外交代表提供了总的方针。较为详细的指示将分别交给各个代表。”

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 10 天以后，在美国的策动和支持下，伊拉克和约旦，于 1958 年 2 月 14 日，也达成了建立所谓阿拉伯联邦的协定。协定规定：伊拉克和约旦将统一外交政策和对外外交代表；在阿拉伯军队的名称下统一约旦和伊拉克的武装部队；消除两国间的关税壁垒，统一两国的关税法。由于伊拉克是“伊拉克军事条约”集团的重要成员，对外坚决奉行和美英结盟的亲西方政策，因此这一联邦的成立，更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矛盾的复杂性。

1958 年 5 月 11 日，黎巴嫩人民掀起了武装起义，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艾森豪威尔主义和屈从美国的夏蒙政府。黎巴嫩民族统一阵线发表声明，要求人民坚持斗争，一直到打败帝国主义代理人为止。声明号召人民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并且保持警惕，把这些作为目前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斗争声势浩大，犹如燎原之火，使帝国主义及代理人十分震惊。于是黎巴嫩外长就向联合国安理会指控纳赛尔和萨拉杰用提供军人、训练“恐怖分子”以及普遍煽动反对合法政府的暴动等方式来推翻夏蒙政权。

联合国观察小组在印度、挪威、厄瓜多尔 3 国代表的带领下，去黎巴嫩调查所指控的罪状。可是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所以他们报告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说，他们没有发现大规模军火走私的证据。6 月中旬，哈马舍尔德亲自访问了黎巴嫩，回来时确信观察员的报告是可靠的。他在和英国外长交换意见时坚持说，贝鲁特当局的指控“完全是夸大的无边无际的”。

贝鲁特政府向联合国投诉不成，就向美国政府紧急呼吁，要求美国如果不直接派遣军队的话，就立即输送大量武器来帮助“面临生死攸关”的黎巴嫩政府。华盛顿给夏蒙等人的答复是：安静下来，不要急躁。正如美国驻贝鲁特大使不断指出的那样，人们已经在认为美国支持夏蒙争取连任总统了。



美国没有忘记 1956 年英法进攻埃及时所引起的反应，因此经过考虑后，决定“要到万不得已时”才派遣军队去黎巴嫩。

就在这个时候，伊拉克爆发了一桩重大事件。

1958 年 7 月 14 日清晨，一旅去阿拉伯联邦约旦地区增防的伊拉克士兵，在司令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准将率领下，途经巴格达时，突然发难，打死了国王和总理，推翻了费萨尔王朝，宣布成立一个新的革命共和国，由卡塞姆自任总理，其副司令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任副总理。这一事件使华盛顿和贝鲁特大为震惊。

伊拉克国家武装部队总司令于 1958 年 7 月 14 日，发表第一号公告，宣布了他的主张。公告全文如下：

光荣的伊拉克人民：

由于真主的恩赐以及伊拉克诚实人民和国家武装部队的合作，我们已经使我们可爱的祖国从腐化政权和帝国主义的传统势力下解放出来，它们为了自私的目的而企图压制着人民的权利。

兄弟们：属于你们的并由你们组成的军队，已负责扫除了蔑视人民真正权利的暴君和腐化集团。他们就这样地同我们合作。必须要注意：除非我们使胜利巩固下来，并使不遭到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阴谋所破坏，胜利将是不完全的。因此，我们要求你们把严重腐化堕落的人和每一个叛国者向当局报告，以便彻底消灭他们。我们还要求你们联合起来消灭他们，以清除他们的邪恶影响。

同志们：在这个幸运的时刻，我们对于你们的爱国精神和良好行为感到骄傲。我们要求你们为了祖国的最高利益而保持镇静，并维护秩序、统一和合作。

我们已宣誓将为你们而牺牲我们自己和我们最珍贵的一切。我们应该确信：我们将不遗余力来为你们工作。托付给政府的权力将由人民来承受，而政府将按照真正人民精神而行事。如果不建立一个能够表现伊拉克人民的坚强和团结的人民共和国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共和国将调整同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兄弟般的关系，根据联合国宪章而行事，尊重对祖国有利的协定和条约以及万隆会议的决定。为此，这个全国性政府今后将被称为“伊拉克共和国”。按照人民的意愿，我们已经把总统的职权暂时赋予最高权力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拥有共和国总统的权力直至民选总统的选举举行时为止。我们祈求全知全能的真主为我们的祖国祝福。

国家武装部队总司令

1958 年 7 月 14 日于巴格达

在伊拉克国家武装部队总司令第一号公告发布后的第二天，1958 年 7 月 15 日，伊拉克共和国总理卡塞姆发布关于伊拉克退出伊约联邦的文告。文告指出：伊拉克、约旦的这个联邦“既不是真正的联邦，也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建立这个联邦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已经过时的帝王政权和维护一些统治者的利益，而这些统治者是违背着人民意志占据他们的职位的，并且从来没有为人民谋求幸福。”文告说，“鉴于这个事实，伊拉克共和国政府宣布退出伊拉克—约旦联邦，并认为，所有和这个联邦有关的法律都一律无效。伊拉克认为，这个联邦所承担的财政和军事义务都不再和伊拉克发生任何关系。”

伊拉克共产党对卡塞姆推翻旧王朝，建立伊拉克共和国表示积极支持，7 月 14 日发表声明，号召人民团结在伊拉克共和国的周围，支持并且保卫它。声明说：“我们英勇的陆军的行动，结束了帝国主义的王朝统治，并且宣布成立伊拉克政府，这是值得欢迎和人民支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荣事件。毫

无疑问，我们伊拉克人民一定要保卫年轻的共和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倒退。伊拉克人民一直在为此而斗争。”

声明指出：“一方面，革命使自由和和平的力量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它使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恼羞成怒，因为这是对他们在我国贪婪的利益和他们长时期用武力强加给我国人民的腐朽统治的严重打击。结果是美国、英国、安曼和伊斯但布尔举行了策划阴谋的会议，帝国主义者开始公开威胁而且极力要在我们热爱的伊拉克恢复王室统治。”

声明最后说：“我们深信伊拉克人民、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工人们、农民们、军队的力量和斗争中人民的力量，他们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击退任何万恶的侵略者。”

在对外关系方面，卡塞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步骤。在政变的当天，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最高权力委员会致电纳赛尔总统，宣布承认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立即与之恢复外交关系。电报说：“我们仅以极大的自豪承认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祈求真主保佑我们在正在展开英勇的斗争和援助各国自由人民的泛阿拉伯主义服务的时候获得一切成功。”

在伊拉克共和国成立的第三天，7月18日，伊拉克共和国总理卡塞姆致电周恩来总理，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一天，卡塞姆总理还发表声明，宣布恢复3年前由努里·赛义德工国政府所断绝的同前苏联的外交关系。并正式声明退出巴格达条约，从此使这个军事条约组织，成为没有巴格达的已格达的条约，这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

伊拉克共和国新政府所奉行的内外政策及所采取的一切积极措施，受到伊拉克人民和世界正义人士的欢迎和支持。但却引起美英两个帝国主义的极大的恐慌不安，并寻找借口，进行武装干涉。1958年7月15日，也就是在伊拉克推翻费萨尔王朝第二天，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演说称：“昨天（7月14日）是中东局势发生严重变化的一天，在伊拉克一个组织得十分严密的军事行动推翻了依法组成的新政府，并企图成立一个军官委员会来代替它，实行这次攻击时采取了十分野蛮的手段，许多领导人被打死或吊死，他们的尸体在街道上被拖着走。”

“大约在同时，发现了一个企图推翻约旦合法政府的组织得很周密的阴谋。”艾森豪威尔又说，“黎巴嫩的夏蒙总统因局势的这些变化而感到危险和不安，给我拍来了一个紧急的请求，要求美国在黎巴嫩驻扎一些军事部队，来表明我们对于黎巴嫩独立的关怀。黎巴嫩这个小国将近两个月来一直在进行内战。这个斗争是由苏联和开罗的广播所积极煽动起来的，并且得到了从叙利亚越过边境渗入黎巴嫩的大量金钱和军火的鼓励和援助。”

“夏蒙总统说，如果美国政府不立即表明支持，黎巴嫩政府将不能在这个地区活动的部队的进攻下生存下去。”艾森豪威尔说，“我在认真考虑了这个请求并且同政府的行政和国会两个部门的领袖进行磋商以后，决定同意黎巴嫩政府的这个请求。几小时以前一营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在贝鲁特城和这个城市附近登陆和驻扎。”

艾森豪威尔又此地无银三百两他说：“有人会问，美国派遣军队进驻黎巴嫩是不是干涉黎巴嫩的内政，明确的答复是：‘不是。’首先，我们是应黎巴嫩政府的紧急要求而采取行动的，……其次，我们现在在中东所看到的那种征服的形式就是我们在1945年到1950年期间所熟悉的那种形式。这牵涉到用间接侵略的办法拿下一个国家！那就是，在纷乱的内战的掩饰下，让

那些真正忠于侵略者的人在国内当政。”

接着，艾森豪威尔就列举了所谓“共产党侵略夺权”的名单。他说：

“共产党就是用这种办法在 1947 年企图拿下希腊的，那个活动因杜鲁门主义而没有得逞。

“共产党正是用这种办法在 1948 年拿下捷克斯洛伐克的。

“共产党正是用这种办法在 1949 年拿下中国大陆的。

“共产党正是用这种办法在 1950 年初企图拿下朝鲜和印度支那的。……”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谎言，就成了美国及其军事侵略集团远渡重洋在黎巴嫩、在中东各地进行武装干涉的理由和借口。

真是无独有偶。1958 年 7 月 17 日，英国政府继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之后，捏造荒谬借口，公然出兵约旦，镇压约旦人民，并同时在地中海和波斯湾地区集结军队，企图从几个方面侵略伊拉克共和国。英国的这些行动，加剧了世界紧张局势，带来了扩大战争的严重危险。这是英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一起对全体阿拉伯人民明目张胆的侵略，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公开挑衅，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英国政府出兵约旦，借口要帮助约旦政府抵抗侵略、稳定局势，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根本不存在对约旦的侵略，约旦国内的局势完全是约旦人民自己的事。约旦的事务应该由约旦人民自己来管，阿拉伯各国的事务应该由阿拉伯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任何外国不能干涉。美国侵略黎巴嫩、英国侵略约旦和威胁伊拉克共和国的战争挑衅行为，不但为阿拉伯各国人民所反对，而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也绝不会对此袖手旁观。

1958 年 7 月 16 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发表声明说：“美国对黎巴嫩的军事占领威胁着中东的和平，并且既是对联合国宪章的严重破坏，也是对于拒绝向帝国主义屈服并且决定奉行独立政策的阿拉伯国家的威胁。美国政府把已经进行了 7 个星期的黎巴嫩的国内革命作为借口，来达到它占领黎巴嫩以及威胁中东独立国家的目的。”

“美国的这种侵略是在诬赖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进行干涉的虚伪借口下进行的，而这种借口已经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派遣去调查黎巴嫩局势的观察团的第一个报告正式予以否认。这就暴露了美国对阿拉伯独立国家的意图，以及它要迫使它们屈服和统治它们的企图。”纳赛尔说，“这种侵略也被认为是一出滑稽剧，因为它只是暴露出：美国破坏联合国的决议并且阻挠它的执行步骤这种行为表明，美国是无视联合国宪章的，甚至是无视这个组织的存在和这个组织的活动价值的。”

关于伊拉克的局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宣布：“对于阿拉伯的伊拉克共和国的任何侵略将被认为同时是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侵略行为。在这方面，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将根据阿拉伯联合防御条约，执行它对伊拉克共和国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7 月 16 日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苏联政府 7 月 16 日发表声明，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阿拉伯国家内政的武装干涉，并且立即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黎巴嫩。声明最后强调说：“苏联不能对在其国境邻近地区造成严重威胁的事件置若罔闻，并且保留为维护和平和安全而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

在全世界人民和公众舆论强烈的反对和抨击下，应大多数国家要求，联

联合国大会于 1958 年 8 月中旬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并于 8 月 21 日一致通过了 10 个阿拉伯国家要求美英早日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军的提案。联合国大会决议还要求秘书长不得迟于 9 月 30 日提出执行决议的第一个报告。这对于美英侵略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它们从联大紧急特别会议一开始，就力图使它们的侵略罪行合法化，继续侵占黎巴嫩和约旦，并且阴谋组织“联合国和平部队”来继续破坏这两个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种打算是完全失败了。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的决议规定美英军队早日撤出黎巴嫩和约旦，反映了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争取和平和维护民族独立权利的声音，在这次联大紧急特别会议上占了压倒的优势。许多国家代表，特别是亚非国家的代表都严正地斥责了美英的侵略行为，并驳斥了它们的侵略中东的一切借口。印度代表拉尔指出，美英以联合国宪章和所谓“邀请”作为武装干涉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摩洛哥代表菲拉利说，摩洛哥政府认为，美国和英国出兵黎巴嫩和约旦是“完全没有正当的理由的……其理由都是杜撰的。”锡兰（今为斯里兰卡）代表科里亚指出，联合国宪章的任何一条都不能证明美英干涉近东是正当的。在会议上发言的大多数国家的代表都指出，美英的侵略行为威胁着中东和世界的和平，并要求美英把它们军队立即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去！

在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下，美英对中东地区的武装干涉再一次遭到可耻的失败。但是，他们控制中东的野心仍然不死，美国又在策动以色列发动新的中东战争，而中东国家内部也在进行着新的分化和组合。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五章 分化写组合

合合分分是非多，恩恩怨怨几时了；  
兄弟阅墙遗憾事，世事沧桑是正道。

纳赛尔对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既反封又反共，奉行所谓“阿拉伯社会主义”，这种左右开弓和“唯我革命”、“唯我正确”的政策，招致了许多敌人，因此，从始至终没有形成一个既巩固而又强有力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这在纳赛尔的事业中，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剧。

阿拉伯社会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是纳赛尔主义的重要内容。但“社会主义”并不是他开始革命时就提倡的思想，也不是1952年革命后就采取的措施。1955年万隆会议后，埃及报刊开始宣传“社会主义”。1947年12月通过的“民族联盟”纲领正式宣布：“民族联盟致力于建设一个合作的社会主义的阿拉伯社会。”而埃及政府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来搞，则是1961年埃叙联合分裂前后开始的。

纳赛尔为了确保其“社会主义”的实现，于1962年5月召开了全国人民力量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国行动宪章》，并宣布立即筹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10月组成了以纳赛尔为主席的联盟临时最高执行委员会。《宪章》把他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说成是“一个富足和正义的社会和福利社会”。

1964年3月颁布的《临时宪法》宣布：“阿联是一个以人民劳动力量联盟为基础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宪法》中还明确规定，阿联有三种财产所有制，即人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根据《行动宪章》、《临时宪法》和纳赛尔的讲话，可以把他的社会主义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第一，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合作所有制；第二，实行企业国有化，发展人民所有制；第三，改变分配办法，限制地主和资本家对农民和工人的剥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四，实行计划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有助于发展生产，而且大大提高了纳赛尔的威信。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纳赛尔在不断取得成功的同时，也潜伏着挫折和失败。阿拉伯群众已把他奉为无所不能的“神”，但他毕竟是一个人。作为一个取得了胜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纳赛尔头脑发热，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他感到自己不仅对埃及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负有责任，而且对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全世界的革命成败都承担了义务。他认为，埃及在世界上的作用，是由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埃及占有世界交通枢纽、世界贸易要道和世界军队通路的重要战略地位，是非洲、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这三个同心圆的中心。因而，埃及就理所当然的要充当这三圆之首。

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一书中写道：“史册上有许多英雄，在重大关头出来充当光荣的英雄角色。史册上也有许多光荣的英雄角色找不着适当的英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仿佛觉得我们居住的这个区域有一个角色在走投无路，在寻找一位可以充当这个角色的英雄。再者，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似乎觉得这个角色在我们这个辽阔地区徘徊到疲惫不堪，最后在我国的边界坐定下来，向我们招手，要我们上前，穿上这个角色的服饰，把它演出。”

这本书出版之后，他赶走了英国占领军，宣布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打

破了西方对埃及的武器控制，挫败了多次要毁灭他的帝国主义的阴谋。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成就和胜利，扮演这个英雄角色的任务就自然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以后的历史证明，由于纳赛尔竭力要求得到阿拉伯世界的权杖，这就使他最终陷入困境。有人说，1958年的埃叙合并，乃是他由得意转为失意的开始。

叙利亚地处阿拉伯北部的十字路口，它不仅受到了苏、美、英、法、土耳其的种种压力，而且受到了阿拉伯内部的“国王集团”和“进步”阵营之间矛盾的深刻影响。战后一段时间内，国内矛盾重重，四分五裂，没有哪一个党派能获得多数的拥护者。从1949年至1952年间，几乎每隔两三个月就要更换一次政府。因此，埃及革命之后，叙利亚就有人主张同埃及联合，以便借助于纳赛尔的威望，来稳定政局。但是纳赛尔一再拒绝他们的请求，认为条件不成熟。他的主要顾虑，是怕得不到军官们的支持。

1957年初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笼，加快了埃叙联合的进程。同年8月，土耳其在土、叙边界大量陈兵，则促成了合并的实现。当时，沙特国王为避免人们指责他支持美国，就发表声明说，他将支持叙利亚反对任何侵略，并派费萨尔王储亲赴叙利亚，公开谴责土耳其对其邻国进行威胁。沙特的这一表态，引起了开罗的不快。纳赛尔认为，沙特的目的是想夺去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于是纳赛尔立即把一支军队派到了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以示他支持叙利亚反抗土耳其和美国威胁的决心。纳赛尔的这一举动，大得叙利亚军政要人们的心。这些人感觉到，当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可以指望从埃及得到支持。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士认为：与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实行联合，将是拯救他们国家的最好办法。

1958年初，以负责情报和安全工作的青年军官萨拉杰为首的十几名叙利亚军官，背着库阿特利总统草拟了合并宣言，向纳赛尔提出联合的要求；并决定，如果纳赛尔不同意，代表团就拒绝回国，直至纳赛尔接受他们的要求为止。经过4个小时的争执之后，纳赛尔终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当消息传到叙利亚，说纳赛尔已同意埃叙联合时，愤怒的库阿特利总统只好逆来顺受。1958年2月1日，纳赛尔与库阿特利在开罗签署了合并宣言。随后，两人手挽手地站在阿布丁宫的阳台上，向欢呼的群众正式宣布两国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2月21日，经公民投票批准，阿联宣告成立，纳赛尔任总统。这时，纳赛尔似乎觉得他已为一个更广泛的阿拉伯团结奠定了基石。

两国一合并，库阿特利就对他说：“在这个人人把自己看成上帝的国家里，你的处境可困难啦！”纳赛尔私下也承认，联合将是“一件十分头痛的事”。埃及驻叙大使里亚德曾劝纳赛尔不要联合，他却根本不听。他作为阿拉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怎么能无限期地拒绝叙利亚人的请求呢？联合，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的问题。不接受联合，就等于否定了他所主张的一切，等于使他已费了很大力气开展起来的阿拉伯团结和独立运动陷于停顿，甚至还要倒退。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状况。

经过再三考虑，纳赛尔还是决定要联合，要把陆地不相连结、习俗各有差异的两个国家合并起来，要尽力把叙利亚人置于他的保护之下。然而，在合并之前，纳赛尔没有到过叙利亚，对那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甚至没有意识到需要经过调查研究，制定出一套适合叙利亚情况的政策，来巩固和发展两国的联合。他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埃及人能接受的事情，叙利亚人也一定能接受。结果，问题、麻烦、裂痕就由此相继产生了。

埃叙联合后，纳赛尔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强制实行埃及的土改法，引起了大小地主以及资产阶级的憎恨；他不照顾叙利亚政界人士的利益，在 21 个政府部长中，只给叙利亚 1/3 的次要职位；他看不到叙利亚的复兴党与埃及的华夫脱党的不同，宣布解散一切政党，得罪了积极主张同埃及联合、并同他有许多相同观点的复兴党人。最使叙利亚人反感的，是他不听一些友人的劝告，硬把陆军元帅阿密尔派去当他的大马士革总督。一些原复兴党人的部长们，在敢怒不敢言的情况下，纷纷辞职。

裂痕产生了，而且越来越大；矛盾增加了，而且越来越尖锐。合并两年多，使很多叙利亚人感到他们在各方面都吃了亏。人员使用不平等，商品交换也不平等。因而叙利亚一些军政人员得出结论说，要和纳赛尔合作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一场闹分裂的风暴即将来临。

1961 年夏天，谣言四起，说叙利亚将发生叛乱，纳赛尔以为联盟可以在任何压力和危机下安然无恙的信念动摇了。

1961 年 8 月，纳赛尔宣布改组政府，要拯救即将破裂的联盟，但已为时太晚了。9 月 18 日，叙利亚陆军开始向大马上革进攻，并宣布叙利亚独立。据说，纳赛尔听到消息后呆坐了好几分钟，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他噙着眼泪对叙利亚人民发表了一篇文告，告诉他们可以自行其事，并表示，如遇危机，埃及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他们。

埃叙分裂之后，纳赛尔并未从中总结教训，一年后又陷入阿拉伯世界南部的危机。

1962 年 9 月 26 日，以萨拉勒为首的自由军官发动革命，推翻了北也门的已德尔王朝，建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但是以巴德尔为首的旧王室人员不甘心于失败，逃入北部山区，在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下，继续进行军事抵抗。也门内战从此开始。

纳赛尔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应萨拉勒政府的请求，1962 年 10 月正式出兵也门。其目的是要在埃及的影响下，树立共和派的势力，以便向在阿拉伯半岛占有绝对优势的沙特阿拉伯进行挑战。他原以为只要派出一支象征性的部队，最多几个星期，就可以使也门内战结束。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他就可以恢复声誉，并进一步巩固他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但是，事情并不顺利，不但没能马到成功，反而愈陷愈深，变成了他自己所形容的“我的越南问题”。直至 1967 年“六五战争”后，埃及军队才陆续撤出。武装干涉也门，造成埃及损兵万余，耗资五亿多英镑，国内议论纷纷，怨声载道。埃及的国际声音也受到了损害。

就在纳赛尔武装干涉也门期间，60 年代中期，在肥沃的新月地带又发生了几次危机。

1962 年 2 月，巴格达的阿里夫在伊拉克复兴党人支持下，发动了反对卡塞姆的政变，获得了成功。虽然卡塞姆曾经赦免了他的旧同僚的死刑，但阿里夫上台，对他却不仁慈，卡塞姆和他的左翼支持者都被处死。1 个月以后，另一个政变在叙利亚发生，使决心重新实现阿拉伯统一的人上了台——这次的联邦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当时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有一个和复兴党人及其思想合拍的政府。复兴党人由于两次成功，信心倍增，希望支配新的联盟，并以此从纳赛尔手中夺取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领导权。

经过多次谈判，3 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新的 3 方联合的国家于 1963 年 4 月宣布成立。它有一个大体是美国式的宪法，但流产了。纳赛尔是唯一意

料中的总统，但是伊拉克的复兴党人和叙利亚的复兴党人，都不准备给他以总统应有的权力。不久公开分裂，一方是开罗，另一方是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纳赛尔发现两国联合起来反对他。亲纳赛尔的游行示威被禁止了。

1963年7月在大马士革拥护他的政变被无情地粉碎了，27人被枪决。这时纳赛尔又称叙利亚领导人为“不道德的、非人道的法西斯分子”。于是这次的联合烟消云散了。

然而，阿里夫仍然同情纳赛尔，并于1963年11月设法驱逐了曾经试图孤立他的复兴党人。阿里夫重新提出统一的计划——这次是伊拉克和埃及——1964年为此目的签订了一个临时协定。可是这也没有下文。纳赛尔对这种计划变得小心谨慎了；而阿里夫因飞机失事身亡。他的弟弟接替了他。他的弟弟是一位小心谨慎的人，结束了和库尔德人的内战，明智地集中精力于伊拉克国内的统一。

尽管在统一方面只取得了微小的进展，纳赛尔仍然是阿拉伯会议和其他国际事务的中心。这在1964年特别明显。那年13个阿拉伯国家的首脑全被邀请去开罗举行最高级会议，就以色列改变约旦河道工程商议报复措施。他们还同意设立由一位埃及将领指挥的阿拉伯军事联合司令部和拥有自己武装力量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新组织的领导人是一位健谈的巴勒斯坦律师艾哈迈德·舒凯里。他滔滔不绝的花言巧语很容易被以色列的情报人员所利用。

然而，阿拉伯各国首脑，在当时并不愿和以色列打仗，他们只在以色列边境上集结军队，但这一思想并没有公开透露。他们决定把约旦河水改道流入阿拉伯境内，但那年晚些时候在埃及举行的第二次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黎巴嫩和叙利亚不愿意实行改道计划。因为阿拉伯各国不能提供比它们自己所拥有的更好的保护。

这一年，即1964年，赫鲁晓夫询问埃及，出席阿斯旺水坝第一期工程的落成和第二期工程的开幕典礼。尽管有莫斯科的帮助，但纳赛尔发表的演说仍表明“阿拉伯人距离共产主义十分遥远”。赫鲁晓夫暗示阿拉伯民族主义是过时的观念，真正的阿拉伯人的联合应该以工人为基础；民族主义只是通往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而阿里夫和纳赛尔所强调的，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或阶级斗争含义的团结的绝对重要性。纳赛尔说，阿拉伯民族本来是统一的，后来人为地分裂了，但阿拉伯人仍然有一个良心和一个愿望。他甚至当着赫鲁晓夫的面，表达他不结盟的信念。

同年，尼赫鲁逝世之后，10月间有56个不结盟国家的首脑或代表在开罗开会，纳赛尔赢得了领袖的形象。然而他对非洲国家的工作却做得不大好，虽然非洲统一组织第二次会议也是1964年在开罗举行的。纳赛尔在这里的主要问题是，他和激进的卡萨布兰卡集团国家的关系过分亲近，不利于他对非洲温和派的影响。而且大多数非洲人处在阿拉伯语言和文化之外，同时非洲人也很难忘记阿拉伯人与非洲黑奴贸易有传统的关系。最后，在和阿拉伯人进行的竞争中，以色列成功而有效地给许多非洲国家派出了它的技术人员和专家，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生产。

从1965年至1967年，纳赛尔的成就没有过去那样辉煌了。他努力设法阻止西德和以色列缔结一笔大的军人贸易，但没有成功。他的领导权在若干新的地区受到很大的挑战。一件事是，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一样，是对犹太复国主义采取现实观点的极少数阿拉伯领导人之一——



—竭力怂恿阿拉伯人准备和他们的敌人讲和，如果以色列愿意讨论边境和遣回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在对待以色列政策上作某些调整，许多阿拉伯领导人，甚至纳赛尔也有这种想法。可是很少人敢说出口。所以当布尔吉巴这样做的时候，某些妒嫉开罗的人见到纳赛尔明显的窘态都很高兴。而且纳赛尔在另一个国家——利比亚——的影响，几年以后，引起了对开罗支配地位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意大利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后，大部分利比亚国土处于英国军事管制之下。1951年它在塞努西家族的伊德里斯国王领导下获得独立，这是一个松弛的联合体，包括3个大省——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基地权利给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经过意大利长期压迫以后，这些基地提供的保护感起初颇受欢迎，基地租金对一个贫穷国家的经济是一笔很大的补助。虽然从西方的立场看来，美国的惠勒斯空军基地在冷战中是很重要的，因为官对“苏联南部防线附近和欧洲侧翼提供空中力量”。但1963年纳赛尔对英美军事基地的攻击，引起利比亚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撤掉这些基地。

伊德里斯国王以退位相威胁，设法阻止这些基地的撤掉达数年之久；但是他于1969年被废黜，惠勒斯基地不久关闭。仿照开罗模样的一个革命指导委员会接管了政府。有一个重要因素激励着利比亚人对西方和他们几个阿拉伯邻邦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基地租金和其他意外收获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从石油开发得来的巨额财富，使利比亚的新领导获得了财政上的自由。

1967年遭受了严重挫折以后，他们加紧恢复他们的阿拉伯民族运动。

1965年1月至1967年6月，沿以色列边境经常有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袭击，主要是由一个叫征服者的团体“法塔赫”干的，其领导人是亚西尔·阿拉法特。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法塔赫有苏联和捷克的武器，有埃及和科威特的金钱，总部设在叙利亚，约旦也有它的基地。这样的武装袭击在1965年有31起。那年5月和9月，以色列曾进入约旦进攻“法塔赫”基地。

尽管纳赛尔鼓励游击队的活动，但他对于和同以色列再来一次大规模对抗，仍然信心不足。不管1967年6月以前他有时在公共场合说出多么激烈的话，可是他私下仍然说，在许多年以内，阿拉伯人不准备同以色列人再打一场战争。事实上，他的政策是阻止任何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急躁的、反反复复的叙利亚——把其他国家拉进这种战争的漩涡。

虽然他自己吃了许多苦头，也有不少教训，但是他不能从以前承担的义务或从他在阿拉伯世界上崇高形象中解脱出来。对纳赛尔及其阿拉伯的伙伴们来说，事态发展的一个致命的后果开始于1966年2月在叙利亚发生的一次新的军事政变。新政权逮捕了复兴党头面人物，从而排除了和开罗改善关系的主要障碍。纳赛尔不可能拒绝和解，因为他曾经很尖锐地谴责大马士革破坏他们的联合，于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又恢复了。同年11月，叙利亚对纳赛尔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他缔结一个防御协定，即一旦战争发生，成立联合参谋会议和联合司令部。但是叙利亚人，拒绝埃及人在他们国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而纳赛尔为了维护他在阿拉伯世界“救世主”的崇高形象，终于答应了叙利亚人的要求，并与他们签订了“联合防御协定”。

此间，纳赛尔和苏联的关系时好时坏，欲知详情，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六章 赫鲁晓夫碰壁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到处挥舞指挥棒，赫氏碰壁知多少。

从 1956 年至 1964 年的 8 年中，纳赛尔同赫鲁晓夫先后见过 4 次面。这说明，他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同他与杜勒斯、艾登的关系相比，要密切得多。但他们之间，也并不总是愉快的。赫鲁晓夫支持纳赛尔，完全是出于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尽管他一再声称，苏联对埃及的“援助”，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

1964 年，开罗成了许多国际事件的中心。1 月，在这里召开了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7 月，召开了非洲国家首脑会议。

10 月，召开了第二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作为东道国，纳赛尔自然成了会议的主角。在纳赛尔情绪高涨之际，赫鲁晓夫又开始向他讨好。这年 5 月，赫鲁晓夫以参加阿斯旺高坝第一期工程竣工典礼为名，率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来到埃及。在访问期间，他竭力对埃及领导人进行拉拢，称纳赛尔为“同志”，授与他列宁勋章、金星奖章和苏联英雄的称号，并赠送了金匾和吉姆轿车。

5 月 16 日，赫鲁晓夫在阿斯旺为高坝工人和工程师举行的庆功仪式上，公开挑衅说：“我愿意看到阿拉伯统一的口号被更正。”并露骨地要求“把苏联的巨大经济力量同阿拉伯人民的巨大力量加在一起”，等等。在讲话中，他还公开攻击科威特，反对埃及同科威特实行合作。他说：“有一些像科威特这样盛产石油的酋长国，那里有帝国主义者……难道可以同这种人达成协议吗？”合众社在一篇评论中认为，赫鲁晓夫单单对科威特加以抨击，“是故意使纳赛尔为难”。其实，他不只是要使埃及领导人为难，而是要切断埃及同富裕的阿拉伯产油国的联系，借以加强埃及对苏联的依赖。

赫鲁晓夫的挑衅和攻击，再次激起了埃及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愤怒。

1964 年 5 月 20 日，纳赛尔在开罗的一次讲话中，对赫鲁晓夫的挑衅进行了回击。他指出，阿拉伯的统一是不可分割的。阿拉伯实体的统一是历史情况的结果，这种历史情况，使得阿拉伯人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同的思想、感情。这就明白地告诉赫鲁晓夫：要使阿拉伯人民放弃阿拉伯统一的目标是徒劳的。科威特政府为此也向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指出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对科威特国家的侮辱和对我们独立的凌辱”，并告诉他，科威特政府正在考虑限制苏联使团在科威特的活动。

在阿拉伯人民的同声谴责下，赫鲁晓夫见势不妙，就赶紧改变口气说，我们支持你们的统一，实现阿拉伯统一将是阿拉伯人民的一次新胜利。这场争论，再次以赫鲁晓夫的败退而告结束。赫鲁晓夫心劳日拙，历时半个多月的访问，没有能达到他预想的目的。1964 年 5 月 24 日，一篇外电评论说，赫鲁晓夫碰壁之后，“可能不愿意让人们看到他的面孔”。果然，他在 5 月 25 日回国时，一反惯例，在开罗机场没有发表演说，就登上了飞机。回到国内，也没有心思讲话，立即溜回了他的住宅。想搞垮纳赛尔的赫鲁晓夫，回国不到半年，就被勃列日涅夫取代了。

关于埃苏关系的发展演变历程，纳赛尔政府的新闻部长海卡尔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埃及革命后的 3 年中，俄国人怀着既敌视又惊奇的心情

注视着纳赛尔总统的进展。在纳赛尔反对巴格达条约时，他们仍然称他为军人独裁者和压迫者。他们对于纳赛尔在 1955 年万隆会议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周恩来寄来他在仰光同纳赛尔会谈的记录感到兴趣。他们对于纳赛尔与英国人发生的种种冲突也极为关心。”

“他们理解纳赛尔政策的影响和意义，是缓慢的。甚至当他们 1955 年签订了军火交易，他们还认为在同一个神秘人物打交道。不过，那时赫鲁晓夫正开始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实权派，他对纳赛尔已有足够的认识，因此认为在军人交易上押下赌注还是值得的。”海卡尔说，“在这项军人交易以后，事态发展到 1956 年英、法、以 3 国进攻苏伊士，这就使赫鲁晓夫和纳赛尔更加靠拢了。俄国在联合国内支持埃及的立场，对动员世界舆论反对侵略起了极重大的作用。”

海卡尔说：“至于赫鲁晓夫本人，他对阿拉伯国家正在联合起来支援埃及的方式，例如，侯赛因国王主动提出向以色列进军，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在莫斯科敦促俄国人进行干涉，叙利亚一群军官炸毁供应西欧的油管，都很感兴趣。在侵略面前这样的团结，给苏联领导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苏联对这一切也并不是完全放心的。苏联等待了 36 个小时才对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问题，作出评论，这一延迟后来就成为纳赛尔同赫鲁晓夫之间吵闹的主要争端。”

争论虽然已开了端，但彼此还是继续互感兴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同纳赛尔于 1958 年 4 月 29 日第一次会晤了。赫鲁晓夫殷切地期待着会见纳赛尔。当纳赛尔到达莫斯科时，受到了盛大的接待。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时，纳赛尔向苏联领导人阐明了埃及革命的性质。他谈到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不结盟和致力于阿拉伯人的团结。然后他还继续谈了在社会主义和独立的道路上进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问題。

赫鲁晓夫讲话，译员当场为这位苏联领导人翻译。在一个问题上，纳赛尔听懂他的意思是说，如果纳赛尔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反对共产党。纳赛尔认为这点是指他在埃及、叙利亚取缔共产党的事。

纳赛尔没有作答复，会议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当他们第二天上午 10 点钟在克里姆林宫再次会谈时，纳赛尔首先发言说：“我必须坦率他说，我不喜欢我们昨天的讨论，我花了几个小时考虑这问题，我认为在进行会谈前必须作一次澄清。”

他重述了他所理解的赫鲁晓夫在上次会议上的话——译员当即把这话译成俄语——并且表明这是一个干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政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允许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有共产党。我们认为那些共产党不懂得，也不会正确分析不发达国家里的民族运动的性质，我们不承认他们。我不准备听取有关那些共产党的任何言论。”

赫鲁晓夫大吃一惊。他坚持说，他并未提及埃及和叙利亚共产党的事情。纳赛尔回答说，无论如何这句话他是听到了的。

译员把双方所争论的话在会议桌上往返进行翻译。译员吓得发抖了。

赫鲁晓夫仍然断言说他自己没有错，于是纳赛尔说，这也许是翻译错误所引起的误解，因为他完全能听懂他所听到的话。

赫鲁晓夫开始咆哮说：“如果是译员造成的错误，他必须受到惩罚！”

在赫鲁晓夫看来，纳赛尔是富有吸引力的。他在国内乃至整个世界掀起了一股风暴。在莫斯科读大学的阿拉伯学生非常狂热地欢呼纳赛尔；当一位

叙利亚代办的夫人被介绍与纳赛尔见面时，她竟昏倒了。赫鲁晓夫看到这一情景，就问为什么这位妇女会昏倒。有人告诉他说：“出于情感的激动。”赫鲁晓夫发觉这一切都令人费解。

接着纳赛尔到苏联各地旅行，访问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然后于5月16日乘飞机回国，准备再访问铁托元帅，同他讨论不结盟国家的事务。1958年7月6日，纳赛尔一行从亚历山大乘“自由号”快艇去布里俄尼会见南斯拉夫领袖。然而就在他访问南斯拉夫期间，伊拉克发生了军事政变，由卡塞姆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军官团接管政权。这一新闻震动了四分五裂的阿拉伯世界。黎巴嫩和约旦两国都有即将爆发革命之势。一些封建王朝大有朝不保夕之感。

沙特国王本来对叙利亚和埃及的联合就怕得要命，这样一来就更加害怕了。为了除掉纳赛尔，他花了将近200万英镑，准备把一颗炸弹放在纳赛尔的飞机里。可是他选错了人，找到叙利亚军事情报局局长阿卜杜勒·哈米德·萨拉杰上校去搞这个阴谋。沙特的总管带着一张100万英镑的米兰银行支票去同萨拉杰洽谈，萨拉杰接受了这张支票并把这件事全部向纳赛尔报告。纳赛尔叫他继续跟那些阴谋者周旋下去。后来萨拉杰又拿到两张支票，票面总额90万英镑。支票都兑现了，款子都分给工业项目了，全部阴谋也公布了。这个事件最终导致沙特国王下台，由他的兄弟费萨尔继位。

那时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已经完蛋，伊拉克国王和王储被杀害。努里·赛义德首相乔装妇女逃跑，很快被追获，在已格达游街示众。土耳其人愤怒极了，因为这三人被杀的那天上午，他们原定去访问土耳其、出席巴格达条约组织会议的。当他们死亡的消息传到时，阿德南·曼德列斯总理还在机场等着迎接他们。

整个地区沸腾起来了。中东形势似将一触即发。此时，美国第六舰队正在运军队去黎巴嫩，而英国人正空运伞兵部队去阿曼。英国人要求以色列准许其飞机飞越以色列领空，这显然是以色列人和英国人在阿拉伯领土上进行军事冒险的又一次勾结。

纳赛尔用“自由号”快艇上的专用无线电通讯设备以密码与开罗通话，而后与铁托进行商议。南斯拉夫领导人感到担忧；他说如果不把形势谨慎地处理好，会导致巨大灾难。

纳赛尔决定中断南斯拉夫的访问，前去莫斯科。他对铁托说：“我有另一打算，我正在考虑去苏联会见赫鲁晓夫，借以弄清俄国人的立场，了解他们准备做什么，不准备做什么。如果在我回开罗前不直接去判断苏联立场，我们就更束手无策了。”铁托赞成埃及总统的决定，随即联系了一架苏联图104喷气飞机，把纳赛尔送到莫斯科。

7月17日上午10时苏埃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对中东发生的事件大为激动。但他给埃及客人的印象是，由于局势发展太快，而且很危险，他很难确定政策。那天会谈进行了8小时。开头两小时，纳赛尔与赫鲁晓夫单独谈判——只有翻译在场。然后埃及外长法齐和新闻部长海卡尔参加会谈。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苏联对美国意图的估计。

赫鲁晓夫深信纳赛尔是政变幕后指使人。他说：“在伊拉克的，都是你的人吗？”

纳赛尔否认这一点，并对赫鲁晓夫谈了卡塞姆和阿里夫准将这两位革命领袖一年前在约旦境内的一个伊拉克旅里工作的时候，是怎样和萨拉杰联系

的。他们是在叙利亚边境拉姆德会见的。那两个伊拉克人对萨拉杰说，他要他转告纳赛尔，伊拉克军队里的自由军官运动与他以前在埃及所领导的自由军官运动是相同的。他们想了解纳赛尔能够提供什么援助，以及埃及能否帮助他们制订革命计划。

纳赛尔说：“当萨拉杰把这要求转告我时，我把它撇在一旁。我请他把我的意见转告他们：第一，如果他们认真要搞的话，他们必须严守秘密，甚至对我们也须保密。第二，我们不能帮助他们搞什么计划，因为计划只能由执行者自己制订。计划是必须随时变动的，并且必须按照当地具体情况而定。第三，他们不应该依赖我们的援助。我在7月23日那天也没有要求任何人援助。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依靠他自己的力量，而不应该把他的行动寄托在外来的援助上。”

赫鲁晓夫说：“你这样告诉他们以后，就同他们断绝了关系，是吗？”

“是的，我已经这样做了。”纳赛尔回答说。

“真奇怪，”赫鲁晓夫摇摇头说，“但他们干了，而且成功了。”接着，他面露笑容，坚持说：“但是他们到底还是你的人啊。让我祝贺你这位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后来纳赛尔向他的两位随行的部长介绍了他同赫鲁晓夫两个小时密谈的内容，俄国领导人告诉他，他认为美国人发疯了。赫鲁晓夫说：“老实说，我们不准备对抗。我们不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纳赛尔指出美国人会利用土耳其人入侵叙利亚。土耳其果真进攻，他将不得不同他们作战，那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局势。赫鲁晓夫回答纳赛尔，要顺势而行，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因为杜勒斯能把整个世界毁灭掉。赫鲁晓夫对纳赛尔说：“杜勒斯伪装神父，但我可以肯定，我虽是无神论者，但我比他更接近上帝，因为他没有良心。”

纳赛尔对这样的回答，感到不满。他要了解苏联能怎样帮助他。同时他告诉赫鲁晓夫他是怎样在帮助伊拉克：从叙利亚派遣飞机、运送雷达装置支援他们，并送给他们从运河区英国军需品堆栈里夺取来的英国弹药，这些弹药适用于伊拉克的英国式武器。可是他指出这一切都需要时间。纳赛尔要求赫鲁晓夫向西方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制止他们向伊拉克或叙利亚进攻，正像他在苏伊士事件上所做的那样。

赫鲁晓夫拒绝了。他不准备去冒导致战争的风险。他在结束了两小时的争论后，便去附近的一个别墅同等着他的政治局委员们讨论纳赛尔的要求。他回来后对纳赛尔说，苏联所能做到的，至多是宣布在保加利亚——土耳其边界进行一般性的军事演习。他又说：“可是，我坦率地告诉你，不要寄托比这更大的希望。请总统先生记住，这仅仅是演习。”

当时赫鲁晓夫是用俄语讲的。译员把它译成蹩脚的阿拉伯语时，他把“演习”一词译成了阿拉伯语的“玩具”。因此纳赛尔听到的是“这仅仅是玩具”。

当纳赛尔一行由莫斯科返国时，他们看到机场上停满了战斗机，正在集合起来准备演习。新闻部长海卡尔望着战斗机对纳赛尔说：“好一个动人的场面啊！”

纳赛尔笑着说：“别忘了，那些仅仅是玩具！”

1958年12月，苏联和埃及签订了第一期建造阿斯旺高坝的协议。俄国人已准备动工。“但是，就是那个协议也还有弦外之音。”海卡尔在回忆录中写道，“《真理报》和《消息报》登载了几封来信，质问俄国为何支援那

些逮捕共产党的人。这类性质的来信，要不是得到官方批准是不能在苏联报纸上发表的。这几封信件反映了俄国人的失望，认为他们在埃及问题上赌输了。”

接着，在1959年1月至2月于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站起来亲自攻击纳赛尔。他说，那些攻击共产党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说纳赛尔是个感情冲动的年轻人，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阿拉伯世界。赫鲁晓夫说，埃及人在讲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纳赛尔没有分析，也不理解形势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纳赛尔发火了。第二天在大马士革，他出现在总统府的阳台上对成千上万聚集在广场上欢呼的群众发表了一篇语气尖刻的讲话，回答了赫鲁晓夫。

这两篇讲话标志着赫鲁晓夫与纳赛尔之间亲热时期的结束，以及冲突时期的开始。双方的舌战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赫鲁晓夫每到一处，不论在代表大会上，还是在外交场合的鸡尾酒会或招待会上，都对纳赛尔“放冷箭”。纳赛尔去叙利亚访问时，每天在一个不同的城镇也大肆攻击一番对方加以报复。论战激烈，双方各不相让。

1957年11月，埃及代表团为参加庆祝苏联革命40周年活动并签署工业合作协定，访问了莫斯科。在此期间，在克里姆林宫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埃及代表团有3位成员——哈菲兹·伊斯梅尔将军、阿卜杜勒·阿齐兹、穆斯塔法将军、阿密尔·加米尔·阿菲菲将军——在一次招待会上遇到一位叫扎伊采夫的官员。扎伊采夫当时是苏联外交部中东司司长，但在埃及与伊拉克发生冲突期间，他原是驻巴格达的大使。扎伊采夫喝了伏特加酒后，信口开河，开始教训那几位埃及将军。将军们认为，扎伊采夫的讲话事关重大，就报告给代表团团长阿密尔元帅。

阿密尔随后报告了纳赛尔。汇报里转述了扎伊采夫的话：“不结盟是空想。埃及如果要获得真正的力量，就必须决定选择一个国际阵营。否则就不可能积聚力量。你们为什么要害怕共产主义呢？接受共产主义，我们就会加强你们，保卫你们。不结盟像走钢丝一样，维持不了多久。”

纳赛尔看到这份报告，把肩一耸，并不在意，认为扎伊采夫大概喝醉了，因此没有作出反应。但是纳赛尔记住了这件事，而且在以后与赫鲁晓夫交换私人信件，阐述双方的立场、哲学和发泄相互之间的怨气时，提到了这件事。

这两封信反映了两位国家元首的立场和感情，因此值得注意。埃及新闻部长海卡尔说，他们之间信件往来，是在纳赛尔总统急于避免与赫鲁晓夫之间一场迫在眉睫的争吵，通过苏联大使叶甫根尼·基谢廖夫带信给赫鲁晓夫开始的。

在基谢廖夫回莫斯科参加二十一大前，纳赛尔向他解释了自己的立场。这位总统说：“我不是共产党人。我是民族主义者。我是进步人士，至少我认为自己是进步的。我自认为是个社会主义者。但是我认为共产主义里有些东西已经过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共产党人都不好，因为我几位很好的朋友中有一些是共产党人。铁托是共产党人，而他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赫鲁晓夫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而他是共产党人。不能因为我攻击阿拉伯世界的共产党，就把这看作是对苏联的批评。”

纳赛尔还提醒基谢廖夫说，1957年10月在波兰驻莫斯科使馆的一次宴会上，一名外国记者问及赫鲁晓夫有关俄国对纳赛尔的支持，赫鲁晓夫回答说：“我们支持纳赛尔。虽然我们知道他不是共产党人，而且他将共产党人

关进他国内的监狱。但是这是与他本人和他的人民有关的内政。而我们支持他，是因为他是一位代表他的人民希望的民族主义领袖。”纳赛尔对基谢廖夫重述了赫鲁晓夫的这段话，企图通过他讲给赫鲁晓夫听，借以阻止争吵的发展，但无效果。紧接着他们之间论战开始了。1959年4月，当基谢廖夫从莫斯科回到开罗时，他给纳赛尔带来了赫鲁晓夫的一封长信。信中说：

总统先生，你一定记得伊拉克发生革命时，我们与你在莫斯科讨论了侵略者可能会对阿拉伯人民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那时我告诉你，从我们方面讲，假如侵略者对伊拉克共和国发动进攻，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但是，同时我也对你表明，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已经发生的问题不通过战争而和平解决。我们知道你感情用事。我们担心无限制地支持你的好斗情绪会促使你采取军事行动，而我们一直认为那是不可取的，但却会被你解释为我们同意你的军事行动。

总统先生，你也许还记得清，当你向我建议，要我们向你提供中程轰炸机和中程火箭时，我的回答是你们国家的领土太小，使用这些武器或有困难。

然后我问你，你所指的中程火箭是什么。你回答说，需要的是射程50—70公里的火箭。我说我们设计的中程火箭射程2000至4000公里，这当然不适合你的需要。我又说，在需要使用这些火箭的情况下，显然最好还是从我国领土上发射。因此你们没有必要有这种火箭。但是假如侵略者对你们发动战争，你们可以放心，我们会从我国领土上使用这些火箭来援助你们。

我不想对你隐瞒这一事实，即当我们不同意你提出的向你提供轰炸机和中程火箭的建议时，我们是有意想的，担心目前的形势会使你在激动的心情中，采取导致战争的不可取的行动……

我不想隐瞒，你3月22日讲话中的声明使我们特别吃惊。你说在1956年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期间，你们只能依靠真主和你们自己。直到1956年11月6日，直到战斗结束，你们一直是孤军作战，甚至没有从苏联得到即使最小的暗示性的声援。

总统先生，这里你走上了否认绝对明显的事实的道路

总统先生，我们听说，现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集会上可以听到“不要卢布，不要美元”的呼声，并得到当局的怂恿。一些政客甚至公开表示怀疑苏联援助是否大公无私。我不想详细说明苏、美援助之间的根本区别。我只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苏联卢布会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某些人受害吗？

众所周知，苏联从来没有，现在也不会把援助强加于任何人，只有在对方提出请求时才给予援助。你知道得很清楚，总统先生，接受苏联的援助是严格出于自愿。是否接受援助当然取决于你。假如你认为我们过去在你的要求下同意给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援助对于你是一种负担，假如你要扔掉根据现有协定我们已给的卢布，你有拒绝这些卢布的自由。

你尽管放心，这决不会触犯我们。我们将乐意满足你的愿望。说真的，我们有广阔的领域可以投资。我想到了苏联经济建设的宏伟计划。我们不想把援助强加给那些不需要援助的国家；那些国家不仅不感激，反而诋毁我们，煽动人民起来反对给以无私援助的苏维埃国家。……

我们要求你正确理解我们不安的原因，假如你现在不需要我们的援助，就拒绝它。我们会毫无芥蒂地召回我们的人员，而我们将如对待其他国家一样与你们保持正常关系。

赫鲁晓夫以他的典型的风格结束了这封信：“你们的国家可能仍然不止一次地需要苏联的援助及其友好平等的合作。这儿我想引用俄国一句有名的谚语：‘不要朝井里吐痰——你可能还要喝井水的。’”

纳赛尔总统的回信同样也是很长而毫不退让。“我毫不隐瞒，”他写道，“你来信的内容使我吃惊。有些段落读起来使我感到好像是在读西方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这些报纸歪曲事实，添油加醋，拿不出事实时就不惜编造。”

他接着反驳了赫鲁晓夫的论点。纳赛尔说他任何时候都不会低估苏伊士事件苏联致英法的最后通牒的作用，但又说：“我们在战场上是孤军作战。我们的士兵在西奈地方是孤军作战。我们塞得港的军民在塞得港打巷战时，也是孤军作战。我们除了真主之外，并不期待任何人帮助。”

纳赛尔回顾了当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曾敦促俄国人援助埃及。他说，库阿特利写信告诉他俄国人的态度。那封信中写得很明确的是：

——苏联不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

——基于这一点，苏联不能进行军事干涉，甚至不能派遣志愿军。

——所能提供的援助最多不过是运送一些装备和派遣一些技术人员。

“主席先生，我要对你强调一点，我完全理解这封信的含义，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你接受你认为不能承受的负担。”纳赛尔说，“现在允许我告诉你这一秘密，我所做的就是把这封信从档案里拿出来放进了我的口袋。因为我不想让任何其他其他人看到它，读了它之后可能会影响士气。直到战斗结束，我才把那封信从口袋里拿出来，然后下令把它作为国家文件归档。”

“我仍然认为这个文件是我们的极大光荣，因为它最好不过地证明了我们进行过战斗，不仅过去在战场上是孤军作战，而且我们也知道此后我们仍然要孤军作战。”纳赛尔在信的结尾用了一句阿拉伯谚语：“一只手掌拍不响。”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向你们伸出了友谊之手，希望不要遭到冷遇。”

这样通信后，苏联和阿联的关系变得冷淡了。在1960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美国，赫鲁晓夫和纳赛尔又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纳赛尔重申了他的立场，告诉赫鲁晓夫虽然他在埃及禁止共产党活动，但他并不加入世界反共十字军而且也不反对共产主义。“正如我告诉你们大使的那样，你是我的朋友，而你是共产党人。铁托是我的朋友，他也是共产党人。”

赫鲁晓夫对此嗤之以鼻：“铁托不是共产党人。他是国王。”

双方没有取得谅解。到第二年5月底，埃及议长安瓦尔·萨达特率领一个议会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赫鲁晓夫又与之进行了“紧张而又严肃的谈话”。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打算把你们推向共产主义。我们不相信棍子竟可以把人赶进天堂。你们已经获得解放，而且对你们所说的民族主义感到心满意足。但让我告诉你们，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不是极乐世界。我并不想强迫你们进入共产主义，但我相信你们代表团的某些成员将成为未来的共产党人。因为生活本身将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人。”

“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思想。思想是监狱所关不住的。”赫鲁晓夫说，“你们可以把一个人关进监狱，但他仍然是共产党人。沙皇将列宁关进监狱，但是列宁创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

萨达特和代表团成员被弄得目瞪口呆。他们无以对答，但回到开罗后，他们向纳赛尔报告了这件事。纳赛尔对赫鲁晓夫企图干涉他的内政再次感到恼火。他命令说：“决不能对此置之不理。”于是萨达特在6月8日写信给赫鲁晓夫驳斥他的论点，指出他完全知道监狱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因为他本人在为争取埃及自由的斗争中就曾坐过6年牢。

纳赛尔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争执，一直延续到1964年5月。5月，埃及举行阿斯旺高坝第一期工程竣工典礼，赫鲁晓夫接受邀请访问埃及。赫鲁晓夫所到之处受到隆重的接待。但存访问过程中双方又发生了争执。这次争论是



赫鲁晓夫挑起的，在谈到阿拉伯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时，他说：“在革命队伍中只有一种团结，那就是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

纳赛尔很不以为然他说：“那么你如何解释苏联与中国正在争吵这一事实呢？这两个国家都是工人掌权的嘛。”“此外，你说我们不能攻击共产党人。那么你本人怎么攻击起斯大林的呢？”

赫鲁晓夫暴跳如雷地咆哮起来：“我可以攻击斯大林，但你们不许攻击斯大林。你们没有权利攻击他。”

这场激烈的争吵从上午8点钟持续到下午两点钟。钓鱼船停在旁边。等到争论结束，时间太晚，已经钓不到鱼了。

可以说，赫鲁晓夫这次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但是，纳赛尔仍希望和这位前苏联领导人维持“友好关系”。可是不久消息传来：“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全世界都在等着瞧苏联新领导的政策是怎样的。纳赛尔比任何人都更焦急。他害怕与赫鲁晓夫之间经过那么许多周折而建立起来的“谅解”会付之东流。他说：“我们现在又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了。”

但就在赫氏在中东碰壁的时候，约翰逊又对埃及采取了“大棒与胡萝卜”的政策。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七章 “大棒与胡萝卜”

拔山卷海看风威，震天动地听惊雷；  
软硬兼施是诡计，美国图谋又告吹。

就在赫鲁晓夫把手伸向中东的时候，美国约翰逊政府继续对纳赛尔采取“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就是对其又打又拉，并千方百计地利用埃及国内外的矛盾及其困难使其就范。但由于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不变，所有这一切均未得逞。因此，埃美关系时紧时松，时好时坏，但从根本上来说，美埃的症结并未解开。

纳赛尔总统对林登·约翰逊总统怀有一种出于直党的厌恶。他对于所听到的关于这个得克萨斯州政客的一切，都很反感。这样一类政客不合纳赛尔的口味。此外，他也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使约翰逊为继任被刺的肯尼迪而付出代价。

纳赛尔和任何人打交道时，总要搜集这个人的相片来仔细端详，捉摸他的品性。他往往收集同一个人不同姿态的相片达 25 张之多，因为他认为，那些相片比一份长长的报告能使他了解得更多。他开始收集约翰逊的相片，其中两张使他大吃一惊。一张摄的是双脚跷在桌上的约翰逊；另一张是这个美国总统炫示手术刀疤的著名照片。纳赛尔觉得，这两张照片都表现出粗鲁和有失体统。“美国的领导人怎么能这样做？”所有的报告和相片都再没有使他放下心来。他觉得约翰逊缺乏国际事务方面的经验，生来只是个地方上的政客。

约翰逊上台的时候，3 个重要问题仍然使美国和埃及的关系十分别扭，即刚果问题、也门问题、以色列和军火供应问题。

1964 年，纳赛尔总统卷人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 月 13 日，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召开，以弥合阿拉伯世界的分歧。这次会议就也门问题和成立阿拉伯联合司令部问题达成了第一个真正的初步协议。7 月份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举行，在同一个月，在亚历山大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再次召开。10 月份，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举行。这些会议，约翰逊曾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止和破坏，但都没有成功。

最使约翰逊恼火的是，在非洲首脑会议上，美国的刚果政策受到强烈谴责，约翰逊很不高兴。整个 1964 年中，他不是受到“攻击”，就是听到不愉快的消息，几乎都来自开罗。而正当他为自己竞选总统的时候，又发生了三桩特殊事件。

1964 年 11 月，正当美国人在为东刚果的白人人质发动一场大规模营救活动的时候，好几个国家的非洲人提出抗议。开罗的刚果学生在游行示威中焚烧了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就在感恩节那天。学生们原先为了抗议比利时伞兵部队由美国飞机空降到斯但利维尔，申请游行示威，并巨得到了许可，可是他们对警察来了个措手不及。一个学生在示威的人到达之前，若无其事地走进了图书馆，随身带着 3 个定时爆炸的纵火装置。也就在示威的人冲进屋子的时候，火烧起来了。

这幢建筑物烧毁了。纳赛尔总统很为难。他对内政部长说：“我怎能对人讲我们对这次示威失去了控制呢？”但他准备采取激烈的态度。

当时的美国大使卢修斯·巴特勒去找他要求赔偿损失和道歉，纳赛尔一

概拒绝。

约翰逊在华盛顿接见了埃及大使穆斯塔法·卡迈勒博士。约翰逊发怒了。他说：“你们烧了我们的图书馆，我怎么能为你们向国会要小麦呢？”使他最恼火的是焚烧星条旗的那张照片。

第二件事情是，一架私人飞机（属约翰·米彻姆所有，此人是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商）从利比亚飞往约旦，没有飞越埃及领土的过境手续，因此一架埃及空军的米格式战斗机起飞拦截，并命令来机着陆，可是这架油商飞机的无线电失灵了，好像不理睬那架战斗机而继续朝前飞。米格机接到命令把它打下来，这架飞机掉落在亚历山大城外的一片沼泽地里。那个瑞典驾驶员和米彻姆公司的一个美籍代表丧命。这件事发生在焚烧图书馆之后1个月。

局势变得非常紧张。美国大使告诉纳赛尔说，约翰逊总统本人深感不安。因为你们先烧了他的图书馆，接着又杀了他的朋友。约翰逊要求由美方的委员会来调查这次击落飞机事件，但是埃及通知他只能派一个观察员参加埃及调查这件事的委员会。

第三个插曲发生在延长美国小麦供应的谈判过程中。埃及供应部长为谷物担心起来了，他请美国大使前来商谈。这次会见的行程安排得很不凑巧，就在巴特爾大使去看了约翰逊总统的友人的那架飞机残骸的当天下午。巴特爾感到非常沮丧；当埃及部长请他喝杯桔子汁的时候，他婉言谢绝了，说他很抱歉，没有胃口喝桔子汁。埃及的行为使他受不了，因此提供小麦的问题也就告吹了。

这件事情激怒了纳赛尔，11月23日，他在塞得港庆祝苏伊士运河胜利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攻击美国人，说道：“美国大使说我们的行为叫人受不了。好吧，那就让我们告诉他们，不赞成我们行为的人尽可以走，尽可以去喝水！”他问听众：“到哪儿去喝？”听众嚷道：“到海里去喝！”

“我要对约翰逊总统说的是，我不打算出卖埃及的独立，3000万英镑也好，4000万英镑也好，5000万英镑也好。我们不准和任何人讨论我们的行为。谁要是讲我们的坏话，我们要割掉他的舌头。这是不含糊的，也是坦率的。”纳赛尔说，“要是我们每星期喝7天的茶，只喝5天也过得下去。要是我们一向喝5天咖啡，只喝4天也过得下去，要是我们一向4天吃东西，只吃3天也过得下去。我们能勒紧裤带。”

“我要说，我们是有困难的。”纳赛尔强调说，“我们不把困难放在眼里。可是我们决不忍受压力。决不忍受牛仔的流氓行径！”

据原埃及新闻部长海卡尔介绍说，美国与埃及的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2年7月埃及革命之夜开始，直到1955年9月杜勒斯得知埃及与苏联集团进行军人交易那天为止。那是“引诱时期”。在这三年里，美国试图“追求”纳赛尔。杜勒斯在1956年告诉哈马舍尔德，当他和纳赛尔在1953年会面时，他觉得纳赛尔有些事情讲得还合乎情理，但是“他不喜欢纳赛尔其人”。哈马舍尔德把此事告诉了埃及外长法齐，法齐又向纳赛尔作了汇报。

海卡尔说，引诱时期之后是“惩罚时期”，这一时期是从军人交易开始，直到1958年纳赛尔和赫鲁晓夫吵架时为止。尽管艾森豪威尔在苏伊士事件中“支持了埃及”，纳赛尔认为，施之于中东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目的是孤立埃及，并且是用和平手段来达到侵略苏伊士的目的。

杜勒斯在1957年告诉沙特国王：“中东局势是具有爆炸性的，炸弹中心

的雷管是纳赛尔，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很快地和静悄悄地采取行动推翻纳赛尔。”

纳赛尔知道了杜勒斯和沙特谈话的全部内容，因为有一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信奉者把谈话内容的抄本送给了他。

“杜勒斯采取的惩罚手段是特别卑鄙的”，海卡尔说，“对一个大国说来尤为不当。”1957年1月，埃及急需药品和抗菌素来治疗苏伊士事件中的伤员。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以后，埃及在美的全部英镑存款都被冻结起来了。于是埃及要求美国政府解冻足以购买主要药品的金额，但竟遭到了杜勒斯的拒绝。纳赛尔一直没有原谅杜勒斯的这次报复行为。

继惩罚时期而来的是“缓和时期”。当纳赛尔和赫鲁晓夫为阿拉伯的统一和阿拉伯各国共产党人的作用问题而争吵的时候，美国人认为有机可乘，可以重新取得他们失去的地位。1958年秋，就当埃苏在伊拉克共产党人企图争取政权问题上的争吵达到白热化之前，美国人从黎巴嫩撤退了军队，英国也从约旦撤退了军队，这就是说美埃之间不存在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海卡尔说，美国有好几个月只是静观静听而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后来他们问埃及政府有什么可以效劳的。他们通过了480号公法，这使得他们可以把小麦送到埃及。并且他们还静悄悄地用其他方式进行所谓“帮助”。

这种情况在1959年和1960年都是如此。美国对埃及提供着援助，不过采取了“不动声色”的方式。两国之间的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缓和的阶段”。当那年轻的、精力充沛的肯尼迪从年迈的艾森豪威尔手中接管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时，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情况。

埃及新闻部长介绍说，纳赛尔喜欢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吸引纳赛尔的是，新任美国总统提到20世纪出生的那一代人，说他们是理解20世纪的，以及“不要问你的国家能力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句话。纳赛尔也因肯尼迪在他的政府中任用大学教授而敬仰他。海卡尔送给纳赛尔一本名为《经济发展的阶段》的书，作者沃尔特·罗斯托给了纳赛尔特别强烈的印象。纳赛尔下令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并分发给内阁每一个成员。

但是，纳赛尔开始接到报告，说以色列人对肯尼迪的当选极为高兴，肯尼迪已给他们秘密保证，将向他们供应武器。海卡尔说，在艾森豪威尔当政的最后几年里，美国人是十分谨慎的，他们注视着埃及和苏联的争吵，他们用小麦和其他方式帮助埃及。他们看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力量。由于这一切，以色列人就没有从美国人那里得到许多军援。人们可以感到艾森豪威尔没有完全听信以色列人的一面之辞。

与此同时，戴高乐总统正急于得到埃及的帮助，使法国从阿尔及利亚解脱出来。戴高乐给纳赛尔写了一封信，表示他希望和阿拉伯世界建立崭新的关系。在戴高乐之前，法国国防部里一直有一个以色列的特别代表。戴高乐把他裁掉了，他说法国是一个独立国家，不能允许在法国国防部里驻有特别的使节。这样，以色列人面对着艾森豪威尔的不愿援助和戴高乐转与阿拉伯人友好的局面。他们便更加不择手段地设法获得武器。

纳赛尔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接到有关肯尼迪答应给以色列人所需武器的报告的。所以不管纳赛尔多么敬仰肯尼迪和多么想试探美国的新政府，但在他和肯尼迪的初步交往中却有着一些犹豫和怀疑。

据海卡尔介绍，纳赛尔是在4年以后从德国人那里获悉肯尼迪对以色列人的诺言的事实真相的。1961年，当阿登纳正式访问美国的时候，肯尼迪向

他施加压力，要他向以色列出售军火。在肯尼迪的坚持下，西德代肯尼迪实现了他对以色列提供武器的诺言。这是西德和阿拉伯各国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然而，尽管有这些报告，纳赛尔还是觉得有必要打开和肯尼迪的关系。1961年2月20日，正好在肯尼迪就职后1个月，纳赛尔给他写了第一封信，这是他们之间持续对话的开始。

写第一封信的动机，是由于刚果卢蒙巴总理惨遭杀害。纳赛尔对这次野蛮的杀害以及美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极端愤怒，纳赛尔的信用的是外交辞令，但态度是十分明确的。纳赛尔说：“美国对联合国的工作负有特别的责任……美国对联合国支持与否，在许多情况下是成功与失败的决定的因素。”

纳赛尔指出：“1948年联合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美国没有给正义以任何支持；可是，另一方面，联合国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其原因就是美国不顾埃美两国政府当时的关系如何而坚持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组织应尽的责任。可惜，我们不能把美国在刚果问题上的作用和它那次在苏伊士问题上的作用相提并论。在那次世界危机中，美国不顾它的友谊而坚持了原则……”

纳赛尔深信美国对联合国的存在所担负的责任。有一次他问哈马舍尔德：“请你指出美国和联合国的分界线在哪里？”这话把秘书长激怒了。

肯尼迪在1961年3月2日写了回信，信是由美国驻开罗大使馆递交的。他的回答也同样“既有礼貌而又坚决”。信中指出，自纳赛尔那封信以后，联合国已通过了一项埃及提出而为美国所支持的新决议案，由于提案的通过，局势已经有所改善。

肯尼迪明确指出了在刚果问题上两国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方面，他指出的是：

——联合国在恢复国内和平的问题上应起较大的作用而不是较小的作用。

——冷战应排除在刚果之外。

——无论是对卢蒙巴先生及其支持者的政治暗杀，或是最近发生的、由斯坦利维尔集团对卢蒙巴的反对者的政治暗杀，应该同样地进行大力调查和强烈谴责。

——在联合国机构之外对刚果任何派别提供的任何援助，包括人员、物资和金钱，都应视为严重的危险，并应严加制止。

“我应当坦率地指出，”肯尼迪说，“在我们看来，任何不承认联合国正式承认的合法政府而去承认刚果的宗派集团的行为，只会破坏联合国的信誉和权威，并且使内战的可能以及随之而来的外来干涉更为临近。”

海卡尔说，这种信件的交换说明了纳赛尔和肯尼迪以后处理他们两国相互关系的方式。每一次危机，每一个问题，以及一切的协议都会引起他们两人交换信件。这种信件的交换，正像纳赛尔和哈马舍尔德之间的会晤一样，成了他们相互关系的进展的一份记录图。这张图上的曲线有时是上升的，但它经常是下降的。

在这之后，美埃两国首脑又就古巴和巴勒斯坦问题上进行了信函往来。关于古巴问题，肯尼迪在1961年5月3日在给纳赛尔的一封很长的信中极力对美国干涉进行辩解。他说：“毫无问题，美国武装部队没有干涉过古巴局势。如果已经干涉了的话，我相信你将同意：结局无疑是可想而知的。”

“美国政府将继续尽其一切努力，务使美国人不卷入古巴国内的任何战

斗。”但是，肯尼迪又说，“可是作为热爱自由的人民，美国人不能对于他们热爱自由的古巴近邻陷入的可悲处境无动于衷。也不会不同情那为了使自己的祖国摆脱专制政权而拿起武器的人民。”

纳赛尔显然不同意美国总统的观点，因此在5月18日一封信中说，“允许我对你讲一下穆罕默德先知的一句名言：‘对你忠诚的人才是你的朋友，而不是那些只是信奉你的人。’换句话说，我相信在当前的形势下，那些关心我们星球未来的人必须绝不含糊地而且完全真诚地交换意见。我这样声明在先，是为了使我摆脱传统外交语言的束缚。”

“我有机会两次会见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我们有过长时间的交谈。我感到他真诚地表达了要在自己国家和他们强大而先进的邻邦贵国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纳赛尔说，“我觉得这儿我有责任告诉你，我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想法和全世界许多人的想法，都认为美国对古巴发生的不幸事件并非隔岸观火。”

但是，肯尼迪已经把“猪湾事件”置于脑后而“迈步前进”。海卡尔说，他试图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结束阶段的停滞状态之后使美国外交政策重新活跃起来。他像美国其他许多政治家一样为中东所吸引。中东的战略地位，它的石油、圣地——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使这一地区显得很重要。它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政治家们。

1961年5月11日，肯尼迪很快在僵持的中东棋局中走了第一步。他写信给纳赛尔。那封洋洋洒洒的长信表达了对阿拉伯国家的友谊和支持，他也特别提到美国正向埃及提供的各种援助项目。但是信的主要部分涉及“尚未解决的阿拉伯—以色列争端”。

“我知道这是一个涉及深切的情感的问题”，肯尼迪写道。“解决争执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美国政府和人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种体面的和人道的解决办法。倘若有关方面真诚要求我们合作的话，美国将愿意分担完成如此困难的任务所必然带来的劳累和负担。”

“我们愿意按照遣返或者赔偿损失的原则来帮助解决悲惨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帮助寻找有关约旦河水资源发展问题的公正解决办法，并有助于在这一复杂问题的其他方面取得进展……”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表示。

纳赛尔直到1961年8月18日才对肯尼迪这一主动表示作了回答。他说，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的真实企图，是“任何法庭都要判罪的诈骗”。它是一个人把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给予另一个没有接受资格的人的问题。

“总统先生，更糟糕的是，”纳赛尔继续说，“美国在这件事上全力反对法律和正义。这样做的原因是……对于大多数美国总统最有影响的是在总统选举中争取美国犹太人的选票。我在报上看到，你的前任哈里·杜鲁门先生，在竭尽全力——包括他的总统地位的全部力量，因而也是整个美国的力量——来反对阿拉伯权利时，他对那些试图对他表示不同意见的人拿不出什么论据，而只是简单地问他们：‘阿拉伯人在美国选举中有选票吗？’”

纳赛尔继续谈到以色列如何利用联合国1949年停火决议，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大片土地以及以色列扩张的危险，谈到帝国主义者如何利用以色列作为

---

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答应犹太民族主义领导人，英国将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居住地。

破坏阿拉伯团结的工具。

“年轻而勇敢的总统先生，我向你呼吁，是美国睁开眼睛正视我们地区事态的时候了……美国和中东的关系比本国的任何选举重要得多……”

原埃及新闻部长海卡尔说，这封信本可以给肯尼迪用作与埃及打交道的“教科书”。它详细说明了纳赛尔所有的基本原则：犹太国的不合法；反对以色列的扩张和侵略；维护埃及的独立；增强阿拉伯的团结；以及埃及希望与美国交朋友——但是决不能屈服于压力，也不能放弃一点点自由。

纳赛尔当然希望在互相通信以后，美国会对埃及采取新的主动，白宫的新领导人和他的青年班子会在中东采取一种比较不偏不倚的政策。“但是事与愿违。”海卡尔说，“在形势演变的现实中，肯尼迪的关于巴勒斯坦的主动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动一样，没有着落。”

纳赛尔写信给肯尼迪之后1个月、发生了由“国王辛迪加”操纵的叙利亚政变，接着埃叙联邦垮掉了。大马士革是通向“肥沃新月”的门户，因此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尽管彼此之间存在家族的世仇，还是采取了联合行动来颠覆叙利亚。他们在沙漠部队和一些政客身上下功夫。沙特付出了巨款，那时受贿的人有的变成百万富翁。当时传说沙特为了支持政变花了700万英镑。但那数字并不准确。沙特国王被他的兄弟费萨尔王储逼得退位后，作为政治避难者亡命埃及时，纳赛尔曾为此责备他说：“你怎么付给那些人700万英镑？”而沙特国王说：“说来很惭愧，不是700万英镑而是1200万。”

靠沙特的钱上台的叙利亚政府在1962年初垮掉了。一些头子受到审讯，这就是所谓“丹德希案件”。在这次审讯中，公布了一些文件，证明丹德希和其他许多叙利亚政客曾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触过。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巴格达条约特别安全委员会的指挥下，共同策划了叙利亚的政变。

阿联的分裂使纳赛尔很痛苦。阿联是纳赛尔统一阿拉伯的梦想在国际上的第一次表现，而且在他的一生中再也没有第二次实现过。因此，当纳赛尔听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卷人后，他既痛苦又想不通。如果肯尼迪正在对他采取“靠扰的做法”，那么中央情报局为何又搞反对他的活动呢？为什么又策动叙利亚政变呢？可见肯尼迪也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了。这就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这件事情过去了，第二年开春以后，以色列一直在暗示它在美国的帮助下生产尖端武器。埃及也感到有必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生产的武器，聘请了以沃尔夫冈·皮尔茨教授为首的一批德国科学家来发展火箭和飞机，海卡尔说，这些科学家起初是由埃及情报局在欧洲先进行接触而后将他们带到开罗的。他们的到来是人所共知的。以色列人把炸弹邮包寄给他们。一枚从苏黎世寄来的这种炸弹，把教授的秘书炸得身受重伤。他们的家属也受到威胁，他们之中的一个成员的女儿被绑架。而且，以色列人在国际上大肆渲染什么“纳粹科学家”和“新的法西斯独裁者纳赛尔”。有消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参与了此事。

纳赛尔不懂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叫嚷。他对美国大使说：“俄国人由德国科学家替他们工作。你们也有德国科学家替你们工作。那末，为什么他们就不应该替埃及工作呢？”因此，埃及不顾这些炸弹邮包和讹诈，制造了而且

---

指西部亚洲“两河流域”（伊拉克）连接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的一片弧形地区。

在 1962 年 7 月 21 日发射了第一枚试验性导弹。这是在以色列人发射一枚改装的法国天使长式火箭 1 年以后进行的。据以色列人声称，他们自己的那一枚是用来研究大气上层的。

且说在埃及发射第一枚试验性导弹一个多月后，美国总统就通过他的大使向埃及提出了 3 点警告：

第一，埃及发射了一枚远程火箭推进的导弹，这样一定会加速军备竞赛。

第二，火箭只不过是一种运载工具，而远程火箭的常规负荷物是原子武器。因此，肯尼迪要求纳赛尔作出不发展原子武器的保证。为了确保这项保证，美国要求有权检查埃及所拥有的俄国建造的核反应堆。

第三，传统武器的军火竞赛已经越来越危险。埃及和以色列应该就限制双方进攻力量达成协议，并由美国加以监督。

但是，肯尼迪的这一动议，由于一些突发事件的冲击，被搁置在了一边。在这个口信转达给纳赛尔 1 个月之后，古巴的导弹危机突然爆发，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剑拔弩张，而其他人都惶惶不安、唯恐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候，中东的事被遗当世界注意力集中在古巴的时候，另一次酝酿已久的军事危机在贫瘠的也门沙漠上爆发了。年老的也门国王伊玛姆曾经 4 次遭人暗示，但都安然脱险，后来在 1962 年 9 月 18 日死去。纳赛尔说他是一个非凡人物，一个中世纪传奇性的怪物。他身上挂着念珠、子弹带和匕首，眼圈涂上了眼圈墨，脸部经常抽搐，每束肌肉由于咀嚼奎特树叶——一种会引起昏迷的烈性麻醉品——而不断抽动。

伊玛姆告诉纳赛尔他挫败一次政变的故事。他被监禁在皇宫时，看见一个守卫在搜查他的一个侍女的身体。他大声喊道：“天啊！只要艾哈迈德还活着，就不许对妇女搜身。”他跳上一匹马，向那些守卫疾驰过去，并且夺取了一挺机枪，然后从皇宫楼塔上向天空开枪。人们看到了他，就叫喊道：“伊玛姆胜利了，伊玛姆胜利了！”于是政变就失败了。他说，他把这次政变的为首分子斩首，并且把他们的头挂在树上，“像烂熟的果子那样”。

老伊玛姆传位给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巴德尔王子。巴德尔是个花花公子，吃喝嫖赌，不务正业，他只做了 7 天国王，就被王室警卫司令官阿卜杜勒·萨拉尔上校推翻了。一些萨拉尔的部下去埃及要求纳赛尔帮助他们建立共和政权。他们会见了那时是议会主席的安瓦尔·萨达特。他写了一份关于同也门人会谈的备忘录，后来埃及决定承认他们，并给他们派去了顾问，还送给了他们一些小型武器。

巴德尔出逃的情况说来可笑。萨拉尔命令他的军队包围皇宫。但到吃午饭时，军人各自离开岗位去吃饭或咀嚼奎特叶。等他们再回到岗位执行任务时，巴德尔已骑了一头毛驴从后门逃出，逃得无影无踪了。

后来情况相当混乱。当时巴德尔究竟生死如何，大家一无所知，如果他活着下落也不明。其时他的叔父塞义夫·哈桑亲王在联合国，是也门代表团负责人。虽然也门王室和沙特阿拉伯王室是由来已久的仇敌，哈桑此时飞往沙特阿拉伯向沙特国王求救。

沙特那时正遭受挫折。在叙利亚，由他扶上台的一些人已经垮台，他的后门口正爆发一场共和主义革命。因此他就毫不犹豫地支持也门王室复辟。于是沙特帮助巴德尔拼凑了一支人马，在美国出钱出枪的大力支持下杀了回来。保皇分子不断积蓄力量并占领了萨达，印有美国援助计划的握手标记的集装箱源源而来。保皇分子烧杀抢掠，气焰嚣张。



纳赛尔于是应邀派遣军队去也门以维持共和国政府，他向那片荒凉的沙漠派去一批又一批的部队，但一批又一批地被吞噬掉了。他经常带着悔恨的心情开玩笑说：“我派一个营的军队去给萨那城解围，然后我就得再派一个师去增援那个营。”

为了通过和平办法避免冲突，纳赛尔政府曾多次发表公报，阐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于也门民族革命的政策。其中第一个公报是在9月27日凌晨在开罗发表的，该项公报着重指出必须避免外国对也门内政的干涉，并竭力主张也门人民有权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受任何干预。

然而不幸的很，沙特国王对形势有所误解，他认为也门革命是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之间的一场斗争，再加上背后有美国的大力支持，所以要竭尽全力扑灭这场革命。因此，纳赛尔不得不同意也门共和国的请求，派出军队帮助它应付这场激烈战斗。

1963年夏秋期间，幻想破灭了。纳赛尔开始觉得他上了肯尼迪的当，他甚至觉得美国的计谋中有一部分是要使他愈来愈卷入也门，而把埃及军队牵制在这个沙漠地区。这一卷入使以色列感到高兴，因为埃及的大量军队正在对付沙特人就不会对付以色列了。形势对以色列有利，美国使用雇佣军，美国人支持他们的沙特朋友武装保皇分子，这一切都使纳赛尔认识到美国政府手段的阴险和毒辣。

肯尼迪死了，约翰逊继续奉行“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大力支持以色列，并明的或暗的对纳赛尔政府进行破坏，不是挑拨离间，就是威胁恫吓，再不就是进行封锁。就这样，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一次新的进犯就要开始了。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八章 “六五战争”的起端

风云突变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  
蓄谋已久行侵略，“六五战争”起烽烟。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又一次大举进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这场战争是美苏两霸激烈争夺中东的结果，是犹太复国主义同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矛盾进一步激化的表现。

由于以色列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遭受挫折，一直心怀不满，决心报复。战争刚一结束，率军进攻西奈的达扬将军就叫嚣：“我们准备跟阿拉伯人进行第三次、第四次、第七次、第八次战争。”而老谋深算的当时在以色列总理位上的本-古里安则认为，在阿拉伯人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个像7世纪出现过的穆罕默德那样的人物，这个人物“鼓舞他们的精神，改变他们的性格，并把他们变成一个善战的民族”。

穆罕默德大约在公元570年出身于阿拉伯半岛麦加城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40岁时自称是安拉的使者，是“最后的先知”，创立传播以信仰安拉神为基础，以祈祷、清洁、斋戒、布施、朝觐为功德的伊斯兰教，相信《古兰经》是安拉“启示”的经典。因遭富商、权贵的反对，于公元622年逃至麦地那，这一年即伊斯兰纪元之始年。公元630年他率师攻下麦加，此后又频征四邻，占领了阿拉伯地区的大部分，伊斯兰教也随之得到发展，以致与佛教、基督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

本-古里安对纳赛尔日益增长着的影响十分担心，他曾对以色列人说：“纳赛尔说明穆罕默德这个人物的这种危险性，现在依然存在。”所以他们一直主张：应该消灭纳赛尔，或者至少使他蒙受屈辱，使他丧失作为一个阿拉伯领袖的威望。

进入60年代以后，美苏两霸在中东的争夺愈演愈烈。苏联趁美国陷足越南战争、无法大力经营中东的机会，打着阿拉伯人民“天然盟友”的幌子，进一步加紧对中东的渗透。1960年1月，赫鲁晓夫与纳赛尔就苏联参加建造阿斯旺高坝第二期工程达成协议。莫斯宣扬这使西方“失去了它的高坝王牌”。1963年尼克松访问埃及参观高坝后，不得不懊丧地对纳赛尔说：“今天我看到了美国最大的错误。我看到俄国国旗飘扬在高坝上面的时刻，我很痛心；如果不是杜勒斯的过错，本来可以是美国国旗在那里飘扬的。”

1964年苏联提供埃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已达5亿英镑。1964年5月，阿斯旺高坝第一期工程竣工，赫鲁晓夫率一个1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赴埃及，同纳赛尔一起主持落成典礼，并且达成了苏联为埃及第二个五年计划提供1亿英镑贷款的协议。赫鲁晓夫还授予纳赛尔“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称号。“六五战争”前，苏联向埃及提供的军火价值总额约达15亿美元，苏式装备已占了埃军武器装备的80%左右。当时美国总统约翰逊惊呼：“苏联在这个战略地区扩充实力，威胁着我们在欧洲的地位。”

苏联在埃及得手后，还加紧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游击队进行活动。进入60年代后，巴勒斯坦人民反对犹太复国扩张的斗争有了很大发展。1964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8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提出建立巴勒斯坦解放军的建议，并在第二次阿拉伯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巴勒斯坦解放军的经费由阿拉伯国家通过阿拉伯联盟提供。到1967年，巴勒斯

但解放军已发展到 15000 人。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民族解放组织，从 1965 年开始就开展了武装斗争。开始时，苏联表示反对，后来又力图对巴勒斯坦游击队施加影响，除提供装备外，还派教官帮助训练。

苏联在中东的活动，严重威胁着美国的既得利益。美国总统约翰逊，早在他担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时，在国会中就以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发言人”著称。1963 年 11 月出任总统后，就对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施加压力。当时埃及进口小麦 50% 来自美国，约翰逊妄图以停止小麦供应迫使埃及就范。1964 年 11 月，美国驻埃及大使卢修斯·巴特尔就美国运送小麦问题对埃及贸易和供应部长卡迈勒·斯蒂诺说：“埃及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美援没有表示过明显的感激，这是埃及的严重失礼行为。”纳赛尔看到谈话记录后，在塞得港的一次演讲中愤怒谴责美国。埃及政府决定除在形式上同美国保持外交关系外，不再同它发生任何其他接触。

1966 年，美国又策划了一个“伊斯兰协定”，企图拉拢中东一些国家反对埃及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埃美关系进一步恶化。1967 年 2 月，美国完全停止向埃及供应小麦。埃及便转而从苏联进口粮食，以弥补不足。美国为了改变自己争夺中东的不利局面，决定利用以色列打击埃及，以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地位。早在 1963 年 6 月，美国就向以色列提供了价值 2.5 亿美元的“隼式”对空导弹。

1967 年 3—5 月，美国不仅给以色列运去了 400 辆坦克和 250 架新式飞机，还从美国空军中抽调了 1000 名“志愿人员”来加强以色列的空军。

苏伊士战争后，西奈半岛埃以边界的埃及一方驻扎了联合国紧急部队。一般情况下，以色列不敢贸然侵犯。于是，以色列就决心要把纳赛尔从屏幕后面引出来，以便一举毁掉他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形象。为此，他们就在埃以边界不断挑起冲突，并扬言要侵入叙利亚，推翻阿塔西政权。1966 年 11 月 13 日，以色列对约旦的萨木村进行了血洗，烧毁房屋 125 间，整个村子被夷为平地。这时，在某种外国势力的挑动下，约旦政府指责埃及空军不肯出力帮助击退以色列的凶猛进攻。约旦的报纸、电台也不断地对纳赛尔进行讽刺，说他躲在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衣裙后面，避免与敌人作战。还说什么纳赛尔在也门攻打阿拉伯兄弟，而在以色列进攻时，不保卫阿拉伯人的生命，等等。纳赛尔真是有苦难言，只好勉强地反驳说，联合国部队将在适当时候奉命撤走。

但是，以色列侵略者要着重打击的是埃及。虽然埃及与叙利亚在 1961 年 9 月 28 日取消了联合，但两国仍签有防御协定，其中规定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侵略都将被认为是对另一国的侵略。以色列认为，只要对叙利亚施加压力，就可以挑动埃及卷入冲突，以色列便可以此为借口，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1967 年 3、4 月份，以色列在叙以边境大量集结兵力，摆好了进攻的架势，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扬言要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对叙利亚发动进攻，必要时以色列将占领大马士革”。4 月 7 日，一辆以色列装甲车拖拉机在部队的掩护下，强行耕种叙以边境上非军事区内阿拉伯人的土地，叙利亚边防部队鸣枪警告。自从 1949 年叙以停战协定规定建立非军事区以来，由于以色列经常违反停战协定，蚕食非军事区，强行耕种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叙以双方曾经多次发生交人事件。但是这一次以色列蓄意扩大事态，它借口叙利亚向它开火，动用了大炮和坦克袭击叙利亚戈兰高

地上的阵地，并且首次出动海市蜃楼式飞机侵入叙利亚领空。

叙利亚空军奋起迎击。激战中，叙利亚 6 架米格—21 型飞机被击落，以色列飞机逞凶直追至大马士革上空。埃及在叙以空战后，表示坚决支持叙利亚反对以色列的斗争。4 月 18 日，埃及总理苏莱曼在空军司令陪同下到达大马士革，同叙利亚领导人进行了会谈。5 月 1 日，纳赛尔在一次演说中宣布，根据埃叙共同防御协定，埃及已同意向叙利亚派遣空军部队，以应付以色列的侵略。1967 年 4 月的叙以空战，是 1956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以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它实际上是以色列向阿拉伯国家蓄意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信号，是“六五战争”的序幕。

为了引诱埃及犯错误，以色列发出假情报说，它要在 5 月 17 日发动进攻。苏联地中海巡逻艇截获了这个情报后，立即转告了埃及和叙利亚。据此，埃及于 5 月 15 日宣布进入戒备状态，并派军队进入西奈。5 月 18 日要求联合国部队从西奈和加沙地带全部撤走。5 月 22 日宣布封锁亚喀巴湾。一夜之间，纳赛尔又成了阿拉伯世界的英雄，昨日的冷嘲热讽，已被淹没在一片欢呼之中。5 月 30 日，纳赛尔与约旦国王侯赛因结成了军事同盟。这样，纳赛尔就在敌人和朋友的引诱下陷入了以色列设置的一个圈套。这不仅把他自己推到了战争的前台，而且为以色列发动战争提供了借口。以色列向西方哀求说，它受到了军事包围，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说，封锁亚喀巴湾等于是对以色列的“一次武装进攻”，扬言要用武力打开亚喀巴湾。

美国总统约翰逊在 5 月 23 日一项声明中谴责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是“不合法的”，“对和平事业有着潜在的巨大破坏作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了简要汇报。后来他告诉约翰逊，“国会普遍同意不能允许阿拉伯人把以色列赶到大海里去”。事后，约翰逊对以色列外长埃班说：“以色列决不会孤立，除非它决心独行其是。”埃班字斟句酌地问道：“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我是否可以告诉我们的总理，你们的立场是采取一切可能以保证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自由而不受损害地通航？”约翰逊总统向他保证，他的话没有听错。

蒂朗海峡，宽 9 英里，航道离埃及海岸不到 1 英里，在埃及领海范围内。对海峡实行封锁原是埃及的主权。1956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前，蒂朗海峡一直由埃及实行封锁。运河战争后，联合国部队进驻沙姆沙伊赫，海峡才向以色列开放。10 多年来，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通过蒂朗海峡取得伊朗石油的。联合国部队全面撤走后，阿拉伯公众舆论要求重新封锁海峡，即使在这时，埃及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蒂朗海峡。埃及第四装甲师的先锋部队进驻西奈边境联合国部队撤离的阵地后，纳赛尔没有立即派出部队占领沙姆沙伊赫。

以色列于 5 月 19 日下令局部动员，向西奈线增兵。至 21 日，以军已在那里集中了 5 个师的兵力。为了防止以色列抢先出兵占领沙姆沙伊赫，埃及军队于 21 日受命重新进驻沙姆沙伊赫。次日，埃及宣布重新封锁亚喀巴湾，不准以色列船只和为以色列运送战略物资的外国船只通过。23 日晨起，封锁亚喀巴湾的埃及军队进入阵地。

5 月 23 日，埃及宣布封锁亚喀巴湾的第二天，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跳出来指责埃及这一行动是“对以色列的侵略”，等于是“一次武装进攻”，声称要对封锁进行“坚决斗争”。24 日，以色列的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扬言，为了“自卫”，以色列将动用军事力量打开亚喀巴湾。美国总统约翰逊 1 周

之内就中东局势发表了3项声明。他还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对中东局势“给予最优先的考虑”，毫不掩饰地表示要利用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来干预中东局势。美国新任驻埃及大使诺尔迪还向纳赛尔口头转达约翰逊的威胁说，如果吴丹用和平措施使亚喀巴湾向以色列船只开放的“努力”失败，那么美国将不惜“使用武力”作为最后的手段。

然而，前苏联在用以色列的一份假情报把纳赛尔引到战争边缘以后，却又用它的一份真情报把埃及推入了灾难的深渊。5月26日凌晨3点，苏联大使未经约定，就跑到总统住处，把纳赛尔从床上叫起来，对他说，美国告诉我们，以色列获得情报说，你们打算今天对以色列开战，苏联政府要求你们不要首先开火，“因为开第一枪的人将处于难以防守的政治地位”。并强调说，苏联已从美国得到保证，以色列不会发动进攻。如果以色列进攻，苏联“决不坐视”。由于纳赛尔过分信任苏联，轻信美国和以色列的“保证”，就真诚地对苏联大使说：“埃及不会开第一枪。”苏联得到这个保证后，立即通报给了美国和以色列。

苏联的这一手，对以色列是一粒定心丸，以色列可以放心大胆地为发动闪电战进行一切准备。对埃及则是一针麻醉剂，他们以为有了两大国的担保，以色列不会轻举妄动。虽然纳赛尔在5月底对形势也作过一次正确的估计，并于6月2日批准了一项行动计划，但为时已晚。特别是由于埃军总司令阿密尔篡改了计划，以致埃军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

在美苏加紧活动之际，英国也积极插手中东问题。英国首相威尔逊就埃及封锁亚喀巴湾一事威胁说：任何国家的船只都有权通过亚喀巴湾，英国政府“将维护所有英国船只的这一权利”。5月24日，英国外交大臣布朗在莫斯科同葛罗米柯和柯西金密谈。英国国务大臣汤姆森被派到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副国务卿罗斯托等进行紧急会谈。同一天，英国政府并宣布它驻在地中海的舰队“处于戒备状态”。

在美国的授意和苏联的默许下，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也于5月22日启程赴开罗，企图对埃及施加压力。

23日，吴丹同纳赛尔会谈，一开始就提出要埃及撤销对亚喀巴湾的封锁。纳赛尔坚决拒绝了吴丹的要求，但表示埃及不会主动挑起对以色列的战争。吴丹建议创造一个“喘息机会”，“让安理会研究目前危机的根本原因，从而谋求解决”；在此期间，以色列暂不派船只开往亚喀巴湾，埃及暂下拘留通过蒂朗海峡前往埃拉特港的任何船只。

吴丹的这个建议为埃及所接受，但遭到了以色列的拒绝，可是吴丹开罗之行不是毫无收获的。他在5月25日回到纽约，就中东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份报告，其中写道：“纳赛尔总统和外交部长里亚德向我保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不会首先对以色列采取进攻行动。”以色列从吴丹这一报告中更加确认埃及不会采取主动军事行动，从而进一步加速了“闪电战”的准备。

为了在这次先发制人的战争中得到美国的有效支持，在获得吴丹报告的当天，以色列政府就派它的外长阿巴·埃班赶到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紧急磋商”，谋求美国提供进一步具体支持的保证。约翰逊向埃班保证，美国将“在军事上充分保卫以色列这个国家，一直到由美国喷气式飞机对以色列城市实行空中保护”，明目张胆地怂恿以色列发动侵略。

游戈在地中海的美国第六舰队进行紧急调动，舰队司令马丁乘坐的旗舰“小石城号”导弹巡洋舰和3艘航空母舰，其中包括正在驶往越南途中折回

的载有 70 架攻击机的“勇猛号”航空母舰，另外还有 1 艘巡洋舰和 4 艘驱逐舰紧急汇合，摆开一副剑拔弩张的架势。约翰逊还亲自向艾希科尔保证：“第六舰队会保护以色列。”

在美国加紧军事调动的情况下，苏联 5 月底也急忙增派十几艘军舰从黑海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东地中海，以加强它在 1964 年开始派往地中海的舰队；但是，它又害怕自己卷进去，因此想极力“平息这场危机”。当纳赛尔 5 月 25 日派国防部长沙姆士·巴德朗去莫斯科时，苏联“加倍使劲地劝导开罗停止进一步的挑衅活动”，要求埃及克制；同时暗中又和美国进行“紧急而又秘密的接触”。5 月 26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约翰逊建议，两国共同采取行动缓和中东局势。他要求美国约束以色列，而苏联则承担约束埃及的责任。约翰逊感到这是一个欺骗阿拉伯国家、掩护以色列发动侵略的好机会，立即表示同意。

除此之外，苏联还直接和以色列进行了多次接触。5 月 27 日，苏联驻以色列大使约见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递交了苏联的照会，要求以色列“克制”，并表示自己正在说服阿拉伯人。接着又送了内容相似的第二份照会。在随后的几天里，苏联大使一再向以色列表示不必担心，一定会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苏联的所作所为，大大助长了以色列的气焰。5 月 27 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带着美国保证提供武装力量支持的诺言回到特拉维夫，同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以及主要部长们举行了几乎通宵达旦的会谈。5 月 28 日上午 8 时，以色列内阁举行全体成员会议，艾希科尔在会上叫嚷：“将在一定时候采取必要的步骤粉碎埃及对亚喀巴湾的封锁。”

晚上 9 时，他继续同军界高级将领们举行会谈。军队要求立即开战。推举达扬为国防部长的浪潮“已经势不可当”。

摩西·达扬 1915 年生于巴勒斯坦。曾在那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读书。早年参加巴勒斯坦犹太人秘密武装组织——“哈加纳”的活动，1941 年在叙利亚接受情报侦察训练。

同年随英军到黎巴嫩，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失去了左眼，因之有“独眼将军”之称。1948—1949 年第一次阿以战争中，任以色列国防军第八装甲旅突击队第八十九营营长。1948 年 7 月任那路撒冷以军指挥官期间，代表以色列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谈判。1949 年作为以色列国防军代表团成员，参加在罗得岛举行的停战谈判。1950—1951 任南部军区司令、北部军区司令。1953 年 12 月至 1958 年 1 月，任国防军中将参谋长。

1956 年发动侵埃战争时，提出在西奈空投部队并向苏伊士运河进攻的方案，即所谓“达扬计划”。

1959 年当选为议员，此后连续 4 次当选。1959 年底担任农业部长。1964 年 11 月退出刘维·艾希科尔政府，参加本-古里安的以色列工人党。1967 年 5 月，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夕，任国防部长。此人多谋善断，富于军事指挥才能。

中东国家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十分愤懑。纳赛尔下令封锁亚喀巴湾后，阿拉伯各国人民斗争情绪空前高涨。在开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首都，人们成群结队的涌向街头示威，支持反击以色列挑衅的措施。年轻人踊跃参军，准备随时打击侵略者。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约旦国王侯

赛因 5 月 30 日到开罗同纳赛尔会谈，两国签订了共同防务条约。伊拉克决定派遣大批部队进驻约旦参加战斗。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和苏丹派出部队到开罗准备参战。原来同埃及有矛盾的沙特阿拉伯也宣布支持纳赛尔。而以色列在国际上却十分孤立。在这种大好形势下，纳赛尔由于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存有不切实的幻想，却把大好机会丧失了。

纳赛尔轻信美苏的“保证”，对以色列侵略者的疯狂性和冒险性估计不足，认为以色列不会发动进攻，他对埃及的一些高级军官说：与 1956 年的形势相比，以色列的处境困难得多，它不一定会采取军事行动，即使采取也完全可能只限于侵占加沙地带和邻近的阿里什地区的局部行动，不会是全面的战争。在这种麻痹轻敌的情绪下，纳赛尔拒绝采纳先发制人的建议，命令军队采取守势。

27 日、29 日和 6 月 3 日，纳赛尔作了 3 次公开讲话，郑重表示埃及“不会开第一枪”，埃及“不会发动进攻”。他甚至解除了埃及在西奈半岛军队的最高戒备状态。这样一来，严阵以待的埃军前线部队松懈下来，有些军官去休假了。

纳赛尔在放松战备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表明，他需要和解，他希望在亚喀巴湾问题上达成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准备把争端提交海牙国际法庭，由国际法庭判决埃及是否有权在蒂朗海峡对敌船进行封锁。5 月 29 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开始举行的有关中东局势问题的辩论会上，两个超级大国又作了一番表演。美国代表戈德堡要求苏联帮助实现亚喀巴湾的“自由通航”；苏联代表费德林则提出要以美国第六舰队撤出地中海作为交换条件。经过讨价还价以后，安理会在 5 月 31 日通过一项提案，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有关各方特别克制”，安排“一个喘息时间”，以便“立即进行国际外交活动”。安理会这个决议进一步麻痹了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而以色列却加紧了对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的最后准备。

1967 年 6 月 1 日，以色列内阁改组，好战分子达扬被正式任命为国防部长。上台伊始，达扬就提出了侵占西奈的作战方案。6 月 3 日，他发表讲话，公开叫嚣要“打败阿拉伯人”。6 月 4 日，以色列内阁紧急会议，择定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时机。现在箭已在弦上，一场“闪电战”就要开始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十九章 达扬的闪电战

达扬将军战术精，闪电战争堪称雄；

埃及空军遭重挫，损兵折将又丢城。

就在战争爆发的那天早晨，1967年6月5日上午8时，约翰逊总统的白宫卧室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国防部长鲍勃·麦克纳马拉从电话里传来了历届美国总统未曾听到过的信息。“总统先生，”他说，“热线运转起来了。”

“热线”是连接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一项特种电传打字机线路。技术人员称它为“莫林克”，它的用途是使苏联和美国领导人遇到严重危机时刻能立即相互通气，尽可能减少由于耽搁和误解而引起的危险。这条热线在1963年8月30日就安装好了，但除了试试它的有效性以及在新年相互发些恭贺新禧的电文之外，直到那时，还没有按照其本来的用途使用过。如今，第三次中东战争，终于按照以色列新任国防部长达扬将军的设计爆发了。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热线”，也就派上了用场。

在战争发动的前夕，达扬和以色列总参谋长拉宾完成了“闪电”进攻计划的最后细节。其部署是：以色列在埃及边境集结军队65000人，坦克650辆；在叙利亚边境集结军队25000人，坦克100辆；在约旦边境集结军队50000人，坦克350辆；还有许多兵力作为后备队，用来增援各条战线。对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向约翰逊提出报告说，如果以色列圆满地完成初步的空中进攻，它将在三四大内赢得战争。

1967年6月5日清晨，按照达扬的“闪电”计划，以军倾巢出动，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发起大规模的突然袭击。达扬认为，以色列“防御的成败”取决于它能否迅速摧毁主要敌人埃及的制空权。这正如他所说的：“以色列最好的防御，在开罗上空。”

5月31日达扬一就任国防部长，以色列总参谋部作战部长韦茨曼准将就向他汇报了整个作战计划并取得了他的批准。计划主要内容有4点：第一，迅速摧毁埃及空军；第二，席卷西奈半岛；第三，打败埃及地面部队；第四，打破对蒂朗海峡的封锁。这一计划实施前并取得了以色列内阁会议的认可。

6月5日清晨，以色列可供使用的作战飞机共196架，另有12架飞机按4机编队在空中待机。第一批幻影式和神秘式飞机。在特拉维夫时间7时45分向攻击目标进发。达扬所以选择这一时刻发动袭击，是因为此时埃及的空防最为薄弱，他们的晨班巡逻机正返航加油，而接班的飞机尚未起飞。以机为了绕过设在苏伊士运河的埃及雷达监视网，故意兜了一个圈子，取道西奈半岛居民区和军事区之间的沙漠荒地和山区峡谷，飞到地中海，然后以超低空的高度从亚历山大西部飞到开罗机场，从塞得港北部飞到苏伊士运河区机场。埃及机场上米格式和索科尔式飞机都毫无隐蔽，也没有作好对空袭的防御，而是翼梢抵着翼梢，一行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当第一批以色列飞机在轰炸和扫射它们的目标的时候，第二批已经在航途中，而第三批又开始起飞。就这样，从早晨7时45分到10时35分，以色列飞机共17批以每次不到10分钟的间隔起飞，川流不息地对开罗，苏伊士运河附近和西奈地区的10多个最重要的埃及机场以及萨姆—2型导弹基地进行猛袭，一批又一批地投下专门用来作低空攻击的爆炸力巨大的炸弹。埃及副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勒·阿密尔和空军司令西德基·马哈茂德以



及几个高级军官这时止乘坐专机前往西奈前线视察。他们抵达西奈目的地上空后无法着陆，折回原出发地也无法着陆。在以机发动袭击1个半小时以后，才在被破坏得很厉害的开罗国际机场紧急降落，坐上出租汽车回到最高统帅部。

在那里阿密尔得到埃及的空军和导弹部队被以机炸垮的报告。在可以立即起飞作战的约340架飞机中，有300架来不及起飞就在停机坪或滑行道上被炸毁了；飞机跑道受到很大破坏，少数尚能使用的飞机也无法起飞。叙利亚和约旦的空军也相继遭到以机的袭击。这一天，阿拉伯国家总共损失了374架飞机以及许多导弹基地和雷达站。

巨大的埃及空军曾被认为是以以色列的主要威胁。在解决了埃及空军之后，以色列又在当天较晚的时候，并又在星期二，即6月6日转而同较弱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的空军较量。到6月6日黄昏，歼灭阿拉伯飞机的数目是惊人的，总计有416架，其中393架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以色列损失了26架飞机和21名驾驶员。以色列使用了由法国人设计的一种特穿透炸弹，使多数受到攻击的机场被毁。这种炸弹能在低空和高速下投掷，然后用一种降落伞来降低速度，由火箭助推器把它驱入跑道。在穿透之后，经过定时导爆线便能产生一系列的爆炸。

同时，在这第一天，6月5日的夜晚，以色列小规模海军的潜水蛙人设法探测塞得港和亚历山大港的港口并加以某种破坏。他们在那里并在其他各地的活动，使埃及海军对袭击特拉维夫和海法失去了信心。3艘埃及的潜艇曾驶近海岸，以色列用深水炸弹攻击，并没有击中要害。对以军来说，不幸的是，由于未能作正确的鉴别，在海上遭受以色列打击损失最大的却是它的友邦美国的一艘海军电子情报船“自由号”。以色列在西奈海岸的阿里什以北约14海里处，用战斗机和鱼雷快艇袭击，造成埃及100多人的伤亡。但以以色列最大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是在西奈沙漠中取得的。

在西奈方面，根据达扬将军的设计，以色列曾有3项战役计划。他们希望通过快速和猛冲来补救其3个师的兵力——对抗埃及7个师——在作战人数和装甲部队上的劣势。两个师各自试图在两个不同的重要地点突破。首先一处是加沙地峡西端，恰恰在汗尤尼斯以外的拉法。主要的目标是试图占领海岸更往西约30英里的阿里什，而同时可切断加沙地峡。阿里什是从苏伊士运河上的坎塔拉到加沙铁路的一个重要车站，也是埃及补充西奈驻军的必然的主要基地。以色列希望突破的第二个重要地点是阿布奥格拉，它处于埃及边境以西约15英里、离海岸30英里内陆的沙丘和用俄国防卫体系在纵深设重兵的一个阵地之间。它控制着从阿里什，从大约往西20英里的利卜尼山，从靠近以色列边境东南约20英里的库塞马延伸的各条公路的交接点，因此它阻止了以色列从内格夫中部进入西奈中部的任何通道。

大多数是预备役军人组成的以色列的第三师，担负的是一件冒险的任务。它在援助另两个师之后，向西驰至特拉和苏伊士运河以东山区的其他通道，以截断埃军的退路。显然，如果另两个师未能达到它们的目标，或者不能坚持它们已取得的胜利，这一师人也许要遭到覆灭。最后是达扬作出的决定，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派遣全部3个师的兵力到西奈去，而不是按原定计划把一个师作为预备队。

拉法—阿里什的突破是整个战役的关键，负责这一战役的是配备约250至300辆坦克的以色列最好的装甲军团。在那个地区埃军布下了地雷，还设

有坚强的防御工事，而且在广大区域里有炮兵的掩护。埃及方面打得相当艰苦，而以色列方面则因埃及反坦克炮火的猛烈和准确，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这次战斗发展成中东从未打过的最大规模的装甲军会战。如果不是以色列人首先征服了领空和他们陆军司令部有能力指派所需的进一步的空袭，结果可能是很糟的。

事实上，6月6日星期二那天的黎明，在以色列不顾代价作了一次浴血交战之后，他们攻克了阿里什及拉法。加沙也在同一天晚上陷落。在这次胜利之后，这个师的一部分兵力被从海岸派往运河。它的指挥官然后率领其余的军队向南移动，使第三师同它在阿布奥格拉以西利卜尼山会合，而同时从中部内格夫的尼扎纳着手包围第二个突破点。

以色列人完成了他们的包围，便在6月6—7日夜向阿布奥格拉进攻，用直升飞机向埃及环形防御内投下了一营伞兵，压制住了埃军的炮火。以军在战前接受了英国军官温盖特的夜战训练，而埃及军队则比较不能适应这种战斗。以色列人设法在清晨3时进入防御工事，但在那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从拂晓一直打到上午6时，阿布奥格拉陷落。随后，以军第二师的一部分兵力向东南的库塞马前进。同时，以军装甲旅开往西奈中部利卜尼山以南60英里的纳赫勒。以色列人由于突破了他们所选的两个地点，就取得了这一地区的道路。他们有更多的装甲部队又从内格夫南边的库塞马和孔蒂拉两翼推进。于是这些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并占领了纳赫勒以北的埃及军队已撤出的塔马德。

埃及当时在西奈前线部署有5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共约12万人，分别据守在东北部前线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的阿里什、阿布奥格拉等战略要点上。以军以勇猛的闪电战突破这些要塞之后，分兵多路向西朝着苏伊士运河地区进犯：北部攻打坎塔腊，中部指向伊斯梅利亚，南路对准陶菲克港和苏伊士城。

为了挽回败局，西奈地区埃军曾发起两次反攻，力图夺回阿里什和阿布奥格拉，但是都没有成功。6月7日，北部以军已进抵坎塔腊附近，中部以军越过比尔加夫贾法，南路以军已进抵重要的吉迪山口和米特拉山口，堵住了埃军撤退的后路。于是，埃及不得不封锁苏伊士运河。以军在埃军的顽强奋战面前，一面利用坦克部队急速向西穿插，力争及早赶到运河，一面依仗空军优势，用凝固汽油弹对失去空中掩护、暴露在沙漠开阔地带的埃及部队进行轰炸。以色列空军还对苏伊士运河沿岸城市狂轰滥炸。苏伊士城有80%以上的建筑物被摧毁，塞得港被破坏的建筑物达30%，至于苏伊士城对岸的陶菲克港和塞得港对岸的富阿德港则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

6月7日，以军向西奈半岛最南端的战略要地沙姆沙伊赫推进。它出动伞兵抢占了沙姆沙伊赫的山头，又出动海军的鱼雷快艇沿亚喀巴湾直到沙姆沙伊赫。6月8日，以色列军已进抵苏伊士运河。在这个时候，那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战局也有了戏剧性的发展。

以色列对约旦的进攻是在对埃及进攻后不久开始的。战争开始之前，以色列曾指望约旦可能会像它不介入1956年战争那样不参与这次战争。以色列部队即使在对埃及进行突然袭击之后，还曾奉命不向约旦挑衅，而只采取一种防御的态势。6月5日星期一早晨在以军进行空袭之后，艾希科尔总理通过驻联合国的代表给侯赛因国王一份电报，向他保证，以色列不会进行任何反对约旦的行动。但约旦和埃及有约在先，又不敢完全置身于战争之外。因

之在这场战争中，约旦最高司令部一直犹豫观望，举棋不定。原定前来助战的伊拉克军队的一个师又未能及时赶到约旦河西岸地区，所以约旦一开始就比较被动，在战斗中节节败退。6月5日午后，以色列装甲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下，同时对南面的那路撒冷旧城和北面的杰宁城展开攻击。约军抵挡不住，被迫逐步后撤。由于没有空军掩护，部署在约旦河西岸的两个约旦坦克旅在48小时内被击溃。6月7日，以军南北两路都进抵约旦河西岸，占领了面积约4800多平方公里的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

6月7日星期三，以色列军的先头部队通过圣斯蒂芬门开进了耶路撒冷的旧城。他们同该城总督和一位穆斯林名流会晤，他们声称，由于该城的神圣性质，城市不宜设防。约旦军队都已撤走，那里不再有有组织的抵抗了。过了中午，达扬将军偕同拉宾总参谋长、中路军司令以及许多他们的士兵，到哭墙祈祷，并庆祝全体犹太人新的胜利。军营乐队吹起了羊角号，表明这是一个特别节日的时刻。这片刻激情似乎压倒了其他两个伟大宗教，以及那些忠于这些宗教的民族对圣城所提出的要求。达扬在对军队讲话时明白表示，整个那路撒冷现已成为以色列的首都，它的人民无意同它再分开，或者说不再同他们的圣地再度分开了。达扬的讲话在以色列军队中引起了狂欢。他们说：“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地方才打仗的！”

当时，《金色的耶路撒冷》的作曲者、以色列著名的音乐家诺埃米·谢默正在西奈的阿里什随军活动。忽然，她从收音机中听到心情激动的播音员宣布老城区被占领的消息。谢默激动万分，情不自禁地决定改动《金色的耶路撒冷》这首歌的歌词；随之，她面向周围坐着的士兵们唱起来。这时歌声完全被欢呼声淹没了：

我们又来到深井旁，  
来到集市广场上。  
老城里的圣殿山上，  
军号嘹亮。  
岩洞之中，  
万道金光，  
我们去死海，  
昂首阔步走在杰里科大道上。

《金色的耶路撒冷》成了“六大战争”的赞歌。

同一天，以色列借助一次强烈的空袭，又攻克了撒马利亚的一个主要城市纳布卢斯。约旦缺乏空中掩蔽，这有助于以色列破坏一条十分机动的约旦防线。这个城市以及南方的帕利恒和希布伦被占领，使约旦的抵抗事实上已告结束。6月7日夜晚，安曼和耶路撒冷接到了联合国的停火要求，以便执行安理会所通过的一项前苏联决议。对约旦来说，6月战争不过是3天的事情。然而约旦人，比起他们某些阿拉伯邻邦来，部队人数少，装备更为落后，但有时候，或在某些方面，却表现出比后者更具有“敢打敢拼的决心”。

在6月8日至9日，即星期四至星期五的晚间，以色列部队到达了伊斯梅利亚对面的运河地区，而且也到了小苦湖南端，以及这里和陶菲克港之间的沙卢法对面的地方。再往南去，他们也到达了埃及在萨达尔角的油田附近的红海海岸。这时，埃及军队的士气和组织都已经垮了。在连连败北的情况

下，纳赛尔屈服了。他的军队在西奈被歼灭；在埃及国土上，几乎不存在能抵御以色列人进攻的部队了。

纳赛尔有些绝望了。他要求马哈茂德·里亚德向在纽约的穆罕默德·科尼发出指令，要他宣布接受停火。科尼伤心地宣读一份简短的声明：“我荣幸地通知你们，基于本国政府的指示，按照安理会的决议，只要另一方也停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决定停火。”在埃及，为了在电台宣布停火消息，首脑们一直等候到晚上 11 时 30 分，在赫利奥波利斯的参谋部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官阿密尔元帅试图自杀。他的朋友们在最后一刻，终于把他劝阻了。

在埃及，在开罗，完全被失败情绪笼罩着。但是，此时此刻，在坎塔腊，以色列坦克部队和伞兵部队正在同埃及部队进行着最后的战斗。夜幕降临时，由舍穆勒上校率领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已到达伊斯梅利亚对面的运河。他们在公路沿线曾与纳赛尔的第四装甲师的精锐坦克部队进行了战斗。在他们背后，留下了 100 辆被烧毁的埃及坦克的残骸。接近半夜，沙隆将军的部队摧毁了聚集在纳赫勒的埃及装甲部队。至此，以色列成了整个西奈半岛的主人。

当以色列全力向埃及、约旦发动进攻时，它对叙利亚只是进行遏制性战斗。然而，早在 6 月 7 日，以色列副总理伊加尔·阿隆就要求以军在当天中午向叙利亚发动进攻，以免坐失夺取戈兰高地、进军德鲁兹山地的良机。德鲁兹人是一个遭受阿拉伯人压迫的少数民族。他认为，这一军事行动可以使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德鲁兹人实现他们自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即开始为之奋斗的夙愿：在戈兰高地和德鲁兹山地建立一个德鲁兹国。如果以色列允许德鲁兹少数民族独立，在北部边界建立一个非阿拉伯国家，那么，它将使这个地区的政治局势变得有利于它。

总参谋长拉宾事后承认，就军事而论，以色列国防军的确有能力在当天对固守在戈兰高地防御工事里的叙利亚人发起攻击。但是，达扬反对贸然进攻。他生怕苏联军队会直接出面干涉。因为在战场上就有苏联教官在叙利亚部队中担任顾问。然而，他知道，正像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的那样，华盛顿绝、反对以色列对叙利亚采取行动。

6 月 7 日这一天，美国人同以色列代表就形势估计交换意见时还认为，只有在以色列国防军穿越苏伊士运河的情况下，俄国人才会有所行动。因此，俄国人不会在戈兰高地干预。虽然以色列在北边可以为所欲为，但是，达扬仍在等待了两天之后才大胆采取行动。

6 月 9 日上午，以色列一面伪装同意“停火”，一面对叙利亚发动全面进攻。当天，以色列军队在通往叙利亚的库奈特腊—大马士革公路以北，分兵 3 路向叙利亚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戈兰高地攻击。以军的进攻遇到了叙军英勇顽强的抵抗。许多战士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跳出防御工事，用手榴弹、机关枪，直至用刺刀同敌人拼杀。以军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以后，才打开了叙军阵地的几个缺口。6 月 10 日，战斗继续激烈进行。以军在公路以南向叙境内进犯。当晚占领了戈兰高地的大片地区，包括战略地位重要的库奈特腊，从而控制了通往大马士革的几条主要公路，夺取了横跨阿拉伯地区最后到达黎巴嫩的输油管。

以色列在 3 条战线上，同人数众多的装备精良的部队作战，以一次罕见的闪电战，获得了“辉煌和决定性的胜利”。对此，英国中东问题著名评论

家理查德·艾伦说：“这种惊人迅速而彻底的胜利，在严格的字义上已是一种闪电战了——的确，在历史上第一次发明这一词的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成功地预期达到那么迅速而彻底地击败敌人，以便结束战争。而以色列人现在却做到了这一点。”

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后经过了6天，因此又称“六天战争”。在这次战争中，3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埃及官兵死亡11500人，受伤和打散的3万多人，被俘官兵5500人；约旦军队死亡和失踪6100人，伤700多人，被俘400多人；叙利亚军队死亡2500人，伤5000人，被俘600人。而以色列只死亡809人。以色列对战俘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常常将俘虏的鞋于脱掉后释放他们，让他们赤脚行走在炽热的茫茫无际的西奈沙地上，很多人最后死于酷暑和饥渴。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侵占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城的约旦管辖区、加沙她带、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达65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侵占的土地是它战前的4倍。

以色列这次胜利可说是以少胜多。据伦敦战略研究所估计，以色列发动进攻前夕，埃及军队有30万人，坦克1300辆，飞机430架；以色列有军队27.5万人，飞机300架，坦克1100辆。两国的武装部队人员和武器装备大体相等。埃及和叙利亚、约旦三国共有军队40万，坦克2100辆，飞机560架，对以色列占相当优势。以色列所以在这次战争中获胜，除了由美国撑腰外，主要是在战前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发动，在战略战术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是制胜的主要原因。

在这次阿以战争中，美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美国在战前大力扶植以色列，耍尽花招迷惑阿拉伯国家，掩护以色列的入侵准备。连美国总统约翰逊也承认“六五战争”的整个计划，是在美国国防部制订的。在战争过程中，美国又以“志愿人员”的名义向以色列提供空军人员，而且以第六舰队的航空母舰“美国”号和“萨拉托加”号的舰载飞机保护以色列的领空，掩护以色列地面部队推进。第六舰队还派遣专门舰只在埃及附近海面，干扰埃及雷达网，截听埃及军事电报。美国U—2型间谍飞机则频繁出动，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军事侦察，为以色列提供情报。

以色列“六五战争”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国防部长达扬将军的声望，一时成了新闻界和国际舆论普遍注目的人物。欲知达扬将军的身世及其沉浮情况，且看下分文解。

## 第二十章 独眼将军

独眼将军出奇兵，征战沙场留其名；  
穿沟破垒标奇迹，“欢呼”背后是怨声。

6月8日星期四晚上，独眼将军达扬在作战室的行军床上过了一夜。9日早晨6时）他一醒来就问道：“有什么新消息？”

他的助手递给他昨天夜里收到的最重要的电报：“埃及同意停火。”

这样一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纳赛尔的这一决定除去了达扬的心病：担心打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他决定采取行动，他问值班参谋：“伊扎克·拉宾在哪里？”

当时总参谋长和作战部长韦茨曼将军都没在场。

“请给我接达多的电话。”达多就是指挥北方部队的大卫·埃拉扎尔将军。

达扬要的电话接通了。在此期间他又收到了其他的报告·得知叙利亚人仍在继续战斗，正在加紧轰炸加利利地区的村庄。

“达多，”达扬说，“你可以行动了，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

“是全部占领？”将军问。

“是的，全部占领。”达扬回答。

艾希科尔从他的秘书那儿获知达扬先斩后奏，已发布了进攻命令。艾希科尔大发雷霆，因为达扬前不久正在竭尽全力反对对叙利亚采取行动，担心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不可收拾，而现在却改变了主意，甚至未请示总理就以国防部长的名义向部队发出进攻的命令。然而，事到如今，艾希科尔只得对达扬作出的决定表示认可。

6月9日9时40分，在达扬的命令下，成群结队的以色列飞机向叙利亚高地俯冲，猛烈轰炸叙利亚阵地。中午，以色列装甲车、步兵部队和伞兵部队冒着枪林弹雨向叙利亚高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叙利亚高地形似一只巨大的平台，俯视着所有邻近地区。平台北面在赫尔蒙山的侧面，最南面和最西面是陡峭的山坡。以色列人只能从西面上去，而叙利亚人正在西面严阵以待。

以色列装甲部队和突击队同时向5个不同的地点发起猛烈进攻。这里的情况与西奈完全不同，不论是地形还是防御工事，都无一相同之处。叙利亚的堡垒，有分为好几层的地下小型掩体、厚厚的混凝土围墙，望不到的战壕、布雷区、装甲兵阵地与炮兵阵地。但是，几经较量，堡垒被以军攻克了。10日当晚，以军占领了戈兰高地的大片地区，包括战略地位重要的库奈特腊，从而控制了通往大马士革的几条主要公路。

战争结束的时候，达扬将军宣布：“现在，我等待阿拉伯人的电话铃声。一旦阿拉伯人承认以色列的存在，那么中东和平的一天也就来到了。”他又说：“以色列人不要要求阿拉伯人在朝夕之间便开始热爱他们，也不要要求阿拉伯人赞同犹太人的理想，只要求他们首先懂得一个简单的事实：以色列是一个实体；它决不能从世界地图上被消灭和被抹去。友谊，相互谅解，只有在很久以后才能达到，因为阿拉伯人深深的创伤非经过天长日久是不会愈合的。

作为一名长期征战的老军人，达扬深知战争的残酷性，每次战争都以夺

去众多人的生命、财产而告终。他希望“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实现中东的和平，实现阿以两个民族的和解。达扬的这一思想不是偶然的，是和他的出身经历分不开的。

摩西·达扬 1915 年 5 月 4 日出生在巴勒斯坦一个贫苦的犹太人的家庭。达扬在其自传中写道：“我的名字‘摩西’是在悲痛之中起的名。在我出生前一年，在加利利海南端约旦河畔的德加尼村的一片橄榄林中，有一块孤独的墓碑，上面就已刻写着‘摩西’这个名字。德加尼亚定居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事集体耕作的最初大胆尝试，是犹太集体农庄运动的摇篮。在这个草创的定居点里，‘摩西’这个名字就标在这里的第一座坟墓之上。在 1914 年，这个小小的、在艰苦中奋斗的定居点还只有 4 年的历史，它由不到 20 个青年男女创业者所组成。19 岁的摩西·巴斯基就是其中的一员。像他的伙伴们一样，他是从俄国的某个村子到这里来复兴以色列的故土的。”

据摩西·达扬将军自己介绍，在一个安息日的傍晚，他父亲病了。摩西·巴斯基这个 19 岁的年轻人，自告奋勇，骑着牲口到几英里外的一个村子搞药。当时，那一带地区抢劫成风。天黑以后，只身在这孤零零的犹太定居点的栅栏外走动是很危险的。但是摩西·巴斯基骑着牲口走了。太阳刚落山，他那受惊的骡子独自回来了。这个农庄的男人们马上组成几个搜寻小队，锁上铁门，出发去寻找他们的伙伴。骑着牲口的人们，手持火炬，照亮了贯穿旷野的道路。他们搜寻了好几个小时。横扫加利利海的强劲东风扑面而来，吞没了搜寻小队相互之间的呼唤声。最后，他们发现了躺在约旦河岸上的巴斯基的尸体，在他身边还有一只鞋、一根棍子和一小块阿拉伯头巾的残片。后来知道他遭到了 6 个阿拉伯人的袭击。他们企图抢他的骡子，他尽力搏斗，他们便开枪射中了他的背部。吃惊的骡子就在这场混战中跑掉了。

达扬的父亲给摩西·巴斯基的在俄国的双亲写了他生平最为悲痛的一封信。他死去的伙伴的父亲回信说：“我们既不恸哭，也不饮泣，我们民族亲爱的子孙们应该艰苦奋斗，以使我们的民族兴旺发达。我们现派遣我们的次子沙隆到你处去，以接替他已牺牲的哥哥。摩西之死，使我们大家更加向往以色列的故土了。”

此后不久，沙隆到了。随后是他的妹妹，接着是他的母亲带着其余的三个孩子，最后连摩西·巴斯基的父亲本人也来了。

1 年后，在 1915 年的 5 月 4 日，达扬在德加尼亚出生，为了纪念死去的摩西·巴斯基，特取名摩西·达扬。那时候以色列的故土叫巴勒斯坦，它处在土耳其统治下，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两年半后，当协约国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时，奥斯曼帝国就崩溃了，巴勒斯坦就由英国委任统治。但达扬是在一个独立的犹太社会里成长的。这个社会讲的是希伯来语，它培育着扎根和生活于其古老家园的以色列犹太人的社会准则。

摩西·达扬将军的父亲出身于一个赶马车售货的小贩家庭。他母亲出身于一个富裕的木材商家庭。他俩都是作为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来到巴勒斯坦的。他们在俄国没有受到人身迫害，他们也不是被驱逐出来的。“说实在的，父母对他们离家出走是不愿意也不高兴的。”达扬在自传中说，“但他俩一心一意——我父亲怀着极端的热忱，母亲则怀着一种不事声张的深邃的内心责任感——深深感到犹太人的归宿是在以色列故土。因而他们就来了。我这个犹太人是在以色列故土上出生的。”

达扬的父亲穆埃尔是个坚强的人，相貌粗犷，体格健壮。他是在乌克兰

基辅地区的扎斯科村长大的。那里聚居着一批贫穷的犹太人，有 300 来户人家，他们靠做小商小贩、工匠、劳工和马贩子维持生活。他出身于一个哈锡德教派的家庭。他祖父和曾祖父是犹太法官——希伯来语称“达扬”。他父亲没从事这个家传的职业，但却用这个作为姓氏。至于他的家族以前姓什么，谁也记不起来了。

摩西·达扬的祖父保持着这个家的宗教信仰。但是在他的宗教书籍中，夹杂着犹太复国主义小册子和名叫《哈泽菲拉》的现代希伯来文的杂志。达扬的父亲也搞到内有描述以色列故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劳联的出版物《青年工人》。他在其中读到“约旦的土地”、“赫尔蒙山的山峰”、“耶路撒冷的奇观”、“红海的水”和“加利利的坡地”等文字。扎斯科村摇摇欲坠的住屋和泥泞小巷同那闪烁的约旦河水和积雪的赫尔蒙山岭之间相距很远。但这一段距离却由犹太复国主义演说家们弥合起来了。这些演说家常在敖德萨向犹太教堂的会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团体讲道，而达扬的伯父埃利亚胡就住在敖德萨。正是他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犹太复国的热忱，并且大大地影响了他的弟弟什穆埃尔。

埃利亚胡一心向往着参加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的行列。到 1908 年，他已凑集了 600 卢布，便立即出发到圣地去，并且带了当时才 18 岁的什穆埃尔和他们的一个妹妹贝拉赫。4 年后，他已是特拉维夫以北约 10 英里的艾因加里姆那里的一个农民，他又回俄国把留在那边的妻子和孩子们接了出来。

达扬的父亲什穆埃尔，身体强壮，开始给人家当雇工，后来参加了在加利利海边的金纳雷特的一个犹太人的农业组合小组。当时金纳雷特的土地属于犹太民族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建立的一个收买土地的机构。

1909 年年底，金纳雷特农场里的 7 个工人，其中包括达扬的父亲，组成一个独立小组，准备到附近的乌姆朱尼的另一块民族基金会的土地上去耕作 1 年。那就是德加尼亚的起源。这个词是由希伯来语“谷物”一词派生出来的。年底，这 7 个人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创业，接替他们的是一人数更多的团体。

在德加尼亚移民生活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他们应组成什么样的公有社会。这简直成了一个无休止的讨论的课题。人们不仅在正式会议上，而且在大田里，在吃饭、走路和睡觉前都在谈论这个问题。直到那个时候，这些人还一直是流动不定的创业者。他们把一片生荒地开垦成为可耕地以后，就交给一个定居小组来接管，然后他们再到另一个荒僻地区去开垦另一片土地供人定居。这个小组的中心人物尤素福·布塞尔极力主张使德加尼亚成为他们自己的永久性定居点。在这里，他们将在全面合作的原则基础上创造一种生活模式：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工作，按需分配；孩子则由公办托儿所抚养，妇女可以自由从事通常是男子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德加尼亚将是一个靠它自己成员的劳动来维持的定居点。他们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他们正在帮助促成的历史变化。而这一信念给他们增添了忍受肉体痛苦的毅力。达扬的父亲什穆埃尔是这个工合小组的中坚力量，“这就是我母亲德沃拉于 1913 年春所进入的社会。”达扬在自传中写道，“她长得苗条动人，有一双深陷的棕色眼睛，她的黑色长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她和我父亲同年，并和他一样来自乌克兰的基辅地区。但就家庭背景。教养和气



质说来，他们两人很不相同。”

达扬的外祖父是第聂伯河上普罗乔罗夫卡村唯一的犹太人，是个木材行的经理。这个木材行从事伐木，并在化冰时期把木材编成木筏，漂在河中顺流运出。他出身于一个犹太法学博士的家庭，是个开明的希伯来学者。在漫长的冬天，当河流结冰时，他就从事研究和写作。他出版过一本关于 17 世纪沙俄什米埃尔尼基集体迫害犹太人时期犹太人的生活书。他并以极大的兴趣关心巴勒斯坦的早期定居活动。

达扬的母亲长大时没有参与她父亲在希伯来文化和犹太复国方面的研究，她受的是世俗的俄国教育，起先在乡村的教区学校读书，继而到一个较大的城镇中学上学，后来她进入基辅大学成为教育系学生。

1905 年的俄国革命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对工人的困苦极为同情，对沙皇政权的暴虐深感愤慨。她认为她的使命就是帮助穷人和减轻人们的痛苦。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俄国伟大的小说家的作品，并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她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在学生中的一个支部。1911 年，当保加利亚在俄国的支持下与土耳其打仗时，她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甚至在保加利亚前线志愿担任过护士。后来她离校回家，满怀着与她自己的犹太人民共命运的新的热忱，决定到巴勒斯坦去。那是 1913 年，当时她是 23 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的 1914 年秋天，达扬的双亲在那个犹太集体农庄结了婚。婚礼由一位“舒谢特”（祭神杀牲者）主持，此人是用一辆大车从邻近的定居点接来的。天篷由系在桔树上的一条毡子做成，设在约旦河岸上。达扬是第一个诞生于德加尼亚的孩子。

摩西·巴尔斯基的悲剧还没有被人们遗忘，而后来又发生了几起凶杀事件。据达扬日后回忆，他们跟毗邻的阿拉伯农民的关系还是友好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是种地的，他们常常互相学习。互相访问，互相参加对方的喜庆活动。对犹太人的袭击并非完全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在阿拉伯内部抢劫事件也时有发生。由于不可能依靠土耳其当局的保护，加利利的一些犹太人定居点组成了一个联防团，在道路上和村子里进行巡逻，搜索隐藏的袭击者和盗匪。

达扬出生在第一个犹太集体农庄德加尼亚，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这个农庄共有 80 户农家。每户种 20 英亩土地。有些农业工具是公有的，产品的销售和物品的采购通过集体的渠道进行。他们保持了犹太集体农庄的一些基本原则：从思想上重视耕种土地，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人与人之间的完全平等。集体农庄建造的“纳哈拉勒”成了如今存在于以色列各地的几百个居民点的雏型。

达扬每天放学后除帮助父亲干农活外，还帮助母亲做家务劳动。由于他父亲经常出外帮工和从事犹太复国活动，有时繁重的农业劳动就主要放在母亲和他的肩上。达扬实际上是个半耕半读的学生，他的学业主要是靠母亲帮助完成的。

1929 年，达扬 14 岁时，被介绍参加一个名叫哈加纳的秘窑组织。这个组织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地下自卫队。在加入这个组织的青年中，他年纪最小。当阿拉伯人在希不伦一次阿犹冲突中，枪杀了 67 个犹太男女和儿童不久，哈加纳就决定扩大这个组织。在那次阿拉伯人的袭击中，还有另外 60 人受伤，一些犹太教堂被夷为平地，犹太教经文卷轴也被焚毁。哈加纳决意使城乡孤零零的犹太居民区再也不致于如此一筹莫展，手无寸铁，或者听凭

阿拉伯一些极端主义者摆布。

达扬还清楚地记得，1932年12月的一个晚上，一枚炸弹丢进了他的邻居优素福·亚阿科比的小屋里，炸死了他8岁的儿子，孩子的父亲也因为受伤过重于次日早晨死去。袭击者属于一个名为“胡子教长”的狂热地下团体。这个团体后来用了它的首领和创始人阿兹丁·卡萨姆教长的名字，称为卡萨米亚。这个组织的出现，清楚他说明了在阿拉伯人和正在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犹太人之间有着深刻的民族和宗教分歧，这种分歧使彼此分离，矛盾愈来愈尖锐。

第二次大战爆发后，达扬离开犹太农庄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1941年在叙利亚接受情报侦察训练。同年随英军到黎巴嫩，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失去了左眼，因此有“独眼龙”之称。“少了一只眼睛并不碍事。”达扬在自传中写道，“这时，我再也不担心万一另一只眼睛被打中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当哈加纳最高指挥部的伊扎克·萨德赫向我提出建议，要我组织一个突击营时，我热切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并以此来迎接新的犹太国的诞生，”

1948年5月14日下午4时半，戴维·本-古里安正式召开了巴勒斯坦犹太国民委员会的一次代表会议。在会上，本-古里安宣告了以色列国的重建，宣布犹太人在其古老的故土上获得了新生。这个国家原定于午夜英国的委任统治结束的時刻诞生，但是由于犹太安息日的来临，使得这个不同寻常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盛典有必要提前举行。在“激动人心的气氛中，本-古里安向屏息聆听的与会者们宣读了以色列的独立宣言”。

几小时之后，这个新诞生的国家就遭到了进攻。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外约旦（后来叫约旦）和埃及的远征军分别从北方、东方和南方滚滚而来。沙特阿拉伯也派出一支部队在埃及指挥下作战。他们越过边界进入了以色列。

“我们面临着一个危急的局面。敌军都装备着主权国家正规军所能拥有的标准的重型武器。他们毫无困难地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地获得军火。然而，在独立战争的初期，犹太人并没有掌握能与之匹敌的军火，因为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哈加纳地下防御部队所能得到的军火，只不过是一些轻武器、一些自制的装甲车和几架轻型教练机。”摩西·达扬说，“叙利亚军队在午夜刚过就开进了以色列。嗣后连续两天，他们炮击和轰炸约旦河谷的一些村庄。第三天，5月18日，我奉调离开筹组突击营的工作，北上指挥约旦河谷战区的军事行动。”从此，达扬就一直处在阿以征战的第一线。

由于达扬作战勇敢，屡立战功，1948年7月就被提升为耶路撒冷军区司令。在此期间，他曾作为以色列的代表，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谈判。1949年作为以色列国防军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罗得岛举行的停战谈判。1950—1951年曾先后任南部军区和北部军区司令。1953年12月至1958年1月，任以色列国防军中将参谋长。

“我任总参谋长一职使我登上了军队金字塔的顶点。”达扬说，“我认识到我必须捍卫以色列国防军的形象。但是，我也认识到必须进行必要的军队改革，把军队锤炼成我所向往的那种军队。我意识到我将不得不处理在此之前我一直竭力回避的事务。一个总参谋长，特别是处在相对来说比较平静的时期，是要整天忙于处理行政和技术等问题的，如兵力、预算、武器、装备、维护保养等，这样与战地的作战部队就比较疏远了。为了克服这一弊端，作为总参谋长必须深入下层，狠抓军事训练，努力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

经常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把以色列国防军锤炼成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

为了树立一个新的摩西·达扬的形象，作为新官伊始的第一步，他打算让军队的作风来一个转变，消除士兵和总参谋长之间的隔阂，精简繁文褥节，在高级军官中提倡简练的工作习惯，任用在“独立战争”中久经战争考验而有才干的年轻军官充实领导岗位。总参谋长带头推行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此取消了总参谋长侍从参谋的职务，把侍从参谋的房间变成总参谋长的办公室。把那间宽大而陈设精美的原总参谋长办公室改成会议室。为消除上下级的鸿沟，他还经常穿着士兵的服装检查部队的战备、哨所和军官们的值勤情况，他还和士兵们一起参加劳动，与夜间训练归来或下哨归来的士兵们谈话。达扬深有体会地说：“只有和下级官兵心连心，才能树立自己的领导权威，才能在战时真正做到指挥到哪里打到哪里。”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前夕，以色列为了配合英法作战，达扬制定了进取西奈的“卡代什行动”计划。“卡代什”是古以色列的孩子们继续向“希望之乡”进发之前在西奈旷野的最后逗留地的名字。在发布命令的会上，达扬作了指示。其中的一条是，坚持以军的任务不是杀死尽量多的敌人，而是把他们打垮，尽可能缴获他们的武器和装备。他说：“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的途径是：通过登陆或空降伞兵，在战争一开始就占领敌境内纵深地区的主要目标，同时我们的步兵和装甲部队则开始迅速推进，他们将尽量绕过敌人的阵地，把敌人切断，使之留在后方一个孤立地区之内，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采取正面攻击。我还强调把我们的部队组织好的必要性，要使得一个部队的推进，并不取决于另一个部队进展的速度。”

以军要在西奈的广阔地区作战，其北廓是沙漠，南半部是道路不通的山区，总面积3倍于当时的以色列。达扬计划的目标是消除埃及部队的威胁，制止来自加沙地带的阿拉伯敢死队的恐怖活动，控制陆地上的一个点，即半岛南端的沙姆沙伊赫。得到了沙姆沙伊赫，以军就能自然而然地打破埃及对亚喀巴湾的封锁，这是这一战役的首要目标。但只有把整个西奈的埃及部队打败，以色列才能达到并保持这个目标，因为通向沙姆沙伊赫的唯一道路位于半岛的极西边，沿着埃及控制的苏伊士湾。

沙姆沙伊赫俯视着极为重要的蒂朗海峡。从东方和东非来的船只一定要经过这里，才能到达亚喀巴湾和以色列的埃拉特城。如果船只能够通行无阻，那末埃拉特就可以成为一个大港口，从而使整个内格夫生气勃勃。这个海峡本身是由一边的西奈海岸和另一边的小小的蒂朗岛形成的，其间可供远洋轮通行的航道宽度只有650英尺。因此，埃及人只要在离沙姆沙伊赫3英里的一个荒芜的海角上放上几门炮就能把海峡封锁住了。

为了描述这一战役，达扬在当时的日记本上画了个图。这一战役在1956年10月29日接近黄昏时开始。按照总参谋长的计划，隶属于第二二伞兵旅的1个营的395名战士被空投到深入西奈腹地、离苏伊士运河约30英里的米特山口的东口的附近。他们于下午5时20分乘16架达科他运输机起飞；为了避开埃及的雷达，飞机越过西奈沙漠时飞得很低。直到离埃及空军基地仅两分钟飞行时间的空投地区，它们才升到张开降落伞的高度。在这之前两小时，以色列4架活塞引擎野马式战斗机，采取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行动去扰乱敌人的通讯系统；它们飞越西奈上空，用它们的螺旋桨和机翼割断仅离地面4公尺高的电话线。与此同时，其他的部队也协同动作，歼灭了众多

的埃军，胜利完成了进军西奈的任务。

达扬在总参谋长任期届满后，脱去军装，于 41 岁时进入那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成为该校政治系的一名正式学员，着重研究中东问题。然后，开始了政治生涯。1959 年 11 月，被选为议员，并出任农业部长。

以色列约有 90% 的土地属于国有。在建国之前，归犹太社会所有的大部分土地是犹太民族基金会收购来的。犹太民族基金会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了在巴勒斯坦获得土地以建立定居点而于 1901 年创立的。这类土地归犹太人全民所有，任何个人都不得购买和拥有。随着以色列国的建立，前英国委任统治当局所拥有的公共土地全部归国家掌握，这约占以色列全部土地的 71%。

达扬在担任农业部长期间，提倡科学种田，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因而使农业产量不断提高。达扬在内阁工作了 16 个月，然后离开了。他说：“我于 1964 年 11 月 3 日向总理递交了我的辞呈。我的问题不是由于本—古里安已经下野，而是因为我感到艾希科尔政府里有一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气氛。”

达扬离开政府，也不再呆在军队中，但仍然是议会议员。他利用这个时间著书立说，进一步研究军事科学。“这时已是 1966 年 3 月，离开我上次参加战争已有 10 年了。”达扬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面对敌人的坦克、野战炮和攻击机，不跟随我们自己的坦克、火炮和飞机已有 10 年了。我想到现场亲眼看一看现代战争是怎样进行的，新式武器是怎样操纵的，它们在作战中的效能又怎样，以及我们自己能否加以采用。”

“那时，越南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军事‘试验室’。”达扬说，“我同意为报纸写几篇文章，并被委派为军事记者。后来，我发现当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知道此事后，曾热诚地打电报给越南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请他给我种种方便，但又关照威斯特摩兰不要使我冒太大的危险。然而，到了战地上，当地的美军指挥官非常友好，让我看了我要看的一切军事行动。因此，我于 1966 年 8 月初乘坐一架美国直升飞机从帆港飞到第一空中骑兵师的后方司令部，我又从那里飞往前线参加一次丛林巡逻。”

“在越南，我亲眼目睹了许多事实，耳闻了不少事情，总算不虚此行。我看到了 60 年代中期的战争是怎样打法的。”达扬说，“不过。当我动身回国时，我还不知道，仅仅 10 个月之后，我又将回去担任政府职务，处于军事事务的中心，积极地投身于指导我国多次最激动人心的战役中的一次。”

以色列报纸说，“六五战争”使摩西·达扬将军在军事指挥上达到“光辉的顶峰”，以色列人为他欢呼。但就在达扬的威望升到“顶点”的时候，纳赛尔在埃及人民中的威信却因为“惨遭失败”而“一落千丈”。纳赛尔悲愤交加，痛心疾首，决心重整力量，洗刷耻辱，而大国却从中进行干预。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一章 大国的干预

“热线”通话通消息，互相摸底费心机；  
大国干预耍阴谋，相互争夺比高低。

“六五战争”以色列横扫阿拉伯，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劝说，警告、抗议相继而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中东，从始至终极力干预这一战争的进行。

在以色列发动“闪电战”5个小时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首次动用连接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热线”。当设在美国白宫地下室的“情报室”的热线传来了柯西金的俄文电讯时，约翰逊总统让他的工作人员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出来。柯西金通过“热线”表示苏联愿为中东停火而努力，矢口表白苏联不希望同美国在中东发生战争。约翰逊了解到苏联不会采取措施妨碍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侵略行动以后，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回电表示“愿意施加一切影响以结束这场冲突”。

就在6月5日这一天，苏联政府就中东局势发表一篇声明，这个声明同5月23日的第一个声明一样，避而不谈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事业，而只是鼓吹“包括大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政府也从自己方面尽一切努力来熄灭近东的战火和恢复和平”。希望联合国应当“火速采取恢复中东和平所必要的措施”。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写给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信中堂而皇之地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该继续努力尽快有效结束这场战争；同时立即同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合作，从而实现这一目的。”

6月6日，当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之际，约翰逊一清早就来到“情报室”，副总统汉弗莱、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以及刚从莫斯科赶来的驻苏大使汤普逊等人早就等在那里，他们全都焦急地期待着“热线”传来莫斯科的新信息。不一会，柯西金又通过“热线”传话说，苏联完全同意美国关于阿以双方实行“无条件停火的建议”。于是，美苏代表立即在联合国着手策划迫使阿拉伯各国接受停火的阴谋，炮制出一项要求阿以双方“立即实现停火”的决议草案，在安理会当天晚上召开的会议上强行通过。

但是，这个不分是非的所谓“立即实现停火”的决议，既阻挡不了以色列的侵略行动，更束缚不住阿拉伯各国军民反侵略的手脚。6月7日，安理会应苏联要求再一次召开会议。苏联代表在会上提出一个“限期停火”的决议草案，得到美国代表的支持，也被强行通过。这一决议要求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在当天格林威治时间20时停止一切军事活动。这实际上是强迫遭受侵略的阿拉伯国家限期放弃抵抗，并认可以色列侵占阿拉伯国家大片领土这一既成事实。6月8日，苏联的一艘船迫不及待地第一个驶过刚刚被以色列控制的亚喀巴湾，这个行动等于是带头承认以色列对亚喀巴湾的侵占。

由于安理会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操纵下通过的这些决议，公然袒护以色列侵占阿拉伯国家的大片领土，以色列8日早晨宣布接受停火。埃及、叙利亚两国在人民遭杀戮、土地被侵占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原想拒绝接受停火；但苏联通过驶埃及大使向纳赛尔横施压力，迫使埃及改变自己的决定，在6月8日晚间同意停火。约旦则在前一天深夜接受了停火。叙利亚也在苏联的压力下，继埃及之后接受了停火。

阿拉伯各国接受停火后，以色列口头上声称同意停火，实际上却利用阿拉伯各国停火的机会，出动装甲部队和伞兵，向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纵深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以色列在6月9日发动新的进攻的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应叙利亚的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以色列在会上受到阿拉伯各国和其他主持正义国家的同声谴责。但这并没有使它的侵略行动有所收敛。

在国防部长达扬的命令下，以色列军队继续向前推进。在6月9日的傍晚，以军“G”旅的一支部队将以色列国旗插上了赫尔蒙山积雪覆盖的山峰。一支装甲部队迅猛向库奈特腊方向前进。在此情况下，在叙利亚的苏联教官首先迅速高开了这座城市。接着，叙利亚士兵们也惊惶失措地逃往大马士革。昨天，他们还勇敢地在战壕里进行战斗；今天，他们却为了活命逃跑了。

接近中午，以色列的领导人发现，对于他们来说，外交活动的最后时刻正在消逝。参谋总部和内阁希望到达一条有利的停火线，即离以色列目前边界20几公里的一条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军们需要几小时的时间。他们希望在停火之前抢占更多的领土。

苏联担忧叙利亚抵挡不住以色列的侵略，使它在那里的既得利益付诸东流，6月10日又动用了“热线”。柯西金告诉约翰逊，中东局势正处于“十分危急的时刻”，并装腔作势地声言，倘使以色列不在今后几小时内无条件地停止军事行动，苏联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军事上的措施”。

在这之前，苏联还对以色列进行威胁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入侵，苏联将断绝与它的外交关系。当天，为了确定一个反以色列的共同立场，东欧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秘密地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所有主要的共产党领袖都出席了会议，其中有诺沃提尼、日夫科夫、卡达尔、哥穆尔卡、齐奥塞斯库、乌布利希，与会的还有东欧国家的外长们。南斯拉夫参加这样的会议，多年来还是第一次，铁托元帅来到莫斯科主要是出自与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私人交情。

在延续12个小时的会议上，铁托起着代理“检察长”的作用。他严厉谴责苏联拒绝前去帮助阿拉伯国家。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个东欧国家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公报，宣布支持阿拉伯的事业，表示只要以色列继续进行侵略，他们就帮助阿拉伯国家。然而，这项声明并未暗示要用武力来对付以色列。只有一个国家拒绝在声明上签字这个国家就是罗马尼亚。据说，会上还作出了一项秘密决定：一旦各同政府明确表示赞成，那么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就断绝同以色列的关系。罗马尼亚又一次拒绝附和这项决定。

在巴黎·戴高乐也在大发雷霆：“他们不听法国的话！”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对他的客人仍克制不住对以色列人的满腔怒火，他说：“我对埃班说，不要放第一枪。他们就是不听我的话！”战争爆发前。戴高乐担心这次冲突会导致越南化，甚至担心会爆发大国之间的核战争。

他曾坚信，以色列在获得一些胜利后，会被阿拉伯国家击退。现在，以色列的胜利已成定局，戴高乐面对知己，又对以色列指责说：“在目前的危机中，以色列从未受到过生存的威胁。但是，以色列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它梦寐以求的是征服领土。它所进行的战争具有侵略性，因为它从中找到了扩大领土和占领辽阔土地的机会。”

“当我在巴黎接见本一古里安的时候，他向我表明以色列渴望扩大领土和增加人口，一有机会他便要进行一次征服领土的战争。”戴高乐说，“以色列人应该撤离他们占领的领土，否则的话，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国家之间

的冲突就没有任何解决的可能性。”

“法国必须站在阿拉伯人的一边。它与几千万阿拉伯人有着根本的利害关系。我们也必须保证长期获得石油供应。总有一大，西方国家会再一次感谢我采取这样的政策。因为法国不仅现在，而且在长时期内仍然是唯一对阿拉伯国家有重大影响的西方强国。”戴高乐说，“苏联和法国将加强它们在中东的地位，真正的输家将是英国。苏伊士运河的关闭将对它的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而法国将获得胜利，因为英国的经济危机将削弱它在欧洲舞台上和就共同市场一事同我们所作的斗争中的地位。”

就在苏联和法国对以色列相继发出警告和劝告的时候，开罗的情况已较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号召彻底消灭以色列人的标语消失了，那些悬挂在十字路口、代表犹太人和美国人的假人也消失了，武装士兵们占领着开罗中心和尼罗河桥。悲伤的人们慢吞吞地在大街上走着。在苏联大使馆门前，开罗市民挥舞着拳头举行示威，他们大声疾呼：“为什么抛弃我们？！”

在西奈，大炮已经停止轰鸣。从那条称作苏伊士运河的并不开阔的对岸，人们发现以色列士兵在占领阵地。那里与伊斯梅利亚、坎塔腊，甚至埃及的心脏隔岸相望。

在赫利奥波利斯，参谋部正召开会议，高级官员在互相指责。陆军司令穆尔塔吉将军尖刻地批评空军司令穆罕默德·西德基·马哈茂德元帅。国防部长沙姆赛丁·巴德兰也同样受到了严厉的指责。在所有的高级将领中，显得姿态最高的要数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尔元帅。是他，要对“等待战略”承担责任；是他指挥了最初两天的战斗；他是纳赛尔完全信得过的人，他受命制定所有的军事作战计划。现在只有阿密尔不想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纳赛尔只参加了一会儿会议。上午其余的时间他都是在人数有限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们陪伴下度过的。纳赛尔显得很沮丧。昨天他还是阿拉伯世界崇拜的英雄。今天他失败了，成了世人嘲笑的对象，甚至被他的苏联盟友所抛弃，他们不愿为救他而战斗。而且，比这更糟的是，军事上的失败严重威胁着他个人的地位，在开罗的一些大街上，愤怒的人们公开指责他对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激烈反对他的政敌，现在聚集在阿里·萨布里领导的社会主义联盟周围。有些人不仅责备纳赛尔在军事上的失败，而且还责备他的停火决定。他们主张“决一死战”。

苏联为了缓和阿拉伯人民对它的不满，在6月10日通过“热线”所发表的最后通牒式的通话，使得美国白宫地下的“情报室”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当汤普逊在腊斯克的要求下，校阅了俄文原件，判明“苏联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军事上的措施”准确无误时，约翰逊转向麦克纳马拉问道：“我们的第六舰队现在在哪里？”约翰逊要知道美国第六舰队在地中海的确切方位，以便进行反讹诈。

麦克纳马拉立刻同五角大楼通了电话，然后对约翰逊说：“第六舰队在叙利亚海岸西南大约300海里的洋面上。”

“这些军舰通常的航速是多少？”约翰逊问道。

“大概是每小时25海里，”麦克纳马拉说，“以通常的速度计算，到叙利亚海岸，大概要用10到12小时。”

美国第六舰队根据命令平时在地中海巡航时，至少要离沿岸各国100海里。这时约翰逊要麦克纳马拉立即命令第六舰队改变航向，加速朝叙利亚驶去，并将上述限制缩小到50海里。约翰逊知道，第六舰队改变航向、航速和

航距的任何做法，都会立刻引起苏联密切注意。他事后带有几分自我吹嘘的情调回顾说：“在有些情况下，总统的个人明智和正确的判断是极为重要的。而现在，我们正处于这种情况之下。苏联人已经作出了决定，我也得作出反应。”

约翰逊在作出反应以后，对“热线”另一端焦急期待着的柯西金说：“我们认为事态应该到此为止，我们已对以色列施加影响，要他们彻底有效地实现停火，并且我们已得到保证，以色列愿意这样做。”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通过“热线”紧张地继续通话，柯西金的口气一次比一次软了下来。在以色列侵占整个戈兰高地并歇手停火之后，约翰逊觉得可以暂时结束一下通话，他满有把握地告诉对方说：“中东的军事行动显然已接近尾声。”

为了表示对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支持，苏联和以色列的关系变得“严肃”起来。以色列驻苏联大使卡特里尔·卡茨来到莫斯科一所大型犹太教堂。上星期六，在他最近一次游览这个地方的时候，一群犹太人同他紧紧握手，并表示对以色列的未来既担忧又充满希望。但这是在战争发生以前的事；几天功夫似乎经过了几个世纪……早晨，在犹太教堂里，死一般的寂静欢迎大使的光临。没有人接近他，没有人紧握他的手，没有人同他交谈。人们弓着背，眼光流露出戒备的神情，这一切仅仅表达了一种感情，即害怕……

卡茨返回大使馆。不久，电话铃响了。这位外交官被紧急召去苏联外交部，安德烈·葛罗米柯的第一助手库兹涅佐夫副部长正在等候他。这位高级官员在外交部中东司司长奇布林的陪同下迎候了卡茨。库兹涅佐夫请卡茨坐下，接着拿起一张纸高声宣读起苏联作出的决定内容：苏联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卡茨问：“你们规定什么时候让我们离开？”

库兹涅佐夫答道：“尽可能早些。”

两个人迟疑了片刻，握了握手，便离开了。回到大使馆，卡茨发现有一排警察围着大楼，大楼周围的人群开始聚集起来。有一个人发了信号，于是人群一边摇晃着标语牌和狭长的小旗，一边喊起反对以色列的口号。1个小时过后，其中一个领队的看了看表，一声令下，示威者就异常安静地散开了。在那几天中，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也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

且说在安理会里，代表们争吵不息，气氛紧张。自6月10日凌晨4时30分开始，代表们召开了特别会议。叙利亚代表乔治·图迈赫面对他的同僚和几百万电视观众用悲枪的声音控诉道：“库奈特腊已经落入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他们轰炸了我们的首都！他们已经到了大马士革这颗东方的明珠的郊区！侵略者想占领我们整个国家！……”

苏联大使费多连科向以色列发起了猛烈抨击，他把它比作纳粹德国，指责以色列“万恶的领导人的反人道主义”。吉迪恩·拉斐尔用同样的口气来回敬他。他说：“正是苏联和纳粹德国签署过所谓‘和平条约’，正是苏联对周边国家进行过侵略扩张。”

阿瑟·戈德堡同样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一个美国代表向一个同僚喊道：“既然拉斐尔在安理会上演奏英雄交响曲，那戈德堡就不能奏波尔卡舞曲了！”

费多连科则针锋相对，把戈德堡比作“不懂事的外省的小律师”。美国代表则嘲弄地回答说：“我亲爱的朋友，费多连科教授，你可真乖呀！”



当代表们不断地相互挖苦的时候，艾希科尔总理在与达扬部长进行商议。他俩正在加利利，靠近指挥叙利亚高地战役的埃拉泽尔将军的前方指挥所。他们知道，他们正在与时间进行一场疯狂的赛跑，应该分秒必争。讨论结束，达扬对他的助手们说：“立即替我找到联合国驻中东观察员奥德·布尔将军，并和他约定立即碰头。”

纽约时间6月10日上午9时30分，阿瑟·戈德堡请以色列代表吉迪恩·拉斐尔立即在会议厅外会面。这位美国代表刚刚接到白宫打来的电话，获悉苏联通过“热线”拍来的电报的内容。

戈德堡对拉斐尔说：“情况极为严重。过一会儿，如果你们仍不停止前进的话，苏联代表将声明它的国家要对中东进行武装干涉。美国对这样的声明不能再无动于衷。如果这样的声明发表后，你们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结束战争，即使苏联的威胁行动并未付诸实施。那时候，全世界将认为以色列和美国是在苏联的最后通牒面前让步的。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声明你们的国家同意停火，你们必须抢在苏联代表发言的前面。”

“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拉斐尔表示反对，“我没有接到国内任何这方面的指示。”

“您以您本身所担负的职责去做。事不宜迟，每秒钟都事关重大。”

正在这时，拉斐尔的一个助手走出会议大厅，他告诉大使，苏联代表费多连科刚才要求发言。拉斐尔立即返回大厅。他很清楚费多连科要讲什么话。

突然，拉斐尔叫去听一个电话，这是从特拉维夫打来的。外交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告诉他，就是刚才，达扬将军通知联合国驻中东代表布尔将军，以色列准备停火。布尔将军确定了有效的停火时间：6月10日18时30分（纽约时间中午12时30分）。

拉斐尔在纸条上记下了这些指示后，向会议大厅奔去。他走到会议主席汉斯·泰伯身旁，一边喘着气说：“我请求您允许我讲话。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要说。”

按照安理会的惯例，一个非联合国成员国——如以色列，在这种场合，只有在已登记的成员国代表发言后才有权讲话；因此拉斐尔必须等其他代表——包括尼古拉·费多连科——讲完话后才可发言。然而，汉斯·泰伯在美国的敦请下，决定略微打破一下惯例。他允许拉斐尔立即发言。

拉斐尔慢吞吞地读了以色列关于停火的来电。“请原谅我读得慢，因为我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鉴于我们刚才同意停火并与布尔将军达成了一项协议，我料想议事日程问题已得到了满意的解决。”

这条消息赶在了苏联人的前头，外国记者说，苏联人明显地流露出失望的神情。尼古拉·费多连科气得不得了。拉斐尔忍不住戏弄起来，说：“我有一种感觉，苏联代表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特别失望。”

苏联对以色列发表的勒令停战的通牒全文还在费多连科的手中，而且再也不可能提出来了。苏联也不必为了拯救叙利亚而进行干涉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美苏领导人就中东局势使用“热线”通话达20多次。约翰逊吹嘘“热线是无价之宝”，在“六五战争”中，“在一些特别紧张的日子里，情报室就变成美国政府的司令部”。在那里，约翰逊及其僚属们有时忙得只好一边吃点心，一边研究从莫斯科发来的信息。而在“热线”另一端的克里姆林宫，柯西金一伙也是费尽心机，紧张得不可开交。两个超级大国通过“热线”，为争夺中东霸权而勾心斗角，相互摸底，也为控制和破坏

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中东停火不久，6月16日，柯西金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以参加苏联要求召开的讨论中东局势的联合国紧急会议为名前往美国，准备同约翰逊举行面对面的秘密会谈。6月23日上午，约翰逊和柯西金举行会谈。这是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的领导集团的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首脑举行的第一次直接会谈。谈判地点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一个叫做葛拉斯堡罗的小镇上。他们一见面就“含笑相迎，热烈握手”。当讨论中东问题时，两人却争得面红耳赤。柯西金为了挽回苏联在阿拉伯国家的“信誉”，打着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旗号，要以色列军队撤回到战前的停火线上，并提出把开放亚喀巴湾的问题提交国际法庭解决。而约翰逊希望保持以色列已经侵占的阿拉伯国家大片土地的现状，装模作样地说：“我希望不要再发生战争。”第一次会谈在各执己见的吵闹声中草草收场。

11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由英国提出的关于中东问题的提案，即联合国第二四二号决议。这项决议没有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它既不谴责和呼吁制止以色列的扩张侵略，更未给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以应有的支持，但是它提出“以色列武装部队从占领的土地上撤退”，“不能容忍以战争攫取领土”，要求“结束一切好战言论或交战状态”，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等等。另一方面，这个决议要求保证以色列在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和亚喀巴湾的“通航自由”的权利。

埃及、约旦代表在会上指出，决议中关于边界问题措词含糊，应有明确的提法。美国代表阿瑟·戈德堡坚持偏袒以色列霸占它所侵占土地的态度，反对在决议中写上任何“限制以色列的权利、不让它谋求比‘六五战争’前所存在的更安全的边界”的词句。戈德堡对埃及和约旦代表表示，以色列已经接受决议草案，如果阿拉伯国家也接受的话，美国将保证决议得到贯彻；只要对原来的边界略加调整，并就那路撒冷的新地位达成协议就可以了。苏联这时也出面劝说。在美苏的劝说和压力下，埃及、约旦被迫接受这一草案。

第二四二号决议通过后，吴丹任命瑞典驻苏联大使贡纳尔·雅林为调停人。雅林同阿以双方频繁磋商，但是在整个停火线上，尤其在苏伊士运河两岸，战事仍然不断发生。1969年1月，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他在就职之前，就派人到中东地区到处宣扬美国对阿以双方将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就职后，又要人拟就关于中东问题的政策文件，其目的在于拉拢阿拉伯国家，“遏制俄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

1969年4月到7月，美苏策划了一个有美、苏、英、法4国驻联合国代表参加的“四大国会议”，进一步讨论“政治解决”中东问题。苏联在会上不再提出要以色列撤退到1967年“六五战争”前的边界，而公然表示可以对阿拉伯国家边界进行“微小的调整”。但即使这样，由于各方分歧很大，4大国会议一共开了15次，最后仍然不了了之。

为了争取主动，尼克松于1970年4月派负责中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赴中东，同阿以双方商讨解决办法。6月25日由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提出一个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被称为“罗杰斯计划”。它主张埃及和以色列实行“3个月的有限期的停火”；在这期间双方各派代表同联合国特使雅林会谈，讨论用什么办法执行第二四二号决议，使以军撤出，并使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主权和独立。

美苏通过双边会谈和“4大国会议”策划所谓“政治解决”中东问题，

直到美国抛出“罗杰斯计划”，都是为了在中东制造一个束缚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反侵略的手脚，有利于它们各自对中东争夺的“不战不和”的局面。

战争的失败，大国的干预，苏联的出卖，使纳赛尔非常悲愤。欲知详情，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二章 纳赛尔的悲愤

出战不利遭惨败，极度悲愤满胸怀；

洗雪国耻是众愿，重整山河不可待。

“六五战争”的失败，使纳赛尔非常悲愤，深感痛苦。他认识到，这完全是由于受了愚弄，被人出卖的结果。

1967年6月9日，即埃及接受停火的第二天晚上，纳赛尔在办公室里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承担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让查卡里亚·毛希丁来继任；他决定回到群众中去，像一个普通公民那样尽他的责任。他沉痛地说：“如果人民判我有罪，并把我绞死在解放广场，我认为他们是有权这样做的。”

纳赛尔的电视讲话使埃及广大人民感到愕然。他的听众刹那间愣住了，不知所措。但接着，当他的话被听众领会得更深刻时，在公众中间就迸发出自发的感情，甚至最爱冷嘲的外国观察家都为之惊奇。不久前，埃及人民无论男女还在狠狠批评这位领袖，因为他使他们的国家遭到了现存记忆中最令人感到羞辱的惨败，而现在他们忽然意识到在当前风雨飘摇的时刻，纳赛尔是他们所能紧紧依靠的唯一的盘石。他们已使他成为政治上的至尊者；眼下正是国难临头的危急之秋，如果他竟下台让位，那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在纳赛尔讲话发表几分钟后，在实行灯火管制的开罗，成千上万的群众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声讨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游行群众高呼着纳赛尔的名字，并纷纷涌向赫利奥波利斯附近纳赛尔的官邸，请求他继续担任总统，领导人民坚持抗战，收复失地。

令人诧异的一点是，纳赛尔事先并未把辞职的意图通知自己选中的继任人，更没有问过他是否准备继任。毛希丁和其他听众一样，只是当他打开电视机才第一次知道纳赛尔的打算。但他不想当总统，在这样紧急的时刻尤其如此；所以他乘汽车，以飞快的速度赶到纳赛尔家里，说明自己拒绝继任。并告诉总统，当埃及部队还在西奈被围困的时候，他不能离开岗位，尽管为了这次惨败而深深地责备自己。

起初，纳赛尔坚持说，他已下定决心辞职；并指出，由于西奈战役的溃败，阿密尔已经声誉扫地，毛希丁是合乎情理的继承人，必须接过这个任务。纳赛尔对他说：“现在你要负起责任，你不能拒绝。”可是毛希丁也同样坚持己见。除了他自己不愿出任总统外，他还说，纳赛尔无权选他为继承人；不错，他是副总统，但这跟继任的问题无关，惟有国民议会才能决定谁应当当总统。

两人就这样争论不休，而在外面街道上，开罗的市民们不断高呼，要纳赛尔留任，继续领导他们。这时，隔壁房间里聚集着内阁的其他部长，等着开会，因为纳赛尔召集他们来举行会议，批准移交手续。最后经过两小时的争辩，纳赛尔让步了，他同意毛希丁发表拒绝担任总统的声明，并由开罗电台立即广播。于是，把这项声明及时地录了音，并派人用汽车把录音带送到电台。可是到了即将广播的最后时刻，纳赛尔又命令电台不要广播副总统的声明。毛希丁是在那天深夜内阁会议结束后才发现这个情况的。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毫无效果。有人通知他，纳赛尔已决定，在明天早晨议会开会之前，不再发表新的声明。

国民议会开会时，议员们一致投票要求纳赛尔留任总统，直到以色列侵略的一切痕迹被清除、被敌人侵占的埃及领土全部解放。这个决议是意料中的结果。纳赛尔接受这项决议后，被赋予全权进行部署，以便“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重新建设国家”。但整个事情却使毛希丁对纳赛尔感到幻灭。他确信纳赛尔这样做是出于一种阴谋，其目的在于使舆论受到震动，从而激起人民来拥护总统，而他自己却成了这个阴谋中被利用的工具；同时他感到非常痛心，因为纳赛尔甚至没有给他一个机会公开声明自己拒绝继任。当国民议会次日照例公布投票结果时，公众得到了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以为毛希丁曾要求当总统而遭到了拒绝。

从也门内战爆发的时候起，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毛希丁同纳赛尔发生了一系列分歧，而这次分歧是最后造成决裂的一次。虽然毛希丁继续担任原职，直到危机消失、埃及部队由俄国人重新装备为止，但终于在1968年春天辞去副总统职位，并且除了在波格达迪的女儿的婚礼上同纳赛尔又见过一面之外，此后两人再也没有会过面。事实上两人的决裂是那么彻底，以致后来黎巴嫩的某些报纸暗示毛希丁即将复职时，纳赛尔立刻怀疑他在阴谋颠覆政府。

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纳赛尔的辞职声明是否是精心安排的一场戏。不过，观察家认为，有一点是肯定的，正如当时许多外国记者所见证的，开罗市民对此作出的反应完全是自发的。同时，无疑地，对于埃及的惨败与所受的剧烈痛苦，纳赛尔深感自己也应负责任。此外，他事先没有跟自己指定的继承人商量这个问题，是他的独断独行与心血来潮的办事方式的又一个例子。这也是可能的。然而，如他发表的声明只是一种计谋，旨在恢复其众望所归的地位，那么他仅仅达到了一部分目的。虽然这个声明可能已使惊愕的公众和议会作出了他所希冀的反应，但未能使他统治下的一部分人民，尤其是已经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中的某些人，重新团结在他的周围，因为这些人现在看得非常清楚，他们一度奉为神明的领袖毕竟不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

大多数埃及人可能忽视了纳赛尔从1959年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但他们不可能漠视他最近这次极其严重的失策。对于沙特人或伊拉克人的拒绝，或者叙利亚的脱离阿联，他们并不怎么关心，甚至对于也门的内战，他们也不十分关注，除了那些有亲属在那里参加战斗的人以外。但是，对于敌人以色列侵占埃及的领土，并使埃及军队遭到屈辱的失败，他们是念念不忘的。

至少资产阶级和学生运动中一部分比较善于思考的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相信纳赛尔的判断力了。因此，虽然纳赛尔将于1968年初再次努力，想使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更能反映出群众的情绪，甚至作出保证：一旦以色列从西奈撤退，就进行选举，组成民主议会；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再也不可能缩小了。

在私人关系方面，“六天战争”带来了甚至更可悲的后果，即纳赛尔与阿密尔之间的关系断绝了。早在叙利亚1961年脱离阿联之后，两人已有些疏远；过了两年，在总司令的职权问题上发生争吵后，彼此更冷淡了；尽管如此，纳赛尔仍然对阿密尔怀有深厚的友情，因为跟纳赛尔的其他同僚相比，阿密尔和他同心协力的日子更长。

从革命成功以来，每次同莫斯科举行重要谈判时，无论是关于武器交易，或者关于修建高坝，或者其他工程的援助，他都委托阿密尔主持。然而当时他知道，即使他本人并不把最近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阿密尔，但他对国家所负

的责任也要求他把总司令撤职。而且，除了西奈战役中伤亡的人数多得骇人之外，现在陆军还受到进一步的耻辱，成为埃及与国外所有讽刺家的靶子。所以，纳赛尔不得不惩处若干负责的司令官，以资儆戒，即使仅仅为了使公众或多或少恢复对武装部队的尊敬，他也必须这样做。

因此，纳赛尔撤掉了阿密尔的一切职务；同时也把空军司令德基·马哈茂德以及其他九个老资格的将军撤职，并对马哈茂德等人以严重失职罪进行审判。但纳赛尔鉴于自己和阿密尔的长久友谊，只通过安瓦尔·萨达特告诉他：如果他立即自动出国，他将不被逮捕。纳赛尔甚至提出，愿意供给他在流亡中所需的无论多少的生活费用。可是阿密尔轻蔑地拒绝了 this 建议。他在回答时以辛辣的语言侮辱萨达特，并说他将在埃及，针对政府与报纸要他承担全部责任的企图为自己辩护。

阿密尔的违抗招致了悲惨的结局。3 个月后，他就和沙姆士·已德朗以及其他大约 50 个军官一起被捕了，罪名是阴谋推翻总统。以后，情报部长萨拉赫·纳斯尔也在此案中被起诉，后来和巴德朗一起被判无期徒刑。纳赛尔已喝够苦酒，不能再容忍了。阿密尔拒绝了他的宽大处理的建议；对于位居总司令的人来说，一旦判罪就无法避免极刑，而根据可以取得的证据，他的定罪是势所必然的。与其被迫签署对一个最老的朋友的处决令，不如在阿密尔受审前让他自尽。

事实上，不管其他阴谋分子的动机可能多么险恶，几乎可以肯定，阿密尔个人的意图主要是想恢复其总司令的职位，而不太可能是图谋推翻总统。他以为自己在陆军中甚孚众望这个事实当时和过去一样对他有利，所以让自己卷入了这个密谋；但以后审讯巴德朗时，在起诉中证明，这是一个反政府的叛逆阴谋。阿密尔没有看清这一点：不管他是图谋推翻纳赛尔，还是仅仅是想官复原职，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在那个阶段，假如他达到目的而重任总司令，那犹如他夺了总统的权，将使纳赛尔的权威荡然无存，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对他非常敬仰的陆军已经分崩离析，落得十分屈厚的地步，以致对他以及其他任何领导人完全丧失了信心。

阿密尔自杀后，纳赛尔取消了第一副总统的职位；后来毛希丁辞职时，就没有任命副总统；直到 1969 年 12 月，原来不怎么显赫的国民议会议长安瓦尔·萨达特脱颖而出，成为纳赛尔的唯一副手。实际上，到毛希丁下野时，以前纳赛尔在革命指导委员会内的 11 个同僚中，只剩下两个了：一个是萨达特，一个是候赛因·沙菲。有人说他们两人之所以能幸存，是因为他们的“船长”——纳赛尔，即使在最猜忌的时刻，也不可能把他们看作对手。

过去纳赛尔常有这样一种表现：当他遭受严重挫折时，就加强“集中领导”，变本加厉地独揽大权。当时也是如此。在“六天战争”之后，他兼任总理，不是挂名而是有实权的。他让法齐将军接替阿密尔任命阿卜杜勒·穆奈姆·里亚德为参谋长，里亚德是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后来在 1969 年 3 月以色列人对苏伊士运河进行炮击时被打死。纳赛尔惟恐法齐企图成为另一个阿密尔，所以亲自控制武装部队，自称最高统帅。他还干预司法，例如当赫勒万的钢铁工人以及开罗与亚历山大的大学生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当局对西德基·马哈茂德以及跟他共事的其他将军的处理过于宽大时，纳赛尔就亲自下令重审，结果把对马哈茂德的判决从 15 年徒刑改为无期徒刑。后来，纳赛尔向一位外国友人承认，1967 年战争后的几个星期，简直是一场噩梦。

在这次战争中，人力与装备都遭到惨重的损失，那些幸存的部队虽未陷在也门的泥坑中，或死在西奈战场上，实际上已没有武器来保卫埃及了。空军已被摧毁，开罗毫无防御；如果以色列人决定从运河向西进攻，陆军将无法阻挡他们。因此纳赛尔拼命设法组成某种抵抗的力量。他把卡迈勒丁·侯赛因召来，要他组织民兵，就是像 1956 年用来骚扰占领塞得港的英国军队的那种队伍。但侯赛因提出一个条件：政府必须准备释放他以前在穆斯林兄弟会中的若干同事，他才同意接受这项任务。纳赛尔对此大为恼火，反驳道：“你以为我现在已经软弱得你可以命令我接受条件了吗？”当时可谓困难重重。

即使面临如此重多的灾难和困难，纳赛尔在他本国人民中以及在阿拉伯世界大部分群众中，仍然是一位英雄。可是在国际上，他现在确已“庸弱无能”了。在 1962 年古已导弹危机之后，莫斯科便不准备冒另一次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危险。这就说明为什么在埃及及其盟邦面临危机时，苏联仅给予略多于口头上的支持。苏联甚至不事先与阿拉伯人磋商，就同意联合国的停火呼吁。波德戈尔内主席同它的总参谋长的确曾在 1967 年访问了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而苏联的海军在当年较晚的时候也曾一再在亚历山大和塞得港以某种力量作友好的示威。但埃及人知道，当苏联人帮助恢复他们战时的损失时，只是以防御的武器去弥补已失去的武器。

意味深长的是，12 月在华沙召开的一次东欧外长会议通过决议说，和平既然取决于以色列人从占领地区的撤退，所有联合国在中东的会员国应当承认这一事实，即每个国家有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并有权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生活。此外，“慢慢地……积累起来的迹象证明，苏联人是在对埃及施加压力，以便通过美国人与以色列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中东一家报纸评论说，“当铁托总统于 8 月访问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时证实了这一点。”

埃及的经济前景也不好。旅游者很少，苏伊士运河封闭了，以色列则占领着能供应它所需要的一半石油的西奈油井。这时，埃及已到了危于累卵的地步。由于苏伊士运河被封锁，敌军屯驻在运河东岸，埃及的税收每年将减少 1 亿英镑左右，所以没有购买军火的经费了，而当时正急需军火来防御运河前线，保卫开罗与三角洲。众所周知，运河的开放，可以获得可观的过境税。但是，以色列坚持认为除非它的船舶被允许同任何国家一样有权通过，否则它将继续封锁运河。

埃及在无奈之下，对此作出让步。这将意味着它领受它没有准备领受的一种新的耻辱，因为这还会引起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轻视和不满。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为了自豪和政治的原因，物质的利益可以置之度外。

阿拉伯各国都懂得了最近的战斗只是长期战争中又一次的战役；他们现在迫切地需要团结，并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而且在数年之内证明他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懂得了如果在保守的和急进的国家之间能消除他们的歧见，这也许是走向正确方向的一个聪明的开始。侯赛因国王早就要求召开一次首脑会议；纳赛尔既然对新的现实十分清醒，也要求召开一次这种会议；但这两人都极端需要资金。喀土穆是那时开会的理想地点，于是 1967 年 8 月便在那里召开了会议。苏丹总理马赫古卜作为东道主是很热心的，早已帮助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就也门的争执达成了一项最后的解决办法。

在这次喀土穆会议上，同意所有的埃及军队都要从也门撤退，而在举行公民投票之前先成立一个过渡的政权。和纳赛尔在 1965 年同沙特阿拉伯所订

的无实效的双边协定不一样，这个新的条约将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部长级 3 人委员会的监督。在会议上，纳赛尔和侯赛因都作了保证：只要阿拉伯国家都愿提供他们一切资源。便继续对以色列作斗争。利比亚、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那样的主要产油国都同意慷慨提供，只要他们并不因此停止向西方国家出口而财政遭到缩减。于是决定了石油出口应当恢复。这时，利比亚、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 3 国分别献出了 3000 万英镑 5500 万英镑和 5000 万英镑 来补偿埃及和约旦因战争而受到的损失。由于埃及的损失比约旦巨大，人口也多得多，所以它在这笔款项中获得 9500 万英镑，或多或少地补偿了已丧失的运河的税收。

从这方面来说，喀土穆会议的结果不仅是成功的，甚至具有历史意义。自从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引起战争以来，20 年来第一次处于直接冲突的地区之外的阿拉伯国家共同承担义务，在物质上支援战区的兄弟国家，而不是仅仅作壁上观，对之欢呼或加以嘲笑。并且，纳赛尔准备为了得到金融援助而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诚然，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再也禁不起在也门保持 7 万人左右的部队，而目的仅仅是为了对英国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退出亚丁。这对他除了在财政上是一个负担以外，他需要这些部队来保卫埃及，防御以色列可能进一步对开罗与尼罗河三角洲的进攻。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认识到，如果埃及同“保守”的约旦人与沙特入联盟，而不是同叙利亚和伊拉克那样“激进而不稳当”的，“不可捉摸”的国家联合，或许终究会得到更大的好处。

关于这一点，在喀土穆会议中辩论如何促使以色列撤出它在“六天战争”中所占据的领土问题时显示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时舒凯里已成为巴勒斯坦游击队中各派的“众矢之的”。他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屡次对埃及与约旦进行猛烈的抨击，痛斥它们背叛了阿拉伯巴勒斯坦的事业。他要求，不管付出多少代价，应该继续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他坚持说：任何打算同以色列妥协的阿拉伯人都应该被称为叛徒。

由于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的代表跟着舒凯里叫嚷，而另一些比较克制的阿拉伯领导人只观望，纳赛尔不得不亲自出马，来戳穿“这种虚张声势的夸夸其谈”。本来，在一般情况下，他会很乐意让费萨尔去驳斥那些人。可是，除了费萨尔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带头反驳之外，纳赛尔还对舒凯里感到非常不满，因为后者显然漠视埃及在“六天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于是，纳赛尔把一切顾虑和盟约都置诸脑后，猛烈地反击批评他的人，以及那些在大马士革的不出席会议的朋友们。他提醒与会者，埃及与约旦在人力和领土方面遭到多少损失；并且讲得十分明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阿拉伯不可能发动反攻。他说，假如要反攻，必须由埃及担任主力军，而由于俄国人已在原则上拒绝供给进攻所需的武器，埃及无法担当这个任务。所以，必须由联合国与各大国在政治上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才能收复阿拉伯在最近的战争中丧失的领土。主张阿拉伯人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的任何说法不过是假充好汉，或者言不由衷。

侯赛因强烈地支持这些论点，于是费萨尔和其他首脑不在保持沉默，通过了一项决议的草案，表示与会者一致同意准备通过外交上折冲来谋求解决被占领土问题。草案中有关的部分讲明：“阿拉伯各国元首同意，要在国际与外交方面共同运用政治力量，力求消除侵略的后果，保证以色列的侵略部队撤出从 6 月 5 日发动侵略以来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然而，舒凯里表示



反对，他说这个声明本身就等于是阿拉伯人的投降。他在伊拉克与阿尔及利亚的支持下，坚持要加上一句限制的话：“上述决议将在阿拉伯各国所遵守的主要原则的范围内加以贯彻，这些原则是：不同以色列媾和，不承认以色列，不同它谈判，坚持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的国家内应享有的各项权利。”

为了求得一致，纳赛尔、侯赛因与其他首脑同意加上这条补充说明。但他们同样讲清楚，他们仍然可以不受约束地通过外交方式谋求和解。并且说，按照他们的理解，“不媾和与不承认”意味着不签订正式和约，不在外交上承认以色列；所谓“不谈判”并不排除通过第三者进行间接的谈判。因此两个月以后，当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探讨和解的方式时，埃及与约旦的代表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以色列应无条件撤出的要求。经有关双方同美国、苏联以及英国代表团在纽约进行持续的幕后磋商之后，英国提出了一项折衷决议，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第 242 号决议。

同时，在这之前，纳赛尔为了贯彻政治上的新战略，已在多方设法补救，使埃及同西方的关系好转。1966 年 11 月，英国外交大臣和阿密尔陆军元帅在苏联一次偶然的会见，终于导致了英、埃双方关于恢复邦交的对话。

事态的发展证明纳赛尔的设想是正确的，这使他十分欣慰。两国正式宣布将互派大使的 10 天后，即 11 月 29 日，英国宣告：亚丁现在独立了，那里所有的英国军队正在立即撤离。更令人高兴的是，次年 1 月，英国首相声明，所有的英国军队将在 3 年内撤出波斯湾，这项声明发表后两年左右，利比亚发生军事政变，废黜了国王伊德里斯，接着英美两国军队撤出利比亚。于是英国在阿拉伯世界中最后残存的一些武装力量已经或即将消失了。

喀土穆首脑会议；曾就巴勒斯坦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纵然纳赛尔的威望因“六五战争”的失败有所影响；但是，他仍然是最有能力来领导阿拉伯国家走向某种解决的领袖。甚至在 1970 年他逝世之后，由于他给予了埃及真正的独立，一个更为健康的社会结构，以及在长期耻辱的附属国历史之后的一种民族意识，埃及仍然是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重大决定时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然而，由于过度的操劳，战争的折磨，纳赛尔的健康情况愈来愈坏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三章 “雄狮死了！”

毕生战斗为国家，廉洁奉公一典型；

壮志未酬公竟逝，举国上下恸哭声。

“六五战争”后，纳赛尔的身体渐渐垮下来了。他不仅体重减轻了 30 多磅，而且更不幸的是，他所患的黑色糖尿病正在引起越来越复杂的并发症，包括糖尿病所导致的神经炎以及心脏病。他的四肢也受到影响，走起路来变得一瘸一拐的。

他生怕自己得病的消息在国外传播，所以拒绝请外国医生诊治：直到 1968 年初，由于他的家属坚持，才请来一位英国大夫。过去他的女婿在英国曾由这位大夫治疗过。护理纳赛尔的埃及大夫则要他出国就医或有更多的休息，但他始终不听这些劝告；直到次年 7 月，纳赛尔的健康状况恶化，他才不得不到苏联去，在一所疗养院里度过了 3 个星期。3 个月后，他体重增加了，看来差不多跟以前一样强壮了。可是大夫们仍然为他的心脏担忧。此后，无论他到哪儿，人们都能注意到，他后面总跟随一辆流动的氧气车，与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总之，由于病魔缠身，埃及的失败所引起的极度忧虑，纳赛尔同以前判若两人。过去他是很自负的，现在不是这样了；过去他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阿拉伯复兴的领袖，现在再也没有这种雄心了。正如他苦笑着向一位友人吐露的，他既无陆军又无空军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怎么能企望成为其他国家的领袖呢。因此，当联合国开始讨论以色列撤出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这个问题时，纳赛尔很乐意让侯赛因国王在华盛顿与纽约作为阿拉伯方面的主要人物。这位国王到美国之前，纳赛尔同他在开罗会谈，要他不必为西奈操心，因为这是埃及的责任。纳赛尔说：“是我使你陷入这个困境的，所以不要把我的损失放在心上；去吻林登·约翰逊的手吧，要求他把西岸归还给你。”……

战争、工作、屈辱及阿拉伯世界内部的争吵……夺去了纳赛尔的健康。在他 1970 年 9 月 28 日逝世前，他还召开了一次阿拉伯首脑会议，为争取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作出了最后的贡献。

在他逝世以前，国际重大事件连续不断，震撼了世界。其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劫持事件，爆发了侯赛因国王和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的公开战争，还有叙利亚入侵约旦，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经过精密策划——进犯约旦的威胁。

对这些事件，纳赛尔总统曾始终不渝地为谋求和平解决而努力。他同侯赛因国王和游击队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意见都有分歧。1970 年 8 月 18 日，即他逝世前 5 个星期，他在亚历山大与侯赛因会晤时就感到，这位国王低估了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竟说几个小时他就能把他们消灭。同样的，当游击队的领袖给他说，他们能在 7 个小时打垮国王，他也认为是错误的估计。他告诫双方：“你们必须共存下去，任何一方都不能够搞掉对方，这是你们双方必须接受的一个活生生的事实。”

---

据外国新闻媒介报道，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劫持了几架来自美国和西欧的飞机，借以要求交换扣押于以色列和西欧国家中的其他游击队员。并使巴勒斯坦问题引人瞩目。1 架飞往开罗的飞机在跑道上焚毁。另外 3 架载有乘客的飞机被劫走，扣在北约旦的“革命机场”。269

他对约旦国王侯赛因说：“你说你能消灭他们。好吧！你说你能够，就算你能够吧！可是得付出过高的代价。经过一场内战，你将损失二三万人民，你怎么来统治这样一个国家呢？你所统治的将只是一个鬼影幢幢的王国而已。”同时，他对游击队员说：“不要认为你对付得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如果国王决心消灭你们的话，他是办得到的。因此，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实力。你们必须争取共存。”

由于他为了在约旦实现和平所作的努力，一个由 10 位阿拉伯总统和国王参加的首脑会议终于在开罗召开。会晤充满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切矛盾。纳赛尔总统在整整 8 天的会议中，扮演了居中调停的和事佬的角色。

这种事往往是困难的。亚西尔·阿拉法特穿戴着借来的科威特斗篷和头巾，被偷偷送出安曼，这样才能参加这次首脑会议。他满怀对侯赛因国王的敌意到会。接着是侯赛因国王亲自来电话要求参加会议，为的是要来驳斥苏丹总统尼迈里谴责他继续制造流血事件的报告。有些人反对他来参加会议。

纳赛尔主张侯赛因国王应该到场，因为首脑会议的目的就是结束杀戮。但是利比亚主席穆迈尔·卡扎菲暴跳起来，说：“找他来有什么用？他是狂人，他是疯子。”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立即反对说：“你怎么能用这种话来批评一位阿拉伯国王？”

卡扎菲答辩说：“那末他的父亲在哪里呢？不是在伊斯坦布尔的疯人院里吗？他是疯子，肯定是疯子。这是这个家族的遗传，他们都是疯子。”

费萨尔请求纳赛尔阻止卡扎菲讲下去，他说：“我们能容忍这种现象吗？我们能容忍我们中间的一位同事，把一位即将参加我们会议的阿拉伯国王叫作疯子吗？”

而卡扎菲却说：“是的，我敢发誓，他是疯子，我们明天应该找几位医生来把他送到疯人院去，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到底疯不疯了。”

纳赛尔笑着调解说：“我看我们大家都有点疯了。我建议找几位医生来看看我们中间究竟谁疯谁不疯吧！”

费萨尔国王说：“好，你说得对，我的兄弟。但是我要医生首先检查我，也许他们查出来是我疯了，那我倒可以不受参加这种讨论的罪了。”

侯赛因前来参加会议时，随带两名官员，都是全副武装。亚西尔·阿拉法特，则在腰间带着一把左轮手枪，卡扎菲也是腰佩武器。阿拉法特指着侯赛因国王叫骂道：“你们看这个罪犯！他先屠杀我们，现在又来这儿开会了。”大家把他的火气按捺下来。费萨尔国王环顾了四下说：“天哪！我们都置身于火药库中了，大家的火气都这么大……”他不愿坐在身佩左轮手枪的任何人旁边，但是他们还是照样带着武器。

据亲临会议的埃及新闻部长海卡尔说，这是一个气氛紧张的会议。但是那些早上准备拼个你死我活的冤家，却以典型的阿拉伯方式在晚上相互拥抱亲吻了。纳赛尔总统经过耐心地说服劝导，争取到侯赛因和阿拉法特之间达成了协议，他们愿意停火，人人为之感到惊奇。这次会议似乎曾充满了愤怒情绪和根本分歧，在外界看来，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纳赛尔经过多方做工作，终于说服了他的争执不休的弟兄们签订了一项协议。这是他为阿拉伯人民作出的最后的一次贡献。长期的操劳和忧虑，使他心力交瘁。

---

侯赛因的父亲塔拉勒国王于 1952 年 8 月退位，在伊斯坦布尔一直隐居到 1972 年 7 月逝世。

关于他的病历，他的好友海卡尔在回忆录中曾作了这样的记载：“他原已积劳成疾。自1958年起就患有糖尿病，并由此引起上腿部动脉硬化。医生劝他戒烟，他照办了，他说：‘我熄掉了最后一支烟，而且答应再也不点上第二支了。我感到这就像刚和一位亲密的朋友告别一样。抽烟是我唯一的奢侈享受，而今连这一点也没有了。’”

“他在苏联接受水疗法的治疗，一度感到大有好转，但他不能遵守医生给他规定的严格制度。医生说 he 应该避免体力和情绪上的过度紧张。可是他对医生说：‘我怎能做得到呢？我的全部生活就是这样。’他的同事们一直敦促他休息，但是他不听。终于在1969年9月11日，心脏病第一次发作了。这次发病，除了约有7个人必须让他们知道外，其余谁也没有通知。对外只是宣布说，他因患严重流行性感冒而将离职休养6个星期。甚至连他的妻子也给瞒住了。

“根据病情，决定向国外求助，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份秘密电报。苏联卫生部副部长叶夫根尼·沙卓夫医生，一位杰出的心脏病专家，率领一队专家来到了开罗。他们的诊断和总统的私人医生是一致的。萨威·哈比卜医生和沙卓夫医生对纳赛尔说，他至少在5年内不能再在俄国接受水疗。于是他意识到自己除了必须忍受腿痛的痼疾外，还必须忍受心脏病的折磨。”

海卡尔介绍说，在病魔的折磨下，纳赛尔曾想到辞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觉得埃及人民会把他的辞职看作是承认失败。纳赛尔仍坚持工作，而且艰苦地和长时间地工作，他一直感到他不可能享有长寿。有人问他是否准备在退休后写点回忆录以度晚年，他回答说，“像我这样生活的人是活不长的。”

在纳赛尔的奔走和劝导下，阿拉伯首脑会议开得很成功。他已筋疲力尽了。他几乎站立不起来了。他告诉朋友们，他将采用一位老农民传授的治疗方法，把两腿浸在热盐水里，以减轻痛苦，再睡它一整天，然后再谈休假的事情。

首先，他必须送别那些和他一起开首脑会议的人物。卡扎菲主席想悄悄地离开，免得过于打扰他，但纳赛尔还是坚持乘车到机场亲自送这位利比亚领袖上飞机。首脑中最后一个离去的是科威特的谢赫。纳赛尔答应妻子及早回家同孩子们在一起吃午饭。随后他再次乘车去机场，并一语成谶地说，他是去作“最后一次送别”。他在机场就感到不舒服。谢赫上了飞机，纳赛尔就吩咐把汽车开过来。平时，他总是自己走过去上车的。他叫他的秘书把萨威医生请到家里。全家都在等他一起吃午饭，他们注意到他已疲惫不堪。他和家里人谈了一会儿，他回到自己房间，说他吃不下什么东西。

萨威医生一到，纳赛尔夫人就离开了房间。她尊重丈夫的意见，每遇有别人和纳赛尔在一起时，从来不在室内逗留。萨威医生检查了总统的身体，看出这是心脏病复发的症状，当即请来了曼苏尔·法那兹医生和扎基·拉姆里医生。他们都是纳赛尔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以来给他治病的专家。经过紧急抢救，他的脉搏开始稳定下来，心跳也接近正常。他开始和3位医生谈话。法耶医生说 he 需要长期休假，但纳赛尔坚持要在度假前到前线去看望“我们的孩子们”。

拉姆里医生和法耶兹医生离开了房间，纳赛尔就是在这个时候伸手去打开收音机的。他听不到他想听的消息时，萨威医生就再次力劝 he 保持安静。他回答说：“大夫，感谢真主，我现在感觉好些了。”

海卡尔说，这是纳赛尔临终的最后一句话。他的眼睛闭上了，胳膊无力地垂了下来。守候在室外的人们觉察到情况严重，就走进房间来了。医生们为了抢救他们这位领袖的生命而进行战斗。纳赛尔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不久，他们曾看到他坐在椅子上吃着他爱吃的白干酪。而这一次他却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只当电击起搏机让3股电流通过他的身体时，才有所颤动。大家希望电流的刺激会使他的心脏再次跳动起来。但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纳赛尔的心脏恢复跳动了。他的心已经破碎了。

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转身向着麦加的方向，跪下祈祷。安瓦尔·萨达特，纳赛尔的继承人，站在床边，仰面向天，念诵着《古兰经》里的经文。面对眼前的一切，作为纳赛尔生前挚友的海卡尔，简直不能置信。眼望着这些医生，他喃喃地念着，“啊，主啊！这是不可能的。”

海卡尔说，在场的人都知道纳赛尔身体不好，但是谁也没有料想到他竟会这样死去。过去他们老是担心他会遭到暗杀。纳赛尔正是中东动乱的中心人物。许多有权势的人与他为敌，不少人想把他赶出政治舞台。但他对个人的安危毫不在意，他总是到人民群众中去。他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现在他平安地死去了。医生们把毯子拉上来盖住了纳赛尔的脸，再去把这一噩耗告知他的妻子。她来到了室内，当人们挨个儿走出去，室内只剩她一个人和死者在一起时，她把毯子又拉了下来，亲吻了他。

内阁和社会主义联盟最高执行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地点就在库巴宫的内阁大厅内。那些正在前线视察部队的部长们匆匆赶来，身上还穿着作战的衣服，他们在研究下一步该做些什么的时候，纳赛尔的座位空在那儿，但室内却到处可以感到他的音容宛在。会议决定把他的遗体移置库巴宫的医院，停放3天后举行国葬。

新闻指导部长海卡尔发布命令：收音机停播一切日常节目，专门广播《古兰经》的经文。人们意识到发生了重大事情，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是纳赛尔逝世。萨达特副总统在一次简短的广播中，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噩耗。顷刻间就引起了惊心动魄的反应。人们从家里涌出来，在黑夜里走向尼罗河畔的广播电台，想弄清楚他们听到的噩耗是否确实。

海卡尔说，自自古以来，埃及人民在感情激动的时刻，总是奔·向尼罗河的。说也奇怪，那天晚上，现代化的通讯广播方式，竟和人们古老的感情行动相吻合了。开始时，街上只有少数几群人，接着就几百、几千、几万，后来街上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广播电台外面，一群妇女尖声地哀叫着：“雄狮死了！雄狮死了！”这一呼声在整个开罗引起了反响，传遍了乡村，回荡在整个埃及。

当天夜里和接下来几天，人们都以无比悲痛的心情哀悼他。不久，人们开始从埃及各地涌到开罗，城里多至有1000万人。当局停止了火车行驶，因为没有地方可供人们住宿，食品供应也渐见短缺。但是人们仍然源源而来，有的乘汽车，有的骑毛驴，有的步行。成千上万的人从别的阿拉伯国家来到了，或乘飞机，或坐轮船。按海卡尔的说法，“形成了一场悲伤的大迁徙”。

纳赛尔逝世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给全世界带来了震惊和悲痛。在安曼，一切战斗停止了。国王的坦克卸下了炮，游击队员们从战壕里跑了出来，高呼着纳赛尔的名字。在贝鲁特，人们向天空鸣炮致哀。在黎波里，卡扎菲主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痛泣，直到第二天才出来。在大马士革，叙利亚总统

哈菲兹·阿萨德痛哭流涕他说：“我们做事情常常像孩子，并且常犯错误，我们知道亏得他来纠正我们的过失，使我们不致造成恶果。”

一位无名氏在埃及作了一首挽歌，歌词叠句是：

永别了，加麦尔。

永别了，亿万人民所热爱的加麦尔。

……

这首挽歌像火一般地在各条街上蔓延开来。人人都在唱它。人民的悲痛情绪受到了约束。5个师的军队开来维持这些送葬人的秩序。但是人潮汹涌，把队伍都冲散了。纳赛尔的灵柩盖满了鲜花，安放在罩着绿绸子的“解放园”的高台上。就在这里，来访的各国首脑，向纳赛尔总统的遗体致以最后的敬礼。

他被安葬在大理石的墓碑底下，上面刻着安瓦尔·萨达特在广播纳赛尔逝世消息时所引用的《古兰经》的经文：

啊，你那平静的灵魂，

欣然回到你的真主身边吧，你已被接纳，

回到我的家里吧，回到忠于真主的人们中间。

1971年1月27日，正在东方国家访问并解释苏伊士运河何以不能无限期停火的埃及代表团，在北京会见了周恩来总理。代表团是由国民议会议长拉比卜·舒凯尔博士和国务部长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扎耶特率领的。中国总理热烈欢迎代表团访华。在双方交谈中周恩来问道：“我有一个问题弄不懂，想请教你们，纳赛尔怎么会死的？”

代表团给难住了。但他又紧追着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代表团回答说：“1918年1月15日。”

“按这样算来，”周恩来说，“他逝世时才52岁零8个月13天嘛。这怎么可能呢？”

埃及代表团成员仍感到困惑不解，回答说，他的死是真主的意志。

“不要把我们做的事情责怪到真主头上，”周恩来说，“这里一定有个道理。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还年轻，52岁可算年轻了。我72岁了，还在工作，你们看，我还健康嘛。我不能想象他怎么会这样早的逝世。他是国家元首，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可以得到最好的医疗。你们怎么会让他死的呢？”

代表团变得沉默了。对周恩来的问题，他们无言可答。最后还是他自己作出了解答：“还是我来给你们解释吧。他是伤心死的，他是心碎而死的。这是超级大国的过错。他们欺骗了他。他们把他推入困境之后又把他抛弃了。他们任凭他心碎。”

周恩来的谈话传到开罗，引起议论纷纷。新闻指导部长、被称为理论家的海卡尔说：“要真正了解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生活和逝世的情况，必须研究他当时工作和斗争的世界局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就被卷进了当时的动荡变乱之中。那些老牌帝国主义正在分崩瓦解。长期分割亚洲和中东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到处都在撤退。老殖民主义

统治者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实行统治了。民族主义和新的思想意识席卷了一度被征服的各国人民。这是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两个新的大国已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美国和苏联正在谋求填补英法留下的真空。到大战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已在掠夺中东权利和石油租让权上，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斗争已经开始了。”

海卡尔说，鉴于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战后美国急欲控制它；但是，作为一个强国的苏联，传统上就对地中海感到兴趣，觊觎那里的温水港。正如尼基塔·赫鲁晓夫惯常说的：“你们是我们的后院。”这就是纳赛尔登上政治舞台时的国际形势。旧的秩序正在瓦解。两个老的强国正在消逝，两个新的主角登上了舞台，一个是利用颠覆手段以达到它的目的，另一个则是利用思想意识。

“这时，影响阿拉伯世界的还有另外两个重大因素。一是表现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民族主义的进攻。二是大量油田的开发以及由此涌出来的巨额财富对阿拉伯世界的冲击。”海卡尔指出，“这项财富，使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剧烈的变化。一些靠石油致富的酋长穷奢极欲，其粗俗下流、放纵无度的程度令人发指。可以看到他们坐着凯迪拉克牌轿车，带着山羊。招摇过市。有人竟把一串珍珠项链套在脚趾上玩弄，还有人把千百万镑的钞票别在衣服上，而且把国家珍宝藏藏在床底下。”

“然而，变成豪富的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的人仍旧是贫困不堪，许多人挣扎在死亡线上。这种新兴的财富和花费它的方式，在这个本来应该团结的阿拉伯世界里筑起了种种壁垒。它筑起了各种新的阶级壁垒，而这些新的阶级壁垒证明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因为有钱的人设法用金钱来收买舆论和权力，并往往取得成功。”

“由于所有这些矛盾的存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乱，而以埃及为最。几个世纪以来，外国人的剥削，地主与股东的代理人的压迫，以及小官吏们的迫害，深深地摧残了埃及人的心灵。人们渴望自由、尊严以及个人与祖国足以自豪的权利。”

“但是，看来希望十分渺茫。”海卡尔说，“法鲁克王高踞在他的皇宫里，仅占人口5%的人占有国民收入的50%。贪污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滋长了，并发展到十分荒唐的地步。政党都茫无方向，漫无目的，统统瓦解了，在埃及既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也谈不到尊严。”

“埃及衰败所达到的严重程度，由以下事实显示出来了。埃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和紧接大战结束之后，是由3个女人掌权管理的。这3个女人，一个是基勒恩夫人，意大利出生，英国大使的年轻夫人；一个是纳哈斯夫人，她也年轻，嫁给了年老的纳哈斯帕夏（华夫脱党的领袖和基勒恩公爵所选拔的总理）；以及国王的母后，纳兹利女王。”海卡尔说，“在那个时期，埃及的统治大权是操在英国大使馆、王室和华夫脱党3者手中，而每一方面都由一个妇人主宰。她们权力最大，地位最高。”

对埃及人的最大侮辱，莫过于1942年2月的事件，英国大使基勒恩公爵向法鲁克王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他任命纳哈斯帕夏为总理。国王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基勒恩公爵调来了一支英国装甲部队，把坦克车开到阿卜丁王宫门前。在坦克威胁下，国王被迫退位。这件事对埃及人的打击是惨重的。一位埃及的君主又一次被迫听从一个外国人的命令。埃及人又一次被迫忍辱负屈。但这件事也大大地触动了陆军中的青年军官，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

尔是其中之一，他就此下定决心，再也不让埃及遭受这样的侮辱。自由军官运动之成为一股凝固不散的力量，可说是在头一辆英国坦克将炮口对准法鲁克王宫那一天开始的。

这就是纳赛尔在 1952 年 7 月 22 日那天晚上所踏进的社会，当天自由军官组织在纳赛尔的带领下夺取了政权。随着一些古老帝国的垮台和新政权的当政，中东正在经历一场革命变化。阿拉伯国家已在力图寻找它们走向独立以及独立以后应走的道路。在埃及进行革命的条件成熟了。这些就是构成纳赛尔一生命运的历史条件，也是使他成为已经失掉的尊严和曾实现的希望的一个象征的历史条件。海卡尔说：“这些历史条件构成了他的一生经历，也促成了他的死亡。”他成了“全阿拉伯人的精神化身，他们的荣誉和理想的保护人”。

“纳赛尔作为一头雄狮，他的一生共有 3 个阶段。”负责撰写他生平的好友海卡尔说，“这就是自由的雄狮、上了锁链的雄狮和受了伤的雄狮。”自由雄狮阶段，一直维持到 1956 年苏伊士被入侵为止。英法和以色列人的进犯，无意中使纳赛尔一跃而成为世界人物。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爵士的愚蠢，不但没有搞垮纳赛尔，反而给了他国际上的威望，并把他推进到埃及疆域以外的世界。他从此也就不再单单关心埃及的事务了。

海卡尔继续说，1956 年后，纳赛尔成为“上了锁链的雄狮”，被苏伊士运河事件推到他身上的权力所束缚了。整个阿拉伯民族都站起来支持他了。输油管割断了，西欧陷入了油荒。阿拉伯世界在变化中，而纳赛尔是这一变化的象征和化身，他是那样深得人心，他不期而然地参预了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内政。在每个阿拉伯国家兴起的纳赛尔式的政党，引起猜忌与不满。这些党派人中有些是不可靠的，他常常多少有些失望地说：“你们知道，我能够掌握我所挑选的人，但我无法掌握挑选我的人。”

这就是他向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所作的解释。沙特在那个时候对他是非常妒忌的。实际上，在阿拉伯领导人中间，他所有的朋友都妒忌他，而他所有的敌人则对他非常恼火。由于他依靠的是同统治阶级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终于在埃及管辖范围之外拥有了一批支持他的群众。他能影响支持他的群众的唯一方法，就是做出榜样。因此，无论在哪里，只要可能，他就为阿拉伯人的权利，而不单是为埃及人的权利而进行斗争。海卡尔说，正因如此，“这就导致他同英国和美国，甚至同苏联都发生了争执”。

海卡尔说：“纳赛尔为阿拉伯团结的观念所束缚，因此他感到对巴勒斯坦人民负有道义上、政治上和思想意识上的责任。他对所有那些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统治驱逐出来而丧失家园的人民，肩负着责任。但是，他憎恶战争。他是从个人观点和民族观点厌恶战争的。”

“尽管他厌恶战争，他仍然是一头上了锁链的雄狮，仍然是阿拉伯团结和抵抗运动的象征，因而当 1967 年危机来临时，他又再一次被迫为阿拉伯人民的利益作出反应。”海卡尔说，“接着发生的事件，使他成为一头受了伤的雄狮。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失败带来了屈辱。他决定辞职，而且也充分准备接受对他失职的审判。但是，人民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行动。埃及人民恳求他留下来，阿拉伯世界的人民恳求他留下来。他们觉得他仍然代表了他们的意志，要他继续领导他们前进，消除这次失败的影响。

纳赛尔接受了他们的裁决。他竭尽全力恢复阿拉伯各国之间的民族团



结，他决心带领人民收复失地，洗刷耻辱。但是，他不能如愿以偿了，他病了，他为沉重的负荷压倒了。正如海卡尔所说的：“他既被套上了锁链，又受了创伤。这些创伤是无法愈合的。”到了1970年9月28日，他终于溘然长逝了。

纳赛尔虽然死了，但他为埃及人民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他为官清廉，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是有口皆碑的。埃及《金字塔报》主编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在《开罗文件》一书中写道：“纳赛尔的一生，始终没有脱离过最初的俭朴生活：他对女人、钱财或者丰肴美食从来不感兴趣。他掌权之后，老奸巨滑的政客们想方设法来腐蚀他，然而都可耻地失败了。他的家庭生活是无可非议的。他总是设法同他的妻子、3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一道吃饭。他们常常坐在一起，一面吃他爱吃的菜（埃及白干酪），一面观看电影——他的唯一消遣。

“至于钱，他收到人们捐献给他的有千百万英镑。他都用于对埃及有益的事业。他死的时候，他的公款户头上存有250万英镑，而他的私人存款户头上却只有610英镑。”

对于纳赛尔的一生，许多政治家、学者写了对他的评价。埃及新闻指导部长海卡尔写道：

“雄狮死了，而他的业绩则永垂不朽。他已把埃及和其余的阿拉伯世界连结起来了，并把整个阿拉伯世界同当前世界和当代思潮连结起来了。他没有能实现他所梦想并为之奋斗的整个阿拉伯的团结，然而他使团结的需要具体化了。在他生前，这种团结业经证明是不可能达到的。但在他死后，它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了。

“纳赛尔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面貌。他改变了地图上的颜色。标志着英国的红色和标志法国的绿色不再填满在那些阿拉伯国家的疆域上了——殖民主义滚蛋了。他还打碎了阿拉伯生活中的封建模式。”

英国著名中东问题专家、曾担任过英国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对纳赛尔一生的评价写了如下的文字：

“阿卜杜勒·纳赛尔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他对埃及的贡献使他得以永垂青史。他使一个在2500年中一直含垢忍辱、饱尝压迫之苦的民族有了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他的成就使一个受腐败的暴君统治、被一支外国军队占领的、落后的、受践踏的农民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对自己的土地享有权利的独立公民的家园。他播下了一个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种子。

“纳赛尔尽管有各种错误和失败，但是他帮助埃及和阿拉伯人民取得了自尊心，而这种自尊心，在他看来，就是民族独立的主要标志。他的老敌手本一古里安，在‘六天战争’之后也感动得说：‘我对纳赛尔非常尊敬。他是一个爱国者，他想为埃及做一些事情。’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尽管在他执政的后期，他和他的人民遭受了种种挫折；但是，如果没有他那种生气勃勃的鼓舞人心的领导，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在精神和物质进步上，都一定会不如现在的。”正是：

万众欢呼纳赛尔，  
古今伟业谁堪比；  
为国为民不辞苦，  
功德长存留天地。

纳赛尔死后，由安瓦尔·萨达特继任总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四章 步履艰难

是敌是友非宣言，患准时节分界线：

口蜜腹剑不足惧，狼子野心揭昭然。

据一些报纸透露，纳赛尔逝世不久，开罗就开始了一场权力之争，安瓦尔·萨达特作为唯一的副总统，自然成为代理总统。在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最高执行委员会中的对手们，企图无限期地推迟总统选举，以期削弱萨达特的权力。萨达特则坚持立即选举。1970年10月5日，埃及人民参加了选举，绝大多数的选票赞成萨达特为推翻法鲁克王朝革命后埃及的第二任总统。

最初，萨达特沿着被“神化”了的纳赛尔的足迹行进。他被看作一个“软弱平庸”的领导者。他的许多同事们背后讽刺他是“纳赛尔的卷毛狗”。还有些人则笑他那一身制作考究的衣着，露齿的笑相，以及他那惩罚以色列和挽回埃及军威的“虚假空洞的誓言”。在国外，萨达特被认为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尼克松总统派往参加纳赛尔葬礼的代表埃里奥特·里查逊向华盛顿提出报告说，萨达特作为总统的任期不会超过4至6个星期。

那时，开罗的观察家们认为，里查逊的预言并非荒谬。因为萨达特从纳赛尔那里接受下来的局面确实是灾难性的。这个国家在军事上蒙受了令人感到羞耻的失败；经济上难以支撑；外交上由于完全仰赖苏联而步履维艰；呈现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是各种险恶的阴谋和权力的角逐。在这充满猜疑和憎恨的气氛中，萨达特在开罗的政敌正在加紧阴谋活动，满心期望干掉新总统的时机的到来。

世界上的人，包括萨达特在开罗的政敌，都大大低估了萨达特。这位后来成为革命家的穷乡僻壤的孩子，这位为了革命事业而尝过多年铁窗风味、具有献身精神的民族主义者，是不会轻易受人摆布的。他对纳赛尔的遗产是既继承又发展，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这和他的出身、经历和从小就养成的“叛逆性格”分不开的。

安瓦尔·萨达特出身卑微。他于1918年圣诞节，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一个僻静的名叫米特·阿布·库姆的小村庄。在政府当职员父亲穆罕默德·萨达特和有苏丹血统的母亲，生了13个孩子，安瓦尔·萨达特是其中的一个。据安瓦尔自己讲，他有过快乐的童年。他家人口多，家境贫寒。这位未来的埃及总统，夜间为了在土坯房里找个暖身之处，就睡在面包炉顶上面。但是，三角洲的土地是富饶的。幼年时代的安瓦尔十分喜爱简朴的乡村生活。萨达特在其回忆录《对个性的探讨》一书中写道：“村庄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幸福的源泉，再无其他幸福可以比拟。当我们出去买胡萝卜时，我们不到胡萝卜小贩那里去买，而是直接到地里去挖；趁家里人烤面包的时候，把洋葱塞进炉膛里，等到黄昏日暮时再掏出来美餐一顿；晚间，在皎洁的月光下，和小伙伴在村里嬉戏，在村子中心的露天土台前谈笑取乐；这时，上有无垠苍穹，我们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安瓦尔的父亲是米特·阿布·库姆村第一个获得教育证书的人。因此，村里人称他为“先生之母”，如此称呼是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安瓦尔最早在当地古兰教师资学校上学。在那里他学会读书、写字，学会背诵《古兰经》。他上学使用的文具只有一块写字用的石板和一支石笔。在教室里，他和同学

们都席地而坐。安瓦尔身着阿拉伯长衫，衫内有一个又大又深的口袋。早上，他把一些面包干和干奶酪装进口袋里，课间就从里面掏出来吃几口。一位善良的老师谢赫·阿布杜尔·哈密德鼓励年轻的萨达特孜孜好学，并具有“笃信精神”。

晚上，每当萨达特躺在面包炉顶上面的时候，他的祖母就给他讲故事，使他听得入了迷。他祖母讲的故事，既不是流传的恋爱趣事，也不是战场奇闻，而是近代历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特别是一些埃及人为了从英国人占领下解放他们的国土而进行的斗争的故事。安瓦尔最喜欢听扎赫兰民谣，这首民谣讲的是一群村民杀死一个残暴的英国殖民者的故事。后来，村民们被抓走，有些人被鞭答，有些人被吊起来，他们的领袖扎赫兰昂首挺胸走向绞刑架。”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某种谬误，”萨达特后来写道，“甚至在我看到英国人之前，我就懂得憎恨那些鞭答和杀害我们同胞的侵略者。”

在1925年，安瓦尔的父亲到开罗的一个邮局工作。他全家都搬到开罗，住进郊外一所小房子里。那儿离国王福阿德一世的库巴宫不远。萨达特成年以后所显示出来的敢于冒险的性格，早在他7岁时从皇宫果园里偷杏这件事就有所表现。在那时，不论是谁，只要偷了皇室的东西都要受严厉的惩处。

安瓦尔·萨达特从小学进入中学。在中学读书期间，他越来越相信，从军是实现其平生夙愿——把埃及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最好途径。因此，他刚一毕业，便申请进皇家军事学院。这段时间的军事训练使萨达特得以形成他的抱负：把英国人从他的国家赶走和消灭君主封建制度。1938年，萨达特从军事学院毕业，被授予埃及陆军少尉军衔。

1939年，萨达特深感高兴的是，他被调至新组建的通讯兵团，驻在开罗郊区马阿迪。这位年仅21岁的军官，以驻地为中心，加紧进行政治活动。在咖啡馆、在军官食堂以及在他父亲的住所，接连举行会议。在1939年至1940年期间，德国的节节胜利和英国接连失败，使萨达特受到鼓舞，从而扩大了联系面，开始接触那些他可以指望他们支持反英武装革命的高级军官。就这样，萨达特和他的同事们逐渐组成一个秘密的军官组织，叫作自由军官组织。

在这之后，萨达特因参与反英活动，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越狱逃跑后，第二次，1945年9月，因参与暗杀一个英国间谍的活动，又被关进牢房。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时，他还被关在狱中。以色列的飞机轰炸开罗，他却蹲在监狱里，这使他感到极大痛苦。他渴望出去战斗，但他毫无办法。在第二次度过两年半的监狱生活，才因“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

萨达特从监狱一出来就立即参加了自由军官团的地下革命活动。

1952年7月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中，他受纳赛尔的重托负责接管电台工作。7月23日拂晓，萨达特前往广播大楼，等到每日诵读《古兰经》的节目一结束，他便代表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革命的诞生，旧王朝的覆灭。7月26日起义部队出发，进抵亚历山大，包围法鲁克国王当时住的夏宫。萨达特又奉命向国王送交最后通牒，命令国王在当天下午6点以前离开埃及。革命政权诞生以后，萨达特一直是纳赛尔的有力助手和革命核心小组的重要成员。

纳赛尔之死使萨达特既悲痛又感到责任重大。为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众所周知，在送葬行列出发前我晕倒了。在革命指挥委员会，我打了5针。当我打了这些针醒来时，就问纳赛尔是否已经下葬。我担心群众会感

情用事地对待他的遗体，这样我们就难于下葬。当时有人对我说：已在 10 分钟之前安葬了。

“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来了。我不能确切地知道那时俄国人脑子里在想什么。我完全忙于新的使命，我看到在我前面有一些重担，有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我前面的图景是令人痛苦的，黑暗的。只有至高无上的真主能襄助我。

“看来，这是普遍的情绪。甚至美国前来参加纳赛尔葬礼的代表理查森，当他回去写报告时，他在报告中记录了对埃及的担心。英国人的情报机构向英国人强调，埃及的形势岌岌可危，一触即发。

“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分歧，但一致认为：我呆在我的这一位子上决不会超过 4 至 6 周，这还是一个夸大的估计。

“我仍然记得柯西金那时的一些言辞。尽管他对埃及深感忧虑，但这些话是亲切和鼓舞人心的。他对我说：俄国将帮助你们，埃及应当继续它过去的政策，我们将始终是你们的朋友，请完全相信这一点。但是，十分明显，当时柯西金以及陪同他的代表团有一种和大家绝然不同的‘姿态’和‘表情’。不过我没有看清这一点，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讲：在这次葬礼中，一切都十分清楚，俄国人是用来对付一个不属于他们的人的。

“这使我瞠目结舌。我回想起我同维诺格拉多夫大使的关系，那是一种为时已久的、持续不断的关系，一种长期的交往。此人了解我脑海中的一切东西，了解我的想法以及我对自己国家的希望。他一定已把这些转达给他的领导。可以肯定，他们很了解我。怎么他们驻开罗大使向他们提供的情况还不能使他们相信：我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真正的埃及人，这是毫无疑问的。

“任何一个人，当他看到埃苏关系中这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时，会感到迷惑不解。非常奇怪，在我同苏联大使交了整整 3 年朋友以后，苏联人还不了解我的真面目。也许这个人对他们讲了，但他们不听他的，或许他们有其他一些耳目为他们观望，有其他一些喉舌给他们传声和作记录，因为俄国人生性多疑，他们不相信对他们最忠诚的人。在这之后，你会感到愕然：那么，他们相信谁呢？

“确实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你不了解你所看到的这种事物的涵义。当他们笑的时候，他们是认真的吗？他们是对着你笑，还是在嘲笑你？

“当时我最大的问题还是埃及的安全。情况未使朋友感到高兴，却使敌人兴高采烈，使它可以随时对我们恣意肆虐……

“至于经济方面，那我们则处于最坏的状况，甚至这种说法也不能表达我所看到的与感到的情况。这使我难过。我把负责财经的哈桑·阿巴斯·扎基找来了。他的看法是，埃及处于完全破产的境地。我对他说：解决办法呢？他用一句埃及的俗语回答说：我拿起这个人的帽子，把它戴在那个人的头上。即他所能做的不是一种科学的解决办法，而在经济上采取一种‘权宜之计’，来堵住人们的嘴，也就是说，他毫无办法。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没法再坏的地步，我们在经济上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十分遗憾。”

为了振兴埃及，加强内部团结，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萨达特下令取消“监护制”，他说：“监护在埃及造成了屈辱、不公以及对人的蔑视。”他命令取消所有的偷听电话，除非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案件。即是这样，也是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行事。不得随意侵犯人权。萨达特一向主张法制，不要凭个人心血来潮行事。1970 年 12 月，他采取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步骤，

取消了国家对私人财产的监护权。这一措施赢得了大多数埃及人的赞许。

然而使萨达特大吃一惊的是，取消监护制的决定，竟使“苏联人火冒三丈”。他们认为这一决定是社会主义的“倒退”，是埃及的“蜕化”，民族的“挫折”。

“而我是根据埃及的实际情况作出这一决定的。因为我像任何一个医生一样，在准备动手术之前，一定要先治疗病人的一些创伤。我要擦干眼泪，治愈创伤。”萨达特说，“因为我不能设想‘如果一个统治者是在统治一个尊严被损伤或者心灵受凌辱的人民’他还能把自己称作一位真诚的爱国的统治者。”

“我知道，他们宁愿继续让人们的伤口流血，让人们义愤填膺，倍感痛苦与失望。”萨达特说，“我还知道，如若不发布这一决定以及随后我在1970年12月20日所作出的其他各项人道主义的决定，那埃及就会出现流血斗争所需的气氛。”

萨达特继任总统后，埃及在对外关系方面还面临两个紧迫问题：一个是怎样挂脱苏联的控制；一个是怎样洗刷1967年同以色列战争失败的屈辱。为了敦促苏联履行供应武器协定，萨达特决定于1971年3月1日访苏。这是他作为埃及共和国总统第一次访苏。他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介绍了埃及急需加强军备的情况。萨达特对这次访问在回忆录中写道：

“3月2日，我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进行了会谈。我当时极为激动。尽管以后我又数次去访问，而我认为，我在这次访问中没有讲出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对他们进行第一次，在我看来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我把一切都讲了，都弄明白和搞清楚了的……”

“他们在这次会谈中说，没有必要打仗，只有和平解决。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不过弱者能谈论和平吗？和平只有通过实力才能实现。如果我变得强大，而以色列人又相信这一点，那我就能通过用战争威胁他们来谈论和平。”

“尔后我对苏联领导人说：现在让我对你们讲讲折磨纳赛尔的事，我开始向他们讲述他们对纳赛尔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向他讲过的每一句话。俄国人认为，他们对纳赛尔所说的话已被这个人记在心里，并带着入土了。事实是，他是被这些话整死的！”

“我不难了解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俄国人的看法同犹太人完全一样——我们是一具僵尸，我们毫无希望了！”萨达特说，“我对于所看到和所听到的按捺不住了，我当着他们的面大发雷霆：我们有分歧！”

萨达特从莫斯科回到开罗后，首先向最高执行委员会通报了他在莫斯科的会谈情况。接着就撤了同苏联关系密切的阿里·萨布里的领导职务，并且直截了当地通知苏联大使，你们今后不再会有一个“在开罗的人”了。萨达特得到的情报使他相信萨布里秘密警察头子沙拉维·戈马和其他人正密谋要杀害他，并要夺取政权。5月13日，他撤了戈马的职。于是引起了一批属于萨布里—戈马集团的政府高级官员辞职。他们原以为这一行动会突然爆发一场政治危机。然而萨达特并不惊慌失措。他干脆接受他们的辞呈，将此消息公诸于世，并把他们全部软禁起来。当晚，萨达特改组了政府，用一批新人

---

阿里·萨布里，埃及前副总统。1920年生于东方省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1952年“七·二三”革命后，曾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副总理，总理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总书记等领导职务。1971年5月由于另立权力中心而被捕入狱。12月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后被减刑，改为25年劳役。

取代那批下了台的密谋者。他确信，这批新人的忠诚对埃及来说是最主要的。

萨达特在谈到同苏联交往的痛苦体会说，苏联领导人“在我背上捅刀子”，一再拖延不给埃及他们答应给的武器。他还说：“苏联从一开始就宣布它给我们的武器不应被用来反对以色列”，“苏联人的目的就是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埃及”，妄图长期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便于它们和另一个超级大国在中东地区进行争夺。

萨达特的果敢行动，引起了苏联领导集团的严重不安。突然他收到苏联的电函说，波德戈尔内主席要访问开罗。于是苏埃之间的领导人进行了既尖锐而又有趣的谈话。萨达特说，“为了历史，我现在极其详尽地记录我同波德戈尔内的谈话”。现笔录如下。

波德戈尔内：我来是因为我想在我们之间签署一项条约。

萨达特：奇哉！怪哉！你难道不记得我曾去你们那儿要求搞一项条约？在我之前，纳赛尔也曾去你们那儿要求搞一项条约。你们拒绝了我和他的要求。怎么回事？再者，现在搞这项条约，同我在这之前给你们写信说我将清洗萨布里一事有什么关系？我已通过你们驻这里的大使给你们捎信，说我将免除萨布里的一切职务，你们驻埃及大使未将此事报告你们吗？

波德戈尔内：大使把全部情况都报告我们了。

萨达特：你们相信西方报纸所说的萨布里是莫斯科的人吗？

波德戈尔内：不。

萨达特：那么，你们为什么要缔结一项条约？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忠告。我是直爽的人，我提前一个月就将清洗萨布里的决定捅给了你们，原因是我切望维护埃及同苏联之间的友谊。我不太了解你们的意图。再说，你们是生性多疑的人，你们不相信最向着你们的人对你们说的话。也许，你们相信这些在人民当中毫无影响或在群众中间毫无地位的人。我有一个忠告，希望你接受，那就是将缔结这项条约的事推迟到7月23日。

波德戈尔内：为什么，

萨达特：7月23日，社会主义联盟将自下而上全面地进行选举，将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将向你发出正式邀请。我现在就邀请你在召开这次新的代表大会时，我们缔结这项条约。我现在就跟你讲定了，我是说到做到的，你们知道我不撒谎。你看怎么样？

（此人试图使我改变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但我没有顺从和讨好他。我毫不夸张地说，此人当时是以一些奇怪的方式在进行乞求。）

波德戈尔内：政治局已经开了会，苏共中央委员会也已经开了会，他们都赞成我提出同埃及缔结一项条约的要求；西方对苏联在埃及的处境的幸灾乐祸已经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你对于我们在此的处境以及西方报纸的报道感到高兴吗？

萨达特：天哪，我真不知如何是好。这项决定，在发布之前就告诉了你们，我对你们坦率的，我一点也没有对你们隐瞒。决定已经发布了，事情已经完了。

波德戈尔内：又喋喋不休地讲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讨论的情况。（不难看出，西方报纸突出地报道了波德戈尔内的这次访问，人们把他放在一些漫画中，画的是正在检阅那些都已穿上囚衣的权力中心的人物！）

萨达特：如果这个协定缔结了，你们就放心了？

波德戈尔内：是的。

萨达特：通过这一条约·纳赛尔走过的、使他和我心碎的荆棘丛生的道路就到头了？

波德戈尔内：是的。

萨达特：我还要提醒你注意我在莫斯科说过的一切，你们驻开罗大使报回的一切吗？

波德戈尔内：不用了。

萨达特：纳赛尔所遇到的、并使他送了命的头痛情况，后来我又遇到的这种情况，还能重演吗？

波德戈尔内：一切都过去了，我们正在揭开新的一页。

萨达特：我们正在揭开新的一页？这新的一页中有什么？

波德戈尔内：有你所要的一切，过不了四五天，你就会得到你在3月份提出的全部东西。

萨达特：全部东西？

波德戈尔内：是的，全部东西。

萨达特：好，托真主的福。

谈到这里，埃及总统随即按了一下电铃，请将外交部长马哈茂德·里亚德叫来，并对他说立即着手草拟一项同苏联的条约，以便提交人民议会。这一来可把里亚德吓坏了只好再问：“阁下，是一项条约吗？”总统说：“是的。是一项条约，明天就要签字！”

也许，此时此刻在开罗，没有人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想到苏联人会要求缔结一项条约，而萨达特总统又这样痛快地应允并同意签署。但是，这确实发生了。萨达特后来说：“那是一个新的机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提供的是什么，我们因此得到的报酬是什么！”

然而，更加茫然失措的是波德戈尔内主席。萨达特告诉他，明天双方就在库巴宫大厅里签署这一条约。不过埃及总统最后一次诚恳地对苏联客人说：“听我的忠告吧。选择这个时间是错误的。你们给人们的印象不好，因为这意味着是这些人在保护你们的利益，你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你们只有通过这项条约才能得到安全。错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选定的时间是错误的，你们的形象是错误的。”但是，波德戈尔内没有听取这一规劝。于是草拟了条约，由埃苏外长里亚德和葛罗米柯切磋琢磨。条约写好了。报纸、电视和电影的摄影师来了。在许多照相机、摄像机面前，即在数百万人面前，苏埃两国领导人拥抱了。摄下了镜头，在全世界的报纸和电视上转播。

在这之后，萨达特问波德戈尔内：“你现在放心了吧？苏联人在埃及的利益，正如你们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领导所希望的那样，有了保障了吗？”苏联这位领导人说：“完全是这样。”并要埃及人确信，他们所要的武器保证四五天就运到。

波德戈尔内主席走了，他的皮包里装着一项同埃及的友好条约。苏联领导人认为，这项条约是埃苏之间友好关系的一个新的保证。苏联报纸认为，这是俄国的成功，美国——它企图通过罗杰斯访问埃及“在两国的牢固关系中打下一个楔子”——的失败。

同时，苏联人认为，在清洗了他们在台上的人之后，这项条约表明，苏埃之间的关系不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是同家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比个人更长久、更重要的关系。

当时读苏联报纸的人都发现，苏联人对这一结局或这一开端感到高兴。



尽管萨达特也感到某些宽慰，可是他的忧虑并没有减轻。因为他有同苏联人打交道的长期的、丰富的经验。但他开始自我安慰。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已确定 1971 年为决定性的一年。全世界和苏联人都知道，埃及想决定的是什么，他们要求苏联人做什么事情帮助他们正在从事和着手进行的事业。

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萨达特已把所有的事情摊开，他向莫斯科交了心，让他们知道了他的全部秘密。而且一些政治评论家注意到，萨达特在欢迎波德戈尔内宴会上所讲的这些话：“我们希望让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准备放弃领土或权利，来换取一种海市幻景。同样，甜言蜜语不能表明它所包藏的意图是真诚的。”

萨达特感到满意的是，他想在全世界面前向苏联人强调的一些意思已经讲透了。他说：“我只是希望苏联人了解我，在我的人民和世界面前赞赏我的立场，并使友谊和一些动听的言词成为事实，而不是用来吊吊胃口，其后又不给食物。”

正像萨达特所担心的，波德戈尔内一回到莫斯科就变卦了。他所答应过的“过了四五天你就会得到你在 3 月份提出的全部东西”也不算数了，事实证明，5 月 27 日苏联和埃及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是个政治骗局。苏联的真实用意在于，用不兑现的武器支票，换取埃及同意用条约的形式将它在埃及攫取的特权固定下来，并欺骗世界舆论。嗣后，埃及多次催促苏联履行诺言，及时运送武器，以抗击以色列侵略者，但苏联一味敷衍搪塞，萨达特后来追述说：“我提醒苏联人，波德戈尔内曾讲过，我将在几天内得到一切东西。而苏联大使却是重复那些我熟悉而单调的话：“苏联领导人在克里米亚（休假）。’我再次提醒他，我们之间有条约。他又回答说：‘领导人在克里米亚。’我问他，我该怎样向埃及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交代。他再一次回答说：‘在克里米亚。’”

萨达特对此十分气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至于我应该做什么，那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必须考虑自己说过与许诺过的一切，我必须找到一种适当的方式来向人民交待。向人民讲苏联人的情况吗？揭露这种关系吗？如果我那样做了，就会直接损害苏联人。我那样做对埃及有利吗？再则，我能忍辱负重到什么程度呢？我能竭力忍受，我很有耐心；但是我担心我的这种耐心会耗尽，因为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我无法控制的愤怒状态。可是，埃及呢？为了埃及，一切都不计较。许多对我来说颇为珍贵的东西，都没有认真对待，甚至为了埃及我的尊严也无所谓了。我无视自己的尊严，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许多对我和我的政权的诽谤。我每天都感到，他们不是在治疗伤口，而是在伤口上放盐。”

10 月，萨达特眼看他所宣布的反抗以色列侵略的“决定性的一年”——1971 年快过去了，而苏联的武器仍未到达。为了催促苏联履行诺言，他便再次亲自前往莫斯科。波德戈尔内称病不见，改由勃列日涅夫出场。会谈时，勃列日涅夫竟然责问萨达特：“你为什么宣布这一年是决定性的一年？”他诱劝萨达特以更多的时间作出所谓“和平的努力”。萨达特忍无可忍，宣布要将所谓帮助训练埃及官兵操纵反低空飞机的 18 座萨姆—3 型导弹发射器的苏联专家遣送回国，勃列日涅夫大叫嚷，这意味着“埃及要取消苏联在埃及的地位”。他允诺 1971 年底前将武器运交埃及，同时提出准备再向埃及提供 18 座萨姆—3 型导弹发射器，条件是必须保留苏联在埃及的专家。萨达特信以为真，回到埃及后加紧战斗部署。从 11 月起，萨达特亲自掌握埃及武装部

队的直接指挥权，他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军事和政治顾问共同拟订了同以色列作战的具体计划。

在埃及加紧备战的时刻，苏联却有意拖延武器运送。12月中旬，萨达特写信给苏联领导人向他们指出，1971年只剩下15天了，至今没有接到任何有关军火已经运出的通知。他要求赴苏会谈。但是苏联有意拖过1971年后，才复告萨达特访问日期安排在1972年2月，埃及在“决定性的一年”反抗侵略的计划，由于苏联的阻挠破坏，终于未能实现。

1972年，埃及人民要求摆脱苏联控制·反击以色列侵略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在广大军民爱国热情的推动下，埃及政府决定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打破“不战不和”的僵局，发动一次打击以色列侵略者的有限的战争，以军事上的优势获取政治上解决中东问题的有利条件，促使以色列撤出它所侵占的阿拉伯领土。萨达特于1972年2月第三次前往莫斯科。在埃及力争下，苏联佯称同意向埃及提供一些武器，柯西主还担保他将亲自监督运送这些武器。但是柯西金的“担保”和波德戈尔内的“诺言”一样，都是骗人的鬼话，过了很久，埃及仍然看不到苏联武器的影子。

1972年5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出访莫斯科，美苏举行高级会谈，双方达成协议，力图把中东问题“冻结在冰箱里20至30年”。勃列日涅夫还向尼克松保证，他们在中东将不采取任何惊人的新的主动行动。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发表声明，要在中东实现“军事缓和”。

6月1日，萨达特写信给勃列日涅夫，希望明确回答苏联是否打算提供它一再答应运送埃及的武器，并且要求苏联澄清在中东的政策。6月15日，苏联送给埃及一份关于美苏最高级会谈的报告，对埃及提出的问题避不作答。苏联领导人无视埃及人民的权利、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的霸道行径，激起了埃及人民的极大愤慨。萨达特总统愤怒地向苏联大使指出：“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3月骗了我；波德戈尔内在1971年5月骗了我；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10月骗了我；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耍的把戏吗？你们同美国人商定：中东无战事。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无权充当我们的监护人。”

然后，萨达特当着苏联大使的面，宣布结束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埃及的使命，埃及军事部门中所有21000名苏联军事人员，除以训练为目的留在埃及的技术人员外，从7月17日起的10天内离开埃及，苏联在埃及领土上建立的一切设施和军事装备移交埃及管理使用。埃及宣布驱逐苏联军事人员的决定以后，苏联又提出要在埃及国防部内为苏联“首席专家”保留一个有80人的办公室。“负责监督合作和训练事务”。埃及看出这是“穿上另一件外衣的军事使团”，坚决予以拒绝。苏联的军事人员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然而，苏联、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等有关各方，大多数人误解了萨达特赶走苏联专家的动机。他们以为，撵走了苏联人即意味着萨达特放弃了同以色列再打仗的想法。萨达特可不是那样想的。他感到，那些认为埃及在军事上永远也不可能战胜以色列的苏联人，正企图驾驭他，不让他再同以色列打仗。尽管萨达特仍然愿意采取外交的解决办法，但是不论是以色列还是其同伙美国，都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给敌人以打击的时候到了，”萨达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重新开战现在已经不可避免。”

萨达特继纳赛尔任总统以来，面临着国内外严峻的形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相当困难的，可谓步履维艰。但他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毅然决定驱逐苏联军事人员，这对苏联在埃及和中东的扩张，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这

为打破“不战不和”的僵持局面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为了收复失地，重振埃及，萨达特加紧备战，并深入地进行全民动员，一场新的反击以色列的战争就要开始了。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游击队“法塔赫”也在积极开展打击以色列占领者的活动。欲知“法塔赫”的崛起，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五章 “法塔赫”的崛起

阿拉法特英雄汉，“法塔赫”军非等闲；  
前仆后继浴血战，重返家园定实现。

巴勒斯坦游击队“法塔赫”，是在20世纪60年代着手组建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它的武装力量称“暴风”部队，开始只有几个人，后来发展到7000多人。这个组织的目标是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上消除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整个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法塔赫”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1929年生于耶路撒冷。逊尼派穆斯林。1948年参加第一次阿以战争。1949年停战协议签订后，举家移居加沙。曾在开罗大学及埃及军事学院学习，其间曾任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在埃及军队中当过尉官。1956年在塞得港和阿布·卡布尔地区参加反击英、法、以三国侵略的战争。1959年在科威特秘密筹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及其军事机构“暴风”部队。1965年1月“法塔赫”。“暴风”部队开始了武装斗争。1965年“六五战争”前，多次在以色列占领区领导作战。

1968年在卡拉梅战斗中，指挥约旦和巴勒斯坦武装共同抗击以色列。

1969年2月，在巴勒斯坦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上当选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

1974年11月率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出席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

1980年5月、1983年7月在“法塔赫”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暴风”武装部队总司令。1982年2月再次当选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

“法塔赫”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诞生、是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为了组建这支人民武装，阿拉法特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当时几个巴勒斯坦热血青年，决心拿起武器，但是他们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阿拉法特利用自己工程师的身份和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的方便，首次募集了两万英镑（只要有人来公司申请订立工程合同，亚西尔就向他募捐），借以解决燃眉之急。后来阿拉法特干脆定了一条规矩：“要想签订合同就得以利润的百分之几捐给巴勒斯坦解放委员会。”后来阿拉法特就是用这种办法又为“法塔赫”筹集了6万英镑，并吸收了許多人参加了解放委员会。

为了进一步宣传“法塔赫”的主张，动员人民拿起武器收复家园，1959年阿拉法特又创办了一种名为《我们的巴勒斯坦》的四开的传单报纸。主要刊登流亡科威特的巴勒斯坦人的“亲身经历”，揭露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的暴行，这张报纸还经常刊载阿拉法特撰写的不署名的社论和一些巴勒斯坦诗人写的战斗诗篇。

开始，这份报纸本来只打算为旅居科威特的巴勒斯坦人服务，但报纸发行之後取得了极大成功，使得大批新的成员加入了解放委员会。于是阿拉法特制定出计划，打算通过北非各阿拉伯国家难民营发行他的报纸。

报纸问世大约6个月之后，阿拉法特来到贝鲁特。他走访了各难民营，组织了一个发行网。在那里，他见到了从德国到达贝鲁特的卡立德·哈桑和

萨拉·卡莱夫。

1960年夏天，他们正式着手建立“法塔赫”组织，并决定在巴勒斯坦人侨居的国家建立3个分部：一个在德国，由卡立德和萨拉负责；一个在阿尔及利亚，由卡立尔负责；一个在科威特，由阿拉法特负责。阿拉法特主要的任务仍是筹集经费、出版报纸和在难民营中建立“法塔赫”基层小组。

通过对难民营的访问，进一步提高了他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他说：“这次旅行之前，有人指责我是一个政治眼光短浅的人。这话说得对，我的确是这么一个浅薄的人。我去过加沙的一些难民营，去过黎巴嫩的一些难民营，可我从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从没有真正地体会到犹太复国主义者迫使我的许多同胞忍受着怎样的折磨和屈辱。的确我已经参加了解放运动，但我的目的并不明确，只是在这次旅行当中，当我亲身体会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磨难时，我的方向才明确起来，不管犹太人如何为以色列的存在辩护，不管犹太人在欧洲受到过怎样的迫害，我只知道犹太人正在用纳粹迫害他们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因此我们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1962年初，阿拉法特使用募集的经费，将《我们的巴勒斯坦》扩充为每期48页的月刊。因为贝鲁特的印刷设备比科威特好，他决定在那里印刷这份杂志。1962年到1963年，他每月去黎巴嫩首都一次，将杂志的稿本送去付印。改进后的《我们的巴勒斯坦》的发行量大大增加，凭借这份月刊，“法塔赫”先是在阿拉伯世界，然后在旅居外国的巴勒斯坦人中间，逐渐成了新兴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喉舌。对动员人民参加解放斗争发生了重要影响。

“法塔赫”游击队在阿拉法特等人的领导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积极投入武装斗争。他们埋设地雷炸毁以色列占领军的军车，并经常袭击以军哨所、碉堡和其他一些重要军事设施。

在战斗中，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发扬了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巴勒斯坦游击队前领导人之一的卡迈勒·纳赛尔被以色列侵略者杀害后，他的母亲写道：“我爱你啊，我的儿子。你用世界上最纯洁的爱情热爱祖国。我骄傲，我激动，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战士的母亲。”一位烈士的父亲，儿子牺牲后，他不流泪，不悲伤，不叹息，更不卑躬屈膝。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坚定地表示：“我的儿子牺牲了，我的孙子继续上战场；一个战士倒下了，千百个战士继续前进！”

有一首诗忠实地记录了巴勒斯坦人民可歌可泣的战斗生活，形象地反映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心。这首诗写道：

坚持战斗！坚持战斗！  
哪怕他们抢走我的粮食，我坚持战斗！  
哪怕他们杀死我的孩子，我坚持战斗！  
哪怕他们摧残我的房舍，啊！我的房舍，  
在那残垣断壁下，我还要坚持战斗！  
……  
即使一只手被砍断，  
用另一只手高举战旗，我坚持战斗！  
哪怕是遍体鳞伤，  
带着累累伤痕，斑斑血迹，

我还是要坚持战斗！

……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处境是十分艰险的。他们不仅经常遭到以色列当局的“清剿”和“扫荡”，而且由于抵抗运动对以色列的袭击，经常引起以军对周边国家的武装报复，周边国家有些领导人，就把“法塔赫”看成是“惹事生非”的武装集团，并对他们采取封锁、限制甚至“武装消灭”的政策。

为了打破这种孤立的处境，1966年春天，“法塔赫”组织派出代表，试图和埃及当局接触。那时，埃及情报部门认为“法塔赫”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而穆斯林兄弟会在1954年因它的成员企图暗杀阿卜杜勒·纳赛尔而被埃及当局解散并停止了活动。这种看法使得起初的接触没有产生结果。

1967年初，“法塔赫”又第二次派出代表，通过纳赛尔好友、《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的引荐，终于会见了这位风云一时的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他们一见面，阿拉法特和他的两位战友就把手枪在一把椅子上。纳赛尔笑着说：“根据我们情报人员收到的一封来自科威特的信，说你们3人在这儿来是为了暗杀我。”阿拉法特他们3人抗议说，这封信完全是某些人搞的离间埃及和“法塔赫”的一个阴谋，当时纳赛尔解释了他对巴勒斯坦运动的看法。他说，他认为埃及和抵抗运动没有产生任何矛盾的理由。“我们已接受了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尽管我们对这个决议将带来什么不抱很大希望，因为这个决议如能正确地执行，可以实现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要求；至于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埃及知道这个决议不能实现他们的要求，你们完全有权不接受它。”纳赛尔又说。“没有理由要求你们不公开反对这个决议，因为它不是为你们制定的。”

“要是你们能够代表巴勒斯坦人民，代表巴勒斯坦的抵抗意志，在政治上通过你们的参加，在军事上通过你们的行动，我将感到无法形容的幸运。”纳赛尔继续说，“法塔赫应该完全独立于所有阿拉伯政府之外，尽管它应该同阿拉伯政府协调自己的行动。……你们应该成为我们不负责任的武装，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向你们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援助。”

会见进行得很好。在那以后，埃及当局开始同“法塔赫”协调自己的行动，在训练它的成员及向它提供武器方面进行合作。“对这一发展，约旦人是不高兴的，”埃及国务指导部长穆罕默德·哈桑宁·海卡尔说，“有一天他们发现在抵达安曼机场的飞机中有两架装载着运给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人员的武器，侯赛因国王不只一次地派他的首相巴赫贾特·塔勒霍尼来开罗抱怨埃及向抵抗运动提供援助。”

1970年9月初，侯赛因国王和抵抗运动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看来他们之间的冲突已迫在眉睫，为了调解这一纠纷，作为第一步，纳赛尔先派埃及参谋长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萨迪克中将带一封信去安曼、在信中提醒侯赛因国王注意纳赛尔曾向他提出的警告：不要进行任何取消抵抗运动的尝试，并使其相信，“在约旦发生一场内战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我们落入以色列人和美国人设置的圈套之中”。萨迪克将军去了，他带回了这样的印象：侯赛因国王企图赢得时间，他的家族成员和侍从中有许多人正在把他推向与抵抗运动的一场决定性的对抗。

侯赛因国王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态度，引起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严重不满。当时，局势急转直下，叙利亚人通过约旦边界往拉姆萨派了一部分坦克。

叙利亚总统努尔丁·阿塔西来到开罗，他带着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方面要用武力干涉安曼的明确愿望，当时的气氛已是剑拔弩张。纳赛尔发现必须就此召开阿拉伯国家国王和总统的最高级会议。9月23日，最高级会议在开罗召开。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与会者的看法中有两种倾向。有一些国家首脑，如卡扎菲、尼迈里等认为，必须把侯赛因国王放在被告席上；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召开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停止屠杀。经过纳赛尔会上会下多方斡旋、劝导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不仅调和了约旦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冲突，而且也进一步加强了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团结，为巴勒斯坦解放力量的发展壮大，特别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发挥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巴勒斯坦游击队在战斗中诞生，在战斗中发展，在战斗中成长。

经过了几年的准备，阿拉伯军民要开始反击了。他们要洗雪耻辱，要收回以色列人抢走的土地。一场新的战争就要开始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六章 准备反击

外交解决已无望，“不战不和”为哪般？

加紧战备雪国耻，誓复山河重开战。

苏联、西方和以色列等有关各方，大多数人误解了萨达特赶走苏联专家的动机。他们以为，撵走了苏联人即意味着萨达特放弃了同以色列再打仗的想法。但是萨达特可不是这样想的。

他感到，那些认为埃及在军事上永远也不可能战胜以色列的苏联人，正企图驾驭他，不让他再同以色列打仗。尽管萨达特仍然愿意采取外交解决办法，但是不论是以色列还是其同伙美国，都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给敌人以打击的时候到了，”萨达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重新开战现在已经不可避免。”

首先，萨达特决定1972年11月15日为向占领西奈的以色列军发动进攻的日子。但是，当他的国防部长令人失望地表明他无力胜任、他的部队也没有按时做好准备时，萨达特只好再一次推迟了收复失地的战斗。这是明智之举。他任命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将军为国防部长，任命萨阿德·沙兹科将军为参谋长。阿里和沙兹科等人很快地完成了他们的前任所忽视了的防务准备，并且着手制订了一个进攻方案。

驱逐苏联专家一事，使得开罗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张。可是萨达特仍然需要苏联的武器；而苏联尽管蒙受了耻辱，也不想放弃它对这个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投资。1973年3月，萨达特派阿里去莫斯科。这位国防部长“在莫斯科成功地谈妥了一笔迄今最大的苏埃军火交易”。出乎萨达特的预料，协议中的某些武器居然如期交货了。“其余的武器，则按照苏联惯常的做法卡住了，一直到他们不再需要时才交货。”

为了做好战斗的准备，萨达特尽力保持同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同家的联系。这些国家对埃及要把以色列从被占领土赶走的目标给予支持。他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秘密商议在反对以色列的联合军事行动中协调一致。萨达特和阿萨德一起把发动进攻的日期定在10月6日，即犹太人的赎罪日。那天，以色列所有的公益服务性活动将全部停止。

在1973年的5月和8月，萨达特分别下令采取民防措施，对以色列施以疑兵之计，使之认为战争已迫在眉睫。这两次都使以色列不得不下令实行全面的军事动员。但萨达特并未打算采取行动。夏大的几个月，他访问了许多作战单位，鼓舞将士们的斗志。他对他们说：即将爆发的这场战事不会是轻而易举的。埃及战士必须攻破一道水域的障碍，即苏伊士运河，然后穿过以色列修建的14米高的以色列工事以及被认为是攻不破的巴列夫防线。巴列夫防线是一道非常先进和具有强大防御能力的防线，是根据以色列将军查姆·巴列夫的名字而命名的。萨达特对他的将士们说，只要埃及军队能跨越运河进入西奈，哪怕只是解放了一部分埃及领土，也可为1967年的败北雪耻。

在1973年的9月下半月，埃及的地面部队和空军完成了最后的训练演习。同时，海军部队启航开往他们的战斗岗位。

10月1日，萨达特签署战斗命令：做好一切准备。苏联领导人在10月3日接到作战计划时，对埃及人缺乏信心，急急忙忙把苏联的文职人员撤离埃及。载着军火的船只也从埃及港口开走了，但是确信埃及已做好战斗准备的



萨达特却是轻松自如，满怀信心。他盼望着 10 月 6 日这一天，埃及将不仅收复失地，而且还要重振军威。

许多人认为，萨达特总统是一个“内向的人”，比起胸襟开阔的纳赛尔，要难以捉摸。不过，在开战之后，萨达特确实曾经向一名西方朋友透露了不少心事。“从纳赛尔逝世后我接任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必须开战。纳赛尔也知道，我们必须战斗。这是我继承下来的事业。不过铁窗生活教训了我，凡事要忍耐。”因此，萨达特愿意给美国和联合国一个机会。“我在 1970 年和 1971 年时对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略怀希望。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从我这里索要更多的让步，而没有从以色列那里获得任何答复。”萨达特开始懂得这是为什么了：“罗杰斯认为我们决不会战斗，以色列也认为我们无力进行反击。西方认为我们是没有优秀将领的次等士兵。”

骄狂自大的确是以色列拒绝完全撤军的一个因素，但是以色列还怀疑埃及首脑们是否真的要求和平。以色列一直要求“全面和平”，包括和解以及签订承认以色列全部主权的“和平条约”。最初，以色列指出，纳赛尔所准备提供的方案只是结束战争状态，叙利亚则什么也没提供。后来，埃及建议达成一个“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和平”，承认以色列主权，却没有提到建立友好关系，后被以色列拒绝了。

埃及所伸出的每一株橄榄枝，几乎都提到“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在以色列看来，每一次提到巴勒斯坦人，都是给以色列“增添烦恼”；但在埃及看来，这样提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任何不能为巴勒斯坦人所接受的和平解决，都是脆弱的。

在 25 年中，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两度被以色列的“军事胜利”赶离家园。1948 年一次，1967 年又是一次。到了 1973 年，巴勒斯坦人一共有 200 多万，而其中大部分是在他们自认的故乡以外的土地上过活；60 万人住在难民营。年复一年，他们始终不能收回自己的土地，回到自己的家园，于是有一些巴勒斯坦团体转为采取暴力手段和进行游击战争。巴勒斯坦战斗团体和某些阿拉伯政府之间存在着摩擦。约旦在 1970 年对巴勒斯坦游击队进行了一次“血腥大镇压”，促成了巴勒斯坦最极端的团体——“黑九月”的出现。“黑九月”这个名称就是为了纪念那次血腥事件。可是，最出名的暴力行动都是针对以色列而进行的，特别有名的是 1972 年 9 月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劫持并杀死了以色列运动员。以色列指责阿拉伯国家，说他们不该容忍这样的行动。

而阿拉伯国家也为以色列在占领区内建立居民点而感到愤怒。在 1967 年和 1973 年之间，以色列一共建立了 40 多处居民点，平均每一处有 100 多居民。大部分设在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也有一些建立在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在 1971 年 12 月说：“这些居民点是建立在将来会成为以色列国土的那部分领土之内的。”

萨达特对于外交解决逐渐失掉信心，“不战不和”的压力也在摧毁着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1971 年 8 月，叙利亚与约旦断绝关系；过了 6 个月，埃及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侯赛因建议，将约旦王国改变为联合阿拉伯王国，这个王国共包括两个地区。约旦地区的首府是安曼，联合王国的首都也是安曼；巴勒斯坦人自己也有一个地区，首府是耶路撒冷旧城。

---

从 1942 年到 1945 年，青年萨达特因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反英斗争，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入狱。

侯赛因的方案遭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同时拒绝。对以色列来说，这个计划意味着要放弃过多的占领区，特别是耶路撒冷旧城；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所获过小。这也引起埃及和叙利亚的警觉，因为侯赛因提出这个计划，意味着他可能同以色列订立一个单独的和平条约，甚至置第二四二号决议案于不顾。从政治上考虑，萨达特别无选择，只好与约旦断绝关系。

但是，埃及军民要求开战的呼声甚炽。为了缓和群众的情绪，1972年1月25日，萨达特在学生、教授、工会领袖的一次集会上保证，他已经作出了对以色列开战的决定，目前正在加紧准备。与此同时，萨达特还发现，美苏正在加速和解，他感到利用超级大国对抗获得好处越来越难了。这一情况，增添了开战的紧迫性。要进行战争，埃及首要的是武器，可是当萨达特2月2日前往苏联时，他又失望了。他见到苏共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以及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人。他要求他们供给新式进攻武器。他们拒绝。萨达特冒火了：“很明显，目前的不战不和僵局有利于超级大国。它们之间就武器供应达到怎样的水平，显然有了一些协议。”

除了世界战略的各种理由之外，勃列日涅夫甚至对阿拉伯能否使用他们手中的武器公开表示怀疑。他对1967年的败绩仍记忆犹新。“如果你们的坦克每一辆能够发射一发炮弹，整个战绩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写法，”他对萨达特说，“可是你们的大炮连动都没有动。”但是，在萨达特看来，苏联人这样讲话，分明是苏联政策趋向于进一步缓和。他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时证实了这一点。

1972年4月27日，在强烈批评苏联不供给他所要求的武器之后，萨达特又去会见勃列日涅夫。萨达特事后回忆道：“我到莫斯科去，告诉勃列日涅夫先生，有一天，我们必须作战，别无其他选择。勃列日涅夫说，他不希望出现超级大国的对抗。”

萨达特终于使勃列日涅夫领会到，他的关于开战的决定是认真的。这次访问之后，苏联公报写道，阿拉伯人“有一切理由来使用（外交以外的）其他手段，以使被以色列攫取过去的阿拉伯土地重归阿拉伯”。可是，苏联依然不供给萨达特所需要的武器。萨达特追述到：“俄国人在1972年夏天和秋天一直推拖。他们说，他们正在等待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不要忘记，当我4月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们根本摸不清尼克松会不会再到莫斯科——虽然他在访问中国之后，又去了莫斯科。”

到了仲夏，萨达特感到应当是把事情摊出来的时候了。“俄国人认为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颇有力量，随时可以控制我们的行动。”萨达特说，“的确这股力量是相当可观的：4000到5000名苏联顾问在埃及部队里；10000到15000名其他人员；一批人控制着50处萨姆—3型导弹基地，200名驾驶员来驾驶米格—21、米格—23和苏克赫—11战斗机；大批苏联人员在埃及4个港口，而且几乎全部控制着埃及7个机场。”西方观察家认为，苏联可以完全否决萨达特的任何军事计划。

这使得萨达特与他自己手下的军官之间出现了许多麻烦。大部分军官是“亲西方的”；其余的则早对苏联人对他们“颐指气使”的态度心怀愤懑。然而，这还不是萨达特的总理西德基博士7月13日到莫斯科去要解决的问题。他与勃列日涅夫及其助手的谈判原定要进行3天到5天。可是，他在7月15日就提前飞回本国了。7月17日，萨达特命令苏联军事人员和他们的眷属立即离开埃及。埃及军队将接管飞机场和萨姆导弹基地。7月19日，萨

达特说明了原因。他在对埃及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发表讲话时，把话说得很委婉：“苏联是一个大国，它有它自己的国际任务，自己的战略。就我们来说，我们的领土有一部分是在被占领之下，因此，从埃及并从阿拉伯两方面来说，我们的目标都是要消除侵略的后果。”不过，他还是暗示了西德基总理想去解决但未获成功的那个问题。他说，埃及从没有设想要制造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对抗，埃及从没有盼望苏联士兵为阿拉伯战争作战。不过，不论埃及从外国得到什么武器，这些武器怎样使用，都应由埃及人民自己决定，“而无须任何方面（不管它有多么重要）加以批准”。

萨达特的行动显著地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军队里不满的暗潮立刻静止了。与此同时，军队还因此加强了信心，认为萨达特会像纳赛尔那样对以色列有所行动。然而，立即出现的并不是战争，而依然是在外交上再一次寻求打破僵局。他在人民议会8月17日秘密会议上说：“现在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与苏联、美国、西欧、不结盟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一起行动，准备一次新的主动。”

然而，这时萨达特已经对于这一行动大失信心。他不能再让新的一年在无所作为中溜走。他可能垮台；埃及经济不可能无限期地负担沉重军费；在“不战不和”的压力下，甚至埃及的社会结构能否继续维持下去都有问题。萨达特一方面寻求和平，同时开始准备战争。1972年10月，他指定他的长期的军事伙伴和支持者伊斯梅尔将军为国防部长和三军总司令。埃及的一位最敢打敢冲的将领沙兹科中将已经出任总参谋长。这两名将领的不同经历和性格，在紧要关头，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有着很大的影响。

事隔很久之后，据伊斯梅尔向《金字塔报》透露的详情表明，那时，他迅速判定，假如只是把1969—1970年的消耗战争重复一遍，那必然意味着灾难。“我们这方面如果打算这样做，会遭到以色列那方面的更加激烈的反击。”他的结论乃是：“因此，我们的打击应该是我们所能拿出来的最强烈打击。”但是，到底是怎样一种形式的打击呢？在这里，伊斯梅尔同意了他的总参谋长多年所持有的意见：要打败以色列，不能抄袭他们的闪电战术，而是要按照沙兹科中将所称的“绞肉”战法，一块一块将他们分割掉。

为了实施这一新的作战计划，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加紧了战前的准备。

1973年1月底，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军事首脑在开罗阿拉伯联盟大厦开会，商讨未来战争的共同战略。1月31日，埃及、叙利亚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成立。3月底，埃及政府下令全国各城市成立人民军事抵抗指挥部，开办训练营，开展军事训练活动。埃及军队加紧渡河攻击的秘密准备，尽量选择同实战条件相似的地点进行渡河演习。譬如训练地点的河流流速几乎同苏伊士运河完全一样，有的攻击目标完全仿照以色列在运河东岸的工事建造。有一支埃及部队演习向这样的工事冲锋，不下300次之多。叙利亚军队也加紧紧张的战备活动。

为了反击以色列的侵略，阿拉伯各国加强了团结合作。埃叙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成立后，6月间，叙利亚派遣军事代表到埃及具体商讨有关军事问题；萨达特还访问了大马士革。埃叙双方同意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先把以色列赶出它所占领的一部分阿拉伯领土，然后利用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迫使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逼以色列撤到“六五战争”以前的边界。8月，埃叙两国就向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侵略军同时发动反击的问题，达

成了协议。

为了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埃及和叙利亚也改善了同约旦的关系。8月初，埃及总统特使卢特菲·扈利去安曼同约旦国王侯赛因晤谈，使原来认为反击以色列的“战争时机还没有成熟”的侯赛因，了解了埃及和叙利亚的打算，改变了看法。9月10日到12日，萨达特、阿萨德和侯赛因在开罗举行3国首脑会议，一致确定了收复失地的共同战斗目标。会议结束时，埃及和约旦宣布恢复外交关系。9月18日，约旦释放了包括“法塔赫”领导人阿布·达赫德等在内的巴勒斯坦突击队成员754人。

10月4日、叙利亚和约旦也宣布恢复外交关系。

埃及为争取中东产油国的支持，5月下旬，邀请阿尔及利亚政府首脑布迈丁访问开罗，双方同意尽力动员阿拉伯力量，共同反对以色列的侵略。8月23日到27日，萨达特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同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卡塔尔国家元首谢赫·阿勒萨尼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在未来的阿以战争中如何使用石油武器的问题。埃及还从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获得13亿美元的援助款项。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努力下，阿拉伯世界出现了一派团结战斗、共同对敌的形势。

为了试图减少超级大国的干涉和阻力，1973年2月，萨达特派遣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前往苏美两国访问，解释埃及政府对解决中东问题的立场，重申埃及不会放弃一寸土地，不会不顾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不会接受一项重开苏伊士运河的部分解决办法，也不会接受单方面的解决办法。紧接着哈菲兹·伊斯梅尔的访问，埃及又派遣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访问莫斯科，试图再一次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苏联这时为了挽回自己在埃及丧失的地位和影响，才同意提供一些“从未向苏联之外的任何国家供应的军事装备”。

在哈菲兹·伊斯梅尔访美期间，曾与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举行会谈，由于美国坚持“不背叛老朋友”的原则，因此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根据基辛格为总统起草的“谈话要点”，尼克松对伊斯梅尔明确了下面这些限度：

“我虽说主张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然而我在越南的政策也表明，我们不背叛自己的朋友。一个大国不是靠着背叛朋友来增强自己力量的。我们能强迫以色列所做的是极为有限的……”

“埃及不应存有任何幻想。在可以想象到的任何解决办法中，埃及都不能达到它的最高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个解决办法，埃及收复任何东西的前途甚微。这并不是我们搞的；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如此。埃及和以色列都得作出困难的决定。”

“换句话说，我们准备力促以色列作出让步，但这也要求埃及方面表现出灵活性。”

基辛格在为总统草拟的“备忘录”中讲述了三种处理问题的选择，供尼克松参考：第一，退后一点，让双方进一步考虑他们的立场；第二，寻求达成一个临时协议；第三，私下作出努力，以达成全面解决的一般原则协议。

尼克松对第一个选择根本不予考虑，对第二个选择没加评论。他喜欢第三个选择，旨在举行全面解决的秘密会谈。尼克松在对基辛格“备忘录”的批示中写了如下的话：

“基辛格博士：你知道，我坚定地同以色列站在一起的立场，一直是以

比以色列的生存更为广泛的问题为基础的。这些问题现在有力地表明要采取行动以取得一个解决办法。我们现在是以色列在世界上唯一的重要朋友。我还得看他们做出一点让步——我承认约旦和埃及方面还未做出足够的让步。现在是动起来的时候了——应该坚定地告诉他们这一点……

“现在是放弃怂恿以色列的不妥协立场的时候了。过去我们的行动使他们认为，不管他们怎么不讲道理，我们都会站在他们一边。”

在这种气氛下，哈菲兹·伊斯梅尔第一次接触到美国政府中的许多高层人物。在48小时内，他会见了尼克松总统，会见了推动达成一个没有白宫支持的临时协议的国务院领导人以及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虽然会谈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埃及总统这位特使却给美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伊斯梅尔在这纷繁的头绪中，十分镇定自若。他身材修长挺直，头发稀疏灰白，仍有军人的风度以及受过教育的埃及人自然具有的尊严。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4000年来，埃及人民目睹急切的外国人的刀光剑影，但他们凭着和解而坚定的精神、灵活而又有无限复原力的特点，取得周旋的余地。接踵而至的征服者带来了种族构成上的变化，一种原型的埃及人生存下来了……而哈菲兹·伊斯梅尔就是这种坚毅的埃及人的代表。”

针对阿拉伯国家既加紧备战，又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的情况，以色列总理梅厄于1973年3月前往华盛顿寻求美国的“支持”。在美国期间，梅厄到处宣传她的“安全边界”的侵略理论，公然主张霸占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以保证以色列的所谓“安全”。4月，她在美国的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根本问题在于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的存在和安全，采取什么态度。”

关于梅厄这次访美，作为当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的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下了如下的文字：

“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在3月1日同尼克松的一次约见中，她宣布：‘我们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并且坚持认为僵局很安全，因为阿拉伯人没有军事选择。果尔达·梅厄是一个有独创性的人。她精明，质朴，实在。她感到她是她的人民之母。对她说来，每一寸以色列领土都是她的孩子们用鲜血浇灌的。人的本性她见得太多了，以至她不依靠像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这样摸不着而且又可以撤销的保证。她深知承认他们的存在是所有其他国家安全问题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果尔达·梅厄作为一个年轻的光驱者来到以色列。归还领土的主意几乎使她感到切肤之痛。作为交换，她要求对安全作出坚定的保证。很难想象什么样的保证才可能被她认为比实际占领更为安全。她善于提出把我们置于防守地位的问题或延缓以色列作出困难抉择的需要。1973年，她在‘直接谈判’的旗帜下进行战斗。这个要求使人们看清甚至是温和的阿拉伯的立场是何其荒谬，这些人坚持要求以色列放弃占领，但又拒绝坐下来在谈判桌上讨论撤军。她要求我们两国间协调立场。这个建议听起来颇似有理，但其实际结果是授予她以对我们的策略的否决权。”

“在会见尼克松时，梅厄夫人以夸奖力武器开始直接进攻，尼克松是相当经不住夸的。她感谢尼克松使世界革命化，以及第一次在人们心中带来了我们正在接近战争终了的希望。尼克松对这个评价并未准备表示异议，但谨慎地补充道：‘我们对仍旧存在的危险是抱现实态度的，这里许多人说，既然世界太平，我们就可以减少军备，把钱用到少数民族居住区上。但是，在

我们的对手真正改变以前，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军备。’“至于谈判，梅厄的态度很简单。她认为以色列在军事上坚不可摧，严格说来（它的边界）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变动。”

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满足已夺取的阿拉伯国家的大片土地，他们得寸进尺，不断加紧制造挑衅事件。4月10日，以色列别动队突然武装入侵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袭击设在那里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杀害了3名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领导人，打死打伤许多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居民，9月13日，以色列侵略者又悍然出动大批飞机入侵叙利亚领空，突然袭击叙利亚的巡逻飞机，击落叙机13架。同月26日，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借口叙利亚“布置了同埃及在苏伊士运河地带同等密度的导弹网”，下令坦克和炮兵部队驰往前线。

美国尼克松政府见到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积极进行反击以色列侵略者的军事准备，就积极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以色列。1973年3月梅厄访美时，美国同意向以色列提供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后又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包括鬼怪式飞机、空中之鹰式飞机、隼式导弹和百舌鸟式导弹等在内的新式武器，并且帮助以色列生产新型喷气式战斗机。但美国又担心一场打破“不战不和”状态的战争将影响它在中东的利益。为此，基辛格提出6点所谓“中东和平建议”，通过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转达给有关阿拉伯国家。这6点建议的内容是：第一，苏伊士运河的支配权交给埃及，以色列军队从运河区作部分撤退；第二，沙姆伊赫由埃及和以色列共管；第三，西奈地区随着以色列军队的撤退，由埃及和以色列共管；第四，耶路撒冷继续由以色列占领，但其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圣地及其特权分别由梵蒂冈和约旦管理和保护；第五，（约旦河）西岸地区归还给约旦，但以色列的新居民区维持原状不变；第六，以色列军队从戈兰高地作部分撤退。

基辛格的“六点建议”立足于保持苏美控制下的中东现状和满足以色列的基本要求。9月10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3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拒绝了 this 建议。

苏联为了加强自己对美国争霸的地位，于4月间向埃及运去了第一批射程180英里、可携带核弹头的斯库特地对地导弹等武器。但同时它也担心中东爆发一场打破“不战不和”局面的战争。因而公开威胁阿拉伯国家，说什么不能“采用军事解决办法”，否则将引起美苏“对抗”，从而爆发世界大战，并“导致（阿拉伯国家）进步政权的被消灭”。

9月28日，乘载去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移民的列车，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遭到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拦截。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即在边境的一些地段摆出蠢蠢欲动的架势。埃及和叙利亚按照事先商定的协同作战计划，宣布为了防止以色列的入侵，实行“全面戒备”，全国处于“紧急状态”，调动部队开赴前线，为发动反侵略战争做好最后准备。

10月3日，埃及征得叙利亚的同意，选定在10月6日，即伊斯兰教的斋戒日和犹太教的赎罪日发动反击。为了避免苏联阻挠干涉，发动反击时间没有正式通知苏联。正如萨达特后来所指出的：“十月战争”的“决定是百分之百的埃及的决定，是违反两个超级大国的意愿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就要开始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七章 赎罪日战争

横跨运河渡天险，陆海空军大会战；

出敌不意攻不备·埃军突破以防线。

1973年10月6日，在苏伊士运河东岸以色列军队的阵地上。异样的沉静。按照犹太教的教规，在赎罪日·从日出到日落，不得进食，不得喝水，也不能抽烟。尽管局势紧张，驻守在防线上的许多士兵有的在祈祷，有的在沐浴、洗衣，还有的没精打采地坐等天黑。

下午2时，苏伊士运河东岸以色列防御工事的沙垒中，爆炸了埃及士兵预先在水下悄悄埋入的两个炸药包，炸开了两个缺口；隐蔽在河西沙丘后面2000门大炮同时突然向东射击，炮弹铺天盖地飞往以色列阵地。许多以色列士兵匆匆奔向战位，口中还喃喃地叨念经文，以为这不过是一次局部炮轰事件，他们没有料到，第四次中东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突破运河天堑，埃及参谋总部事先制定了周密计划。对于一支现代化陆军说来，江河并不足惧。水陆两栖坦克和装甲运输车可以充当突击的先锋，在对岸建立桥头阵地。还可以运来舟桥部件，卸下后连接在一起，于几分钟之内在预定地点架设完毕。等到军队主力抵达时，渡口业已准备就绪。

然而，苏伊士运河却与众不同。其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构造使两栖突击部队面临了许多困难，而且以色列还在天然障碍上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运河的宽度只有195至220码。但是，凡是见过它的人，都把它视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为防止河岸被侵蚀，河岸镶砌了水泥墙，墙顶露出水线，墙脚深深埋入河床。总参谋长沙兹科将军介绍说，河水还有潮汐现象。高潮时，河水从水泥墙顶端下方一码处流过。低潮时，水面距墙顶两码，南端为3码。水陆两栖车辆不能像拉市拉多猎犬那样从高度为一码以上的河岸跃入水中；至少不能不冒严重风险就跳下去。即使跳下去了，又怎能爬上对岸呢？

第二个障碍是以色列军队沿整个东岸垒起的庞大沙丘。在6年的时间里，以色列的推土机孜孜不倦地聚沙成垒。当然。功夫下得最大的地方是可能的渡河点。那里的沙垒高60英尺，而且上下几乎一般宽。其面向埃及突击部队的西坡、则与更陡峭的水泥河岸连成一体。

第三道障碍，即巴列夫防线。以色列自“六五战争”中侵占埃及的西奈半岛后，为了长期霸占这块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它部署了9个旅的重兵，其中包括4个装甲旅，并且不惜花费3亿美元，用3年的时间，沿运河东岸构筑一道全长170公里、纵深10公里的防线，以当时以色列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的名字命名为巴列夫防线。

防线的主阵地以运河为屏障，依托河堤构成。河堤原是由开凿运河时挖出的泥沙堆积而成，以军将它加高到平均25米，并把朝向运河一侧削成55度的陡坡，上面布设了十几层密匝匝的蛇腹形铁丝网和地雷。河堤全线构筑了19座要塞、30个坚固据点，各个据点又都有若干个钢筋混凝土的碉堡，下面埋设了许多通向运河的凝固汽油管道，只要一按发火设备的电钮，就可以点燃汽油，向河面喷射，形成一片火障，燃烧时间可达30分钟。在各据点之间，建筑了坦克和大炮掩体，火力互相交叉，控制着整个运河和重要通道。

在主阵地后面的交通要道上，还构筑了据点，配备有预备队和支援火炮。

防线前沿驻军 3000 人，有足够三四个月用的军火、粮食等。以色列在防线筑成后，曾经大肆吹嘘它“坚不可摧”，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防线。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狂妄地叫嚣，面对巴列夫防线，任何埃及军队渡河攻击，都将在 24 小时内被消灭。

10 月 6 日下午 2 时整，按照计划，200 架埃及空军超音速飞机呼啸着越过运河，袭击了以色列军阵地。这次袭击几乎完全出人意料，也近乎大获全胜。20 分钟之内，埃及飞机摧毁了以色列在西奈的指挥部、空军指挥部，防空和雷达干扰中心、导弹营，炮台等。估计 90% 的预定目标被击中，埃及仅仅损失了为数不多的飞机。以色列军遭到了严重创伤，军事通讯系统被破坏，以至使他们的通讯联络中断了好几天。

空袭后接着便是毁灭性的排炮轰击，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猛烈的一次炮击。然后，就是成千艘小型橡皮攻击艇载着埃及士兵，冒着极大的危险抢渡运河。第一批抵达东岸的士兵攻占了以色列的卫事后，便给战友们放下绳梯。他们很快就占领了一些在工事后的以色列军阵地，进而掩护后来的登陆者。最先横渡运河的大部队是埃及第七旅。在开罗作战指挥大厅里，满怀喜悦的萨达特和他的军事指挥官们接到了这样的报告：埃及的旗帜又一次飘扬在东岸了！

先头部队渡过运河以后，工兵便开始以高压水龙开道。高压水龙轻而易举地冲开了沙质的工事，造成一个个大缺口。埃及的坦克从快速安装起来的浮桥上过河后，便通过这些缺口向以色列占领的西奈挺进。夜幕降临时，5 个完整的装甲师沿着 170 公里的河道成功地越过运河，到达苏伊士东岸。被吹得不可一世的巴列夫防线的要塞，在猛烈的炮火中，一个一个地落入埃及人手中。

关于这次抢渡运河天堑，亲临指挥这次战役的埃及总参谋长萨阿德·沙兹科中将在《跨过苏伊士运河》一书中介绍道，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交锋，基本上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术的坦克和新一代步兵武器之间的第一次交锋。

10 月 6 日 14 时 30 分至 14 时 45 分，埃军第一批突击部队已经登陆。4000 名士兵占领了各支撑点之间的沙垒。橡皮舟已在返航，每舟由工兵舟船营的两名士兵操纵。当敌人的第一批坦克冲向运河时，在 5 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尘土迷漫。埃军突击组有很多已经抢在以军坦克之前占领了斜坡式射击阵地。而且，占领了沙垒的埃军士兵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向前开进的以军坦克射击。但是，击退以军第一批装甲车辆主要靠部署在西岸沙垒上的部队。埃军的火力一方面继续对敌方支撑点进行射击，同时掩护各工兵排把水泵运到对岸，开始执行在沙堤上打开 70 条通路的任务。

“在苦湖，我们的两栖旅已经开始在东岸登陆。”沙兹科将军说，“我们的飞机在完成了第一次袭击后，正在返航。它们的航程很短，因此所有的目标都选在西奈，其中包括敌军机场、防空导弹发射场、电子干扰站和军事司令部。袭击中，我们损失了 5 架飞机。（这是我军飞机到 10 月 7 日 8 时止的全部损失）我们的飞机都沿安全走廊穿过我方萨姆导弹防御地带返航。”

随着埃军大炮的猛轰，埃军先头部队 8000 人在海、空军的支援下，从运河北部的坎塔腊、中部的伊斯梅利亚、南部的大苦湖等处奋力强渡运河。他们乘橡皮艇和两栖车辆在弥漫的硝烟中奋勇冲向东岸，首先占领那被炸药包炸开的缺口。以军士兵见状慌了手脚，赶忙去开启凝固汽油管道，想用大火



阻挡埃及战士前进。不料电钮按后，连半点火星也没有。原来前一天晚上，埃军侦察兵已经偷渡过河，用水泥堵塞了管道喷口。埃及士兵登陆后，用爆破筒在以军阵地的铁丝网和地雷区中开辟通道，沿着临时架设的绳索和软梯，攀登上陡峭的河堤，分割包围以军主要据点；然后用机枪、手榴弹、火焰喷射器和反坦克导弹压住了以军火力，粉碎了以军前沿坦克的反冲击，并且掩护工兵部队先用高压水枪冲破河堤，再用炸药和推土机扩大缺口，不到10个小时就打开了60个可容坦克通过的缺口，架设了10座浮桥和50个门桥渡场。于是，配备有坦克、装甲车、火炮、地对空导弹等重装备的8万名埃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通过运河，突破了巴列夫防线。

到10月7日8时止，渡河战斗已经告捷。埃军总参谋长沙兹科将军说，防守巴列夫防线的以军3个装甲旅和1个步兵旅几乎全部就歼。以军的360辆坦克中有300辆被击毁，几千人被击毙。

埃军损失了5架飞机和20辆坦克，280人阵亡，这相当于埃及投入战斗的飞机总数的2.5%，坦克的2%，作战部队的0.3%。在18个小时内，埃及已有9万名官兵、850辆坦克和11000部车辆渡过了运河。

埃军初战告捷，士气更加高昂。为了解放祖国的领土，埃及兵人人奋战，个个争先。有的把炸药包绑在身上跳上以军的坦克，和敌人同归于尽；有的用身躯堵住以军堡垒的机枪口，让战友们冲上去。

10月8日，埃军收复西奈第二大城东坎塔腊。9日，击退以军装甲部队3次猖狂反扑，全歼以色列第一百九十装甲旅，活捉了旅长。接着，埃军又攻占富阿德港以南地区、伊斯梅利亚以东地区和陶菲克港湾地区。到了13日，盘踞在运河东岸最后一个据点的以军也被迫缴械投降。至此，埃及第二、第三军团5个师、1个旅全部过河，在前线北部、中部和南部打开三条通向西奈腹地的通路，控制了西奈半岛纵深10至15公里的地区。

在埃军从正面突破运河的同时，还有数十支伞兵部队和特种突击部队乘直升飞机在以军后方着陆，破坏以军的交通通讯联系、油田设施和攻占据点，并对沙姆沙伊赫进行了一次袭击。埃及海军则封锁了曼德海峡。

在防守运河的战斗中，以色列之所以遭到惨败，主要是骄傲轻敌。开战前10天，以色列曾向驻以色列外国记者介绍情况。英国《泰晤士报》说，这一次讲话，对于以色列怎样错误地估计形势，提供了基本线索。以色列高级人士强调，他们认为“阿拉伯首脑们并没有准备好战争”。有一个人这样说，阿拉伯也许“估计错误”而发动战争。他们如果敢于如此，毫无疑问，必然失败。情况介绍人最后用极大的自信这样说道，以色列“无意作战”。他暗示，因此阿拉伯也不会开战。

美国情报机构也得到同样结论。9月30日，在基辛格的要求下，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自己的情报研究局，向基辛格提出了它们对于阿拉伯调查的判断。两者都没有像基辛格所说的那么乐观。情报研究局认为阿拉伯的行动“难作结论”。不过，该局在衡量了政治情况之后，虽然没有“乐观地”认为一定没有战争，却“怀疑”战争是否在不久之后出现。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大致相同。埃及调兵被视为“不好的兆头”。可是以色列对阿拉伯意图的解释被当作决定性的了。情报研究局也受到了以色列情报的影响。美国人说：“我们的错误是接受了以色列对阿拉伯意图的解释。”但在衡量阿拉伯意图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大致接近看准了一点：阿拉伯国家是针对联合国而来的，联合国大会新的一届会议刚刚开始。

阿拉伯各国外长和以色列外长都来到联合国大会，刚刚因“解决了”越南问题而准备接受诺贝尔奖的基辛格宣称，美国现在准备协助“实际进展”，走向中东问题的解决。9月25日，他邀请阿拉伯各国使节午餐，作为正式宣布，第一次采取外交行动。通过9月底在纽约的一连串谈话，基辛格的确有了若干成就。“阿拉伯人显得比过去轻松和自信，这是我长时间来所少见的。”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事后谈到这次会见时说道。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外交部长秘密同意，在11月的某一天（确实日期俟以色列选举后再定），在基辛格的主持下会见，以制定“一套程序”，走向实质谈判。

情报分析人员受骗了。“阿拉伯国家对于外交显得十分有兴趣，以致虽然有大量军事调动的证据，我们受到了愚弄。”一名华盛顿情报人员说，“我们掌握了正确的事实，可是我们没有能够正确地分清主次先后。”看过情报机关的判断报告之后，基辛格也以为阿拉伯国家会给他的外交手段一次表演的机会。由于萨达特本来就主张军事和外交并进，也许基辛格与阿拉伯国家的一次最有力的接触——与埃及外交部长札雅特的接触，是萨达特极需要的最后一分钟接触，以便弄清，万一军事失败了，可能遇到的大致是什么条件。

就以色列来说，开战以前的30小时是最危险和最神秘的时刻。以色列运输部长西蒙·皮尔斯说：“我们在星期五举行了内阁会议，讨论局势。那是我记忆中最短的一次内阁会议，我们一致决定不动员……”可是其他政界方面的消息都说，那一次会议是在星期五傍晚才开的。

在以色列内阁里，正如其他内阁一样，虽说采取集体负责的原则，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有一些部长比其他部长地位高。梅厄夫人的“厨房内阁”（这是以色列加给核心部长们的绰号）的组成，时有不同。那天傍晚，5点30分，天色一黑，宗教仪式一开始，便等于通知犹太历一年中的最隆重的一天——赎罪日开始了。那时，有4名部长在梅厄夫人的特拉维夫官邸开会。有梅厄夫人自己，副总理阿隆，国防部长达扬，无任所大臣卡里里。卡里里这个人，在以色列之外几乎不为人所知，他是梅厄夫人最亲近的政治助手之一。也许是从会议一开始，也许是在会议开到一半中间参加进来的还有前任参谋总长巴列夫（当时任商务部长），现任参谋总长埃拉札尔。

关键在于是否打乱赎罪日的平静，征召预备役。当场决定不征召。官方事后的解释说，当时并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但事实上是埃拉札尔反对无效，他非常生气。埃拉札尔在11月11日说，如果预备役能够“提早24小时或48小时征召”，战果“毫无疑问会大为不同”。他并且提到了事后争论最大的伤亡问题，认为那样的话，伤亡可以大为减少。他说，可是，这一项决定“是在最高级的政治—军事会议上决定的”。他的结论是：“如果征召了预备役，我们很难说，战争是否真的会爆发。”

还有消息说，10月4日夜间，以色列得到更多的有关阿拉伯军队调动的情报，达扬从睡梦中被叫醒。他同参谋长埃拉札尔讨论后，和军事情报局长泽拉同到总理梅厄夫人家里，向她汇报。埃拉札尔建议取消空军和装甲部队的假期，把装甲部队集中到埃以和叙以两条战线。梅厄决定次日召开内阁特别会议，研究当前局势和对策。5日在内阁会议上，埃拉札尔强调，埃叙军队已进入防御状态，可能要举行军事演习，但这两支军队都可以立即由防御转入进攻，战争的危险性是存在的。而泽拉得到美国情报机关的观点支持，认为埃叙军队不可能发动进攻。他说：“埃军大规模渡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以色列一些人一贯不相信阿拉伯人民真正有能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

攻，更不相信阿拉伯人民能够在战争中获得胜利。10月6日清晨4时，以色列情报机关才确信，阿拉伯国家将在当天对以色列发动一次袭击，估计进攻时间在日落以前，梅厄夫人在她的家里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她仍拒绝埃拉札尔提出的先下手对埃叙军队进行袭击的主张。内阁会议最后只同意采取包括局部动员在内的必要措施。直到10月6日上午10时，以色列才发布紧急动员令，要它的大部分由市民组成的军队开往前线。这时离战争爆发只有4个小时了。

且说埃及武装部队在10月6日全线成功地渡过苏伊士运河，8日摧毁以色列吹嘘为“不可逾越”的“巴列夫防线”，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与此同时，沙特、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产油国家首次使用“石油武器”，非常成功地打击了美国以及其他支持以色列侵略的西方国家。

后来，由于美国的插手干预，叙利亚军队在戈兰高地节节失利，被迫宣布停火，致使以色列卷土重来，集中全力于埃及战线。在此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338号决议，要求“立即就地停火”。阿拉伯国家未尽其功，被迫停战。尽管如此，15000万阿拉伯人民向美、以显示了团结战斗、不可欺侮的力量。

欲知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发展详情，特别是导致第四次中东战争受挫的戈兰高地前线的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八章 激战戈兰高地

戈兰高地遍硝烟，两军对战士马欢；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敌军岂能还。

在10月6日下午埃军向运河东岸发动进攻的同一时刻，叙利亚以3个师的兵力，在空军掩护下，在戈兰高地分路向以军阵地发动全面攻击。

以色列通过1967年的“六五战争”侵占戈兰高地后，在那里构筑了坚固的防线，除派军队严守外，居民点都筑有地堡和战壕一类工事，每个居民都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戈兰高地正面宽65公里，纵深20至30公里。以军沿停战线内侧构筑了宽6米、深4米的防坦克壕，在防坦克壕后又构筑了17个支撑点和112个碉堡式阵地或地堡群。这17个支撑点配备10至30名士兵，在主要接近路上的防坦克壕前后都敷设了反坦克地雷。同时，为便于装甲部队机动，还整修了戈兰高地内的道路网。另外，赫尔蒙山在内的各支撑点的通信、监视系统都配备了新型电子器材。

1973年9月中旬，戈兰高地的守备任务由艾坦准将指挥的第一步兵旅和第一八八装甲旅担任，9个炮兵营进行支援。

10月初，以军总参谋部为对抗叙军向戈兰正面集结的重兵，又增派第七装甲旅防守库奈特腊—纳法赫公路北侧地域；第一八八装甲旅负责防守南侧地域。10月6日晨，艾坦准将指挥下的兵力达到1.2万人，坦克195辆。而叙军沿紫色防线正面部署了6万人，3个步兵师，1300辆坦克，600门火炮，400门防空火器和100个防空导弹分队。

叙军总参谋部制定的作战计划，深受苏联军事原则的影响。这个作战计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消灭约旦河东岸戈兰高地的以军，并占领该高地；如果西奈战线战况进展顺利，便渡过约旦河，占领东加利利地区。

在第一阶段，叙军企图从两翼实施包围。在戈兰高地南北两个地段，叙军以第七步兵师从阿马台地段突破，然后经艾尔罗姆和瓦塞特向约旦河进攻。在戈兰高地南部，叙军以第五步兵师从拉菲德向阿里克桥方向实施进攻。两个师均以师的第一梯队打开突破口，以师的第三梯队扩大突破口。第九步兵师作为中部地区第一线师。担任钳制敌军和切断阵地内横向道路的任务。

那末，以军的戈兰高地的防御方案如何呢？以军的防御方案是固守戈兰高地北部地区，这是以军防御的重点。戈兰高地南部地势平坦、开阔，具有一定的纵深，以军企图利用纵深节节抵抗，逐渐消耗叙军的战斗力，等待增援部队到达后再转入反攻。以军的计划是，最初以两个旅担任迟滞敌人的任务，逐次投入5个旅，必要时增至7个旅。反攻方向的翼侧依托赫尔蒙山系，从戈兰高地南部或北部转入反攻。

10月6日下午2时5分，叙军以600门火炮进行了55分钟的进攻火力准备后，第一线3个步兵师同时发起进攻。与此同时，第八十二突击营乘坐直升机袭击并夺取了以军设在赫尔蒙山的哨所。第五步兵师担任主攻任务，从拉菲德南侧实施突击；第七步兵师担任助攻任务，向库奈特腊以北地区实

---

指戈兰高地东侧1967年叙以停火线。全线宽约0.5—1英里，由一条“无人地带”隔开叙以两方。沿该地带曾设有观察站，驻有联合国观察员。因该线在地图上用紫色标记，故称紫色防线。

施突击；在第五师和第七师中间的第九步兵师，也向库奈特腊以北地区实施突击。形势发展很快，到了深夜，叙军突破了南段的防线。在战争开始前，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将军曾经预计，叙利亚人发动攻势时会把矛头指向北段，所以北方军司令部在分配手中的坦克时给阿维格多旅多派了些。当叙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南段时，它只好由坦克配备较少的本一舒哈姆装甲部队来进行牵制。

“然而，戈兰高地的战斗同苏伊士运河的形势不一样，北方军区司令部的坦克是恰当地部署在指定的阵地上的。”达扬说，“先头装甲部队在山坡上严阵以待，以猛烈的火力对付来犯者。前沿阵地的据点，除了在赫尔蒙山上的那一个以外，都及时得到了加强。我们的炮兵是按照我们的应急计划摆开阵势，以准确火力掩护着整个前线的。”

叙利亚军队开始进攻时，投入了500辆坦克，抗击它们的是以色列北方军区司令部已部署好的177辆坦克。然而午夜过后，叙利亚又增添了300辆坦克，这样一共就有800辆了。而北方军区司令部能够从预备役中弄到来对付他们的增援力量的，只是一支由12辆坦克组成的小分队。

第一天的深夜，在叙军突破以前，达扬将军退出内阁会议到地下作战室去。这个“应急总司令部”像个蜂房，就是里边没有蜂蜜。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它的效率很高，组织得很好。他们从前线接受报告，在地图上作出标志。但从进行控制和指挥的角度，更重要的从冷静地和全面地考虑问题的角度来看，这个作战室和作战小组就远不符合要求了。达扬说：“战争的指导实际上掌握在前线指挥官手中，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如何使用他们全部力量去守卫住他们的前线，防止敌人突破，封锁一旦出现的突破口，坚守阵地直到援兵到来。在这种形势下，总参谋部对指导战争所施加的影响是很小的。他们最好是时不时地到前线指挥部去，与那里的指挥官共同商量作出决定。”

10月7日，叙军全线突破戈兰高地以军的阵地后，派遣直升飞机载运突击队向高地西北角海拔2800米的谢赫山的最高峰突袭。叙军事先派人打入以军内部，摸清了峰顶堡垒的通道，从一个防守薄弱的备用铁门中攻入，顺利地夺取峰顶阵地。至此，叙军收复了包括谢赫山在内的许多失地，最远处向前推进了35公里，并且包围了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重镇库奈特腊，解放了周围的一些村庄。

为了配合埃及、叙利亚反击以色列，巴勒斯坦突击队有26000人，在戈兰高地、加利利、加沙和以色列占领的其他地区，展开袭击活动。他们运用游击战术，袭击以军营房和集结区，摧毁雷达站、供应基地和仓库，伏击以军车队，破坏桥梁交通，严重威胁以军的后方，牵制了敌军的力量，使以色列军队首尾难以兼顾。

由于以军在各条战线节节失利，达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忙从“应急总司令部”来到空军作战室。空军司令向国防部长汇报了他第二天的作战计划。他打算在早晨袭击南部战线的目标，主要是导弹发射场和机场，这将使他以后在运河两岸反击埃及部队时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总参谋长也认为在把叙军导弹连打哑以前，对渡口进行袭击没有多大意义。

达扬对此却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说：“我怀疑我们空军是否有可能去摧毁导弹发射场。同时，我预计有两个夜间和一个白天将是关键时刻。在这期间埃及人将会把增援的大量装甲部队送到东岸。我的意见是，空军在这个时刻应暂缓执行袭击导弹发射场的计划，而应尽一切力量阻止埃及人将坦克送

到西奈，即使这样做会使飞机遭到损失。如果空军全力以赴去摧毁导弹发射场的企图遭到失败，我们将两头落空，埃及坦克将渡过运河，而我们的空军行动自由仍将受到限制。”

然而，国防部长享有的是政治上的权力，而这是技术上和作战上的具体问题，决定权在总参谋长和空军司令手中。在拂晓时袭击导弹发射场的决定仍然有效。当时是午夜 2 时，战争开始后已过了 12 小时。达扬回到办公室小睡片刻。

两小时后，他被叫醒。北线的形势变得更严重了。一支叙利亚部队突破了以军在库奈特腊以南 8 英里的侯赛尼亚地区的防线，正向着从戈兰高地到加利利海的几条倾斜的公路前进。匆匆忙忙地组织起来的预备役队伍赶去守卫坡道和堵截叙军。以色列北方军区司令伊扎克·霍菲少将下令农业定居点的所有男人撤退。至于妇女和儿童已经在赎罪日撤走了。

达扬立刻启程到北线去。直升飞机沿海岸朝北飞，然后折向东去。在平时，他一看到夏隆平原这个布满桔树和农业居民点的得天独厚的地方，他心里总是暖乎乎的。而当时，几乎一飞出特拉维夫，他仿佛已经听到戈兰高地上炮弹的爆炸声。戈兰高地的纵深总共不超过 15 英里。达扬心想：“如果叙利亚军队到达通向约旦河的斜坡，要击退他们就将十分困难，特别是他们又拥有如此大量的武器和人力，而我们还不得不同时在埃及战线作战。很明显，我们必须在突破口附近堵住叙利亚人，即使要把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扑上去，也在所不惜。”

凌晨 6 时前，达扬到达北方军区司令部的前线指挥所。指挥官报告说，以军在戈兰高地南段的防线已全线崩溃。叙利亚人已战胜了巴拉克旅，通过戈兰高地的南部，推进到离约旦河几乎只有一半路程的地点。以色列的后备部队已经动员起来，正在和增援的坦克一起开来，但在中午之前还不可能与叙军相遇和交战。

达扬认识到眼下能够挡住叙军前进的唯一力量是空军，必须毫不延误地让它立刻投入行动，一点点时间也不能浪费。北方军区司令解释说，我们的坦克和敌人的装甲部队短兵相接地混在一起，我们的飞行员可能会打到自己的部队。达扬要他下令给坦克乘员，要他们或是离开坦克，或是关上舱盖。

“我们的空军必须袭击敌人的装甲部队，而且不是按照规定的条文行事。”达扬说，“我给空军司令本尼·佩莱德少将打电话，对他说，他必须立即并连续地派出自己的飞机投入战斗，对付已突过防线的叙利亚坦克。在增援的装甲部队下午来到这里之前，他的飞机是唯一能堵住敌人坦克前进的力量。否则我们将丧失戈兰高地的南半部。”结果证明，达扬这一决定对稳定当时的战局、迟滞叙军的进攻起到了重要作用。

10 月 7 日早晨，以色列北方军区司令部开始把前几个小时里三三两两投入战斗的各个旅一一集合起来，并把各个战区的防卫责任分给了各个师长去承担。丹·拉纳尔少将负责戈兰高地的南部地区，拉富尔·埃但少将负责北部。但到下午 1 时，叙利亚坦克突然出现在以军纳费赫营地围墙周围。这营地在库奈特腊西南，离约旦河上的一座桥仅 6 英里，过了这座桥就可以通向加利利北部以色列的村庄和农业居民点。当达扬他们在营地附近发现叙利亚人时，他们急忙派去了几个小分队，把袭击者赶出了营地。最后叙军终于找到了一个缺口，通过那里他们可以直达桥边。本一舒哈姆上校拼死阻击，以待更强的增援部队抵达。他和他的副司令都被打死。但到傍晚，叙利亚部队

被挡住了。在 24 小时内骤然出现在戈兰高地这一地区的第二次严重危机被防止了。

达扬说，扭转形势有两个因素：一是空军，他们不间断地轰炸和袭击叙军；二是预备役装甲旅的努力，当时他们分成几个小分队正从加利利的基地开往前线。这些部队看到叙利亚军队迎着他们朝约旦河推进，便迅速设置障碍物和路障，阻塞叙军前进的道路。北方军区司令部加强了这支新到的部队，他们挫败了叙利亚部队的突破行动。夜里，以军利用暂时的间歇喘了一口气，准备进行反击。

“战争的第三天，10月9日，带来了第三次危机，这一次在第七旅负责地段。”达扬将军继续介绍说，“第七旅在极不利的条件下连续打了3个昼夜，阻击了试图穿越他们防线的敌人，至此已精疲力尽。这一天敌人的攻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猛烈，他们集中力量要打通去库奈特腊的通道。到中午，这个旅的处境已危在旦夕，已没有后备力量，许多坦克已被打坏，那些还能继续作战的坦克，弹药也几乎已耗尽。”

这时，以色列的第七装甲旅阿维格多上校，通知拉富尔·埃坦师长说，他再也不能挡住敌人了。拉富尔也几乎放弃了抗击这次进攻的希望。但就在这一非常时刻，他收到约西中校的一封电报，说他的部队刚刚占领库奈特腊正西北角上布斯特地区的一个重要山脊。叙利亚后卫部队正在折回去并开始退却。这一消息立即振奋了疲惫不堪的以色列前线部队。“他们阵脚乱了，”拉富尔师长说，“我们再坚持几分钟就胜利了。”第七旅这样坚持了，不一会叙利亚先头部队的坦克就开始撤退了。

据达扬将军介绍，以色列军官约西中校在“十六战争”爆发时，正在喜马拉雅山和他新婚的妻子艾纳特度蜜月。就在以色列国防军进入戒备的那一天，这对年轻的夫妇正坐着“本田牌”摩托车在深山密林里游玩。第二天，旅馆的服务员偶然谈起，他听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广播说，以色列局势紧张。约西马上给加德满都的以色列大使馆挂了一个电话，对方很简要地告诉他，战争已在两条战线上爆发了。飞离尼泊尔的第一架班机要在第二天起飞。约西和他的妻子就订了这班飞机的机票回国，路上经过新德里和孟买，最后到达雅典。他们在那里等候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把他们带回以色列。

约西从以色列驻希腊大使家里打电话给他的父母，打听了战局发展的消息，让他们到卢德机场接他，并把他个人的用品——军服、卫生衫、左轮手枪、风镜、茄克衫和手套都带来。他和艾纳特一回到以色列，就打电话给他的部队。部队告诉他，他已派往北线，那儿已被叙利亚人突破。他的司令官本—舒哈姆已阵亡，他将去担负起剩下部队的指挥职务。约西穿上军装，告别妻子，急赴北线。两个小时以后，他已在北方军区司令部作战室报到，听取军区司令对战况作简要的介绍。没多久，他就前往装甲部队的前进基地。

在那里，约西看到他部队的士兵在修理被打坏的坦克。他也遇到了长期当他副职的什穆利克，什穆利克在战争第一天就受伤，但从医院里逃回了部队。

10月9日上午8时，约西和他的坦克已准备就绪。他用无线电同师长拉富尔取得了联系，拉富尔命他立刻赶赴第七旅的战区，接受阿维格多的指挥。通话时阿维格多通过无线电联络网也在听着，他叫约西中校立即到布斯特山脊去，那里快要落到叙利亚人的手里了。当约西抵近高地时，他遇到以军守卫布斯特山脊的部队余下的几辆坦克，上面装载着许多伤员正在撤退，丢弃

了一些燃烧着的坦克。

于是，叙以双方开始了一场争夺高地的竞赛，问题是谁将首先到达山顶，是从东面向上爬的叙利亚军队呢，还是从西面上来的约西。在紧接着发生的战斗中，约西的 11 辆坦克同叙利亚军队的 60 多辆坦克对阵，双方的坦克有时在斜坡上几乎相撞。以色列人“高超的射击技术”发挥了作用。叙利亚的坦克一辆接一辆地燃烧起来，布斯特山脊很快就被以军夺回了。

“当我在北方军区司令部听到这些情况后，我想同约西取得联系，向他表示敬意。”达扬说，“但因战事情况复杂，只是在 3 天之后，我才在海法一家医院里向他致意。他是在这前一天深入叙利亚境内进攻特勒沙姆斯时再次受的伤，这次伤得很重。”

“这时，我们部队很多已投入了反攻。他们制止了叙利亚军队的突破行动，将敌人赶出了我们的防线，并把他们赶回了叙利亚的腹地。”达扬继续说，“自从赎罪日战争最初一些严峻的日子以来，前线的命运已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但叙利亚军队仍在进行顽强的战斗，争夺在其境内的军事要地。当约西的部队到达库奈特腊—大马士革公路上的特勒沙姆斯的主要的山头阵地时，他们发现那里戒备森严，并遭到了敌方反坦克导弹、坦克部队的攻击，而且叙利亚的飞机也不停地向他们发射火箭。”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之后，以军摧毁了山脚下的叙利亚坦克。虽然只剩下了 8 辆坦克，约西还是决定乘胜一鼓作气冲上特勒沙姆斯山顶。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是判断错了。在山脚下虽已不再有什么坦克，但在山顶却有一支配备着反坦克导弹的、筑壕固守的叙利亚步兵队伍。两枚反坦克导弹击中了约西的坦克，等他苏醒过来才知道自己躺在地上，旁边是他那辆正在燃烧的坦克，左边大腿被打得粉碎。骨头从肉里穿了出来，腿无力地耷拉着。其他没有被导弹击中的坦克都撤走了，只有一个人留下来和约西在一起，那就是他的坦克驾驶员兹维卡。真像出了奇迹一样，他竟没有受伤，是他把约西拖到了安全的地方。

约西虽然身负重伤，但并没有完全失去知觉。当火焰熄灭、坦克正在冒烟时，他要他的坦克驾驶员兹维卡去抢救那台可以用手工操作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幸好它没有损坏。当同指挥部联系上时，驾驶员把话筒放在他的师长约西的嘴边：“我是约西。我丢了一条腿。我在坦克旁边，快来救我。”3 个小时后，抢救组来到他身边。约西一直催促兹维卡离开他去逃命，但兹维卡拒绝了。兹维卡把他拖到一条被叙利亚人弃置不用的战壕中，从坦克里取来一罐水，并通过无线电从军医那里得到指点，将止血带扎住约西被炸碎的大腿的动脉。

抢救组是由一位名叫约尼的上尉志愿兵指挥的。当他们来到时天已黑了。叙利亚的炮兵不断朝山坡脚下轰击，所以约尼和他的士兵不到山脚就离开他们的装甲车，步行往前。借着炮弹爆炸的火光，他们认出了约西的坦克，接着又发现了约西躺着的那条不深的战壕。随后就是吗啡针、担架、半履带式装甲车、直升飞机和医院。约西被推进手术室时，他的妻子艾纳特设法赶到了医院。以一种重度蜜月的心情，他对她说：“没有什么，用不着担心，我已彻底检查过了。我失去的只不过是一条腿！”

约尼上尉，是一支精锐的小分队的副指挥员。当他听到无线电传来要营救约西的消息时，他的分队恰巧在离特勒沙姆斯约 7 英里的地方。他迅速同旅长通了电话，要求让他和他的士兵去完成这个任务。



据以色列一家杂志介绍说，约尼是他3兄弟中最大的一个，他们3人都自愿在这个部队服役。他们的双亲已离开以色列去美国，父亲在那里任康奈尔大学的历史教授。在“六五战争”中，一颗子弹打中了约尼，把他的肘骨打碎了。他到美国去呆了一年，一面在医院门诊部治疗，一面在哈佛大学的数学系学习。当他的手臂治疗结束时，尽管还未完全恢复，他就重返以色列，回到他的特种部队去。后来他再次旅居美国，继续在数学上深造，并进一步治疗他的手臂。他在赎罪日战争爆发之前一个月回到以色列。在战争头两天，他的部队在南线作战，第三天他被调到北线。

10月9日，约尼带领他的小分队追击和消灭了他们防线以内降落的40多名叙利亚突击队员。接着他们同第七旅一起向前推进，深入到叙利亚境内。

作为国防部长，达扬对他的官兵们十分赞赏，他说：“我们的部队几乎所有的官兵都是志愿参军的，身体都是最棒的，并且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身上所共有的气质，与其说是在军事方面，不如说是在人的意识和犹太复国主义意识的方面。……他们这些年轻人，对犹太人的命运和我们的力量抱着炽热的信念并决心要实现它，他们时刻准备去执行最困难和最危险的任务。”

几乎就在约尼小分队抢救约西中校的同时，以色列第七旅的一个24人的侦察小分队，去营救另一辆被击中的坦克乘员时，归途中遇上叙利亚的火箭炮伏击，但顺利地通过了。他们把救回来的乘员安置好以后，要求再回去解决那支叙利亚的伏击部队。结果在交战中全部牺牲了。对此，达扬十分惋惜地说：“对一次毕竟是可打可不打的军事行动说来，这确是一个重大的代价。事后看来，这次作战是毫无必要的。但打仗不像开杂货店，什么东西都可以称一称、量一量。”

在这次赎罪日战争中，敌对双方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动员。埃及和叙利亚的广大人民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在埃及，许多青年踊跃报名上前线参加战斗，成千上万的人志愿为前线受伤的官兵献血。在叙利亚，由工人、农民、学生等组成的民防部队，活跃在首都大马士革和全国各地。他们一面坚持生产和工作，一面积极参加修筑工事，带着武器准备随时投入战斗。许多少年也参加了民防部队。当敌人空袭时，他们马上赶到现场抢救伤员，或去捕捉被击落的空中飞行员。

在埃及、叙利亚军民和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沉重打击下，以色列为了改变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企图先稳住叙以战线：解除对以色列本土的威胁，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埃及。从10月9日起，以色列在叙以前线集中了15个旅的兵力和1000辆坦克，在空军主力的掩护下，对叙军进行疯狂反扑。经过激烈战斗，10日黄昏，以军突破叙军阵地。次日，沿公路向大马士革进犯。至13日，以军进犯到离大马士革34公里的萨萨附近。这时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趾高气扬，吹嘘要在24小时内打下大马士革。但是，叙军在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等国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的有力支援下，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制止了以军推进，粉碎了它企图侵占大马士革的计划。

10月16日至19日，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4支部队，在纳赛吉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在戈兰高地双方进行了激烈争夺。10月22日10时，以军夺回了赫尔蒙山哨所。这个哨所是以色列的“眼睛”，是无论付出多大牺牲也要夺回的地方。这一天，以色列和约旦接受了联合国的停战决议。叙利亚于第二天，即10月23日也接受了这个决议。至此，战斗停止

了。

在戈兰高地战役中，叙利亚损失坦克 1150 辆，伤亡 3500 人，被俘 350 人。以色列损失坦克 250 辆，伤亡 3225 人，被俘 65 人。

就在敌对双方争夺戈兰高地时，埃以前线的战斗在西奈半岛也在炽烈地进行。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二十九章 美苏的斡旋与争夺

坦克大战世所罕，以军乔装登西岸。

美苏又演斡旋戏，是非曲折全不管。

“十月战争”爆发后，埃及总统萨达特曾召见苏联驻开罗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向他表示埃及再也不能容忍以色列的侵略行动。萨达特指出：“我们可能被迫很快采取行动。”他要维诺格拉多夫转告勃列日涅夫：“苏埃条约不久就要受到一次真正的实际考验。”

苏联知道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即将发动一次反侵略战争，在10月4、5两日，从埃及和叙利亚撤走它的非军事人员及其家属，并且故意大事张扬。原来停泊在塞得港和亚历山大港的苏联军舰也奉命驶往公海。这些都无异告诉以色列，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将对它采取行动。

10月6日上午，基辛格接到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肯尼思·基廷来电话，梅厄要他转告，以色列已掌握埃及和叙利亚将在几小时内发起进攻的情报，要求美国运用影响，阻止事态发展。基辛格从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证实了以色列这一说法的可靠性后，向正在比斯坎岛度假的尼克松汇报。基辛格根据尼克松的指示，先打电话给埃及和以色列的外长，劝告双方克制，接着又打电话给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要苏联“竭尽全力制止埃及和叙利亚”。

多勃雷宁向苏联政府汇报后告诉基辛格，苏联同意美国的意见，并将据此行动。到了下午1时35分，苏联驻埃及大使打电话给埃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哈非兹·伊斯梅尔，询问是否可以会见萨达特。萨达特估计苏联大使可能是为阻止埃及反击以色列侵略而来，而这时离预定的反击时间已不到半小时了，决定拒绝接见，从而避免了苏联的再一次干扰。

然而就在那天晚上，战争爆发6个小时后，苏联驻埃及大使紧急要求埃及总统同意在48小时内停火。萨达特予以拒绝，他说，在主要目标未达到之前，他不想听到“停火”二字。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苏联仍然认为埃及最终要失败，一个劲地促使萨达特同意停火。萨达特仍然拒绝。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苏联赶紧给他提供一些新型坦克。因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坦克战——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次都大——正在西奈展开。到西奈之战结束时，大概有数千辆坦克投入了战斗。

开始时，国际上尽是很难相信埃及人能战胜以色列的报道和议论。但从第三天起，每个人都清楚了：以色列处于严重困境。战争的头3天，以色列在叙利亚和埃及前线损失了1/3的空军。叙利亚人在戈兰高地取得了新的进展。埃及人在西奈重创了以色列精锐的坦克部队，埃及的坦克损失也不小。形势的发展大大地有利于埃及人。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大为震惊，公开宣称，埃及人通往特拉维夫的道路畅通无阻。情绪低沉的达扬曾提出辞呈，但果尔达·梅厄总理没有接受。后来她回忆说，“十月战争”头几天，“在我的经历中，近乎是一场灾难、一场恶梦，它将使我永生不忘”。

战争爆发后，尼克松为了维持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责成基辛格“同所有有关方面接触，并敦促他们尽一切力量结束战事”。基辛格打电话给埃及外交部长扎那特威胁说，如果战斗不尽快停止的话，事态可能无法控制，并将以以色列取得胜利而结束。他还要多勃雷宁转告苏联政府，不要“采取

构成威胁缓和的不负责任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命令第六舰队派攻击型航空母舰“独立号”和3艘驱逐舰驶往地中海克里特岛海面，进行武力示威。

10月7日，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发表评论，提出“必须在众所周知的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决议的基础上，从政治上解决冲突”。勃列日涅夫在给尼克松的一份电报中，表示苏联“同美国一样希望限制中东冲突”。但是，当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已经打出一派大好形势时，苏联就改变手法，竭力做出支持和声援阿拉伯国家的姿态。苏联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把勃列日涅夫的信件递交给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力促阿尔及利亚“利用他们拥有的一切手段，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支援叙利亚和埃及进行以色列侵略者强加于它们的艰苦斗争”。从10月10日起，苏联进一步向埃及、叙利亚实施紧急空运计划。当天至少有80架苏制安—12型运输机装载地对空导弹、反坦克火箭和其他军用物资运达叙利亚。

随后，苏联又通过海运提供军火。苏联政府还要求驻中东地区所有大使向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转达勃列日涅夫的口信，说什么“不要让埃及和叙利亚单独作战，要用你们的一切手段援助它们。我们方面，我们要向它们提供各种援助”。

以色列统治集团内部，由于巴列夫防线的失守和战争的失利，发生激烈的争吵。国防部长达扬责怪后勤工作没有做好，说坦克的弹药快要用尽，军服特别是冬内衣严重短缺。司法部长夏皮罗则要求国防部长辞职并承担战败的责任。梅厄忧心忡忡，手足无措，她在10月12日写信给尼克松总统要求美国提供“紧急援助”。美国认为战争如果以以色列的失败或削弱而告终，苏联就将成为阿拉伯世界永久的主宰势力，从而危及美国在中东的根本利益。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以为，现在对他们来说，“不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而是华盛顿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意志的考验……俄国的大炮决不允许胜过美国的大炮”。

10月13日，尼克松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立即向以色列大规模运送军事物资。当天下午，67架C—5A型军用运输机装载大批军火空运以色列。

40多架原属美军库存装备的鬼怪式飞机也抽调出来，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直飞以色列。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说：“我们是根据苏联人给了阿拉伯人什么来规定我们应提供什么武器的。我们希望力量平衡。”16日，美国还派出2000名海军陆战队加强地中海的第六舰队。

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苏联想通过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劝说萨达特停火，遭到铁托拒绝。

10月16日，柯西金亲自前往开罗，竭力鼓吹就地停火。他气势汹汹地责问萨达特，为什么要把这场战争选择在对苏联外交关系至关重要的时刻进行。萨达特回答说：“我不是苏联的主席，而是埃及的总统。”“我们是在认为对埃及而不是对莫斯科最有利的时刻采取行动的。”

柯西金接着又大肆恐吓，声言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交战双方对武器的需要量加速增长，这就使供应武器的两个超级大国有卷入冲突的危险。他提出了一个停火方案，但又不肯对强迫以色列撤出西奈作出任何保证。柯西金在开罗访问4天，会谈5次，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柯西金提出的停火方案主要内容是：第一，双方停火，以色列在两个月

的期限内撤出占领区；关于有利于以色列边界的修改，可以讨论。第二，由联合国武装部队监督停战线。第三，和平谈判所确定的边界由美国和苏联予以共同保证。

苏联积极策划停火，正适应以色列的迫切需要。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打击下，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它总共不过 330 多万人口，其中犹太人约占 280 多万，根本无法在一场战争中较长期地支持下去。为了增加兵源，以色列不得不把征兵年龄上限从 45 岁改为 50 岁。战争中大量的物资消耗，造成以色列的财政严重困难。它决定征收战时特税，广大人民怨声载道。

以色列在国际上的处境也十分孤立。战争爆发后，它遭到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严厉谴责，有 20 多个国家相继同它断绝外交关系。西欧和日本出于对中东石油供应的关切，同它的关系也趋向冷淡。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以色列将进一步陷入被动局面，甚至面临绝境。以色列于是抓紧苏联兜售停火提供的喘息机会，出其不意地对埃军进行疯狂反扑。

在华盛顿，以色列最坚决的支持者美国政府开始担心出现最坏的局面。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西奈战争还在进行，华盛顿接到以色列的紧急要求，要 400 辆坦克弥补其损失。与此同时，尼克松政府得到美国军方情报说，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节节失利。当以色列方面的战况恶化的时候，美国官员们，特别是国务卿基辛格便着手策划停火了。首先基辛格要求以 10 月 6 日战争爆发前的界线为基础，实行停火；后来，当他看到以色列濒临失败时，他呼吁在 10 月 13 日战线基础上实现停火。那条战线表明了埃及在战争的第一周取得的战果。然而萨达特拒绝接受停火，除非以色列同意从 1967 年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

且说以色列初战受挫之后，利用美苏斡旋停火的机会，重整旗鼓。为避免两面受敌，首先向叙利亚发动猛攻，使叙军遭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他们对埃及的军事设施和靠近苏伊士运河两岸的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以色列坦克和步兵穿过西奈的埃及防线，跨越到苏伊士河西岸。当这支以色列的先头部队缓慢推进时，一些埃及军人劝说萨达特自东岸撤军以保护埃及城镇，萨达特不同意。他深信埃及能阻截以色列军队的延伸，并使越过运河的以色列军最终陷入罗网。但是，不论怎么说，以色列至少是成功地搅乱了整个军事形势。

从 10 月 14 日起，以色列依靠美国源源不断的军火补充，在西奈前线集结大量兵力，组成 3 个旅群，对埃及军队展开正面攻击。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坦克战是地面战斗的主要形式。

14 日早晨，埃以双方在运河东岸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坦克会战，双方投入的坦克数量超过 1600 辆。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战。

为了迎击以色列的进攻，10 月 14 日这天早晨，开罗电台广播道：“在真主的慈悲和同情下，今晨 6 时，我们的武装部队根据计划，开始向东进攻。……我们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全线胜利前进。”这是埃及的拂晓进攻。在进攻之前，先由炮兵进行了 90 分钟的炮击。正如以色列方面所料，埃及出来求战了。也正如以色列前线指挥官戈南和巴列夫将军所预见，这使得以色列坦克手有了他们一直在寻找中的目标。

这次进攻并不是在相隔一段平静时期之后开始的，因为自从开战第一天起，战事就没有停止过。但这时埃及军力已得到大规模加强。3 天以来，部队和坦克通过浮桥不断地开到运河东岸。据军事观察家估计，在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的 3 天之中，又有 500 辆坦克跨过苏伊士运河驶到西奈半岛，埃及在战场上的坦克总数增至 1000 辆以上。同时，以色列坦克通过西奈半岛各山口西驶，它们的数目也随着叙利亚威胁的下降而日渐增多。

到了 10 月 13 日星期六下午，部署在吉迪、密特拉两山口以西地区的以色列军队，可以看到沿着运河河岸，掀起一片尘烟，从苏伊士市向北移动。埃及进攻的中心看来在湖泊地带。这次坦克大战，比起 1942 年 10 月在开罗 200 英里外进行的“阿拉明战役”的坦克数目还要多，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埃以双方出动的坦克在 2000 辆以上。

由于坦克一直被认为是骑兵的“接班人”，因此一般人认为，坦克战是骑兵战术和老式海军战术的结合，一队队坦克驶过沙漠，把身子横过来，用炮火轰击敌方。

埃及坦克部队拂晓发动进攻，天色还黑的时候便已出动。这样，东边的光亮，就会把出现在天际的以色列坦克的黑影映照出来。现场的景象是不难想象的：几百辆坦克隆隆前进，在沙漠中扬起阵阵沙尘：有时疾驰，每小时 20 英里，有时在危险地带缓缓爬行；钢铁履带轧轧作响，600 马力引擎轰鸣，浑身是汗的驾驶员吃力地调换排挡；偶尔有一声炮声，那是指挥坦克发现以色列坦克踪影时发射的冷炮。激战开始了，不时有炮弹击中装甲钢板的巨响，驾驶员们从一辆辆被打坏的坦克中跳出，被炸得瘫痪的坦克燃起熊熊大火，阵阵油烟卷着沙尘冲天而起……

一名以色列坦克指挥官在战后回忆说：“在 10 分钟内，我们击毁了 20 辆坦克。当埃及第一批攻击坦克穿过一个谷地，爬上我们南边的一个高地，我们的部队在高地上迎战。经过双方一个多小时的厮杀，我们把他们首批进攻的坦克消灭了。”

“其后，沉寂了片刻。埃及方面开始炮轰，再沉寂。紧接着，第二批攻击坦克驶过来了。一共有 145 辆坦克，等他们驶进射程之内，我率领全部力量迎击。”这位以色列坦克军官继续说，“埃及方面打算用炮兵支援坦克。我们消灭了坦克之后，开始轰击他们的炮队。”

以色列官方宣称，在 10 月 14 日这一天，以军共击毁了埃及 250 辆坦克，其中，大部分是在头一两个钟头的战斗中击毁的。到了当地时间上午 7 时，以色列军事发言人声称，攻击已被“遏止”。

在坦克大战的第二天，10 月 15 日，以色列根据美国间谍卫星和高空侦察机提供的情报，向埃及第二、三军团防卫薄弱的防线结合部派出一支装甲先遣队。他们身穿埃军制服，口操阿拉伯语，乔装成前线调防的埃军，驾驶“六五战争”中缴获的 13 辆 T—54、T—55 型坦克，在大苦湖以北地区偷渡运河，突入西岸，隐蔽在德维斯瓦果园林中。第二天，以色列增调后续部队，扩大突破口。

10 月 17 日，以军在渡河地点建立桥头堡，并架起浮桥。窜入西岸的以军从 18 日起进犯埃军阵地，破坏埃军交通线和通讯联系，摧毁埃军许多防空导弹发射场和炮兵阵地，使埃军在运河中段的防空火力配系陷于瘫痪，从而掌握了这一地区的制空权。埃军紧急调动后备部队进行围歼，河东阵地上的埃军大炮也掉头猛烈轰击。以色列这支装甲先遣部队受到重大伤亡。但是，

以军继续大力增援，到 19 日晚上，突入运河西岸的以色列部队已增加到 4 个坦克旅、1 个机械化旅和 1 个伞兵旅。

苏联对阿拉伯人民的斗争完全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当战局发展对埃及不利，又兜售停火把戏，向埃及施加强大压力。当以军窜到苏伊士运河西岸，深入埃及腹地，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战斗处于紧要关头之际，苏联不仅没有向埃及提供新的武器，而且连原应在 10 月 6 日前运到的武器，也突然停止运送。埃及空军中苏制直升飞机竟有一半由于缺乏配件而不能起飞，而这些配件只要用一架普通客机运来两箱就足够了。埃及军队急需坦克打击以军，阿尔及利亚为此已付了 1 亿美元的现汇，苏联仍拒绝供应。苏联还冻结了对埃及的非军事援助，甚至向埃及逼债，索取 8000 万美元的利息。

另一方面，苏联却向以色列提供它所迫切需要的人力。据以色列官方统计，从 1961 年到 1970 年的 10 年中，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共 10330 人，而在 1973 年 1 年内就达 33600 人。其中发生战争的 10 月份，有 3660 人，创苏联历史上犹太移民数的最高月纪录。有些苏联移民一到以色列，就分配到部队服役，充实了以色列的军力。

埃及政府和人民坚决顶住了苏联的压力，在缺乏有效武器的情况下，及时地从其他阿拉伯国家取得了军火支援和补充，阻止了以色列侵略军在运河西岸的进攻。

10 月 19 日，柯西金从开罗回到莫斯科。苏联鉴于策划就地停火不成，决定撇开埃及，单独和美国谈判，达成一个停火协议，然后再强加给埃及。当天，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向基辛格转达勃列日涅夫邀请他在几小时内飞往莫斯科。同一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出一项咨文，在所谓“保持（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并从而获得稳定”的借口下，要求向以色列提供 22 亿美元的“紧急安全援助”，妄图通过加紧对以色列的支持，使它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以增加同苏联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

10 月 20 日凌晨 2 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夫·多勃雷宁陪同下，前往莫斯科。基辛格是秘密离开华盛顿的，但飞机起飞不久白宫就宣布，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博士“去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直接商讨如何结束中东的敌对行动”。

“在旅途中以及正式谈判开始之前，我的紧张心情暂时缓和下来，不再担心苏联人会利用阿拉伯人的激烈情绪来掀起一场反美运动了。”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但那天下午，沙特阿拉伯突然宣布，它和其他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对美国实行全面的石油禁运。这使我隐约感到将会出现另一种危险局面。”

“我曾经告诉多勃雷宁，”基辛格说，“在长途飞行横越几个气候带之后我从不立即进行谈判，在莫斯科时间星期天上午之前（即 36 个多小时之后）我不准备开始会谈。我和他都明白，在这段时间内，战局发展只会对我们有利。我曾一再告诉以色列大使西姆查·迪尼茨，要他转告以色列，一定要把仗打好，因为我们谈判停火的建议最多拖不过 48 小时。（最后证明，我的莫斯科之行使这段时间增加了一倍）”

在旅途中基辛格收到迪尼茨大使的两份报告。两份报告都如实地报告了以色列军队的进展情况。报告表明，以色列人确已了解到停火迫在眉睫，但又暗示，不管在莫斯科的谈判情况如何，以色列部队由于过分疲惫将会限制它继续前进。迪尼茨在报告中说：

“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必须考虑到停火（或就地停火）很快就要来临的可能性。当停火生效时，我们应当控制一条具有政治和军事意义的战线。我们的部队必须发挥顽强的战斗精神才能继续推进。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自10月6日以来他们几乎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着艰苦的战斗。”

迪尼茨的第二份报告肯定，以色列部队已切断开罗至苏伊士城的公路，但预料埃及人会努力重新打通这条公路。埃及越过苏伊士运河的部队号称有两个集团军，每一个集团军约有35000人。第二集团军控制着运河北段，第三集团军部署在南段，正对着苏伊士城。如果以色列已切断开罗至苏伊士城的公路，那末第三集团军实际上已经被包围了。

基辛格在飞机上看了这两份报告后，立即回电在白宫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电示如下：

“我要特别强调，必须尽快地让我全面了解战斗进行的情况。我需要精确的估计，而且要快，要随时报告。”

“迪尼茨必须——我重说一遍，必须——一天至少三次向你汇报，并且必须立即把这些汇报转来。告诉他，要他立即把联络系统建立起来，如果还没有这样做的话。这些报告必须核对清楚。”

“如果我不能全面了解最新情况并确切知道战场上的情况，就难免要犯错误。”

飞机快到莫斯科了，这时基辛格感到他的谈判地位是十分有利的。以色列似乎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出乎意料，他接到尼克松的一封电报，信心突然发生了动摇。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在飞赴莫斯科的途中，哪里知道10月20日这一天竟是决定总统命运的一天。国内发生了那个被称为‘星期六夜晚大屠杀’的戏剧性事件。我们全被蒙在鼓里：特别检查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拒绝接受经过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检查的尼克松的录音带摘要；他要求交出录音带的原件。尼克松提出另一个建议，要交出录音带，他得放弃调阅其他文件的权利，但也遭到他的拒绝。尼克松被迫摊牌，把考克斯解职。这样一来，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和司法部副部长威廉·拉克尔肖斯也都相继辞职。”

然而，基辛格到莫斯科后，实际情况却比他所预料的“顺利”。开始是斯考克罗夫特发来的急电，转述尼克松想通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立即转交勃列日涅夫的信件的原稿。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尼克松授予基辛格“全权”，信内还提到“在你们商谈的过程中，他（基辛格）所做的承诺将得到我的全力支持”。尼克松的信还向勃列日涅夫作如下的呼吁：

“我们两人要坚定地承诺，为实现该目标（持久和平）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并成为该地区我们各自朋友的坚强的有说服力的领导。我将致电基辛格博士，要他口头向你转达我个人有关这方面的坚定的承诺。”

苏联领导人一看到信，喜出望外，他们立即拍板定案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几小时之内，勃列日涅夫的复信就到了华盛顿。信中说：“完全像你所说的那样，我理解基辛格博士是你所充分信任的最亲密的同事。这次也将代表你讲话，并理解在我们同他商谈的过程中他所作的承诺，将得到你的全力支持。”勃列日涅夫也照样不拘礼仪地亲笔附加了一句话：“勃列日涅夫夫人感谢你们的问候，并同我一起向尼克松夫人和你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历史将会证明我不曾多次拒绝授权。”基辛格说，“但这一次使我十分恼火。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授予‘全权’只能束缚谈判的灵活性，



而不是增加谈判的灵活性。”

“现在立即结束战争更有必要了，不然的话，我们国内的政局激变就有可能为苏联人所利用。”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因此，我坚决按照我出发前由尼克松批准的有限计划去办。勃列日涅夫也急于要求停火，因而尼克松的信里对我有什么指示也无暇深究了。”

就这样，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背着阿拉伯国家和人民进行紧张的政治交易，于10月21日晚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关于中东问题的联合提案。它的主要内容是：

——要求现在战斗的一切方面，在它们目前占领的阵地上立即停止一切射击并终止所有的军事活动，至迟不得超过本决定通过后12小时。

——要求各有关方面于停火后立即开始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号决议的所有部分。

——各有关方面于停火时起，在适当方面主持下，立即同时开始谈判，目的是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0月22日凌晨，安理会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操纵下，未经各成员国充分协商，就强行通过这一决议草案，即第338号决议。这一决议既不对以色列的侵略作任何谴责，也没有明确规定以色列必须从侵占的阿拉伯国家领土上无条件地全部撤走，更只字不提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却竭力压逼阿拉伯国家在12小时内放下武器，停止战斗。这实际上是把“不战不和”的局面重新加在阿拉伯人民头上。

为了促使埃及接受，苏联驻埃及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在10月21日方案出笼后，三次求见萨达特。在当晚一次会见时，转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信中保证以色列在停火后完全撤出一切被占领的土地，回到“六五战争”以前的经过一些小的修改的边界，逼萨达特接受停火。

22日晚7时，埃及接受了安理会“就地停火”的决议。

叙利亚也是在同苏联接触后，被迫于10月24日宣布接受“就地停火”。叙利亚全国进步阵线中央领导机构当天发表声明，叙利亚“决定在下述基础上接受安理会决议，这个基础就是：安理会决议意味着以色列从1967年6月以及在这以后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走其全部军队，并且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安理会的“就地停火”决议遭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坚决反对。

10月22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在贝鲁特宣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拒绝联合国安理会当天通过的这个决议，表示为了恢复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巴勒斯坦人民将继续战斗到底。

美苏炮制的这个决议受到以色列的欢迎。以色列当局10月22日发表声明说，它同意根据安理会通过的美苏提案实施停火，同时扬言“军事部队将保留在实施停火时所占据的阵地上”。以色列总理梅厄在23日的电视讲话中公然扬言：以色列在接受安理会停火决议的同时，“将坚持不会退到1967年6月4日的边界线”。以色列在接受“就地停火”决议的当天，就在苏伊士运河东西两岸和戈兰高地发动了新的进攻，侵占了更多的埃及和叙利亚土地。

由于以色列在“就地停火”决议的掩护下，继续侵略阿拉伯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应埃及要求，于10月23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本来预定中午12时开始，但是美苏两国代表幕后交易尚未谈妥，推迟到下午4时35分才开始。

美苏联合提出了一个所谓监督中东停火的决议草案，要求联合国秘书长“采取措施，立即派遣联合国观察员监督以色列部队和埃及部队停火，并为此目的使用联合国目前在中东的人员，首先使用目前在开罗的人员”。苏联代表在这一决议草案尚未发给安理会各成员国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强要会议通过。

在开罗，苏联驻埃及大使将这项决议草案拿给萨达特看。萨达特指出，草案没有要求以色列撤回到10月22日第一次停火时的界线，因而听任以色列占据了由于违反停火而夺到的地盘。苏联大使竟说现在修改会把问题搞得复杂化。他恫吓说：“总统先生，那末，你是否希望我们投票否决它呢？”埃及只好被迫接受了这个决议草案。

苏联本来就盘算着如何利用阿拉伯国家的暂时困难，通过“监督停火”，把军队开进中东，扩大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在“监督停火”的决议草案强加给安理会以前，就有一些苏联陆军和后勤部队处于戒备状态。

10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新的侵略行动时，埃及外交部长扎耶特提出要求美苏派出部队监督中东停火。这正符合苏联出兵中东的企图。苏联代表马立克立即表示，埃及的要求“无疑是正当的和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10月25日，马立克又表示，苏联对此是采取积极态度的。但美国代表斯卡利坚决反对，斯卡利表示当前“并不是大国卷入、通过派遣武装部队就能有助于产生和平条件的时机”。美国白宫发言人沃伦也在当天公开宣布：“美国不打算派军队去中东，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也不派军队去中东。”美国反对的原因是防止苏联重返埃及，恢复和加强同它争霸中东的地位。

然而，苏联决心进行赌博。就在10月25日这天晚上，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电话中向基辛格口述勃列日涅夫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信中表示由苏美派遣部队到埃及，并说：“如果你觉得在这件事上不能同我们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面临有必要紧急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步骤的问题。”这时苏联政府实际上已作出紧急决定，命令军队处于局部动员状态，并集中一定的兵力，准备开赴埃及。

为此，苏美关系骤然紧张。尼克松说：“这是古巴事件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他要国家安全委员会采取一切可以确保“安全”的措施。

10月25日深夜11时，基辛格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在白宫地下“情况室”紧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出席的有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尔、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比等人。会上研究了勃列日涅夫的来信，一致认为此信调子“生硬”、“粗暴”，“使人难以想象”。同时分析了有关苏联集结兵力的情报：又有4个苏联空降师处于戒备状态，总数达到了7个空降师，约50000人，其中一个师已进入更高一级的戒备状态，随时可以开始行动；地中海的苏联舰只已增至85艘，东地中海出现了7艘苏联登陆艇，还有两艘载有运兵直升飞机的舰只；苏联在本土南部设立了空降部队指挥所；10多架安—22型运输机正在飞往开罗，有可能是苏联大规模空运部队的前奏。

鉴于苏联军队调动情况，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决定，美国海陆空三军，不论是常规部队还是核部队，立即处于戒备状态。

11时半，施莱辛格下令大部分美军进入“三级戒备”，即取消官兵的一切假期，部队集中待命。

10月25日凌晨，美国全球武装部队220余万人，包括核打击力量、战略空军司令部，全部进入三级戒备，其中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等还进入二级戒备。航空母舰“肯尼迪”号载着鬼怪式飞机从大西洋驶往地中海。一向被视为美国“迅速反击力量”的15000人的第八十二空运师，奉命准备在25日早晨6时出动。

在中东，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继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和1967年“六五战争”后，又一次剑拔弩张，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局势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后来，苏联和以前两次一样，首先软了下来。美国宣布武装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后几小时，苏联就通知联合国，它不坚持派部队到中东去了。

在10月25日的安理会会议上，通过了几内亚等8国联合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决定成立一支除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外的联合国会员国组成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派往中东监督停火。10月27日，安理会通过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为建立一支紧急部队提出的报告。报告规定这支部队总人数为7000人，并任命芬兰的恩肖·西拉斯沃少将为紧急部队的临时司令。至此，两个超级大国在联合国出兵中东问题上争吵的丑剧才告收场。

欲知中东人民的斗争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三十章 斗争在继续

不可战胜是神话，闯墙之争多恶声；  
团结奋斗无穷期，石油武器显威风。

“十月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遭到沉重打击。据统计，以色列共投入 40 万兵力，伤亡达 5000 余人，其中死亡 2400 人，损失飞机 200 余架，坦克近 1000 辆，舰艇 30 余艘，物资消耗与财产损失超过 70 亿美元。

这样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失，使得本来就已债台高筑的以色列经济陷于一片混乱：财政赤字增加，外汇储备迅速枯竭，通货急剧膨胀。以色列人民对工党政府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十分不满，许多人公开表示希望迁离出境。

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以色列统治集团内部互相争吵，乱成一团。

1973 年 3 月以微弱的多数勉强拼凑起来的梅厄内阁，对战争失败的责任互相推委。为了平息争吵，在各派力量的压力下，以色列当局在 11 月 18 日决定成立所谓调查委员会，调查战争失利的原因。调查委员会将以色列在“十月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没有得到准确的情报，把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军事情报局长泽拉作为替罪羊，迫使他们辞职，为总理梅厄和国防部长达扬开脱，这种丢车保帅的做法，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一场更大的风波。梅厄内阁已经无法维持下去，她无可奈何地哀叹：“我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走不下去了。”

按照宪法规定，以色列的议会选举要在 1973 年 12 月 31 日举行。选举原安排在 10 月 30 日，即第七届议会任期届满的时候，但由于战争，任期作了延长，超过了法定的时间。选举有两点具有特殊意义。选举结果将表明公众对刚过去的事件的意见——政府由于赎罪日战争的“灾难”而受到尖锐的批评，选举结果将决定以色列今后要走的道路。

达扬说，对过去的批评并不只限于这次战争。批评还直接针对政府的总政策，一项未能同阿拉伯人实现和平的政策。对于未来也存在着同样的忧虑不安。需待决定的是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这既关系到战争结束以后立即面临的问题（包括日内瓦会议），又关系到以色列在世界上的总的政治地位，密云布满了以色列的上空。阿拉伯国家由于实际上垄断着一种必不可少的能源，而在世界事务中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石油资源也使他们大发其财，迅速成为世上的大富豪。而另一方面，以色列却变得越来越孤立，最糟糕的是，“它的人民陷于深深的沮丧之中”。

“对我来说，选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公众对政府的批评中，他们对我另眼相看。”达扬说，“作为国防部长，我在军队和战争的指导上要对议会负责。在个人的问题上，由于在这次战争爆发前，我在军界和政界已享有一定的声望，人们对我的要求，就比对别的国防部长要高得多。抗议运动、报刊、知名人士，甚至一些军官都要求我辞职。”

对于战争的“失误”，达扬作了如下的自白：

“赎罪日战争占满了我的整个内心生活，沉重的忧虑和悲痛交织在心头，还要不断地努力集中自己的思想。这是我遇到的第四次战争。第一次是我们的 1948 年独立战争，那时我 25 岁，在战斗中指挥着一个突击营。既有

悲伤，也有欢笑。职责范围和心理上的压力只不过局限在 3 个连队之内和限于拿下下一个山头这类的任务。成功地完成任务以后——通常总是完成的——我就可以用我的头巾包住脸，埋头睡大觉。1956 年的西奈之战和 1967 年的 6 天战争也不难打。当时，埃及人被打败并逃跑了；叙利亚人还没有地对空导弹，约旦人还没有空军。

“赎罪日战争就不同了。这个仗不仅难打，而且进行这次战争的气氛也不好。我们要对付的是装备着大量强火力的装甲车、枪炮、地对空导弹的雄厚兵力。即使我们摧毁了几百辆坦克，也没有使一个人显得兴高采烈。然而，只要我们的一个前线碉堡陷落，或是在一次行动中失去了 30 辆坦克，全国都会忧心忡忡。我们有些优秀的青年已当了军官，带领着他们的部队——飞行员、坦克手、伞兵——进行战斗。每天、每小时都带来新的不幸消息——丈夫被打死，儿子被打死，亲戚的儿子、朋友、熟人、同事、镇上和村里的邻居的噩耗，等等。我们的人民不愿去想以前发生过的其他战争曾是怎样的，也不愿去想欧洲曾发生过的情况。他们也没有由于没有出现某种局面——敌人没有突破到我们的居民聚居区，破坏仅仅限于前线——而感到庆幸。他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损失。他们看不到这样的客观事实：尽管我们是在抗击 100 万阿拉伯士兵和数量众多的苏联武器，我们仍正在地面和空中击败埃及和叙利亚军队。以色列人民由于他们的人牺牲、被俘或受伤而完全沉浸在悲伤和忧虑之中。他们其他什么也不考虑了。

“我也是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中，但我是国防部长，对今后的战争怎么打，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事态将会怎样发展？苏联大概会采取什么行动？美国将会怎样动作？约旦是否会开辟第三战场？阿拉伯军队是否会得到补充增援？我们在北线和南线能够做什么和需要做什么？这些问题是我日日夜夜无休止的内心活动所思考的一部分内容。我怀着极其犹疑和悲伤的心情，每日每时探求着作战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解答。

“在我看来，我们当前形势中主要面临着三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技术性的，如关于俄国人大量供给阿拉伯人的最新式尖端武器，特别是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的问题，以及我们必须找到适当的作战方法来制服它们的问题。第二类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同阿拉伯邻国未来关系的问题。我们在决定下一步军事行动时必须看远一些，要考虑到战后我们同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关系。我们应该不应该以夺取埃及和叙利亚更多的领土为目标？第三类问题是关于大国的态度问题。为了防止苏联的进一步卷入，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在北线的进展以及由此形成对大马士革的威胁，会不会促使苏联军队的积极参与？我们该怎么做，才能保证得到美国的支持——向我们供应武器，首先是帮助我们抑制苏联对我们的军事干涉。

“这次战争同前几次战争的根本不同点在于阿拉伯实力的变化。同过去相比，如今阿拉伯的实力是大得多，也强得多了。这就使我们的伤亡人数增加，并要求我们的人在战斗中作出最大的努力。在赎罪日战争中，阿拉伯军队、人民和武器方面的实力，大体上是‘六天战争’的 3 倍：部队 100 万人，过去是 30 万人；坦克 5000 多辆，过去是 1700 辆；飞机 1000 多架，过去是 350 架；野战炮 4800 门，1967 年是 1350 门。

“数量的增加还伴随着质量的提高。他们的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提高。除了新的防空导弹系统和反坦克武器以外，他们如今已使角苏联新型 T—62 坦克代替老的 T—34，还有质量很好的俄国新式装甲战车，即

BMD 装甲运兵车。阿拉伯部队装备着单兵携带的导弹，并学会了同进攻中的装甲车辆配合使用，也很有战斗力。”

达扬将军在做了上述“自白”后，得出结论说，在赎罪战争中“我完全自信我没有失职，我自己觉得完全有资格继续任职。但这主要要由公众来决定。很清楚，对我是否配做国防部长并被要求留任的问题，我必须得到一个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回答”。

达扬即便做了多次的“自白”和辩解，但仍没有缓和以色列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更没有消除人们对他和梅厄总理的不满。1974年4月11日梅厄提出辞职。5月28日，由以色列原驻美国大使伊扎克·拉宾为总理的新内阁组成。拉宾在6月3日宣誓就职时，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叫嚷以色列将继续霸占阿拉伯国家的土地，拒绝回到“六五战争”前的边界，并将继续从质量上和数量上加强军队。

“十月战争”虽然也给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带来重大的牺牲和损失，据外国通讯社报道，这些国家共投入70万兵力，其中伤亡15000余人，损失飞机400余架，坦克2100余辆，舰艇29艘，但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用自己勇敢的战斗行动，洗刷了“六五战争”中蒙受的耻辱。

在“十月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反击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同时，采取联合行动，发动了一场气势磅礴的石油斗争。这是第三世界反霸斗争的一个伟大创举。

长期以来，外国垄断资本一直控制着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它们像吸血鬼一样吮吸着中东劳动人民的血汗。截至1972年底，美国在中东的石油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为18.07亿美元，而1972年一年的纯利润就达24.19亿美元，利润率高达133%。美国石油消费总量有10%以上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美国在国外的军事用油，更是大部分依赖中东地区。苏联为了扩军备战和建立世界霸权，也早就垂涎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

1967年苏联开始从中东进口石油，当年10万吨1972年就增加到750万吨，1973年更猛增到1400多万吨。在激烈的石油争夺战中，美国公然叫嚷，“自由世界的未来，系于中东的富饶油田”；而苏联领导人也心怀叵测地声言，阿拉伯石油“实际上是国际财产”。

在1973年10月反侵略战争中，阿拉伯各国把石油作为捍卫国家主权、收复失地和反对强权政治的战略武器，采取减产、提价、禁运以及国有化等措施，配合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以色列侵略者及其支持者。10月6日爆发战争的当天，叙利亚首先卡断了一条输油管，黎巴嫩也关闭了输送石油的南部重要港口西顿。

10月7日，伊拉克宣布将伊拉克石油公司所属巴士拉石油公司中美国埃克森和莫比尔两家联合拥有的股份收归国有。接着，阿拉伯各国在短短的几天内连续采取了3个重要步骤。

10月6日，海湾地区的科威特、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5个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决定，将海湾地区的原油市场价格提高7%。

10月17日，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埃及、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10国参加的阿拉伯石油输出组织部长级会议宣布，立即减少石油产量，决定以9月份各成员国的产量为基础，每月递减5%；对于美国等支持以色列侵略的国家的石油供应，逐

月减少 5%。

10 月 18 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的阿布扎比酋长国决定完全停止向美国输出石油。接着，利比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巴林等阿拉伯主要石油生产国也都先后宣布中断向美国出口石油。

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斗争突破了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对国际石油产销的控制，打击了美国在世界石油领域的霸权地位。美国每天的石油进口减少了 200 万桶，许多工厂因而关门停工。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美国总统尼克松在 11 月 7 日一次关于能源危机的电视讲话中承认，美国“正在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能源不足的时期”。为了应付这个困难局面，美国宣布一系列节省石油和电力的紧急措施，其中包括：减少班机航次，限制车速，对取暖油实行配给，星期日关闭全国加油站，禁止和限制户外灯光广告等。许多居民不得不拾树枝生火取暖；于是，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到了夜晚一片漆黑，连联合国大厦周围和白宫顶上的电灯也限时关掉。尼克松下令降低他的座机飞行的正常速度，取消了他周末旅行的护航飞机。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法案，授权总统对所有石油产品实行全面配给。美国国防部正常石油供应几乎有一半中断。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和地中海的第六舰队不得不动用它们的战时石油储备。美国国防部还宣布，舰只行驶时间减少 20%，飞机飞行时间减少 17%，车辆最高时速 50 英里，并且降低各种军事设施的冬季室内的取暖温度。

石油斗争促使美国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美国石油垄断组织不顾人民的死活，利用“石油危机”囤积居奇，哄抬油价，牟取暴利。一些个体经营的卡车司机为了抗议石油涨价，用卡车封锁公路。“石油危机”使中小企业和垄断资本的矛盾也加深了。

美国为了对抗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斗争，威胁要使用武力占领这些国家的油田。美国的恫吓遭到阿拉伯国家的迎头痛击。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利比亚发出严正警告，如果美国军队胆敢武装侵略，就立即炸毁油田和有关设施。阿拉伯国家针锋相对的坚决态度，迫使美国不敢贸然动手。

阿拉伯国家采取分别对待的策略，根据进口中东石油的国家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将它们分为友好、中立、不友好三类；以达到利用矛盾、集中力量打击美以侵略者的目的。凡符合如下 3 个条件之一的国家划为友好一类，可以获得阿拉伯产油国减产前的供应数量：第一，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第二，对以色列实行某种经济制裁；第三，为阿拉伯各国提供某种军事援助。凡积极资助以色列侵略者、反对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事业的国家，则被划为不友好一类，停止对它们的石油供应。

随着工业和民用事业的发展，进入 7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能源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西欧的石油消费基本上依靠进口，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就是中东地区，从那里进口的石油一般占整个西欧总进口量的 80% 左右，许多西欧国家为了获得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供应，加上不满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问题上推行强权政治，都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采取拒绝合作的态度。例如，英国不许美国利用它的国内和海外领地的运输设施为以色列转运补给；西德禁止美国供应以色列的军火从西德港口起运；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国不允许美国飞机在其领土着陆或飞越其领空。由于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阿拉伯国家表示支持和同情，阿拉伯国家就把它们划入友

好一类，在石油供应上给予优待。

日本消费的石油 98% 依靠进口，而进口石油中的 80% 来自中东地区。它起初采取所谓“中立”立场，阿拉伯国家就把它划到中立一类，限制对它的石油供应。

11 月 22 日，日本政府发表 4 点声明，表示以色列军队应从“六五战争”所占领的土地上撤出，应当承认与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并敦促以色列遵守联合国宪章原则，否则“将重新考虑对以色列的政策”。由于日本的态度有了改变，阿拉伯国家就把它改划为友好国家。

西欧各国和日本鉴于美国支持以色列侵略而导致阿拉伯国家发起石油斗争，使它们在经济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就不顾美国的反对，纷纷同阿拉伯产油国直接“对话”，谈判双边贸易协定，发展经济关系，以谋取今后稳定的石油供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十分懊恼地说：“我们的一些盟国实际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把它们自己同我们公开分开。”

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武器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鼓舞了第三世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保护民族经济权益的斗争。它为第三世界的反帝反霸斗争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在此情况下，基辛格博士对中东问题的斡旋、调解更是马不停蹄。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三十一章 基辛格在中东

穿梭之行为和平，转圜才知化雨功；  
化剑为犁众所盼，和平谈判在运行。

被称为“中东旋风”的基辛格，在1973年11月，为了给中东带来和平，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了“非凡的外交努力”。他抓住赎罪日战争余波未平这一有利时机，把他的精力、声望和才智投入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方面撮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达成协议，同时劝说费萨尔国王和他的朋友对美国解除石油禁运。基辛格打算让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退，但要“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他赞成恢复阿拉伯人的尊严，但要考虑现实和责任。于是，已经名噪一时的基辛格越发显赫起来，有些美国人竟说他不是“国务卿”而是“世务卿”了。

基辛格看到16大战争的伤痕，看到那条很容易重新燃起战火的犬牙交错的停火线，意识到他的时间很紧迫。以色列军队正在收缩它对埃及第三军的包围圈，似乎一心要夺取早先由于基辛格10月22日的停火呼吁而没有拿到手的胜利。只是在国务卿向梅厄夫人提出警告，说再这样下去美国可能放慢援助之后，以色列才允许护送125辆载运救济物资的车队通过停火线到苏伊士城。埃拉扎尔将军一再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由于以色列不顾美国的压力，拒绝开辟一条通往苏伊士城和第三军的固定走廊，萨达特威胁说，“我的健儿们”如有不测，就要“采取行动”。

基辛格立即安排了去阿拉伯世界的首次旅行。

1973年10月27日，开罗《金字塔报》破例全文刊登了基辛格10月2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与此同时，基辛格获悉，萨达特已同意他在11月6日飞赴开罗会谈一天。第二天萨达特电告基辛格说，他将派高级特使伊斯梅尔·法赫米前往华盛顿进行一轮初步会谈。基辛格告诉萨达特说，法赫米此行“时机不成熟”。萨达特的答复是，很抱歉，他已经在路上了。

当时基辛格之所以不愿接待法赫米，是因为他已经邀请了梅厄夫人在这时访问华盛顿。他从以色列大使迪尼茨那里了解到，梅厄夫人需要尼克松总统再次作出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保证。埃及和以色列同时计划同美国商谈，是个意外良机。这为国务卿基辛格第一次提供了充当中间人的机会，来全力保持停火和促使埃以之间进行外交接触。这两个交战国都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都怕自己沦为大国工具，所以双方都欢迎基辛格的这番努力。

萨达特相信这位国务卿是能够创造奇迹的。他认为，由于基辛格不必担心被人加上反犹太主义的罪名，因而可以成为能够说服以色列放弃其侵占的阿拉伯领土的第一位国务卿。

从梅厄夫人方面说，她深知以色列依赖美国的程度很深，所以她说，以色列对美国在调解方面所作的真诚努力，既不能也不会从中作梗。显而易见，以色列从1967年战争以来所采取的战略已经弄巧成拙。萨达特不但没有乞求以色列进行谈判，反而拿起武器，越过运河，一举打破了中东的军事和心理的均势。当时梅厄夫人希望基辛格作为国务卿能够说服阿拉伯人同以色列和睦相处。

10月29日，法赫米特使飞抵华盛顿，当时基辛格刚刚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法赫米是一位举止文雅的埃及外交官，他即将接替

扎耶特担任埃及外交部长。有一位议员说，埃及和苏联关系密切，他想知道“为什么法赫米要到这里来”。基辛格当时是这样回答的，“因为他虽然可以从苏联那里得到武器，但只有从我们这里才能得到领土。”这一简单的现实，后来成为基辛格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最重要的底牌。

10月31日，梅厄夫人飞到华盛顿，第二天她会见了尼克松，并得到他的保证。后来，她引述美国总统的保证说：“以色列的安全和幸福是美国很关切的一件事。”一向钦佩以色列“胆量”的尼克松，很乐于同梅厄夫人交往。他笑着说：“总理夫人，您知道，我们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有一位犹太人当外交部长。”

在以后的3天里，基辛格往返奔波于法赫米和梅厄夫人之间，常常为缩小两方的分歧而忙到深夜。问题的焦点在于勃列日涅夫和基辛格在10月22日停火呼吁中提出的条件。埃及要求以色列退到10月22日的停火线。法赫米警告说，如果不答应，埃及就不能同意交换战俘。梅厄夫人争辩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10月22日的停火线究竟在哪里。她还坚持说，如果不交换战俘，如果不同埃及直接进行谈判（这是以色列长期以来在外交上的要求），以色列就不撤退。会谈中断了一会儿，因为11月2日晚，基辛格要在国务院欢迎叙利亚副外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当时这位叙利亚副外长正在联合国，他是应国务卿基辛格的邀请来华盛顿的。这个小小的迹象表明，甚至像叙利亚这样“富于战斗性”的阿拉伯国家，也愿意同基辛格一起进行范围越来越大的努力，促使3个主要交战国开始谈判。

在这3套交谈中，基辛格没有拿出美国的“埃以和解方案”，但是他的确提出过美国对于弥合双方分歧的一些设想。当这些“设想”第一次向梅厄夫人提出时，就遭到她的坚决反对。她问道：“为什么在这次战争中进行侵略的是埃及，它的军队倒可以留在运河东岸，而以色列却要撤出运河西岸呢？为什么调整战线时偏要以色列吃亏呢？”基辛格对此解释说：“以色列在25年中打了4场代价越来越大的战争之后，应该打破这种周期爆发战争的局面。为了和平，以色列应该放弃在战争中取得的战术性军事优势。”

但是基辛格同埃及特使法赫米打交道时，运气要好得多。尽管国务卿未能说服法赫米放弃以色列必须撤到10月22日停火线的主张，他却在一项临时性安排上取得了进展。这项安排是，在以色列同意开辟一条向苏伊士城运送物资的通道之后，埃及同意交换战俘。基辛格希望到开罗后能说服萨达特，让他对埃及要求以色列撤到10月22日停火线这一问题来取一种“更有远见”的看法。

到11月4日梅厄夫人和法赫米离开华盛顿时，基辛格总算拟就一项考虑了埃以双方观点的非正式的“六点方案”。他希望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两国进行谈判的基础。对国务卿来说，奔走于梅厄夫人和法赫米之间，是他中东外交的头一道难关。有一位记者天真地问道：“你觉得有意思吗？”他苦笑着说：“我跟越南人谈判时，我不知道我当时干得怎样。但是，那时越南人只有3方。现在阿拉伯人有4方，再加上犹太人的一方，简直跟但丁的《地狱》故事差不多。”

1973年11月5日晚上，基辛格乘坐一架特别设计的波音707飞机，开始了他的中东穿梭之行。这次他要访问摩洛哥、突尼斯、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5个阿拉伯国家。开罗是基辛格这次阿拉伯世界之行的主要停留地。在从突尼斯到开罗的4小时的飞行中，基辛格曾两次跑到座机后舱，去找他

允许随行报道这次旅行的 14 位记者聊天。基辛格同记者们交谈时，情绪乐观。他同哈桑国王和布尔吉巴谈话后已相信，至少有些阿拉伯领导人赞成“采取行动”去跟以色列达成永久性的解决办法。

但是关键人物还是萨达特。他可能在以色列撤至 10 月 22 日停火线的问题上接受一项妥协办法，从而为逐步同以色列和解打开大门；他可能同意美埃恢复外交关系，这样做可以对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产生有利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可能力促联合国作出一系列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到 10 月 22 日线。如果以色列拒绝，他可以要求联合国进行制裁。这样的行动会使以色列在外交上进一步孤立，并使已经开始感到石油压力的美国减少对以色列的支持，还会使美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遭到削弱。

基辛格不愿作任何预测。他小心翼翼地使报界减弱对他的期望。有人问他：美埃恢复外交关系怎么样？他审慎地回答说：“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也可能会提上日程。”然后基辛格的一位助手解释说，法赫米已就恢复外交关系同解决埃及第三军在西奈被围的问题联系起来。

基辛格在抵达开罗的当天，就同萨达特举行了 3 个小时的会谈。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单独会谈。这是基辛格的一贯作风。埃及和美国的所有其他高级官员西斯科、法赫米、艾瑟顿以及萨达特的亲密助手阿什拉夫·古尔巴勒都被请到花园去了。他们先是欣赏了一会儿喷泉和垂柳，然后把藤椅围成一圈，坐下来讨论中东的一般性问题。大约在下午 1 点半的时候，萨达特陪着基辛格从会议室走到花园里来，记者们一涌而上，官员们则退到后面。一个小型的记者招待会开始了。

一个记者问：“基辛格博士，谈得不错吧？”

基辛格和蔼地答道：“这是一次富有建设性的会谈。”

“基辛格博士，你还会到开罗来吗？”

“会来的，只要情况需要，我就来。”

一个美国记者问：“总统先生，美国现在会削减对以色列的空运军用物资吗？”

萨达特微微一笑说：“这个问题应该问基辛格博士嘛。”

基辛格插话说：“幸好，我没听见提的是什么问题。”

这番对话引起了一阵笑声，大大超过这句话本身应当引起的笑意。

“基辛格博士，埃及和美国会恢复外交关系吗？”基辛格笑一笑，有点窘，一句话也没说。这时萨达特主动回答说：“别急，今天傍晚你们就会得到消息的。”

果然，傍晚时，麦克洛斯基在希尔顿饭店大厅里举行的人群拥挤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两国“原则上”已恢复外交关系，两周内将互派大使。阿什拉夫·古尔巴勒博士将出任驻美大使，在国务院工作的阿拉伯问题专家赫尔曼·艾尔茨出任驻埃及大使。这样一宣布，萨达特就向苏联人表明，他可以直接同美国人打交道了。麦克洛斯基丝毫没有透露基辛格和萨达特会见的详细内情，但是塔赫拉王宫发生的情况表明，基辛格在很短时间内已取得了一项成就。他说服萨达特暂缓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到 10 月 22 日线，而把这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放到谋求埃以军队全面脱离接触这一更大的范围内加以考虑。

基辛格承认，他对“阿拉伯浪漫主义”有点担心。他提醒说：“和平并不是垂手可得的東西，要花时间才行，得要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看到一

点具体的东西。国际政治并不是魔术师变戏法。”

11月8日（星期四）上午，基辛格同法赫米热烈拥抱告别后飞往安曼，稍停，续飞利雅得。按照他的日程，他不在以色列停留。他这次到中东转了一圈，部分目的是要为自己充当“一视同仁”的调解人树立威信。他在飞行中跟记者们说：“西斯科前往以色列同梅厄夫人商谈，他将在约旦或沙特首都同我们会合。”

从安曼飞往利雅得的途中，基辛格不时闯进记者舱跟他们说笑一番，这显然是为了减轻他对费萨尔那个“极端反犹”的国王将如何对待他所感到的不安。有一次，他对3个是犹太人的记者一本正经地说：“你们3个最后下飞机。”又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只有祖籍欧洲，信奉新教的美国人才能在这里着陆。”他的眼睛扫了一下记者：然后问：“你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吗？”有几个人把手举起来。“好，”他决定，“那你们先走。”有些人神经质地笑了起来。有个记者说：“亨利，如果你能下去，我们也能下去，”

在这段飞行中，基辛格不愿谈实质问题。他对西斯科到耶路撒冷去的任务能否完成没有把握，也拿不准费萨尔国王如何对待他，以及对他要求解除石油禁运作出什么反应。所以他再一次设法用幽默的话来回避问题。他微笑着说：“我本想和你享受一下利雅得的夜生活，但据我所知，这里的夜生活下午4点钟开始，过一小时就结束了。”

基辛格在机场受到沙特外交大臣奥马尔·萨卡夫的欢迎。他在皇家宾馆稍事休息之后，就乘车前往红宫，第一次会见费萨尔国王。他被引进一间挂着深色帷幔的长方形房间。基辛格在香烟缭绕中可以窥见国王坐在屋子尽头的宝座上。两个体格魁梧的侍卫指引着基辛格朝国王走去，他们身穿黑袍，头缠黑白相间的头巾，手里拿着阿拉伯宝剑。国务卿走到国王跟前，同国王握了手。国王淡淡一笑。基辛格挨着费萨尔坐了下来。这时，他注意到，屋子两厢坐着几十个王子，一律穿着黑袍，不少人戴着墨镜，有的在喝咖啡。基辛格应国王之请，站起来同每个亲王都握了手。随后，基辛格和国王同意饭后进行单独会谈。那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为了创造一种良好的会谈气氛，基辛格想给国王留下一种“认真和诚恳”的印象。他一上来就告诉费萨尔，国王同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3任总统的来往书信他都看过。他说，他相信，根据这些文件，费萨尔国王完全有理由对美国的政策感到失望。约翰逊曾向国王担保，以色列会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联合国第二四二号决议敦促实现这种撤退；甚至尼克松也是这样主张的。然而，什么也没有兑现。另外，赎罪日战争爆发时，美国马上向以色列提供了军事物资。就在这个时候，费萨尔最后决定了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基辛格对国王的立场表示同情，但他提请国王注意某些“新的现实”。

基辛格把尼克松说成对以色列撤退“承担了责任”。他说，他个人相信，现在已经有可能解决问题。他要求费萨尔采取合作态度。譬如，国王是否支持召开和会？费萨尔说：“支持。”国王是否支持解除石油禁运？基辛格解释说，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禁运继续下去，在美国就要激起反阿拉伯情绪，那样一来，他在外交方面为了促使以色列逐步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而进行的努力，就会更加复杂化了。接着，费萨尔国王说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反对以色列推行“侵略和扩张主义”政策。他说现在犹太人“正在世界各地夺取当权的地位”。他告诉基辛格，犹太人打算统治全世界，但是他要用他的石油武器叫他们住手。费萨尔还说，犹太人是《古兰经》中唯一没有给说几

句好活的人，这一点决非偶然。

“犹太人必须放弃所有属于阿拉伯的土地，包括耶路撒冷。”对费萨尔来说，这才是关键所在。他想去世之前到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大清真寺去祈祷。他警告说，他历尽了那么多令人失望的事情之后，现在要运用他的石油武器，直到迫使以色列从耶路撒冷撤退为止。“这是不是说阿拉伯人一天不收复耶路撒冷，就一天不解除石油禁运呢？”费萨尔的回答比较含糊，基辛格得到的印象是，一旦以色列开始撤退，就可以解除禁运。

基辛格同费萨尔国王进行了异乎寻常的长谈后，回到宾馆。这时他的助手西斯科从以色列刚刚赶到。基辛格根据他同阿拉伯各国领导人及西斯科同以色列总理会谈的情况，提出了“六点协议”。这项协议是以基辛格致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信件的方式提出的。具体规定如下：

- 双方将“认真遵守”停火；
- 他们将“立即”开始会谈，商讨根据联合国主持下双方部队脱离接触和分开的协议，解决各方回到10月22日阵地的的问题；
- 苏伊士城将“每天得到粮食、水和药品供应”；
- “不得阻碍”非军事物资向东岸运送；
- 沿开罗—苏伊士公路将建立联合国检查站，以色列军官有权检查运往东岸的物品；
- 最后，一俟检查站设立后，立即交换所有的战俘，包括受伤的战俘。

11月11日，在开罗至苏伊士公路101公里处的联合国帐篷里，一位以色列将军和一位埃及将军举行了会晤，以实施基辛格的“六点协议”。这个地方原先是以色列占领下的一个检查站。以色列方面的阿哈隆·亚里夫是一个情报军官，埃及方面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加尼·贾马斯是一位军事战略家。他们的会晤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以方要对运往苏伊士的“非军事”物资进行检查，埃方则认为协议没有给以色列人这种权利。埃方要限制以色列对开罗—苏伊士公路的控制，以方却说虽然协议规定联合国在公路沿线设立检查站，但公路本身仍应由以色列控制。

当时正在访问中国和日本的基辛格，进行了3天远距离的幕后活动，才打破了这个僵局。

11月15日，两位将军就弥合双方分歧的程序取得了一致意见。在联合国部队沿公路设立检查站的同时，埃以双方交换了战俘：埃方释放了238名以色列人，以方释放了8000多名埃及人。这项措施为12月下旬召开日内瓦和会开辟了道路。

基辛格希望能够保持外交上进展的势头。他认为，在谈判的现阶段，为埃以双方寻求一个彼此都可以接受的除打仗以外的解决办法，是最重要的事情。

12月召开和会就是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基辛格希望开成一个讲究实效的会议，参加国包括4个主要交战国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以及背后分别支持这4个国家的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将代表起“保护作用”的机构联合国，作为这次会议的东道主。

为了促使这次和会的召开，12月8日基辛格又从华盛顿出发，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的中东穿梭之行。基辛格把希望寄托在萨达特身上。他说，这位埃及领导人有一种“一种长远目标感，一种现实感。他本可以像一些埃及报纸那样采取蛊惑人心的做法。然而他愿意听一听别人的意见，看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

法。他是很有头脑的”。基辛格一离开开罗，萨达特就派了一名高级助手阿什拉夫·马拉恩前往大马士革和波斯湾沿岸产油的酋长国，把他同美国国务卿长谈的情况告知这些盟国。

12月14日天刚黑，基辛格再次到达利雅得。他同费萨尔国王第二次会晤之后，便开始说国王是个“非常严肃的人，言而有信的人”。基辛格需要国王帮他一把，所以他说他欣赏国王所处的地位：治理着一个拥有占世界很大比例的石油资源的落后国家。基辛格还说，“一旦你理解了他生活于其中、行动于其中的那个天地”，你就看得出他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

基辛格在飞到大马士革时，他的估计是，“叙利亚的态度会很强硬的”。自1953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那里作过停留以来，基辛格是到叙利亚首都的第一个美国国务卿。他的飞机甚至还没有完全停稳，就被一批身材魁梧，手持冲锋枪的叙利亚士兵围了起来。基辛格走出机舱，迎面一股凛冽的寒风吹来。他受到一小批叙利亚官员的欢迎。他们很快就把他接到大马士革城里的总统府。记者们被请出房间以后，基辛格同阿萨德总统会谈了6个小时，比原定时间延长了4个小时。

基辛格对这位叙利亚“铁腕人物”采取了一种开诚布公、别出心裁的态度。他说：“我走遍了中东，人们都对我说跟叙利亚人没法打交道。请告诉我，总统先生，为什么跟叙利亚人没法打交道呢？”阿萨德为之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这一下子才打破了冷冰冰的气氛。从1967年断交以来，双方就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或代表机构了。他们回顾了在中东谋求和平所走过的道路。不出基辛格所料，阿萨德表明了反以色列的强硬态度，要求以军从戈兰高地全部撤出。而基辛格则强调和会，他希望阿萨德答应派代表团去。他把邀请书的草稿拿给阿萨德看，阿萨德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但对叙利亚能否出席和会却持“保留态度”。

在此以后的18个小时内，基辛格又访问了3个国家。他先到约旦，在那里得到了侯赛因国王的保证，国王说，即使叙利亚不出席会议，他也将派里法伊首相去。接着，基辛格又到了黎巴嫩。他力中东和平所作的努力，受到了黎巴嫩政府的赞扬。最后，他到了以色列，在那里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和外交手腕，总算得到了梅厄夫人同意召开和会和举行脱离接触的谈判。

以色列给基辛格提出一个特殊问题。基辛格知道，他不能在美国国务院奉行一项完全站在以色列方面的政策。但是，他也知道。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也不能奉行一项可以导致以色列失败的政策。他对朋友说，如果他真被逼到这一步，他就辞职了事。早在1947年，当他还是哈佛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就赞成“权势集团”的观点，认为在中东建立一个单独的犹太人国家，那就会像他后来所说的，将为历史种下“一个潜在的祸根”。他当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与约旦组成一个联邦国家，日子会好过得多”。可是他访问以色列后，看法却改变了。犹太人“居然顶住种种厄运”，建成了一个国家。他们创造了“奇迹”。无论是个人感情还是从工作角度出发，基辛格都决心要帮助以色列生存下去。

但是，由于赎罪日战争，许多幻想破灭了，其中也包括基辛格的一些幻想。自从这场战争以来，基辛格越来越认为，“以色列执行的是一种愚蠢、短视的政策”；它抓住几块阿拉伯领土不放，这样做不但对自己的安全没有什么帮助，反而激起公愤。阿拉伯人继续从苏联那里得到先进武器，而且显得比过去更有信心和尊严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决心恢复失地。

在此情况下，基辛格对以色列的“安全”越来越感到担心。他说：“阿拉伯人运用足以破坏西方经济的石油武器，迫使越来越多的石油消费国不得不采取反对以色列的政策。”他深信，不管美国如何经常调整中东的军备均势，以色列还是会越来越孤立的。有一次，基辛格对一位朋友说：“这是一个悲剧。可是犹太人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从一个犹太人隔离区逃出来，而他们建立的国家本身又成了另一个犹太人隔离区。”

基辛格相信，即使在美国，以色列得到的支持也会“愈来愈小”，因为越南战争令人失望的后果使更多的美国人不愿再卷入任何的国外纠纷。他觉得，以色列跟阿拉伯人完全和好，使自己第一次得到公认的、安全的和受到保证的新边界，正是时矣。如果错过了这一机会，大国很可能非强加它一项解决办法不可。

然而基辛格对中东和平的这种立场，却受到以色列一些人的反对和抱怨。他们说：“这位犹太人的美国国务卿，不为犹太人说话；他奔走于阿拉伯国家首都之间，同阿拉伯领导人拥抱，于着以色列人担心他可能干的那种出卖以色列利益的无耻勾当。”在美国，一部分犹太知识分子也对基辛格抱有深刻的怀疑。《评论》杂志主编诺曼·波德霍雷茨 12 月 6 日对基辛格说，他也跟一些以色列人一样怀疑起来，国务卿“究竟是一位打扮成张伯伦的丘吉尔呢，还是一位打扮成丘吉尔的张伯伦”？

就在同一天，基辛格邀请了一批美国犹太知识分子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们说明，他不是要抛弃以色列，恰恰相反，他是在把以色列从一个由“胆怯的”欧洲人、疯狂的阿拉伯人和孤立的美国议员组成的联盟下拯救出来。

1973 年 12 月 16 日，基辛格飞抵特拉维夫，同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举行了 3 个小时的会谈。这位国务卿阐述了自己的政策，特别强调了以色列日益孤立和脆弱的处境，并对以色列能否对付面前的挑战深表关切。他说，这是求得和平的绝妙机会，哪怕必须付出从阿拉伯领土上撤退的代价，也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占领领土并没有能够确保安全。赎罪日战争已经推翻了原先的设想。他敦促以色列进行谈判，放弃占领的领土，以换取有保证的边界。

基辛格言之成理，令人信服，他的观点似乎赢得了以色列内阁大多数阁员的赞同。当天上午，基辛格同以色列外长埃班讨论了有关和会的问题，同国防部长达扬讨论了脱离接触的问题，并就这两个问题又同梅厄夫人进行了磋商。

然后，基辛格在前往机场之前，又在雅得瓦西姆作了短暂逗留，那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纪念碑，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惨遭杀害的欧洲 600 万犹太人。他的助手把记者引到机场去，以使他能够对这个地方作一次纯系私人性质的拜谒。当时国务卿基辛格头戴传统的犹太人小毡帽，手擎点燃的蜡烛，在那里悼念那些未能像基辛格一家那样幸而死里逃生的犹太人。他在那儿呆了半小时，两眼直直望着刻在黑色石板上的那些纳粹死亡营里的人名，默默地悼念着。

基辛格离开雅得瓦西姆时，为以色列的孤立处境而“伤心”，他决心使今后不再需要树立这样的纪念碑。这时，他更清楚地了解到梅厄夫人为什么一个劲儿地强调安全了。他后来说：“只要我们能茹苦含辛，待人以善，孜孜不倦，时来运转——可别小看了时运的重要性——我们也许能够搞出点名堂来，”做到“化剑为犁”。

12 月 21 日，埃及、约旦、以色列、美国和苏联的外长齐集于当年国联

总部所在地的国联大厦，在瓦尔德海姆秘书长主持下，开始了为中东谋求和平的漫长的历程。25年来，中东局势紧张，兵连祸结，阿以双方的部长坐在一间屋子来，这还是第一次，尽管他们还不愿同对方握手，也不随便交谈一句话。由于安排坐位问题，耽搁了45分钟。法赫米和埃班一度进行了宣传战。但谈判总算开始了。

基辛格创造这个机会，是为外交提供一次机会，以显示外交有时能奏效的神通。他在会上强调自己的中间人作用。他说：“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道理。”他讲了一句阿拉伯语，意思是“往者已矣”。他还引用了犹太圣人希来尔的一句话：“如果不为自己，那么谁来为我呢？如果我只为自己，我又算一个什么人呢？”基辛格补充了他的想法：“有一个更大的道理……那就是要寻求一个能把各种愿望集合起来化为人类大家庭的真理的途径。”

12月31日，梅厄夫人的工党在大选中遭到挫折。该党在议会中失去了一些席位，反对派利库德的力量加强了。但以色列工党在国内政治上仍占统治地位，梅厄夫人受权组织新政府——这个艰巨的任务带来了一段漫长的政治动荡时期。梅厄夫人在首批发布的命令中，有一条是派国防部长达扬到华盛顿同基辛格会谈脱离接触的问题。达扬于1974年1月3日离开以色列，第二天上午11时走进国务院大厅。那天他同基辛格就脱离接触的概念讨论了4个小时，第二天又讨论了4个小时。当时基辛格对记者说：“双方的立场大为接近。”达扬的话则比较审慎，他说：“每个人都应当认识到，在这样长时期敌对和交战后，在埃以双方发生的激烈冲突之后，哪怕是向达成一项协议迈出第一步也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我希望我们现在都愿意在日内瓦最终迈出这一步。”达扬在会谈中以个人名义邀请基辛格再去中东推动脱离接触谈判，这是达扬的希望所寄。

1974年1月18日，基辛格再来中东，在梅厄夫人的官邸同这位女总理举行了会谈。他在一旁看着梅厄夫人代表她的国家在协议上签了字。梅厄夫人然后转身对国务卿说：“我真诚地、实心实意地相信，你在这个星期里创造了历史。”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我毫不怀疑这一点。”以色列原来对基辛格的重重疑虑似乎顿时烟消云散了。当天早晨的《耶路撒冷邮报》有一整版连环画，画着基辛格穿得像和平天使一样，坐在一门沉寂的大炮上。

在这以后，不到一个月，基辛格再次回到中东，着手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脱离接触谈判，这是短短的4个月中对中东的第四次访问。在开罗停留休息时，基辛格和萨达特又举行了一次露天记者招待会。有一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关于脱离接触问题，你将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提些什么建议呢？”萨达特这时把手臂搭在基辛格身上。这位埃及领导人回答说：“要信赖我的朋友亨利。这就是我告诉阿萨德的话。要信赖我的朋友亨利嘛。”

欲知埃及和以色列和谈进展的具体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

希来尔，著名犹太学者，生于巴比伦，活动时期为公元前30年至公元10年。他是当时犹太人的精神和道德领袖。



## 第三十二章 埃以和约

埃以和约终签字，褒贬臧否任评说；  
彻底和平犹遥远，干戈终须化玉帛。

“十月战争”结束了，埃及人民的贫困和国家经济困难重新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萨达特继承下来的经济混乱情况尚未调整好。在开罗及其他城市不满情绪普遍出现，尤其是对食品价格不满。萨达特从未像今天这样认识到，国家的资源不能再用于战争，而必须用于疲惫的经济。

正好在“十月战争”前，萨达特曾向以色列提出过和平建议。1970年10月，他当上总统不久，曾不顾许多埃及高级官员的劝告，拒绝重新对以色列发动消耗战。

11月，作为罗杰斯计划的一部分的埃以停火行将期满，萨达特又把停火时间延长了90天。

1971年2月，延长期快到了。虽然他上任刚3个多月，但他感到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他是愿意同以色列媾和的。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倡议”。倡议中，他以向以色列提供和平和安全为条件，换取以色列从阿拉伯被占领土撤出。

一个阿拉伯国家元首敢于提出同以色列媾和的建议，这是破天荒的第一遭。这个建议赢得世界范围的赞许，埃及人民也给予了热情支持。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对萨达特这一倡议视为非常积极的步骤而予以欢迎。不幸的是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的想法却不一样。梅厄夫人不愿放弃西奈任何一寸土地而拒绝考虑萨达特的建议，甚至公开指责罗杰斯竟敢把这一建议向她提出来。于是萨达特得出结论：梅厄政府没有和平愿望。倘若美国向以色列施加更多的压力，使其认真严肃地考虑这一和平倡议，那么，以色列为之付出巨额代价的1973年的“十月战争”就可能不会发生。

“十月战争”之后，亨利·基辛格取代了罗杰斯任国务卿。他会见了萨达特，并同萨达特一道着手从事一项他们称之为“和平进程”的工作。两人立即建立了密切关系。萨达特在他的回忆录中作了如下的记述：

“十月战争后我们所生活的这段时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一定是一个宝藏。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为了使局势得到解决或者使其复杂化，出现了许多方面和许多尝试。这是一个千头万绪的问题，问题的各个方面随时都可以燃烧起来，以便一切重新开始。

“也许，历史学家的缺点是他们太悲观了，因为他们只注意这幅画上黑色的、鲜血淋漓的一面，看不到缓慢地、悄悄地取得的许多成就。

“我想起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韦尔·杜兰特的一句话，他说：历史是一条在两岸之间流过的长河，河道里漂浮着尸体，出现了呼喊声、烈火、浓烟和眼泪，历史学家注视着河道，却忘记了两岸建成了农场、工厂、学校和博物馆。但是，当人们处于事件中心或事件的发源地时，就不能清楚地看到他周围的事物，不知道是他在推动事物，还是他随着事物运动。

“基辛格说过：统治者就是坐在历史这辆汽车的方向盘前面的人，他既开动汽车，又随汽车而动。基辛格还在他的一本书中说过：政治家是命运的一个工具。

“但是，这后一种观点的缺陷是使政治家或统治者失去自己的个性，失

去他的人民和他的环境的特点，脱离总的历史。

“这样做是恰当的：在埃及、阿拉伯东方以及全世界历史的这一段时期，我稍微停留一下。我按照自己的老习惯，回头看看我的后边，看一看我们原来在哪里？现在在哪里？今后走向哪里？我不佯称我对所有事情都掌握主动权，也没有一个人自诩能够这样。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突然，美国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变换了。继杜勒斯，上来了罗杰斯，在罗杰斯之后，又来了基辛格。把这3个人比较一下，在我们看来，基辛格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最善于理解问题，因此也最能取得成功……

“那些对基辛格感兴趣的人，正注视着前不久前的记录：他怎样尝试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美国同俄国之间、中国同美国之间的和解，缩小越南战争，撤出美国军队，把美国从一场民族灾难和一次内部的大分裂中拯救出来，并与参加巴黎和谈的越南谈判者分享诺贝尔和平奖金。”

“至于我对基辛格博士的看法，那就是，他是一个对历史进行了研究和长时间的考察，作过反复推敲，并把研究同政治结合起来的人。”萨达特说，“这不是说我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是吻合的……我同基辛格博士分歧很大，但是这种分歧很快就变成一些跨入其他一些互相谅解的领域的跳跃点。每个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讨论和考虑其他一些观点而成为一个共同点。”

通过第一次接触彼此就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而且很快他们就以“亨利”和“安瓦尔”相称了。这位擅长于现实政治的基辛格很快地认识到，他正面对一位“务实”的政治家，这位政治家的谈判策略不是在细节上争论不休，而是创造一种气氛，使你在心理上难以表示不同意见。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的第一部《白宫岁月》中说：“我不能讲，那时我已完全了解萨达特的内心世界。伟大的人物是少有的，因此人们必须逐渐深入理解他。”

基辛格穿梭于开罗和耶路撒冷之间，搞了两个协议，一个在1974年，另一个在1975年，使驻扎在西奈的埃及和以色列部队脱离接触。但全面的和平进程，连同他那实行全面和平的希望，看来受到了阻碍。萨达特在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的过程中，决定采取一项戏剧性措施：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

1967年战争和以色列部队占领运河东岸后，这条国际水道一直关闭而未能通航。根据第一个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军队已撤离运河一段距离，但运河区仍处在他们大炮的射程以内。尽管如此，萨达特还是抓住了时机。1975年6月5日，他宣布运河开放。他乘坐埃及“十月六日”号驱逐舰通过运河，并允许从苏伊士、伊斯梅利亚和赛义德港3城市外逃的难民重返家园。对全世界来说，重新开放运河表明萨达特对中东的和平和正常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尽管萨达特和基辛格作出了努力，但由于以色列和美国忙于克服国内的困难，外交活动曾一度停滞不前。鉴于以色列在“十月战争”最初阶段那种“不堪一击”的表现，作为以色列总理的梅厄受到了攻击，于1974年4月下台了。取代她的是伊扎克·拉宾。他曾任军队参谋长和驻华盛顿大使。拉宾领导着一个包括右翼利库德党成员的脆弱的内阁。他在政治上实在大软弱，以致无法同埃及全面推进和平进程。

1977年初，拉宾作为执政的工党领导人的职务由西蒙·佩雷斯取代。同年5月，自成立以来一直控制着以色列政府的工党在大选中大败于利库德党。该党主张强硬路线的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出任总理。这一情况在当时

被认为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事业的一大挫折。

贝京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3 年生于波兰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后划入苏联）。

1935 年毕业于华沙大学法律系。30 年代积极从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38 年成为贝塔青年运动波兰支部领导人。1939 年德军侵入华沙时，他逃往维尔纽斯，双亲和兄弟死在集中营里。1940 年因从事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被苏联当局逮捕，1941 年获释，参加流亡的波兰军队。1942 年随部队开入巴勒斯坦。

1943 年参加武装组织“伊尔贡·兹瓦伊·卢米”，并任司令。1948 年以色列国成立后，“伊尔贡”改组为自由党，他任党魁。迄 1967 年一直为议会中反对党领袖。

1967—1970 年参加民族联合政府，任不管部部长。1970 年任利库德集团（全国自由联盟）主席。

1977 年 5 月利库德集团在全国选举中获胜，6 月贝京组阁，任总理。在 1967 年“六五战争”中以色列所占领土问题上，他以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闻名。但后来与埃及总统萨达特举行关于中东问题的和平谈判，1979 年 3 月 26 日签署埃及和平条约。他和萨达特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

美国尼克松的下台以及杰拉尔德·福特这位临时总统的不稳定性，严重地破坏了基辛格在外交上作出的努力。然而萨达特并未气馁。1977 年 1 月吉米·卡特出任美国总统之后，萨达特决心同这位佐治亚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从一开始他就留给卡特这样的印象：他期望同以色列和平共处，而和平的内容应包括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完全承认以色列。萨达特还清楚地表明，他理解以色列对安全的需要，因而任何一项和平协议都应包括严格的安全保证这一内容。

萨达特和卡特书信频繁。他们两人都笃信宗教，也都来自下层，彼此相互尊重和信赖。卡特懂得，可怕的心理上的隔阂，也就是憎恨和疑忌这堵高墙，把阿拉伯和以色列分隔开来。在一封信中，美国卡特总统对错综复杂的中东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剖析。如萨达特后来说的，那封信间接地促使他对自己进行了重新的再评价。萨达特认为，是探索一种新的方法的时候了。他的思想又回到被隔离的 54 号牢房。他在那牢房内发现，他有着其他一些人所不具备的东西：一种能使他的看法发生深刻变化的能力。他写道：“思想僵化的人，永远无法改变现实，因此，他也就永远不会有所进步。”

萨达特独自沿着尼罗河散步，他叼着烟斗，一再思索着阿拉伯和以色列问的各种问题。整整一个时代，阿拉伯人接受的教育是把以色列看作是一种禁忌之物，一个只在战场上交锋的实体。以色列也是抱着同样态度来看待阿拉伯人。萨达特思量着，这种态度是否就不能改变？这个互不信任的障碍物是否就无法拆除？

回到开罗后，萨达特继续思考。有一天，在朦朦胧胧的幻觉中，他似乎正在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做祷告。柯克萨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座穆斯林圣殿。萨达特恍然大悟，他想，尽管埃及和以色列还处于交战状态，他要到耶路撒冷进行一次私人访问，在以色列营地的中心面对着以色列人，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

11 月，萨达特根据他的决定行事了。他在人民议会上宣布，为了和平，他愿意“到天涯海角”，甚至是以色列的会议大厅。

包括萨达特的朋友们在内的阿拉伯同胞们认为，萨达特这些话纯粹是神志不清的胡话，是在辩论最激烈时的失言。但他向他们保证说，他可是严肃认真的。以色列人同样被萨达特的话弄得目瞪口呆。不过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

11月17日美国大使求见埃及总统，递交一份贝京总理邀请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的官方请帖。形象像冰河一样缓慢地移动多年之后，如今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

“我将去耶路撒冷城，”萨达特对那些怀疑论者说，“其他阿拉伯人也会接踵而至的。”11月19日正当萨达特启程赴耶路撒冷之前，他的一位助手摇着头说：“此人如果不是疯子，那就是一位真正的伟人。”

从运河区的阿布·舒威尔机场起飞后不到40分钟，萨达特便在以色列的路德机场着陆。新的篇章就要揭开了。向这位埃及总统伸出欢迎之手的是以色列政界中的名流：前总理梅厄夫人，前总理伊扎克·拉宾、戴着引人注目的黑眼罩的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前外交部长阿巴·埃邦和阿里尔·沙龙将军，沙龙将军曾在“十月战争”中指挥以色列军队进行反击。

在前总理拉宾的回忆录中，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我承认，当我站在等待萨达特总统飞机着陆的行列中时，我心中萦绕着一种奇特的感觉。诚然我参加过1949年同埃及的谈判，但后来发生的事件更加强我年轻时便有的想法：埃及是我们的敌人。虽然我任总理时，我们也曾尽一切努力去促进和平。可我不能说，我真的想到这位埃及国家领导人会这么早就公开地访问以色列，而且我们是以极其盛大和正式的礼仪来欢迎他。当飞机滑行到欢迎人群的地段时，机舱门开了，在机场等候的人们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但当萨达特总统出现在舱门，走向舷梯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达到我过去认为不可能的高度。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无比激动的时刻；这是人们所要求的标志着新的时代的时刻。当以色列军乐队奏起两国国歌，尤其是当萨达特总统随着他的卫队检阅以色列三军仪仗队的时候，我仿佛进入了梦境。尽管我耳闻目睹这一切，但发生在我周围的一切仍似乎是十分难以相信的。”

第二天萨达特在阿克萨清真寺做完祷告，便到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说。议员听众们鸦雀无声，全神贯注。电视台对这件事作了实况广播。萨达特讲道：“你们愿意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的这个地区，那么，我十分真诚地告诉你们，我们欢迎你们同我们在一起。”当时许多以色列人听了这番话都流下了眼泪。但他又坦率地对他的听众说：和平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以色列必须从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撤退，包括阿拉伯的耶路撒冷城，并且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包括他们“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利”。作为交换，萨达特作出和平诺言，并同意提供“你们希望并接受的国际保证……来自两个超级大国或其中某一个超级大国的保证……以及你们接受的任何保证”。

“祝你们和平！”当他用这样一句阿拉伯语来结束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时，议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在这里保卫萨达特的以色列士兵向他致敬的时候，简直无法控制他们的喜悦。他确实提出了世界瞩目的建议，而这一建议是别的阿拉伯领导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更不用说用响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布了。在他公开承认以色列对安全的需要时，萨达特甚至解除了许多以色列的怀疑论者的思想顾虑。拉宾写道：“一位曾和以色列兵戎相见的阿拉

伯领导人站出来声称他理解我们对安全的需要，因而必须找出办法满足我们的合法权益，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看作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革命。”

萨达特回到开罗时，埃及人民给萨达特以盛大的欢迎。他对他的同胞说：“一切怀疑、不信任和不安的障碍都清除了。”人民议会对他的行动表示赞同。但是在 360 个议员中，也有些人对他的行动表示反对。

埃及总统的耶路撒冷之行，在当代的中东史上无疑是个重大的里程碑。但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埃及同以色列的谈判在一些问题上停滞不前，特别是巴勒斯坦人问题以及他们的前途问题。这种停滞不前的局面一直延续到 1978 年 9 月，卡特总统邀请萨达特和贝京访美、并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内的总统别墅聚会。对这次美国之行，萨达特在回忆录中写了如下的话：

“我的美国之行比单纯的‘横渡’大西洋意义更为深远。横渡一词已具有一种特殊的‘褒意’。而我认为，在一方和另一方之间建立桥梁，增进谅解、友谊和团结，所有这些都是同义词，即‘横渡’、逾越障碍、克服困难，为一件更重大、更要紧、更宏伟和更长远的事情铺平道路……

“因此，我感到横渡大西洋有一种特殊的滋味。这不是我首次赴美，以前我曾去过。但是，这一次我感到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我对此感到高兴。我认为，我应向美国舆论介绍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问题，直接作为发言人，通过记者招待会、电视谈话以及先后在联合国和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让千百万美国人听到我的声音。

“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美国的：我们在世界上的形象已经得到纠正，全世界已经清楚地懂得，我们能够打仗和赢得胜利。在这以后和以前我们都主张和平；当一切和平手段无济于事时，我们诉诸于战争；一旦战争结束，我们就回到和平状态；如果和平没有带来任何结果，我们就重新怀着厌恶的心情面临战争，面临一种停滞状态。这种状态名曰不战不和，即既非迫在眉睫的战争，又非迟迟将至的和平。

“美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那里的人正为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事情而操心，他们对中东知之不多，或者是按照那些控制新闻和报业机构的人的观点去认识中东。我不要求美国，也不要求美国人民做理解不了和违背公正的事情；我的全部要求是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的事业，公正地判断一切事情。美国人民享有作为一种哲学和一种生活与贸易的方式的自由。我将理智地同他们交谈。

“正如我在美国以及在访美前所宣布的，我口袋里没有一张采购单。我不是旅游者，也不是商人，而是一个正义事业的当事人。我来自一个历史最古老的国家，来自文明的母亲——埃及。在我的后面是一部悠久的充满着斗争和反抗、寻求知识和确立信念的历史，在我的前面是一条漫长的谋求生存和尊严的道路。诚然，我们是一个小国，但是，在尊严、言论自由和国家意志自由的面前，对我们来说一切都轻如鸿毛。我在美国宣布了这一点，就像我在我们处境最严峻的时候会见苏联人时宣布了这一点一样。

“在大国面前，我们也是一个大国，这是鉴于我们有自己的原则，并切望坚持道德和宗教的价值标准、民族团结和人类尊严。再则，我是襟怀坦白、头脑开放地面对整个世界。我们同苏联人的友谊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对美国或西方的敌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准同我们友好，我们就是谁的朋友；或更清楚地讲：没有永恒的友谊，也没有永恒的敌对。这是政治上的一个常识。我不妄称这个政治、经济或贸易上的概念是我发明的；这是一条人所共知的

基本原则，只不过我们小国比其他大国更敏感罢了。

“在美国之行中，我的重点明显地放在：代表埃及、代表整个阿拉伯讲话，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任何人。或许，我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讲话是从个人的角度和民族的角度来谈的。说从个人的角度，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阿拉伯问题的核心，我对此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是一种民族义务，同时也是每个阿拉伯人的义务，直到巴勒斯坦人能够用自己的嘴巴和逻辑对全世界讲话。

“从第一天起直到最后一天我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我抓住每个机会讲巴勒斯坦问题。我在第一天就宣布，巴勒斯坦人民没有得到他们有权从各方面得到的完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无辜地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至今他们仍被剥夺自决的权利；巴勒斯坦人应当同我们一起作为基本成员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样，如果以色列控制了耶路撒冷城，就没有一个穆斯林或基督徒会感到一刻的安心。然而，如果使耶路撒冷国际化，那就应该把旧城和新城都包括进去。

“我还向美国人民强调，只要巴勒斯坦人民处于无权地位，不公正就继续存在；如果巴勒斯坦人民按照他们所满意的、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和联合国决议的方式，恢复了自己的领土和实体，那么巴勒斯坦就将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坚强成员，争取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一个伟大支柱。

“我提醒美国人民，他们是最理解人是与土地相联系着的这个概念的人民。这种联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美国文明的基石。再则，同土地的联系导致人类尊重家庭关系、决不放弃土地和关心荣誉，并使为此而牺牲成为我们最崇高的愿望。

“巴勒斯坦人民决不放弃自己的土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领土他们就无法生存。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民正在过着一种与一切文明和人道主义准则背道而驰的生活。他们继续处于这种令人痛苦、伤心的状况是人类额头上的一个洗不掉的污点。这是美国和国际大家庭的一个机会：用公正洗刷耻辱，用谅解和善意减轻良心责备。我们不应错过，不应丢失这一机会，以便消除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争取世界和平。

“我要求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以同其他成员平等的地位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作出决定。”

就在萨达特和贝京在美国期间，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内的总统别墅里，经过 10 多天的讨论，问题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即对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实现和平有了大致的设想。基本点是萨达特和贝京同意以色列将从 1967 年战争中占领的西奈半岛撤军。埃及则同它过去的敌人发展全面的和平关系。以色列的撤离将在 3 年内分阶段完成。每一阶段埃及则相应采取诸如向旅游者开放边界、互换大使等措施，以便扩大两国间的联系。

此外，埃及和以色列同意着手解决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自治”问题。双方都明白，以色列最终能向巴勒斯坦人交出多大程度的自治权将是个“棘手的问题”。尽管协议用词含糊不清，但这是件重要的事。它意味着以色列同意考虑巴勒斯坦人的自治权，也支持埃及虽然同以色列媾和但并未放弃巴勒斯坦事业这一论点。

在戴维营会晤的最后阶段，埃以双方领导人经过多次会谈，于 1978 年 9 月下旬，在华盛顿白宫的草坪上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纲要》和《关于签署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纲要》（通称戴维营协议）。1979 年

3月，埃及签署了《埃以和约》，从而结束了两国之间历时30年之久的战争状态。萨达特在签字仪式上引用大预言家伊赛亚的话说：“让我们携手工作，直到化剑为犁、折矛作镰的那一天到来吧！”

萨达特的和平之举，既受到了世界大多数人的称赞，也遭到阿拉伯世界不少人的强烈反对。有的人把他誉为改变历史潮流的英雄人物。有些埃及政治分析家认为，萨达特经过摆脱苏联的控制和1973年的“十月战争”，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开始推行更加带有他自己印记的政策。

纳赛尔和萨达特本属于同一代的人物。他们是同一年出生的，纳赛尔出生于1918年1月15日，萨达特出生于1918年12月25日。他们都是自由军官组织成员，一起从事过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从1952年到1970年，纳赛尔同萨达特并肩共事。但是，纳赛尔执政时期同萨达特执政时期推行的政策，却有巨大的区别。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也是由于他们两人具有不同的个人特点。

纳赛尔是30多岁时掌握政权的，正值“青年的顶峰”。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国际上卷起了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纳赛尔信奉“革命的哲学”。他在埃及革命的急流中登上政治舞台，也经历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高潮。

萨达特是到50多岁时就任总统的。其时正值埃及蒙受1967年战争失败的屈辱，原来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被迫停顿，国家陷入了严重困难。阿拉伯民族主义从高潮趋于低落。一些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面临许多问题，更多考虑自身的利益。人们认为，这些都影响萨达特信奉的哲学。

谈到萨达特所要决心采取的和平政策，1980年9月，萨达特在对埃及大学教授们的一次讲话中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和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苏联答应给我们武器的一个主要条件是，我们不能破坏以色列的安全”，“两个大国都要求以色列不应被损害”。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强调，不能再同以色列打仗，不能用武力来解决阿拉伯同以色列间的问题，只能同以色列和平。萨达特在这里讲的，是他决定采取和平主动行动的国际方面的考虑。

同时，萨达特采取这项行动有其国内考虑。埃及在30年阿拉伯同以色列战争和对抗中承受了重担。埃及在4次战争中消费1000亿埃镑，死伤10万人以上。长期的战争损耗和不战不和局面，使埃及的元气大伤，人心思和。萨达特同以色列实现和平，为埃及赢得了和平环境，收复埃及领土西奈半岛，使埃及能医治战争的创伤，进行恢复和建设。

但是埃及处在中东这样一个地区的风口浪尖上，它难以摆脱超级大国的你争我夺。美国一心利用戴维营协议把埃及纳入它的中东战略轨道。以色列也企图通过埃及单独缔和，分化、削弱、侵犯阿拉伯国家。许多埃及人士认为，埃及为戴维营协议的签订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在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后，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了谴责埃及的决议。决议规定阿盟总部从开罗搬走，停止埃及的联盟成员资格。决议要阿拉伯国家中断同埃及的关系。除阿曼、索马里和苏丹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同埃及断绝了外交和财经援助关系。以色列利用阿拉伯国家的严重分裂，猖獗地推行80年代“大以色列”扩张计划。

1981年6月以色列飞机袭击伊拉克核设施。同年7月，埃及《金字塔报》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埃及为和平作出的努力遭到以色列

领导人的屏弃，“以色列把它看成是一张加紧侵犯被占领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以及黎巴嫩南部和伊拉克的许可证”。在 1982 年 4 月归还埃及领土西奈半岛后，以色列又在美国支持下，于同年 6 月悍然发动侵略黎巴嫩的战争。

萨达特曾期望利用美苏矛盾，让美国约束以色列，推行他同以色列的“和平战略”。萨达特强调对付苏联扩张威胁、联合美国、同以色列和平的政策，改变了埃及的外交格局，也影响到整个中东斗争格局。

然而，事与愿违，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不安。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三十三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和约签定非太平，一厢情愿岂能成；  
扩张政策无收敛，中东战火何时停？

萨达特曾期望利用美苏矛盾，让美国约束以色列，推行他同以色列的“和平战略”，从而为中东带来和平。结果事与愿违，不仅埃及国内矛盾急剧发展，而且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日趋紧张。

且说戴维营协议后，美国势力迅速进入埃及。也渗进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在美国偏袒下，更加嚣张。受到以色列严重威胁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不得不求助于其他国际力量。苏联加紧南下战略，也乘机渗进一些国家。中东和海湾，过一从地理位置和战略资源上来说都具至关重要的地区，越来越成为美苏争夺世界霸权中的一个热点。

萨达特曾经一厢情愿地期望以色列当局会认真对待和平，以色列总理贝京会信守他的诺言。但是，戴维营协议刚刚签订，贝京就否定了他的诺言，说他只同意在阿拉伯被占领土地上冻结建立定居点3个月。美国前总统卡特在1982年出版的回忆录《保持信心》中说：贝京曾同意在签订戴维营协议后不再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新定居点，在所有谈判完成以前停止建立定居点。随后，贝京政府一直拒绝在埃、以、美3方巴勒斯坦自治谈判中作出让步，致使戴维营协议规定的这一谈判达不成任何结果。

随着局势的发展，埃及公众憎恶以色列蛮横侵略行径的情绪日益强烈。

1980年2月，埃以正式建交前夕，埃及国内一片呼声，鉴于贝京当局的顽固态度，应该把埃以关系正常化同巴勒斯坦自治谈判的进展联系起来，即贝京政府必须在巴勒斯坦自治谈判上拿出诚意，使谈判取得进展，埃及才同以色列建交。当时在开罗报刊上，议会辩论中，甚至在政府高级官员发表的公开谈话中，都表达了这个意思。

但是，1980年1月，萨达特同贝京在阿斯旺会谈后，没过几天，萨达特就决定埃及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马上开始。他下令在内阁领导下成立经济、贸易、交通、文化等几个委员会，着手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工作，并决定2月同以色列互换大使。

从70年代中期起，美国给了埃及巨额军事和经济援助，但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参加巴勒斯坦自治谈判，但它并不促使以色列改变顽固立场，反而纵容以色列阻挠这个谈判，纵容以色列不断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挑衅。美国和以色列的做法一次又一次地把萨达特逼到墙犄角。萨达特不幸被刺身亡后，不少西方报刊指出：“美国政策害死了美国的又一个朋友。”

萨达特执政初期，继续奉行纳赛尔的政策，那时阿拉伯世界是团结的，一直到1973年“十月战争”。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埃及把国际交往主要限于美国和以色列，而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中，埃及疏远了不少老朋友，处境孤立。

萨达特1970年接任总统时，埃及经济已经很困难。经过1973年战争，情况更加恶化。萨达特采取经济开放政策，其重点在寻求外援外资，鼓励外国商品进口。在开放政策下，埃及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也出现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主要是本国工农业生产增长率低，进口猛增，债台高筑，埃及日益成为一个依赖外援和进口的国家。

埃及有些政治分析家认为，对美国的过分接近，对以色列的妥协，西方的影响同伊斯兰传统之间矛盾的激化，社会贫富的差别扩大，这许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触发了埃及人民对现状的不满。据埃及报刊分析，萨达特执政初期所依靠的“社会联盟”，包括有“拥有巨额和中等财富的埃及人”，有在政治上受到过打击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和革命前旧政党人物。但是后来这个“联盟”趋于分化。这些埃及报刊说：到了80年代初期，同外国资本有紧密联系、利用开放政策获得利益的那个阶层，在社会上最有势力。

1981年6月到10月，埃及的政治气氛是异常炙热的。贝京同萨达特会谈后3天，以色列于6月7日袭击伊拉克核反应堆。埃及群众上街举行抗议示威。8月上旬，萨达特访美失败，里根政府没有答应埃及要美国压以色列让步的要求。9月间，贝京访美，美以就进一步战略合作达成原则协议。8月下旬，萨达特同贝京在亚历山大会晤，达成以色列最后撤出西奈的协议。萨达特同意恢复巴勒斯坦自治谈判，并答应同以色列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达成原则协议”。在这期间，开罗、亚历山大等地接连发生群众示威。

萨达特执政初期曾经宣布要“开放民主”，实行新闻自由和“多党制”，但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萨达特于1981年9月下令解散十几个宗教组织，打击信奉耶稣的科普特教会，也打击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小组以及穆斯林极端组织，还宣布由政府接管全国几万个私人管理的清真寺。他下令逮捕了几千人，其中包括各反对党人士、一些著名政界人物、律师、教授、新闻记者和其他知识界人士。政府封闭了一些报刊，还解除了上百名新闻记者和大学教授的工作。萨达特采取这一非常行动，表明他意识到当时的埃及政局已处于大风暴来临的前夕。然而，萨达特可能没有料到，恰恰就在1981年10月6日，在戒备森严的纪念“十月战争”胜利的盛大阅兵式上，他被接受检阅的军队中的穆斯林极端分子枪杀了。

萨达特被安葬在开罗他遇刺的检阅台对面一座金字塔状的“十月战争”无名战士纪念碑下。萨达特墓前几米远，就是在“十月战争”中牺牲的无名战士墓。萨达特大理石墓上刻着：“忠诚的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战争与和平的英雄，他为和平面生，为原则而死于1981年10月6日胜利日。”

国际问题观察家普遍认为，萨达特的死是一悲剧。萨达特原以为在美国的支持和“监护”下，和以色列签订了戴维营协议。就可以实现中东和平，以色列就会履约和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撤出被其占领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然而，事与愿违，不仅以色列毫无改弦更张之意。继续进行侵略扩张，而且中东国家内部的矛盾也愈来愈尖锐，其中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就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战争一打就是8年。真是“兄弟阋于墙，两眼泪汪汪”了。

伊拉克和伊朗长期以来存在着领土纠纷。民族和教派矛盾。1975年两国曾为解决双方之间的争端签署了阿尔及尔协议，伊朗同意停止支持伊拉克库尔德反政府力量；伊拉克同意将阿拉伯河南段102公里中心线定为两国水界。

1979年2月，霍梅尼在伊朗执政后，两伊关系日愈恶化，不断发生边界冲突。1980年9月17日伊拉克宣布废除阿尔及尔协议，收回阿拉伯河的主权。22日出兵伊朗，导致两伊战争爆发。

战争初期，伊拉克军队占领伊朗约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一些城镇。

1982年4月伊朗大举反攻，收复了大部分领土。6月伊拉克宣布单方面

停火并将其军队撤至边界。7 月以后，伊朗在两伊边界不同地段多次越界发动攻势，但进展不大，战争基本上在两伊边界一带进行。双方互相攻守，战争不断升级。据统计，交战 8 年，伊拉克伤亡 23 万人，被俘 5 万人；伊朗伤亡 64 万人，被俘 1 万人。双方军费开支及各项经济损失已超过 4000 亿美元。

战争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人民反对战争，盼望和平。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两伊战争爆发 1 年零 9 个月之后，也就是在埃及总统萨达特逝世 8 个月之后，以色列趁中东国家陷于“内部分裂”之机，在美国的支持和纵容下，于 1982 年 6 月，悍然发动了对黎巴嫩的大规模入侵。这就是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在这次入侵中，投入的兵力多达 12 万人、坦克 1600 辆、飞机 500 多架，使本来就动荡的中东局势更加恶化了。黎巴嫩军民和巴勒斯坦武装力量，虽然进行了英勇抵抗，但终因力量相差悬殊而失败了。欲知这次战争的详情，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三十四章 以军入侵黎巴嫩

违犯协约肆侵略，烧杀抢掠罪难逃；

黎、巴军民齐奋战，杀声动天势如潮。

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于 1982 年 6 月，悍然发动了对黎巴嫩的大规模入侵。以军大规模入侵黎巴嫩，中东的观察家认为，主要有以下的目的：

——彻底摧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的基地和指挥中心，一举歼灭巴勒斯坦的武装力量，迫使巴勒斯坦人屈服，从而勾销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

——打击黎巴嫩国内支持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民族民主力量，扶植亲以色列势力，迫使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或在黎巴嫩南部建立所谓“安全区”，形成国中之国，以肢解黎巴嫩。

——加深阿拉伯国家的分裂，破坏阿拉伯国家和埃及正趋和解、恢复团结的势头，以便为以色列将来正式吞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铺平道路。

以色列贝京当局，选择这个时机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入侵不是偶然的。在埃及完全收复西奈以后，阿拉伯国家和国际舆论要求公正解决中东问题、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阿拉伯国家在对待两伊战争和同埃及恢复关系等问题上仍然意见分歧。以色列认为有机可乘，乃发动这次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企图制造新的既成事实，迫使阿拉伯国家就范。

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投入的兵力多达 12 万人、坦克 1600 辆、装甲车 1600 辆、大炮 600 多门、飞机 500 多架。以色列的主要目的是摧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乘机进行扩张，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军民奋起反抗。这就是第五次中东战争。

1982 年 6 月 4 日，一波接着一波的以色列 F—16 型战斗机 6 周来第三次轰炸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目标，包括 4 个巴勒斯坦难民营、一座法塔赫训练营以及贝鲁特机场。以色列飞机还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纳巴提亚附近地区及其他一些村镇。巴解部队用火箭和大炮轰击了以色列北部地区和黎巴嫩南部得到以色列支持的由哈达德少校控制的一块飞地。

第二天，6 月 5 日，以色列飞机对纳巴提亚、波弗特堡、阿尔农、哈斯巴亚和埃契叶进行了 42 次轰击；以色列飞机和舰艇还轰炸和炮击了从蒂尔到纳迈赫长约 25 英里的走廊地带的数十个目标；重型火炮部队开进黎境内 6 英里的迈尔杰乌荣；以色列直升飞机在达穆尔上空遂行侦察飞行，该城遭以军轰击达两小时之久。

在战争进行的第三天，6 月 6 日上午 11 时，以色列悍然出动 2 万军队，在大批飞机、坦克、装甲车掩护下，越过联合国驻黎隔离部队防区入侵黎巴嫩；西顿市遭到炮击，沿海公路被以军切断，位于扎哈拉尼河的黎巴嫩炼油厂被炸弹击中，储油罐起火燃烧；蒂尔以北横跨利塔尼河的桥梁被炸毁。以军分兵 3 路进攻，一路包围蒂尔，一路直取纳巴提亚和波弗特堡，一路由戈兰高地出发攻打谢巴。在扎哈拉尼河河口附近，以军实施了两栖登陆，企图切断巴勒斯坦人北撤的道路。另一股以军在拉希迪亚巴勒斯坦难民营附近登陆，同时一支伞兵在蒂尔以北的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实施机降。

以色列飞机撒下阿拉伯文传单，警告蒂尔市的市民不要向巴解游击队提供庇护所。成千上万的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在顺沿海公路北撤时遭到以

军炮击，死伤惨重。

在长达 33 英里的战线上，已有多处巴解游击队的据点被以军攻占，但据报道巴勒斯坦人抵抗得十分顽强。巴解游击队的高射炮在纳巴提亚附近击落一架以色列“天鹰”式喷气机，另一架以机坠落在萨拉范德附近。此外，还击落了 2 架以军直升机。巴解游击队继续用火箭轰击以色列的加利利平原西部和哈达德控制的飞地；巴解游击队击毁了 42 辆以色列装甲车；蒂尔中内的巴解游击队仍在作殊死抵抗，以军先头部队绕过该市继续北上；以、巴双方在波弗特堡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6 月 8 日，以色列军进至贝鲁特 15 英里处，在贝鲁特上空爆发了自 1973 年中东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空战。以色列飞机在蒂尔空投传单，敦促居民撤至海边以免遭轰炸，满城已燃起熊熊大火，下午 2 时，以色列人将 100 辆坦克调至巴解据点达穆尔以东的山区，以军炮火击中了西顿近郊的一处红十字会中心。杰津地区爆发了坦克大战，以军的意图是切断通向叙利亚的公路。

6 月 9 日，90 多架以色列战斗机攻击并摧毁了叙利亚设置在贝卡谷地的地对空萨姆导弹基地。据报道，22 架叙利亚米格战斗机被击落，叙方则声称击落了 19 架以色列飞机。巴解战士仍在西顿坚持战斗，以色列军在贝特丁附近的进攻受阻，损失惨重。

经过一系列激烈的坦克、炮兵和空中战斗之后，叙利亚军被迫撤至距以色列北部边界炮火射程之外的地区。以叙双方宣布停火。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仍在战斗。迄停火时，以色列已控制了 1/3 的黎巴嫩领土；又有 18 架叙利亚的米格战斗机被击落，83 辆坦克被击毁；以色列战斗机击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军事指挥部；巴解游击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在坚持战斗。

6 月 11 日，叙以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下一个目标便是包围贝鲁特。6 月 12 日，以军直升机机降部队在拜苏尔着陆，随即向巴卜达推进。此时，以军地面部队绕过哈尔达，从东面攻击该镇。以军进抵并攻占巴卜达、哈载斯和苏威法特后，哈尔达便失去了军事价值，巴解游击队乃于 6 月 14 日撤离。战争的最后阶段始于 6 月 22 日，以军进攻布汉姆敦并迫使叙军撤至远离贝鲁特的地方。经过一番有装甲和直升机机降部队参加的激烈战斗之后，布汉姆敦于 6 月 24 日被占。接着，25 日和 26 日，叙利亚、巴勒斯坦部队撤出阿莱地区。新华社驻黎巴嫩记者，曾以《贝鲁特在燃烧》为题，对以色列的侵略罪行和黎、巴人民的反抗作了如下的报道：

6 月 4 日以来，以色列依仗美国提供的 F—15 和 F—16 飞机，多次野蛮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其他地区。8.5 万名侵略军蹂躏了 1/3 的黎巴嫩国土，黎巴嫩人民的鲜血在流淌，和平的土地上升起了滚滚狼烟。

美丽的贝鲁特市西区，如今弹痕累累，许多高大建筑物已被炸成废墟，除了阵阵的炸弹爆炸声和地面炮火的轰鸣外，整个城市死一般的沉寂，街上没有车辆和行人。市内电话早已中断，供电设备也被摧毁。入夜后，全城一片黑暗，只有以色列飞机发射的照明弹在天空划出一道道鬼火般的亮光。敌机的频繁轰炸使空袭警报失去了意义。居民只要根据地面炮火声音就能判断以色列飞机又来空袭了。在地下室里，妇女们紧紧地搂抱着被爆炸声吓呆了的孩子。

但是，贝鲁特仍然屹立着。贝鲁特人民正在奋战。爆炸后的浓烟刚刚升起，民防队的救护车就已经呼啸着从四面八方奔向现场，救护人员和消防队

员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扑灭熊熊大火。贝鲁特各大医院的医生、护士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抢救一批一批的受伤者。

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抵抗战士，仍然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海滨公路上的坦克、大炮，警惕地注视着地中海海面，随时准备回去企图从海上登陆的以色列侵略者。安装在机动车上的防空炮，在大街上迅速变动着炮位；在居民楼之间的空地上，也部署了高射炮。炮手们隐蔽在建筑物的墙脚下，密切地注视着天空，向空中强盗猛烈开火。

贝鲁特在燃烧，贝鲁特人民的心也在燃烧。黎巴嫩已宣布成立了以萨尔基斯总统为首的民族救国委员会，来领导黎巴嫩人民渡过这严峻的时刻。在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支持下：黎巴嫩人民必将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利，历史古城贝鲁特将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以色列的侵略，不仅使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严重地损害了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急剧地恶化了中东地区的局势，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联合国安理会在6月6日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第五九号决议，要求以色列侵略军立即无条件地从黎巴嫩撤走。这项决议要求：第一，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把它的军队撤退到国际上公认的黎巴嫩边界以外去。第二，冲突各方立即在黎巴嫩境内和黎一以边界地区，同时停止军事行动。第三，有关各方在24小时内，向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他们接受此项决议的情况。决议说，安理会随时准备开会审议有关这场危机的问题。

但是，以色列贝京当局继续我行我素，在美国的纵容和支持下，公然无视安理会关于要它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侵略的决议，继续指挥它的侵略军向黎巴嫩内地大举进犯。以色列的侵略行动，受到全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中央委员会6月15日宣布：“阿尔及利亚坚决站在被侵略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一边”，“它一如既往准备提供形势要求的具体支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人民议会15日发表一项公报，呼吁阿拉伯各国加强团结，尽快向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抗击以色列的野蛮入侵。埃及总理毛希丁16日在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代表举行的一次紧急会上说，埃及要求以色列立即、完全从黎巴嫩撤军，保卫黎巴嫩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他还说，埃及决定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黎巴嫩提供药物和食品。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沙提10日宣布，这个组织已决定从紧急基金中拨款200万美元支援黎巴嫩，并呼吁其成员国派志愿人员前往黎巴嫩抗击以色列侵略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扎耶德下令为支援黎巴嫩的志愿人员和医疗物品提供运输方便，并决定捐款600万美元。在这以后相继捐款、捐物和派出志愿人员与黎巴嫩、巴勒斯坦战士并肩作战的，还有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利比亚、摩洛哥、澳大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6月15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入侵和强占黎巴嫩大片国土，指出美国纵容和支持以色列进行侵略，应当受到谴责。

以色列侵略军在遭到黎巴嫩、巴勒斯坦军民和驻黎的叙利亚军队的抗击后，施展假停火骗局，暗地集中兵力围攻巴解总部所在地贝鲁特西区。巴解受重挫，最后其在黎的全部12000名战士被迫分15批分散撤往8个阿拉伯国家。

不久，以色列又制造借口再次出击贝鲁特西区，支持黎右翼势力，血洗失去武装保护的巴勒斯坦难民营，2000多手无寸铁的巴平民惨遭毒手，这就

是“贝鲁特大屠杀”。此后，以色列扶持着一个傀儡“南黎巴嫩军”盘据黎南边境地区，一直到今天。

近半个世纪来，经过五次大规模中东战争，以色列几乎侵占了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部分领土。除造成大批巴勒斯坦人四散流亡而外，还有80多万人呻吟在以色列占领军的铁蹄下。老一辈的巴勒斯坦人受尽熬煎，新一辈的青少年却不甘继续忍受父辈的屈辱。

1987年12月9日，一场势如燎原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在以色列占领区爆发了。

这场起义的导火线是：12月8日，加沙地带一辆巴勒斯坦人乘坐的汽车被以色列卡车撞毁，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9日，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示威，要求惩办凶手；以色列占领军又打死示威者2人，打伤15人，并对当地难民营实行宵禁。以色列的镇压暴行激起巴勒斯坦人民极大愤慨，反以抗暴的怒火燃烧起来了，一个抗暴斗争的地下指导委员会成立，向全世界宣告：起义！

起义迅速蔓延到整个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被占区的大小城镇以及耶路撒冷市的阿拉伯区。起义斗争的先锋多是青少年，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石块。他们高呼“争自由，争生存”的口号，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以色列占领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不仅使用警棍、橡皮子弹，还动用了机枪、坦克、直升机和毒气弹。截至1989年4月底的统计，以色列占领者已打死巴勒斯坦示威群众480人，打伤数千人，拘捕1万多人，甚至毒打和施用毒气残害巴勒斯坦孕妇！

为了扑灭巴勒斯坦人民起义斗争的熊熊烈火，以色列当局还采取枪杀、驱逐、关闭学校、拆除民房、包围村镇和难民营等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1989年6、7两个月，以色列陆军总司令达恩·肖姆和以色列内阁成员、利库德集团强硬派人物沙龙先后发表讲话，叫嚣必须采取大屠杀的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巴解组织领导人，特别是要消灭巴解组织主要领导人阿拉法特，方可平息起义活动，在他们这一思想指导下，不少巴解领导人遭到伤害，最令人震惊的是，以色列情报人员暗杀了巴解主要军事领导人阿布·杰哈德。

那是在1988年4月16日凌晨，在突尼斯北郊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阿布·杰哈德还在伏案工作。突然，19人组成的以色列武装恐怖小组闯入室内，用冲锋枪从不同方位扫射，杰哈德身中70余发子弹，倒在血泊中。对这一血腥恐怖事件，以色列特务头子埃班直言不讳，说早已把杰哈德列入他们暗杀的黑名单，甚至宣称消灭了杰哈德是以色列的“重大胜利”。

以色列当局还用一些新的杀伤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青少年。据报道，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士兵用伪装成糖果的爆炸装置引诱儿童，孩子们捡拾，即被炸死炸伤。以色列当局还制造了一种染色子弹，用一种含有塑料和玻璃纤维混合材料制成的“M—85”型冲锋枪发射出去。这种枪每分钟可发射1200发染色子弹。凡中弹者，便被指控为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罪人”，立刻被抓进监狱。当被捕入狱的青年的父母要求释放自己的孩子时，以色列士兵又趁机勒索赎金。据报道，赎金数从80—800美元不等，往往相当于这些家长几个月的收入。以色列当局还在被占领区随心所欲地制定发布各种法律，以莫须有的罪名随便抓捕巴勒斯坦居民。

以色列占领当局满以为用镇压就可以把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平息下去，然而事与愿违，起义斗争已进入成熟的、持久的阶段。全世界人民也都同情、支持这一起义。联合国安理会多次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在占领区的

镇压暴行。

巴勒斯坦人民历经 40 多年的浴血奋战，1988 年 11 月 15 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十九次特别会议上，正式宣告巴勒斯坦国成立。

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宣读《独立宣言》。会议大厅掌声雷动，全体代表起立，长时间热烈欢呼，相互拥抱，不少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宣言》的最后一段话是：“我们谦恭地向为祖国献身的烈士和殉难者致哀。”

《独立宣言》和大会通过的《政治声明》显示，巴勒斯坦人民的巴解组织根据 40 年斗争的经验教训，作出了既坚持原则性又富有灵活性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新决策。其主要表现是：

——正式表示接受联合国通过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一切决议。主要是指第 118 号、第 242 号和第 338 号三个决议。这有着两重意义：一是明确了巴勒斯坦国的建立是以无可争议的联合国决议为根据的；二是默认了同样依据联合国决议建立的以色列国，从而修改了 60 年代通过的《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第十五条提出的“必须把犹太复国主义从巴勒斯坦领土上赶出去”的目标。

——确认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决议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地区和国际冲突。这就修正了《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第九条规定“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正确途径”的提法。

——重申巴解组织谴责违反人权行为的恐怖行动。这就剥夺了以色列和美国硬说巴解是一个恐怖组织进行恐怖活动的一切借口。

巴勒斯坦国的诞生，巴勒斯坦人民光明磊落的博大胸怀，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目前已有上百个国家正式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阿拉伯人，犹太人，全世界人民，都希望阿以冲突早日和平解决，使“中东问题”这座已经冻结了 96 年的冷酷冰山，在它出现百周年之前彻底消融，迎来一个和平安宁的新世界。正是：

烽火硝烟年又年，  
万物生灵遭涂炭；  
日日夜夜盼宁日，  
急望朝阳融冰山！



## 结束语

中东人民盼和平，社会安定利繁荣；  
阿以会谈开新面，但愿中东无战争。

中东问题至今仍是全世界人民所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其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全球和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从海湾战争及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之后，中东的大国势力，阿以力量对比，阿拉伯国家的相互关系，以及海湾地区旧有力量的平衡，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使中东地区总的形势趋向缓和，和平解决阿以冲突成为不可逆转的势头。

1991年10月30日马德里和会开启了中东的和平进程。10多年来，阿以多次交战，双方始终强调以武力作为解决中东问题的主要手段。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后，阿拉伯国家在对以态度上有所分化，阿以矛盾有所缓解；美国为避免中东地区再度成为冲突的热点，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已调整了对以色列的政策，由一味支持、偏袒转变为又压又护的做法；以色列态度虽仍僵硬，但也开始有些松动。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意味着阿以冲突出现转折，双方开始走上政治解决的道路。

在美苏争霸世界的冷战年代里，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从50年代一直将以色列作为抗衡前苏联扩张的桥头堡。以色列的建立及在美国公开支持下发动的侵略阿拉伯各邻国的数次中东战争中，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不遗余力地全面武装以色列，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力支持援助这个新建的国家，因而使这个弹丸之地的以色列居然数次战胜比自己大几十倍的、由20多个国家所组成的、具有两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然而进入90年代后，国际局势骤变，由于苏联的自我解体而使冷战时代宣告结束。目前世界正向多极发展。国际局势由原来的两霸争雄，而转变成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而它又面临国际上多种政治力量挑战的局面。为了确保美国与西方各工业大国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得到最广泛的满足，并妄图最终以美国的方式、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统治全世界，对美国与西方来说，更需要一个“听话的”、“安宁的”中东地区。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坚决不允许以色列参战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然而，要消除敌意，了却争端，确非一件易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已经存在半个世纪，打了5次较大的战争，至今局部的冲突还没有停止。长期以来，阿拉伯人就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持反对态度。他们反对贝尔福宣言，反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当联合国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关于巴勒斯坦将来分治问题的决议时，阿拉伯方面就表示反对。他们没有按照联合国的决议筹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当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14日建立时，阿拉伯国家想用武力消灭它，于是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没有被消灭，而且还占领了分给阿拉伯国家的6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开展武装斗争反对以色列。1967年6月5日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了所有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的土地，还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使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更是难上加难。

1968年7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巴勒斯坦国民宪章，重申了过去阿拉伯国家对待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国策，那就是要“摧毁犹太复国主义”，“把犹太复国主义从巴勒斯坦领土上赶出去”。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所以采取消灭以色列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以色列的侵略使阿拉伯国家被迫做出这种反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阿拉伯方面认为以武力消灭以色列是可能的。他们认为阿拉伯国家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完全可以对付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即使在战争中多次失败，也可以和以色列长期打消耗战，最终总是会取得胜利的。所以长期以来，除了埃及1977年和以色列缔结了戴维营协议，实现了埃以之间的和平外，其他阿拉伯国家没有打算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

1988年，巴勒斯坦国成立。在它的政治声明中向全世界宣布它承认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和338号决议。这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方面对以色列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这意味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放弃了1968年7月通过的巴勒斯坦国民宪章中对待以色列的政策，意味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这一举动受到美国的赞赏，接着开始了美国与巴解组织的实质性对话。

以色列在它的1948年独立宣言中曾宣称：“我们对一切邻邦和它们的人民伸出和平与善邻之手，并且请求他们与独立的犹太国为大家的共同的利益而合作，以色列国准备对整个中东的进步事业作出它的贡献。”但以色列至今未能实现它的诺言。由于阿以双方结怨很深，以色列对自身的安全问题特别敏感，把它视为犹太人的生死存亡问题。以色列人担心阿拉伯人发动突然袭击，他们经常采取一种过度的军事行动，甚至发动侵略战争，消灭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力量，占领阿拉伯的土地，以此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1967年的“六天战争”之后，由于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占据了比它自己的面积还要大3倍的阿拉伯领土，许多以色列人做着“大以色列”的美梦，以为这是上帝的安排，是上帝对犹太人拯救的开始，没有必要放弃它占领的土地。以色列的一些当权派，如利库德集团，经常引用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自然与历史的权利来为他们永远吞并整个巴勒斯坦作辩护。以色列不放弃被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特别是沙米尔政府，不断扩大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规模，以达到永久吞并的目的。他们拒绝“以土地换和平”的主张，甚至提出为了“大以色列”而牺牲和平，使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长时间没有进展。

1992年6月以色列大选，利库德集团失败，沙米尔政府倒台，接受“领土换和平”原则的工党获胜，拉宾组成新政府。这年8月下旬华盛顿第六轮双边会谈持续一个月，阿以各方一改过去相互攻击和纠缠枝节问题的态度，就实质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特别是在叙以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和解气氛。

实现中东和平的关键，首先是阿以双方都要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消灭对方，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通过和平谈判，实现阿以之间的和平与合作。正如一位以色列人士所推出的：“战争只能导致痛苦、灾难、死亡和仇恨。”以色列不可能彻底打败和消灭阿拉伯人，这是显而易见的。阿拉伯方面有如此众多的国家，有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民，以色列要永远霸占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不可能的。

1993年秋，中东和平进程终于出现了突破。8月30日晚，以色列内阁举行会议，批准了同巴解组织达成的关于首先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杰里科

镇实行巴勒斯坦人自治的协议草案。由 18 人组成的以内阁，在就这一协议草案进行表决时，16 位部长投赞成票，两人弃权。在这次内阁会议上，以色列总理拉宾首次公开承认，以已同被占领土以外的巴勒斯坦人士举行了谈判。他赞扬佩雷斯外长上周同巴解组织官员达成了关于首先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杰里科实行巴勒斯坦人自治的协议。后来新闻界透露，以色列同巴解的直接谈判是经挪威牵线实现的。双方 1992 年 12 月开始悄悄接触，1993 年 1 月 20 日在挪威外长霍尔斯特位于奥斯陆附近 90 多公里的萨普斯堡镇的一所农场别墅开始首次会谈。5 月 21 日谈判升为官方级，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萨维尔任以方谈判代表。8 月 19 日，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到达挪威。在他在场的情况下，萨维尔同巴解代表阿布·阿拉签署了协议。

在这之前，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的政治顾问谢里夫 8 月 29 日宣布，巴解组织准备修改该组织宪章，以便为与以色列相互承认作准备。谢里夫还指出，巴解组织不会使它的宪章成为和平的障碍。如果以色列承认巴解组织，那么巴解组织将修改全国宪章的有关条款。以色列电台曾广播说，以色列有可能在近期内承认巴解组织，巴解组织也将承认以色列。巴解组织 1968 年宪章，特别强调该组织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阿拉法特 1989 年 5 月曾在巴黎表示，这一宪章已经“过时”。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8 月 31 日在亚历山大与来访的巴解主席阿拉法特举行了约两小时的会谈，讨论了巴勒斯坦初步自治方案。会谈结束后，穆巴拉克总统发表谈话说，加沙——杰里科自治是全面和平解决已有 40 多年的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一步；埃及时此表示全面支持。

当时，巴以要就这一方案达成一致，也还有一定阻力。以色列各反对党计划再次提出对拉宾政府的不信任案，以表示抗议。利库德集团认为，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将视这一行动力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开端。据透露，巴勒斯坦领导机构内部对加沙和杰里科自治方案的意见还不完全一致。此外，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在关于加沙和杰里科自治方案的含义及认识上也还不尽相同，以色列主张该自治区的安全事务应由以色列负责，但巴勒斯坦强调以色列必须完全撤军。

为了推动和谈，1993 年 8 月下旬，中东地区的两个重要会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个是在贝鲁特召开的阿拉伯前线国家外长会议。会议决定正式接受美俄邀请，参加定于 8 月 31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十一轮阿以双边谈判，尽管以巴协议是在这项马德里开始的已进行了 10 轮的中东和谈范围之外达成的，参加这一谈判的各方（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态度对于协议前景仍有极大影响。另一个是巴解执委会在突尼斯召开紧急会议。消息说，尽管巴解内部对在加沙地带和杰里科镇先实行自治的方案争论激烈，但会议最终仍然通过了该项方案。

令人欣慰的是，1993 年 9 月 13 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巴以和平协议”签字仪式。世界观察家认为，“这是中东和平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和平协议规定：

——以色列将从 1993 年 12 月 13 日至 1994 年 4 月 13 日撤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镇，以军撤出后将重新部署在约旦河西岸以居民区周围，负责以居民的安全；

——巴勒斯坦将在今后 9 个月内选举产生自治委员会，对教育、经济、

文化、卫生、环境保护、税收、旅游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实行自治管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杰里科镇的行政和军事管辖权将——并取消；

——巴勒斯坦将建立自己的警察部队，被占领土外的巴解组织战士可作为警察部队；

——在加沙地带和杰里科镇实行自治的 5 年过渡期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将就巴勒斯坦永久自治协议进行谈判，以解决耶路撒冷地位、边境、遣返难民、以色列定居点和军队驻扎等问题。

协议呼吁建立以巴经济合作委员会，在贫困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实行经济发展计划，解决用水、电力、能源、财经、交通运输、贸易、工业、劳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

那天上午 10 时许，来自世界各国和美国各界代表 3000 人出席了签字仪式。他们中间有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美国现任总统克林顿、前任总统卡特和布什，以及一些国家的外长、美籍犹太人和阿拉伯社团的领导人等。

会场主席台设在白宫南门口，左边的长桌是 1979 年以色列与埃及签署和平协议时用过的桌子，右边是讲台。

11 时 15 分，克林顿总统陪同身穿便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和满头银发的以色列总理拉宾踏着红地毯走出白宫，来到主席台上。顿时，会场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人们共同期待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克林顿首先讲话。他强调说，协议不仅给巴以人民带来了和平和希望，而且为巴以年轻一代的未来揭开了美好的一页。

佩雷斯和阿巴斯代表以巴双方先后在和平协议文本上签字。尔后，克林顿总统与站在左右两旁的阿拉法特主席和拉宾总统握手。在他的引导下，两位几十年来势不两立的宿敌相互握手。这次握手标志着揭开了中东和平进程的新的一页。

“巴以和平协议”虽然签订了，这仅是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步，但是，要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各个方面仍需做出“认真的艰苦的努力”。双方在耶路撒冷地位（以色列认为那路撒冷是其首都，巴勒斯坦认为是他们的圣城）、巴勒斯坦立国（巴勒斯坦希望通过自治达到立国，以色列对此迄未允诺）等问题上分歧仍然很大。巴勒斯坦问题之最终解决，还得以色列放弃对巴勒斯坦的侵略、扩张政策。

中东曾是人类古文明的摇篮之一。困扰中东几十年的问题一旦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必将对这一地区和世界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

## 中东战争大事记

1917年11月6日 英军侵入巴勒斯坦。1918年9月占领全境。在此之前，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书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银行家洛希尔，表示英国“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将尽其最大的努力以达成此项目的”。此信后被称为“贝尔福宣言”、并得到美国的支持，为创建犹太国创造了条件。1922年国际联盟给予英国以管辖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同年，英国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分为两部分，西部仍称巴勒斯坦，东部称为外约旦，并封汉志的统治者侯赛因的第二个儿子阿卜杜拉为外约旦酋长。在英美的支持和怂恿下，定居各地的犹太人开始大规模地向巴勒斯坦移居。到1946年巴勒斯坦境内的犹太人增至约60万人，占当地居民总数的30%以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矛盾日益尖锐。

1919年1月 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关于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的建议”。建议“邀请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那里定居”，一旦“犹太国”成为事实，“国联就立刻承认巴勒斯坦为犹太人的国家”。

1936年4月 阿拉伯人举行总罢工，要求废除英国委任统治，停止犹太移民，斗争持续6个月之久。英国对此实行武装镇压。

1942年5月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纽约比尔特的旅馆举行会议，制订了所谓“比尔特摩计划”，要求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成立犹太国。

1945年5月 犹太复国主义者向英国送交请愿书，要求再让10万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并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

1947年11月29日 联大就巴勒斯坦阿、犹分治问题进行表决。结果美苏等33票赞成，阿拉伯国家等13票反对，英国等10票弃权，分治方案通过。方案规定：巴勒斯坦在1948年结束英国委任统治后，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国面积11000多平方公里，包括北部的加利利、约旦河以西地区和加沙地区；犹太国面积14000多平方公里；耶路撒冷及其郊区（计158平方公里）实行国际化，由联合国管理。

1947年11月30日 当日清晨，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耶路撒冷和一些阿、犹混居的村镇发动了武装袭击，挑起了巴勒斯坦“非正式战争”。

1948年4月9日 犹太复国主义者头目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恐怖组织“伊尔贡”血洗了耶路撒冷附近的德杰尔·亚辛村，全村250名阿拉伯男女老少无一幸免。22日，犹太武装力量占领海法港，把当地7万名阿拉伯居民赶出家园。

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国正式宣告成立。

1948年5月15日 阿拉伯联盟5个成员国——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分别同以色列军队展开了激战。第一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由此爆发。

1948年5月29日 安理会通过了停火4星期的提案。经斡旋，阿以双方在6月11日起实行停火。

1948年7月9日 4周停火到期，以色列继续发动进攻，战斗持续了10天，以军共侵占了1000多平方公里土地。7月15日，安理会通过了无限期停火提案。

1949年3月7日 美国又支持以色列派军队夺取亚喀巴西面5英里的埃拉特要地，获得了通向红海的出口处，切断了阿拉伯国家在陆地上的联系。

1952年1月26日 开罗群众获悉英军在伊斯梅利亚开枪打死13名埃及人的暴行后，立即举行了50万人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群众出于义愤，放火烧了英国人开办的银行、商店和影院。大火持续了8小时之久，焚毁了700多座建筑物和大片市区。这就是有名的“开罗大火事件”。

1952年2月至6月 埃及国内政治、经济危机频发，法鲁克国王连续更换了5次内阁也无济于事。“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在纳赛尔主持下，决定采取行动。随后，“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改组成革命指导委员会，直接控制国家政权。

1952年7月23日 埃及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为了清除给军队和整个国家带来耻辱的卖国贼，军队已经夺取了政权”。

1952年7月26日 在“自由军官组织”指挥下的装甲兵团开进了亚历山大，攻占了法鲁克国王居住的蒙塔萨宫和拉斯·丁宫。下午在拉斯·丁宫法鲁克被迫签署了退位的声明，并被勒令离开国境。

1953年6月18日 埃及共和国宣告成立。

1955年2月28日 以色列侵略者向埃及管辖的加沙地带发动了1949年停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使埃及遭到重大伤亡。

1956年7月26日 纳赛尔在开罗解放广场向25万群众发表重要演说，宣布将“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全场沸腾，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1956年7月27日 艾登致电艾森豪威尔，要后者与英法一起对埃及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并用军事力量作为最后手段，“使纳赛尔恢复理智”，同时提议3国立即举行外长会议。

1956年8月2日 英、法、美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公报，鼓吹运河是“国际水道”，“始终具有国际性质”，否认埃及将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权利，建议24个国家在伦敦开会，妄图通过国际会议把运河公司重新置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

1956年8月9日 纳赛尔下令成立埃及民族解放军。到8月14日，在短短的几天里，就有8万名青年参加了民族解放军。

1956年10月24日 英、法、以一致确定要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计划先由以色列对西奈半岛发动攻击，吸引埃及主力东援；接着由英法从塞浦路斯、马耳他、亚丁和航空母舰上出动飞机轰炸埃及，摧毁埃及有组织的防御力量；然后英法军队向塞得港发动进攻，切断西奈埃军的退路；最后由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英法占领运河区，全歼埃军，迫使纳赛尔下台。10月25日，以色列按照预定的侵略计划，秘密而迅速地进行军事动员。

1956年10月24日 埃及和叙利亚、约旦成立了联合司令部。与此同时，埃及在运河一线部署了大量的军队。

1956年10月29日 以色列出动45000名军队分4路入侵西奈半岛，埃及在西奈半岛只有6个营的部队，以色列在法国海空军掩护下乘虚而入。

1956年10月30日 为了反击以色列的入侵，纳赛尔下令全国实行总动员，并命令装甲部队开进西奈，埃及空军出击米特拉山口的以色列军，轰炸以色列的机场。

1956年10月31日 英法正式宣布成立两国对埃作战的联军司令部。由英国驻中东地面部队总司令凯特来陆军上将任司令，法国的巴尔若海军中将任副司令。当天下午，英法空军对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等城市和机场进行轰炸。埃及军民奋力抵抗。

1956年11月6日 英法从马耳他海运22000名海军陆战队在塞得港附近登陆。登陆作战除了使用海军炮火外，还动用了15架直升飞机，并且发射火箭，使大批群众惨死在血泊之中。

1956年11月6日 在各方的压力下，英法被迫宣布停火。1956年12月22日，英法侵略军全部撤离埃及。英法政府为进行这次侵埃战争，总共动员了16万兵力（不包括以色列的20万军队），出动了100多艘军舰和2000多架次飞机，花费了3亿美元的军费，结果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场斗争震撼了帝国主义在中东的统治基础，促进了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

1957年1月2日 埃及政府废除了1954年签订的英埃条约，粉碎了英国重返运河的迷梦。

1957年1月15日 埃及颁布命令，规定所有外国在埃及的银行、保险公司、贸易公司归埃及人所有。

1958年7月14日 伊拉克人民推翻了费萨尔工朝的统治，成立了伊拉克共和国。1959年3月，正式宣布退出已格达条约组织。

1967年6月5日 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又一次大举进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此前，美国不仅给以色列运去400辆新式坦克和250架新式飞机，而且从空军现役部队中抽调1000名所谓“志愿军人员”充实以色列的空军。

1967年6月7日 以军向西奈半岛推进，占领大部地区。同日，以军又进抵约旦河西岸，占领了面积约4800多平方公里的整个约旦河西岸。

1967年6月8日 以军进抵苏伊士运河，西奈全部陷落。以色列结束同约旦的战斗后，将大量兵力转移集结到叙以战线。

1967年6月10日 这次战争前后经过6天，3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遭受了重大损失，被迫停战。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侵占了约旦河西岸、那路撒冷城的约旦管辖区、加沙地带、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达65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使近100万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被迫背井离乡，过着难以言喻的悲惨生活。

1967年11月22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二四二号决议。提出“以色列武装部队从占领的土地上撤退”，“不能容忍以战争攫取领土”，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个决议还要求保证以色列在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和亚喀巴湾的“通航自由”权利，并把巴勒斯坦问题归结为“难民问题”。

1970年6月25日 美国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罗杰斯计划”。它主张埃及和以色列实行“3个月的有限期的停火”；在这期间双方各派代表同联合国特使雅林会谈，讨论用什么办法执行第二四二号决议，使以撤军，并使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主权和独立。7月23日，埃及正式宣布接受罗杰斯计划。

1970年10月7日 安瓦尔·萨达特继纳赛尔担任埃及总统，并发表声明，保证奉行已故总统纳赛尔的政策方针，并提出首要任务是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1973年1月底 为了反击以色列侵略，收复被占领的土地，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军事首脑在开罗阿拉伯联盟大厦开会，商讨未来战争的共同战略。

1973年1月31日 埃叙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成立，并加紧战备活动。

1973年9月10—12日 萨达特、阿萨德和侯赛因在开罗举行3国首脑会议，一致确定收复失地的共同战斗目标。会议结束时，埃及和约旦宣布恢复外交关系。随后，叙利亚和约旦也宣布恢复外交关系。

1973年10月3日 埃及征得叙利亚的同意，选定在10月6日，即伊斯兰教的斋戒日和犹太教的赎罪日发动反击。为了避免苏联阻挠干涉，发动反击的时间没有正式通知苏联。正如萨达特后来所指出，“十月战争”的“决定是百分之百的埃及的决定，是违反两个超级大国的意愿的”。

1973年10月6日 爆发了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同以色列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在此次战争中遭到沉重打击。以军共投入40万兵力，伤亡达5000人，损失飞机200余架，坦克1000辆，物资消耗与财产损失超过70亿美元。

1973年10月6—18日 在此次反侵略战争中，阿拉伯各国把石油作为捍卫国家主权、收复失地和反对强权政治的战略武器，采取减产、提价、禁运以及国有化等措施，配合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以色列侵略者及其支持者。美国每天的石油进口减少了200万桶，许多工厂因而关门停工。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1973年11月11日 埃及和以色列代表在苏伊士城附近签署了“六点协议”，其中规定埃以双方在联合国监督下立即开始就脱离军事接触问题进行谈判。

1974年2月28日 埃及同美国正式恢复“六五战争”中断绝的外交关系，重新互派大使。

1975年11月30日 阿布鲁迪斯油田终于回到埃及手里。按照埃以协议规定，1976年2月22日，以色列侵略军撤退完毕。

1977年11月19日 萨达特总统访问那路撒冷，并在以色列国会发出和平呼吁。

1978年9月 下旬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应卡特总统之邀访美，并举行会谈。在美国的参与下，埃以签订了戴维营协议。

1979年3月 埃以两国领导人又在美国的主持下，签订埃以和约。

1980年2月 埃及和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经过30年来持续战争和战争威胁后，萨达特打开了同以色列和平谈判的道路。

1980年9月17日 伊拉克同伊朗关系日趋紧张，萨达姆政府宣布废除阿尔及尔协议，收回阿拉伯河的主权。9月22日，伊拉克出兵伊朗，导致两伊战争爆发。

1981年6月7日 以色列派飞机袭击伊拉克即将竣工的核反应堆。

1982年4月 以色列归还被侵占的埃及领土西奈半岛。

1982年6月4日 以色列动用12万军队、1600辆坦克、600门火炮和数百架飞机，大规模入侵黎巴嫩。在这次战争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遭受严重损失。

1987年7月20日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598号决议，要求伊拉克和伊朗立即停火。两伊接受决议，于1988年8月20日正式停火。在这场历时8年的战争中，双方死亡60余万人，伤100余万，作战费用和经济损失约达5400亿美元，遭到袭击的油轮540余艘。

1987年12月9日 被以色列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揭竿而起”，他们不畏强暴，以石块为武器，与前来镇压的全副武装的以军展开英勇的搏斗。斗争持续3年，使以色列遭受重大损失。

1988年11月15日 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

会第十九次特别会议正式宣告：巴勒斯坦国成立。会议通过巴勒斯坦《独立宣言》和《政治声明》两个重要文件。



1990年8月2日 伊拉克出动10万大军·入侵科威特。8月8日，伊宣布与科合并，8月28日又宣布科为伊拉克的第十九省。联合国安理会先后就伊侵科通过12项决议，均被伊拉克拒绝。

1991年2月26日 伊拉克在联合国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打击下，被迫宣布从科威特撤军。

1991年3月3日 伊拉克宣布接受安理会3月2日通过的686号决议，该决议规定在海湾实现正式停火条件。伊拉克接受安理会所有决议，表明它在实际上已放弃对科威特的主权要求，也标志着海湾战争的结束。

1993年8月30日 以色列内阁批准同巴解组织达成的关于首先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杰里科实行巴勒斯坦人自治的协议草案。

1993年9月13日 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平协议——《巴勒斯坦有限自治原则宣言》的签字仪式在华盛顿白宫南草坪举行。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巴解组织执委会成员阿巴斯分别代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原则宣言上签字。国际舆论认为这是中东和平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

